中國近代史

范文瀾著

中國近代史

上編　第一分冊

著者　范文瀾

發行者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十五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版期　卅八年六月滬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372〕〔Q72〕S.0001-5000（P.512）

本書據生活.讀書.新知上海聯合發行所1949年版影印

說明

一、中國近代史分上下兩編，上編敍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下編敍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上編又分兩個分册，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五年爲第一分册，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九年爲第二分册。本書是上編的第一分册。

二、本書純屬草稿性質，各分册擬陸續付印，目的在便於讀者審閱。其中觀點錯誤、取材不當、繁簡失宜、語句欠妥等病，所在多有；切盼讀者閱覽時隨手標出應改之處，以便將來蒐集許多寶貴意見，作修改草稿的南針。

三、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飽受外國侵略的苦難，永遠不能遺忘。稿中列舉某外國如何殘暴，如何詭詐，都是專指侵略者說的，與各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無涉。

四、凡引用原文，如文句較長，多註明出處；數句或數字，多省略不記，惟概標『』符，以明語有所本，非出臆造。

中國近代史目次

第一分冊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形成及中國人民舊式的反抗運動——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

第一章 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第一章 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〇年））

第一節 緒言

十八世紀後半期，英國已是世界第一個商業和殖民地強國。以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八年）瓦特完成蒸汽機的製造爲起點，早在全國普遍發展的紡織工業首先獲得劃時代的大進步，接着蒸汽機應用到其他工業上，使英國的製造廠變成了巨大的機械化的企業，作爲英國紡織業中心的曼徹斯特烟囱林立，也成爲全世界紡織中心了。一八一二年（嘉慶一七年）完成了輪船的裝製，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又製造火車鐵道，這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駕駛着新式運輸工具，帶着可怕的殺人大炮和精美而又廉價的紡織品，開闢世界市場，她決不允許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閉關自守，孤立於資本主義世界之外，那是完全自然的。

可是中國——世界第一個老大封建帝國，她是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社會，廣大人民過着勤儉窮苦的生活，曼徹斯特的機器布，敵不過中國土布的結實而便宜；社會上層人士，四季服裝有一定制度，材料全用絲織品，中國的養蠶業和絲織工業在當時是舉世無匹的。『天朝

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八年給英王喬治上諭。）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支持了滿清的嚴格閉關政策，英國布匹和毛織物在中國市場不能取得必需品的地位，如果不依靠可恥的鴉片貿易（直到一九〇〇年英國一向依靠鴉片來維持貿易優勢）很難打破中國的太門。下列簡表顯示戰前中英貿易的概況（單位千元）：

年份	中國對英輸出額	英國對華輸入額	輸入額中所包括的鴉片價	除去鴉片中國出超額
一八一八年（嘉慶二三年）	一四・一四四	一六・〇〇四	四・七四五	二・八八五
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	一四・四〇一	一五・九三二	七・六〇八	六・〇七七
一八三三年（道光一三年）	一七・八一四	二二・三〇四	一二・八七八	八・三八八

鴉片在中英貿易中成爲決定性的商品，中國既決不能放任，英國又決不肯放棄，英國資本主義逐步發展，鴉片輸入額依國力而逐年增大；反之，中國統治階級逐步腐化墮落，無法阻止大量白銀因鴉片輸入而逐年流出，最後必需出於戰爭，戰敗者自然是中國。

第二節　可恥的鴉片輸入者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佔領鴉片產地孟加拉。一七七三年（乾隆

三八年）東印度公司獨佔鴉片專賣權，開始對中國經營鴉片貿易。為要顧全公司的『名譽』表面上禁止公司船販運鴉片，但給予私人商船的執照中却列有一項條文，註明這些商船除運輸東印度公司自己生產的鴉片以外，不得運輸任何

第一期輸入情況

鴉片，違則罰款。從此輸入量逐年增大，一七八〇年（乾隆四五年）至一八一六年（嘉慶二一年）公佈的數字為每年輸入約四千至五千箱，據東印度公司航務長的記錄說：『一七八六年中至少已有六千箱鴉片運入中國，較前六年每年所輸入者，已超過五六百箱』足見實際輸入比公司發表的數字大得多。本期內滿清政府感覺到鴉片的壓力，於一七九六年（嘉慶元年）一八一三年（一八年）一八一五年（二〇年）三次嚴令禁止，但東印度公司把鴉片的種植及其向中國的私賣，作為自己財政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份，決不放鬆對鴉片貿易的鼓勵。

第二期輸入情況

一八一六年，東印度公司允許鴉片自由貿易，這給了英國私販們的營業以新的強大的推動，輸入更旺，至一八三四年（道光一四年）竟達二一・八八五箱的巨額。本期內英國工商業愈益發展，不僅需要中國大量茶葉供給本國及歐陸各國，一八二〇年起又需要中國大量生絲供給本國絲織工業，中英貿易的支付方法是英國向印度輸入大批布匹，換取鴉片，轉向中國換取絲、茶和白銀。中國感到鴉片威脅的嚴重，一八一七年，滿清政府執行禁烟法令，要求搜船並令其立『不售鴉片』字據。東印度公司通令公司船、

私人商船堅決拒絕認爲『爲保持英國之尊嚴及公司之利益，凡懸掛英國國旗之船，必須拒絕搜查，』又認爲『若公司應允簽寫此種誓書（字據）將來對於歐洲與中國之貿易，恐發生惡果。』如果私人商船出立字據，『航務委員會便取消彼等之貿易特許權。』它派兵船一艘到廣州示威，把怯懦的滿清政府嚇倒了。此後清政府於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二九年、三二年、三四年訂立各種法令，企圖禁運禁吸，但除了二一年鴉片商船自黃埔、澳門移至伶仃洋，貿易更覺便利以外，絲毫不生禁阻的效果。

第三期 輸入情況

一八三〇年以來，英國工業空前發展，三二年，工業資產階級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勝利，自由黨（代表資產階級）代保守黨（代表大地主階級）當權。三四年，取消作爲商務機關的東印度公司，改組爲殖民地總督爲統治，因此對華貿易就變成了英國私人企業所完全能夠執行的事務。這種私人企業的對華自由貿易當時發展得非常迅速，不管中國政府拚命抵抗，它們在一八三七年將價值二千五百萬元的三萬九千箱鴉片運入中國，三八年，運入四萬零二百箱。中國發生銀源枯涸的危險，當然要講求自救之道。可是自稱文明的英國政府，強迫一部份印度農民種植罌粟，用墊款辦法來引誘更大一部份農民也去種植，用嚴格壟斷的辦法操縱這種毒藥的全部生產。在政府市場上，由國家官吏拍賣給商人，偷運到中國。每箱鴉片上英國政府所化的費用約二百五十印洋，而在加爾各答拍賣時，却按照

每箱一千二百一十印洋至一千六百印洋的價格發售，印度的英國政府就依靠這樣的非法貿易取得七分之一的收入，它不惜發動武力來阻止中國的自救行動，資產階級所謂『文明』『自由』的實質就是『強權卽公理』。

第三節　腐爛的『天朝』

鴉片輸入與滿淸腐爛統治是互爲表裏的。中英雙方都玩弄兩面手段來推進鴉片貿易，英國明禁暗運，滿淸明拒暗受，貫通雙方的是賄賂。

鴉片貿易從乾隆後半期開始發達，那時候正是駭人的受賄者和珅做大學士，他開兩座洋貨庫，出售大呢、羽緞、嗶嘰等英國貨，很可能私賣鴉片。咸豐九年法律規定洋貨店有出售鴉片權，當是和珅以來的舊例。如果這個推測不誤，鴉片不僅和地方官吏（主要是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勾結，而且和朝中大官也直接聯系着，更不待說政以賄成的間接聯系了。任何禁令不能阻止鴉片貿易的增大，中國方面的主要原因在此。

事實上滿淸皇帝也是鴉片貿易的受賄者，他禁止外商在其他海口通商（康熙時有江浙閩粵四海關），保證粵海關獨佔利藪，海關監督又必用滿人，替他搜括金錢玩好。監督於正稅外，勒索賄賂，稱爲『規費』。雍正、乾隆以來，皇帝經常以淸查積弊爲名，『將規費改正歸公。行之旣

久，陋規漸又增加；無所底止，華夷各商，咸受其累』（道光二三年耆英奏。）皇帝勒索監督，監督勒索洋行，洋行勒索外商，背上加費，循環不已。耆英所謂『從來清釐積弊，另定新章（陋規歸公）大抵如此，不獨關稅一事爲然。』確說破了滿清統治者在各方面剝削的祕密。若干年一次的海關陋規歸公以外，還有每年照例賄賂，定出辦貢、備貢、人參變價三種名目。辦貢是隨時獻納新奇物品，備貢（年貢）每年三次，是無代價的獻納呢、羽、鐘錶等英國貨，參價是朝廷發給海關若干斤人參，（吉林貢品，）按高價變錢獻納。海關從鴉片得肥，皇帝從海關分肥，因之朝廷可以嚴禁鴉片，但不能嚴禁官吏受賄。英政府質問『大清國家豈得開一眼而察遠人（英商）犯罪，閉一眼不察官憲犯罪乎』（琦善轉呈與外部大臣致中國宰相書，）這正是禁烟失敗的重要原因，滿清皇帝是一隻眼看鴉片的毒害，一隻眼又看鴉片的利益的。專制政體的皇帝，個人態度對政治起極大的作用，這就是說，不管嘉慶帝如何積極嚴禁，絲毫不能阻止鴉片的輸人，禁令只供官吏利用，向鴉片商勒索更多的賄賂。從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以來，歷次禁烟都證明這一事實。試看開始積極禁烟的嘉慶帝得些什麼效果？

一七九六年嘉慶帝頒佈禁烟法令。一七九八年航務長向印度長官報告說『一般人均相信，海關監督因暗中鼓勵此種違法貿易，藉以發財，彼決不能積極設法禁止。』一八〇二年航務委員會報告『中國政府雖然一再頒佈禁烟法令，而鴉片之銷路確已大增，毫無疑問。』

一八〇九年（嘉慶一四年）兩廣總督兼代理關務百齡發令禁運。一八一一年航務委員會報告：『據觀察，總督關於禁烟之語，不過官樣文章而已，毫無積極禁止貿易之意，因政府久以縱容私運爲發財之機會。』

一八一三年（嘉慶一八年）嘉慶帝令刑部擬定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烟分別治罪條例，上諭斥責官吏說：『各海關竟有私徵鴉片烟稅銀者，是竟導奸民以販鬻之路，無怪乎流毒愈熾也。』一八一五年航務委員會記載：『當時因官吏阻礙販烟，阿立加先生遂決定每箱抽稅四十元，以分與中國官吏。』

嘉慶帝禁烟的結果就是這樣。道光帝繼續嚴禁，結果還是一樣。

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十二月）上諭嚴禁海口守巡員弁賣放偷漏說：『鴉片烟流行內地，大爲風俗人心之害。總由海口守巡員弁賣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着阮元（總督）達三（監督）認眞査拏。』阮元密奏請『暫時覊縻，徐圖驅逐。』這八個字的後面，自然是大批賄賂。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總督李鴻賓設巡船。『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聖武記。）一八三一年（道光一一年）上諭嚴禁販運吸食及私種烟苗。次年，東印度公司航務記錄說：『最近伶仃洋內所運入之貨，特別加多。中國政府雖欲消滅此種貿易，茲無論其有無誠意，而並未成功。』『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與洋船約，每萬箱許送數百箱與水師報功，甚或

以水師船代運進口，於是韓肇慶反以獲烟功，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水師人人充橐，而鴉片遂至四五萬箱矣』（聖武記）。

廣東官吏從鴉片貿易獲大利，內地官吏當然不甘落後，歡迎鴉片廣泛流行，從中取利。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奏稱；『鴉片之禁已非一日，其風不息而愈熾者，非立法之不嚴，實稽察之不力。查夷船載運烟土至廣東黃埔、老萬山二處停泊，內地奸商分設窯口接運。其大宗由海運至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天津、關東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專司收囤轉販之戶。其由內河興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筒，載以舟車，實繁有徒……是興販者確有來蹤，不難稽查。而開館者則咸在通都大邑，更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各省大吏督率僚屬，認眞查緝，何至不可遏絕。』這說明官吏是鴉片貿易的保護者，他們的利益早和鴉片混成一片。內地大量吸烟，也由於官吏的默認。

天津是鴉片第二大市場，貴族官僚集中地的北京盛行吸烟可以想見。又在天津經營鴉片業的英國人郭子立（又譯作郭士利，）熟悉中國官場情形，道光一六年，英政府派領事義律駐粵，義律約郭子立商議推廣鴉片的方法，郭子立議論滔滔，大意說：『清廷百事泥舊，毫無進步傾向，惟知傲慢自尊，不顧世界大勢。要路顯官，盡爲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尙。朝廷命官多嗜好鴉片，故倘以賄賂擴張販路，必能達到目的』（武堉幹：鴉片戰爭史：義律小傳）義律大喜，託郭子立包辦朝廷方面苞苴之事，後來首席大學士穆彰阿指使投降派有計劃的破壞林則徐禁烟，滿

足英國的侵略慾，不能不想到郭子立與穆彰阿、琦善、耆英這一羣賣國賊的秘密關係。

馬克思說：『英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爲和鴉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並破壞了宗法制度底柱石。』的確，自高自大的『天朝』，在英國鴉片商人看來，完全有理由予以藐視。皇帝自稱爲『國父』，他的官吏自稱代皇帝行施『父』權，這個作爲國家柱石的封建倫常，曾是欺騙人民的一種重要手段，但是事實揭露他們的極端無恥，在人民看來，完全有理由予以驅逐。侵略的鴉片戰爭以及革命的太平運動，都是從滿清腐爛統治產生的。

第四節　烟毒汎濫於中國

殺人的英國侵略者與自殺的中國統治者合作，儘量推廣鴉片貿易，到道光時代，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駭人的破壞現象。

從鴉片銷場看，鴉片已流行全國。道光九年上諭：『鴉片流行內地，皆由番船分銷各省商船，載往各處售賣。』十一年上諭：『鴉片局各處城鄉市鎮所在皆有。』鴉片『由海路運至天津，有數棧代爲包辦關稅。山陝等處商賈來津銷貨，即轉販烟土回籍』。（宣宗聖訓）『盛京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沾染惡習日深，幾成積重難返之勢』。（黃爵滋、耆英等奏。）這些說明英國鴉片

在全國範圍內組成了經濟侵略的毒網。

從鴉片吸食者看，鴉片漸漸取得對中國統治階級及依附統治階級的各色人等的統治權。道光一八年黃爵滋奏：『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作坊、商店主人）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烟具，爲市日中。』蔣湘南與黃爵滋論禁烟書：『今之食鴉片者，京官不過十之一二，外官不過十之二三，刑名錢穀之幕友，則有十之五六，至長隨吏胥不可以計數。』蔣湘南的估計。當然只是一些感想，但所謂京官不過一二，經上諭指出有親王、輔國公等高級貴族，有宮中侍衛，內廷太監等皇帝親近人，有『世職官員相率玩法』決非一二少數。尤其使朝廷恐慌的是兵丁吸食鴉片，『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轍』（道光九年上諭）。鎮壓人民的力量削弱了。自從『鴉片吸食者不可勝數』，以北京爲中心，全國遍佈着滿洲貴族、旗丁、太監、官吏、地主、紳士、士人、幕友、商賈、優伶、隸役、綠營兵、僧尼道士、娼妓一大羣鴉片癮者，據道光一五年估計，吸洋烟人數，約二百萬以上，幾乎腐蝕了大部份的統治階級及其依附人。不僅『拏辦烟案之人即吸烟售烟之人，互相庇護，狼狽爲奸，絕無破案拏之時』（宣宗聖訓）而且吸食者的生命，掌握在英國鴉片商人手中，他們惟恐鴉片不能源源接濟，癮發喪生，自動幫助烟商破壞禁烟法令的實施，把禁烟派看成死敵，有意或無意作了英國侵略者的忠實內應。

從財政經濟方面看，中國每年出口絲茶等土產，不能抵償鴉片價，還要補足白銀數百千萬

兩，人民『竭其終歲之操作，不足以償閭室之一燈』（夏燮：中西紀事。）就是說，人民整年的勞苦生產，替剝削者償付鴉片價還不夠，這樣，財政上發生銀荒，經濟上生產力大遭破壞。例如，『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皆闤闠聚集之地，舉向行商舖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烟而已矣」』（林則徐：宜重禁吸烟以杜弊源片。）舊商貨一半被鴉片奪去，情勢嚴重可以想見。一部份統治階級感到銀荒的危險，力主禁烟，道光一八年黃爵滋奏摺，主要從這一點着想。他說：『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年復一年，不知伊於胡底。』黃爵滋所舉銀數未必確實，但金銀大量外溢，確使政府痛感：『若再數年間，銀兩愈貴，奏銷（國家開支）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淸，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自然，政府總是向人民，主要是農民敲剝的，這就是舊捐稅已經繁重得難以負擔，舊捐稅。外又加上新捐稅，農民無力負擔重稅，陸續破產流亡，有的在官吏保護下種植鴉片，放棄正當生產，如廣東、福建、浙江、雲南、山西等省，種烟田畝繼續增加，土烟較洋烟價廉，因之烟毒擴大到社會下層去。林則徐在宜重禁吸烟以杜弊源片裏說：『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有銀四五分卽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吸鴉片

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費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卽另費銀三十六兩。』這裏鴉片價是指洋烟。貧民生活窮苦，受購買力的限制，不能吸食洋烟。自土烟盛行，價廉易得，烟毒侵入貧民層，生產力的萎縮和破壞更不堪設想。

英人馬爾丁描繪當時烟禍說：『鴉片腐化了、降低了和毀壞了不幸福的人底精神生活，而且還毒殺了他們的身體。鴉片販賣者時時刻刻向貪慾無厭的吃人神貢獻新的犧牲品，而充當兇手的英人和服毒自殺的華人，就彼此競爭，向吃人神的祭台上貢獻犧牲品。』這是多麽悲慘的一幅圖畫。統治階級迫誘勞苦人民服毒，當作犧牲品貢獻給吃人神，這種情況，直到現在的所謂『寓禁於徵』政策，本質上很少有變動。

第五節　統治階級對鴉片的態度——抵抗、妥協、投降三大派

白銀外溢，到一八三四年以後，形勢實在嚴重不堪了，滿清政府必須處置當前的緊急問題，一派人主張弛禁，對鴉片妥協；一派人主張嚴禁，徹底消滅烟毒；又一派人無所表示，實際是主張維持現狀，這一派人最後取得勝利。

道光一六年許乃濟奏請弛禁，理由是：『閉關不可，徒法不行，洋銀有出無入，食鴉片者幾遍天下，』事實證明禁烟失敗了。他主張承認鴉片爲合法貿易，『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

材納稅，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民間販賣吸食，一律勿論，祇禁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吸食。內地種烟，聽民自便，土烟大量生產，英商無利可圖，洋烟不禁自絕。這

安協派—許乃濟爲首

一派的主張純從挽救漏銀的觀點出發，以爲首先是『稅額輕於行賄，偸越之弊，不戢自消』；其次是『以貨抵貨，有贏無絀』（廣東總督鄧廷楨等奏）又其次是『以中國之鴉片抵夷人之鴉片，夷人爲利而來，必至折本而去，久之自不復販』（蔣湘南：論禁烟）這一派主張如果實行，英印國庫可能遭受暫時的損失，但決不能『不禁自絕』因爲洋烟性味酷烈，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成本不大，可以減價競爭，弛禁的結果，勢必洋烟土烟同時盛行，鴉片戰後情況就是明證。例如，浙江台州出產土烟『黃巖一縣，無不吸烟，晝眠夜起，杲杲白日，闃其無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烟禁大開，鬼世將成』（道光二二年浙撫劉韻珂：致伊里布等書。）安協派公開官佈禁官不禁民，準備犧牲人民的生命，全國出現無數黃巖縣，他們是不會傷心的，這種露骨的殘忍主張，當時被抵抗派嚴厲斥責，道光帝在抵抗派影響下，革許乃濟官職『以示懲儆』（一八年，上諭。）

抵抗派—林則徐爲首

道光一八年，黃爵滋奏請嚴禁官民吸烟，來抵抗鴉片的輸入。辦法是限期一年戒絕，過期犯禁，常人處死刑，官吏加等治罪。道光帝令各省督撫大員商議。反對派琦善、伊里布等二十人，其中滿員十三人；贊成派林則徐等八人，其中漢員六人。

二十八人中反對派佔多數，滿員又佔反對派中多數，這說明禁煙派勢力是薄弱的。但道光帝受銀荒、兵弱的威脅，傾向禁烟派，看到林則徐奏文稱『鴉片流毒天下，爲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宜重禁吸烟以杜弊源片）大受感動，決定嚴禁，任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往廣東查辦鴉片。

投降派——穆彰阿爲首

這一派人勢力最大，人數最多，主要是滿洲貴族，道光帝最信任的首席大學士穆彰阿暗中主持，爲本派首領。他們反對弛禁，因爲他們不單依賴於鴉片貿易，而且還依賴於這個貿易的偷運性質，與英印政府利益一致。他們又反對認眞嚴禁，以免喪失大宗收入。他們以『有傷政體』來反對妥協派的合法輸入，以『聖朝寬大』來反對抵抗派的嚴刑禁止，形式上表示寬嚴得中，實際是外國鴉片商的代理人。當道光帝傾向於抵抗派的時候，他們暗中破壞烟禁，等到英國侵略者佔領定海，道光帝動搖時，他們公開打擊林則徐，割地、賠款、開放海口、鴉片無限制輸入，迎合英國當時最大限度的需要。這一派人在統治階級中佔領導地位，本身利害與外國侵略者相符合。隨着外國侵略的逐步深入，他們的賣國事業也逐步發達；從穆彰阿開始，繼承人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段祺瑞、汪精衞以及現在的中國反動集團的領袖，百年來一脈相傳，逼迫中國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六節　轟轟烈烈的禁烟運動

林則徐是中國封建文化優良部份的代表者，又是滿清時代維新運動的重要先驅者。他在一八三○年（道光一○年）與黃爵滋、龔自珍、魏源等結宣南詩社。這一小詩社中人，黃爵滋發動禁烟運動，龔、魏發動維新思潮，林則徐成爲他們的首領。他後來探詢外情及意圖製造新式船礮，思想上是早有某些基礎的。

道光一八年黃爵滋奏請嚴禁鴉片，林則徐正在湖廣總督任上，首先實行黃氏主張，捐廉配製大量斷癮丸，強迫吸食者戒絕。一面大舉搜查，繳獲烟槍五千五百餘桿，土膏一萬二千餘兩，兩湖禁烟大見成效，增強他的自信心，奏稱：『查看輿情，並非不可挽救』（查拏烟販收繳烟具情形摺）道光帝得奏，以爲『所辦甚屬認眞』，十一月任林則徐爲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查辦鴉片事件。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以來口頭上喧譁的禁烟法令，開始變成實際行動了。

一　嚴厲的禁烟（一八三九年（道光一九年正月至同年九月））

道光一九年正月，林則徐在往廣州途中，原來贊成弛禁反對嚴禁的兩廣總督鄧廷楨，放棄舊主張，寫信給林則徐立誓：『所不同心者有如海』，願『合力同心除中國大患之源』，從此鄧

廷楨成為第二有力的禁烟派首領。中國官吏慣用『虎頭蛇尾』的方法詐取賄賂，起初禁令森嚴，對被詐者示威，等到貪欲滿足，禁令即成具文。義律懂得這一慣例，往澳門觀望形勢。不料林則徐是特殊的官吏，有決心禁絕鴉片，在路上密劄廣東官吏按清單嚴拿『包買之窯口，說合之孖氈(Merchent)與販各路之奸商，護送快艇之頭目』（正月，密拿漢奸劄。）二十五日林則徐到廣州，英國老鴉片商查頓見勢不佳，逃離中國境。伶仃洋面之躉船二十二艘（每艘存鴉片一千箱上下，）企圖開船暫避，被林則徐派水師制止。

二月，林則徐傳集伍怡和等十三洋行，宣佈諭帖，令轉諭各洋商公司人等報明存烟實數，諭帖中聲明：『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斷無中止之理。』滿清官吏表示如此堅決的意志，百餘年來鴉片商不曾見過，義律無法推諉，來到廣州，但仍取觀望態度，暗中反抗繳烟，指使老鴉片商顛地夜間逃遁。林則徐查明截回逃人，按照『違抗封艙』舊例，下令停止中英貿易，派兵嚴密圍守洋館，撤退沙文(Servant 即所謂買辦，)斷絕躉船與洋館往來交通。義律大窘，陸續交出全部鴉片二萬二百餘箱，值英金三百萬鎊，核銀約八百萬兩或銀元一千二百萬元。林鄧怡良（廣東巡撫）三人會奏：『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如蒙恩准，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夷人躉船鴉片盡數呈繳摺）

繳烟是何等嚴重的大事件，林則徐很順利地做成了。一眼看鴉片禍害的道光帝，以為『外

夷』畏懼『天朝，』因而發生虛驕心。但他另一眼看的是鴉片利益，禁烟成功對他和大部份的統治階級是有損害的，因而發生鄙吝心。至於繳烟將發生何種後果，他在精神上絲毫不曾作準備。他的虛驕心，表現在林則徐奏摺上硃批『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所辦可嘉之至』一類的話上；他的鄙吝心，表現在十餘萬斤茶葉錢讓林鄧等私人捐辦，不問錢從何來，祇要不動用公款，樂得『照所議辦理。』義律、郭子立、穆彰阿、這些老奸看透他的弱點。侵略者從外面用輪船大砲來對付虛驕心，投降派從內部用『勞師糜餉』來對付鄙吝心。事變演進全爲他意想之外。從三月起，他在投降派陰謀影響下，開始表示動搖，此後他左右搖擺，虛驕心招致戰禍，鄙吝心造成慘敗。

三月林則徐、鄧廷楨會同水師提督關天培督率文武官員收繳鴉片，驅逐外國鴉片商，查拏吸烟販烟人，深得廣東人民擁護，進行極順利。各省禁烟運動受廣東影響，相繼發展起來，鴉片貿易確是可危了。道光帝突然下一道嚴諭，斥責禁烟的官員，說『其弊不可勝言，』禁止收繳『民間烟土烟具，』『嗣後各省拏獲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繳烟土烟具入奏。』他還譏笑那些自首戒烟的人說：『何必呈繳烟具以自表其改悔？』這一道實際停止烟禁的上諭。主要是打擊禁烟最嚴的林則徐。林鄧見前途危險，懇求道光帝堅持禁烟政策，說：『無知蚩氓，相率傳訛，轉幸明諭之頒，冀遂深藏之術。若因此頓更大局，非獨前功可惜，更虞挽救無方。且風聞外夷於呈繳之後，知內地

民人烟可不繳，不無反唇相譏者，於國體尤有關係。臣仰蒙委任，專辦此事，下懷實深焦急』（遐陳民間烟土烟具仍宜收繳片）道光帝不聽。這是投降派對抵抗派第一次打擊，取得勝利。

四五兩月，林則徐收繳全部鴉片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在虎門灘上燒燬（公曆六月三日開始至二十五日燒畢。）當時『各國洋商，聞風來觀，作文紀事，頌中國之政』（聖武記）『該夷人等咸知一一點頭，且皆時時掩鼻，旋至臣等廠前，摘帽斂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誠』（林、鄧等會奏：銷化烟土一律完竣摺）。這一偉大行動，是以林則徐爲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國人民純潔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堅決性，一洗百餘年來被貪汚卑劣的官吏所給予中國的恥辱。六月三日，是中國人民值得紀念的一日。投降派方面也在五月中擬出一個『食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由道光帝公佈。章程所定刑罰極嚴，條文極密，似乎政府決心禁烟，但最重要的一條是『吸食之案祇准官弁訪拏，不許旁人訐告』，這等於保證官吏有權貪汚，鴉片癮者有權吸食。抵抗派山西巡撫楊國楨奏稱：『在官人役及官親幕友長隨人等，託足公門，勢必互相容隱，巧爲彌縫，請變動新例，准軍民人等告發。』道光帝下諭批駁，言語支吾，說不出『不許訐告』的理由，祇能依恃有權便說：『所請軍民告發之處，格礙難行，着毋庸議』（東華錄）這是投降派對抵抗派第二次打擊，取得勝利。

鴉片貿易是英印政府的重要財源，是滿清官吏的巨大弊竇，又是數百萬販烟吸烟人的生

活命根，禁絕鴉片決不像林則徐所想所做的那樣簡易，這是很顯然的。林則徐的才能、道德，在當時自然是第一流，但閉關時代的傳統知識，限制了他不知道中國以外的世界，而且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樣，抱着『天朝聲威』可以『慴服夷人』『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絕市閉關，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一類自高自大不識時務的舊見解。在與外人實際接觸中，林則徐逐漸改正舊思想，開始從蒙昧無知進到探求新知，從嚴禁鴉片進到獎勵通商，他的思想是在向進步方面變化中，因爲思想裏包含保守進步兩種成份，不多的進步成份使他獲得某些成效，濃厚的保守成份使他終於鹵莽致敗。

林則徐不同於一般保守份子的特色，就是他願意瞭解外國國情。聖武記說：『林則徐至粵，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繙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林則徐也說：『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於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因此『必須時常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可定控制之方。』他積累材料，編成四洲志草稿，敍述各國歷史、疆域、政治等情況。他的友人魏源根據四洲志，編海國圖志（道光二四年初版，）記事更詳備，日本明治維新，受海國圖志影響甚大。其餘如汪文泰著紅毛英吉利考略（道光二一年出版、）楊炳南著海錄（道光二十二年出版）徐繼畬著瀛環志略（道光二八年出版、）都比四洲志後出。林則徐是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有這些逐漸增加的新知識，對外態度，顯起變化。例如致英女王維多利亞照會初稿中說：『汝海外夷人，敢

於侵犯天朝，實屬罪不容誅，今姑先予警告，如能悔罪輸誠，尙可曲宥，否則大兵所至，汝區區三島立成灰燼矣。』（濮蘭德‧清室外紀）這表示對世界情況的完全無知。第二次照會（一九年十二月發）改爲：『向聞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欲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並聞來粵之船，皆經頒給條約，有不許攜帶禁物等語，是貴國王之政令本屬嚴明，祇因商船衆多，前此或未加察，今移文照會，明知天朝禁令之嚴，定必使之不敢再犯。』區別英政府與鴉片商，留出交涉餘地，比初稿確有進步。西人澳門月報說：『林則徐留心外國事務，觀其知會英王第二封書，足見其學識長進之效驗，』這是公正的批評。雖然『天朝』『蠻夷』等舊觀點並未改變，但多少有異於盲目排外交的流弊。

林則徐對外國鴉片商堅持強硬態度，令進口各船出具『永不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卽正法，情甘服罪』的甘結。他的第一理由是『貿易一事，該國（英）之國計民生皆繫於此，斷不肯決然捨去。若果英夷憚於具結，竟皆歇業不來，正米利堅等國之人所禱祠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會奏轟擊夷船情形摺）他的第二理由是『論者或恐各夷商因此（具結）裹足，殊不思利之所在，誰不爭趨，卽使此國不來，彼國豈肯不至。縱或一年偶少，次年總必加多，且聞華民慣見夷商獲利之厚，莫不歆羨垂涎，以爲內地民人格於定例，不准赴各國貿易，以致利藪轉歸外夷。就此察看，則其不患無人經商，亦已明甚矣。』（附奏夷人帶鴉片罪名應議專條

夾片）他看出英美間矛盾，又看出華商與外商間矛盾，不怕英國也不怕各國商人停市挾制。尤其是商船往南洋一帶販茶獲利倍蓰（聖武記）使他更有恃無恐。同時各國商船，主要是美國商船，具結進口帶來洋錢一二百萬元，呈『近年頗爲罕見』的新現象。林則徐獲得這些成效，愈益堅持不具結不准進口的主張。投降派奏請道光帝免鴉片商具結，說『雖責以萬分切實之結，亦將甘心出具，徒開含混之路』這是代表義律及貪官汚吏的意見，因爲當時義律已經承認『如有鴉片，將貨物盡行沒官』，對『人卽正法』字據，則堅決拒絕。在義律清楚懂得『繳烟係一時之事，具結乃長遠之事』。林則徐調走後，『貨盡沒官』要用大賄賂使成具文，已是對禁烟退讓一步，『人卽正法，』要用更大賄賂，實不甘再讓。在貪官汚吏獲得『貨盡沒官』甘結足夠借端勒索，飽塡慾壑，不再希望『人卽正法』的權利，認爲禁烟應該就此結束。林則徐也懂得這些情形，却以爲『夷情最重信字』（會奏諭辦英夷情形摺），『夷人最重然諾，卽議一事，訂一期，從不爽約，其視出結之事，絕無僅有，非比內地公牘結多而濫，以致視爲泛常』（覆奏責令夷人出結甫經遵依片）他看到侵略者的小信，沒有看到小信所掩蓋的大詐，企圖強迫出具『人卽正法』甘結，藉外人的守信來肅淸鴉片來源。

林則徐堅持『貨盡沒官，人卽正法』的主張，英國以外各國商船全部具結進口，少數英國商船也願具結，被義律武力阻止，中英交涉表面上爭『人卽正法』四字，實際是義律爲代表的

鴉片集團（包括英印政府、中國投降派、中外鴉片商販及吸食者）與林則徐爲代表的禁烟集團（包括禁烟派及中國人民）作生死的鬥爭。鴉片集團方面，義律口頭表示退讓，說：『義律在粤有年，此次並無別心，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溫和而已』。（上澳門同知書）暗中仍『濟賣鴉片，』準備武力（林鄧會奏：九龍洋面轟擊夷船情形摺）投降派散佈謠言，對林鄧汚衊陷害，『始而風影訛傳，繼且歌謠遠播，以查拏爲希旨，以掩捕爲貪功，以偵緝爲詭謀，以推鞫爲酷刑，甚至誣以納賄，目爲營私，譏廷議爲急於理財，嗤新例爲輕於改律』（鄧廷楨等奏）又『假託姓名，臚列款蹟，向內外衙門投遞揭帖，希冀代奏』（東華錄）。當時道光帝的主要傾向還在禁烟一面，宣稱『林則徐、鄧廷楨皆朕親信大臣，現在查辦鴉片正在吃緊之時，斷不可因羣言淆惑，稍形懈弛』支持了禁烟集團。禁烟集團方面，林則徐據理駁斥義律各種飾詞，揭破一切狡計陰謀，在義律面前，不是遵令具結，就是武力解決，再沒有其他妥協途徑。道光帝在投降派影響下，給林則徐一道諭旨：『着林則徐、鄧廷楨體察情形，相機籌辦，務使聞風慴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爲妥善』（五月上諭）就是說，如果海疆有事，林鄧該負不妥善的責任，這無異啓示義律以開邊釁，並預留林鄧未來的罪名。林鄧面對投降派所設陷穽，毫不畏縮，一面指明『義律藉邊釁暗爲恫嚇』（林鄧奏：審察敵情摺）一面積極籌備戰守。林則徐察看海口形勢，安設木排鐵鍊，添置礮台礮位，購西洋各國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大洋礮二三百尊，排列兩岸，又整頓水陸官兵，號令嚴明

聲勢壯盛。水師提督關天培認眞操練，用舊洋船作式樣，令兵士演習攻首尾、躍中艙諸法。一向腐敗販烟的水師，轉成勇猛耐戰的精兵。沿海岸及海中小島嶼，派兵防守，帶大量毒藥，必要時投入溪泉，使大洋中敵船不得汲取飲水。林則徐抵抗侵略者最特出的方法，尤在於始終相信『民心可用』（答徐廣縉問馭夷書）他說：『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外國鴉片商）命而有餘』（二月，諭各國夷人呈繳烟土稿）又說：『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莊不但正士端人，銜之刺骨，卽漁舟村店，亦俱恨其強梁，必能自保身家，團練抵禦。彼見處處有備，自必不敢停留』（七月，林鄧奏：審察敵情摺）這種依靠民衆的正確思想，大異於一般統治階級的疑民心理，這是他眞心對外的證明。當他在禁烟期中，不僅信任普通人民，而且還信任所謂『貪利亡命』的梟徒蛋戶，招募漁蛋丁壯五千人，每人發月費銀六元，贍家銀六元，『取平時所裝大小火船，教以如何駕駛，如何點放，每船領以一二兵弁，餘皆僱用此等民人以爲水勇，先赴各洋澳分投埋伏，至夜深察看風潮皆順，一齊放出，乘勢火攻，焚燒匪船夷船』（燒燬匪船以斷接濟摺）。後來中英開戰，水勇成水師的重要助手，立功不小。

林則徐籌備戰守，確盡了最大限度的心力，在『民心可用』的信念下，擁有未曾發動的兩廣無限人力，對外貿易方面，外國商船進口超過往年的總數，可以購買新式船礮，船堅礮利，英國不能獨擅其長。林則徐備具這些條件，又採取『以守爲戰，以逸待勞』的戰略，廣東海防不可否

認是鞏固的，但道光帝既不派道得力官員防備廣東以外各海口，又不許林鄧動用廣東庫款，設防募勇等費，全由洋行、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捐。林鄧祗希望他『明降嚴旨，切責臣等務將夷船新烟，查明全繳』不敢請求撥用款項，怕觸動他的鄙吝心，會放棄禁烟傾向於投降派。

廣東防務的效力，從軍民反抗精神表現出來，林則徐的領導也起着極大的作用，下列事實，說明人民是齊心的，兵士是能戰的。

五月，英船水手毆斃村民林維喜，林則徐嚴令義律交出兇犯抵罪。義律抗不交兇，聲稱：『遵國主之明諭，不准交犯，按照本國之律例秉公審辦。』林則徐斥爲『謬妄』，勒令交兇按中國法律懲辦。在雙方交涉中，林則徐駁義律稟文有『天朝以大字小，不得率將「相和」字樣寫入稟內』等語，否認中英間平等地位，自然是不識外情，妄自尊大。但義律堅執『照本國律例審辦』存意破壞中國主權，更屬恃強不法。林則徐令洋商通事勸導英國商船具結進口，並不因懲兇交涉妨礙合法貿易。英船三十二隻，停泊外洋，被義律阻止，所載洋米、洋布、棉花等貨，潮溼霉爛，損失甚巨，不敢進口卸貨。鴉片船混入船羣中，私放舢板潛赴偏僻口門，用木片作招帖，寫明鴉片一個，洋銀幾元字樣，隨潮流入海口，誘人偷買賤價毒貨。義律借懲兇交涉擴大事態，企圖爭取治外法權，繼續鴉片貿易，正義顯然在中國方面。七月，林則徐下令『禁絕英夷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對英人罷市。罷工的結果，義律及英商無法在澳門居住，退到海面貨船上，託澳門葡人出面調停，

但仍拒寫『人卽正法』甘結。中英關係惡化，責任全在義律為代表的鴉片集團。它採用各種手段來破壞烟禁。七月下旬，竟試圖武力威嚇。義律率兵船一隻，武裝商船十隻，突然向九龍山口岸巡船三隻開礮，巡船奮勇回擊，岸上礮台發礮應援，交戰十小時，擊翻英方雙桅飛船一隻，擊死英兵至少十七名，中國兵死二傷六，英船逃回大洋。八月初，水師兵勇又燒燬鴉片蠆船一艘，向來中國水師不敢接仗，英船『安假礮於船旁，畫礮眼於船板，虛張聲勢，粉飾觀瞻』就嚇倒傲慢自大的『天朝』，這次交戰，不料被少數巡船擊退，義律自知威嚇無效，要求繼續談判。自然，談判難關仍在『人卽正法』四字。

道光帝接得林則徐等奏報，硃批：『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這似乎是支持了林則徐的強硬態度，但稱正當抵抗為『孟浪』，對『人卽正法』的爭執不表示明確意見，所謂『後德』又是含胡其詞，投降派就潛伏在這些含胡詞句後面，等機會驅逐抵抗派。

二　堅決的抵抗（一八三九年（道光一九年九月）至一八四〇年（道光二〇年七月））

林則徐、義律雙方態度都極堅決。九月底，英商船兩艘遵令具結，義律派兵船兩隻到穿鼻洋面阻止，不許進口。林則徐派水師保護英商船一艘進口（一艘逃去），英兵船開礮來攻，水師提

督關天培親督兵勇回擊，激戰兩小時，英兵船一艘受傷，戰敗逃走。從九月底到十月初，中英交仗七次，中國俱獲全勝，當然，這些勝利是微小的。但，當時中國軍隊是怎樣一種軍隊呢？將校兵卒是一羣烏合的無賴流氓，礮是一二百年前的舊礮，火藥是三分錢一斤的火藥，主要武器是弓箭刀矛。澳門新聞紙論中國武備說：『中國之武備，普天之下，爲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及其所行爲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其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衆，未必有一千人合用。其師船之樣，若得我等或米利堅之兵船，在一點鐘之久，即可趕散各師船。中國敵外國人不過以紙上言語，眞可謂之紙上王國矣。』這樣的軍隊，經林則徐整頓，居然打了七次小勝仗，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成績。

林則徐積極籌備戰守，但並不專恃武力，他的策略是：『苟知悔悟，儘許回頭』，『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他國貨船遵式具結者，固許進埔，即英國貨船，亦不因其違抗於前而並阻其自新於後』（會奏礮攻轟擊英夷船情形摺）。這就是全力禁阻一部份英國鴉片商，既不牽涉其他合法貿易，也不拒絕鴉片商悔悟自新。道光帝自九龍山獲勝後，虛驕心增強，穿鼻洋戰前數日，下諭『斷絕大黃茶葉，永遠不准交易』，要停止英國一切貿易，正中義律的奸謀。林則徐奏稱：『具結之船，不宜與觀望營私之他船一例辦理，以示區別。』道光帝恰接到七次戰勝的奏報，竟正式下諭：『即將英吉利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着出示曉諭各國，列其罪狀，宣佈各夷』；並批斥『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說：『同是一國之人，辦理兩歧，未

免自相矛盾。』這種謬妄的指導，完全破壞了禁烟計劃，擴大了戰爭危機，而且替義律懲罰了具結進口的英商船。林則徐當然不敢違抗上諭，十一月一日起，遵旨封港，斷絕中英通商關係。

義律及英商居住海上，生活困苦，義律投遞稟帖，大意說：『請准許英國商人家眷等復得回澳門居住，至英國茲時所求，惟欲仍作正經貿易，凡事欽遵大清律例而不違本國制度，俾可兩爲同存也。』林則徐不便違旨重開交涉，止好嚴詞駁斥，有『現奉大皇帝諭旨，永斷爾等貿易，將爾罪狀明白宣示各國，業已欽遵辦理』等語。既不許通商，又不留體面，世界第一强國的英吉利，必然將藉口蒙受辱害，發動武力侵略。道光帝却以爲禁烟事了，調林則徐爲兩江總督，要他去整頓政府重要收入的漕務，諭稱：『林則徐已放兩江總督，現雖專辦此事，豈能常川在粵？即鄧廷楨統轄兩省，公務煩多，亦不免顧此失彼。仍當通盤籌畫，辦理結實，俾日後淨絕根株，方稱一勞永逸。』林鄧會奏也以爲派一道員駐劄澳門，『督同澳門同知等查辦夷務，稽察澳夷額船，斷絕英夷冒混，緝拏漢奸接濟』，就可以『一勞永逸。』事實却不是這樣容易，迫使道光帝改任林則徐爲兩廣總督，任鄧廷楨爲兩江總督，旋又不得不改任鄧廷楨爲閩浙總督，因爲福建水師收受陋規，包運烟土，廈門成走私大海口。這說明英國絲毫不放鬆鴉片貿易的利益，但滿清君臣並未意識到戰爭已迫在目前。

道光帝停止中英貿易，從中國方面說，自然是絕對有利。禁烟時期，各國商船（英國除外）

進口特別增多，截至十一月，廣州到船六十二隻，美船佔四十五隻，帶來現洋將及二百萬圓（會奏察看英夷反覆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摺）。白銀外溢一變爲白銀輸入，這使道光帝自信停止貿易是有效的政策。大官僚曾望顏代表極端閉關主義者，奏請封關禁海，無論何國夷船，概不准其互市。這樣荒謬的建議，正合道光帝的志願，即時寄交林則徐等，意思是要他們照辦。停止中英貿易已經造成大錯，何况停止各國貿易，與世界爲敵？愚昧自大，閉關排外，是當時指導外交的主要思想。林則徐比較明白外情，奏稱：『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違抗者擯之，恭順者亦擯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此中控御之法，似可以夷治夷，若概與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這一反對意見，被道光帝採納，因此戰禍限於中英兩國。

中英停止貿易，從英國方面說，自然是絕對有害。英印兩政府歲入總額六分之一，從對華貿易取得。英國輸入華貨，每年收關稅四百二十萬鎊，其中茶稅佔三百六十六萬鎊。印度輸出鴉片，每年收烟價二百萬鎊，佔印度歲入十分之一（戰後增至七分之一。）貿易停止，英印政府損失六分之一的收入，無法彌補，這是發動戰爭的主要原因。英國對華正當商業，如茶、棉、毛、紡織等營業驟然停滯，銀行利息上長（中西紀事）並影響到英國布匹對印輸出，因爲英國布匹在印度很大部份的消費是靠鴉片生產爲轉移。

販茶利益被美國奪去，呢羽鐘錶等貢品，法國向粵海關聲明願多製貨物，來粵貿易。國際商業的競爭，更威脅英國既得的商業霸權。所有這些原因的總和，使產生英國的武力侵略——鴉片戰爭。這個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同時也改變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面貌，廣大的中國加入世界市場，使英國工廠數目空前增多起來，英政府看到目前的損害與未來的利益，決心爲開放市場而戰爭。

一八四〇年二月英政府任命印度水師提督喬治。義律爲對華談判全權大臣，作爲用兵的第一步驟。陸軍大臣答復國會質問時提出三個理由：第一，報復中國政府對英國領事及商民的侮辱，第二，賠償英商所受的損害；第三，保障英商身體財產的安全。至於不體面的鴉片偷運應否停止，英國政府並不願考慮。四月，英國會開會辯論，議員中也不乏公正議論。經三天激辯，終於以九票多數通過軍費支付案，正式派遣侵略軍。當時侵略軍海陸兩部總數不過一萬五千人。陸軍歸喬治・義律統率，海軍歸伯麥統率，乘軍艦二十六艘，載大炮五百四十門，於六月（道光二〇年五月）間陸續到達廣州口外海面。老大的封建帝國，在侵略軍威脅下，暴露了它的極度腐爛性，因此遇到意外慘重的失敗。

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堅決抵抗外國侵略。在他的言行中，絲毫不曾畏懼英國的船堅炮利，他極畏懼的卻是掌握政權的腐爛勢力。

事實也是林則徐在軍事上不敗於英軍，而在政治上敗於道光帝的謬亂指導和投降派的陰謀破壞。

道光二〇年五月初，英兵船四艘游弋於廣州口外，保護鴉片商船，『日則暗放舢板，分運烟土，引誘奸民，零星賤賣（比禁烟前減價十分之七）夜則拋錨寄椗，並招集辦艇（華人賣食物用具小船）環護，文更瞭望，以防我兵火攻』（林則徐：焚剿夷船擒獲漢奸摺）。英陸軍大臣在國會宣佈出兵理由是『中國政府侮辱侵害英國，若不出兵，不但損國威辱國體，實大不列顛民族之大恥辱』似乎正義全在英國方面。不過這些辭句並不能掩飾武裝販賣鴉片的事實，宜乎林則徐斥爲『實屬可惡已極』林則徐對抗侵略者首先是發動民衆，他頒發『英夷鴟張安民告示』內稱『英吉利夷人本多狡詐，且以鴉片害我民人性命，騙我內地貲財，當亦吾民所兵仇共憤；本部堂今與汝等約，如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凡殺白頭鬼一名，賞洋銀一百元，殺死黑鬼子一名，賞洋銀五十元。』一個官員敢於允許『人人持刀痛殺』侵略者，在統治階級看來，實是駭人的措施，林則徐却看作最可靠的力量。雖然『夷兵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爲』的估計是可笑的，但『以守爲戰，以逸待勞』（密陳夷務不能歇手摺）利用民力，在持久抗戰中爭取勝利，並不是無理由的空想。他利用民力，確實達到頗高的程度，本上有水勇、蛋民、漁戶、引水及『索諳夷語線民，』陸上有鄉勇、團練及自願持刀殺敵的民衆，水陸

到處與侵略者為敵。英船在內海，必需雇引水領路，官府據引水探報，得知英船行動。線民『假裝濟夷辦艇，作為內應，配合各隊水勇火船，出其不意，縱火焚燒夷船。』英船被火攻以後，不敢停泊在一處，『每日東飄西泊，莫定行蹤，夜更游弋不停，深恐我兵復用火船往燒。』對漢奸也不敢信任，『洋船之漢奸，皆為英人所疑忌，盡遣去』（聖武記）。船上缺淡水，『以布帆兜接雨水，幾於不能救渴』到小島汲取，又『夷兵吸水受毒，患病者甚衆。』英船在外洋不知陸上虛實，『偶見內地出入之鹽船、商船，即遣舢板攏近，探詢官兵消息，迨內地各船駛近口門，則又不敢追問。』在這些情形下，英軍無隙可乘，企圖封鎖廣州海口又不遂，乃成坐困之勢。伯麥得本國訓令向中國北部活動，六月初，率艦隊三十一艘北駛。五艘攻廈門，被鄧廷楨督水勇火攻，英軍戰敗逃走，二十六艘攻陷浙江定海縣（舟山島），居民多避歸內地，英軍伙食無多，費用浩煩，大張招帖，每鴉片一斤，只賣洋錢一圓，謀誘回居民，取得食糧，但很少人受誘。七月底，留粵英軍進攻澳門附近關閘一帶，林則徐、關天培督水陸兵勇猛烈回擊，接仗至三四時辰之久，英軍敗回外洋。

投降派以定海失陷為契機，全力攻擊林則徐，本來動搖的道光帝，更轉到投降派方面。正當林則徐在關閘戰勝之時，道光帝下嚴諭斥責林則徐說：『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從此抵抗派得罪，坐待處罰；投降派大得勢；英國侵略軍無阻礙地橫行南北海疆，收獲意外的勝

利。

禁烟失敗的主要責任不在林則徐而在投降派和道光帝，咸豐帝宣佈穆彰阿罪狀的上諭裏已經論定了。此後任何嚴肅的歷史學者無不同意這一論定，因爲它符合於當時的事實。過了一百年，中國的反動集團依然保持着穆彰阿的投降路線，却無恥地顛倒是非，歌頌投降派是「知己知彼」的「愛國者」，誣林則徐是「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的「僞善者」。這種抹煞事實的謬說，絲毫不能證明林則徐爲首的抵抗派是錯誤了；相反的，投降派及道光帝被確證爲禍國殃民的負責人。

林則徐原定計劃是禁絕鴉片，獎勵合法通商，如果道光帝不停止中英貿易，英政府對華軍費案未必在國會通過，因爲正當工商業者的利益與鴉片貿易並不一致。雖然英政府決不放棄鴉片利益，無論何種藉口，它定要發動戰爭。滿清政府腐敗落後，卽使不因鴉片啓釁，它仍不免淪爲半殖民地。但就鴉片戰爭本身說來，却是道光帝促成的。林則徐給其妻鄭夫人家書裏說：

「外間悠悠衆口，都謂我激起夷釁，殊不知實出聖躬獨斷，屢頒嚴旨，謂不慮諸臣操之過切，只愁諸臣畏葸之過甚耳。予明知禁烟妨礙奸夷大利，必有困難，而毅然決然不敢稍存畏葸之心者，蓋以身許國，但求福國利民，與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尙付諸度外，毀譽更不計及也！」

這是夫妻間私信，當然不是所謂「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也決不是推諉自己的責任。他

所稱『聖躬獨斷，』實指停止中英貿易而言，這正是促成戰爭的重要原因。

林則徐等籌備海防，道光帝置身事外，絲毫不給以財政上的援助。募集兵勇，添造快船，製備新器械，購買外國大炮，修築炮台，都『不敢請動帑項』（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摺）惟設法向當地富商募集。他在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裏說，『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尙形棘手？』他不僅指出了過去的錯誤，還希望補救於將來。在同片裏他說：『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製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卽裨益實非淺鮮矣。』這裏已有輸入外國軍需工業的意圖，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進步的思想。對於這種意見，道光帝批斥說：『一片胡言。』當時投降派的主張是『內地船炮非外夷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這種守舊消極思想，和林則徐所代表的思想正是顯著的對照。

英國侵略軍到達廣東，林則徐就『飛咨閩浙江蘇山東直隸各省飭屬嚴查海口協力籌防』（英夷續來兵船情形片。）道光帝據奏報，也疊經降旨，令沿海各督撫嚴加防範。不過這些督撫，除了鄧延楨，不是投降派首領（直隸總督琦善、兩江總督伊里布，）便是『形同木偶』的腐敗官僚。從浙江到直隸海岸『毫無準備』（東華錄。）林則徐深知無法挽救，給鄭夫人信裏說：『而今英夷兵船來華，既不能在粵思逞，必然改竄他省？他省海口皆無設備，苟有疏失，則該督撫

必然諉罪於余之惹啓夷釁焉，則是非亦祇可聽之公論而已。』他這個『必然諉罪於余』的預見，定海失陷後完全實現。

投降派配合英軍向林則徐進攻，對道光帝大進讒言，說『夷兵之來，係由禁烟而起，』『上年廣東繳烟，先許價買而後負約，以致激變，』『鄧廷楨反門軍報不實。』尤其陰毒的是誣衊林則徐接受英吉利國王文書，私自銷燬，引起道光帝大疑忌。林則徐處在猛烈的謠言攻勢下，奏請『欽派大臣來粵查辦。』道光帝決心投降，給他一個『看汝以何詞對朕』的訓斥。林鄧失勢孤立，但直到被革職爲止，還繼續在粵閩堅持抗英。

腐爛的滿清必然遭受失敗，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林鄧抵抗派受滿清政府支配，失敗也是必然的。他們禁烟並未成功，但値得被中國人民紀念和尊敬。這首先是由於他們懂得抵抗侵略必需依靠民衆這一眞理；其次是不畏任何困難，富於堅決頑強的精神。投降派對人民採仇視態度，對侵略者採不抵抗政策，正和抵抗派走相反的道路。

第七節　投降派第一次『勝利』（一八四〇年（道光二〇年七月）至一八四一年（道光二一年正月））

投降派有兩個基本思想。第一，即林則徐所說：『夫震於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豔其富』（林鄧會奏審察敵情摺。）第二，即蔣湘南所說『世方奇貨之

居，人切染指之願』（與黃爵滋論禁烟書）換句話說，就是英國不可抗，鴉片不必禁。在本時期內，上起道光帝，下至一般烟民烟販，形成龐大的投降集團。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代表這個集團出面實行投降主義的交涉。

一 出面求降的直隸總督琦善

六月初，定海失陷，道光帝開始恐慌。七月，決定採取投降政策，敕沿海督撫，遇洋船投書，即收受馳奏，企圖在受書所在地辦理交涉。英兵船五隻、火輪船（當時輪船只作通訊船用）一隻到天津海口，他恐慌更甚，但求敵船退歸廣東，一切都可商議。琦善的任務在如何退敵，下面就是他的退敵法。

英船投遞英政府致滿清宰相抗議書，說明出兵理由是反對停止通商。對販賣鴉片，說是英國少數人違禁行爲，大英國主不願包庇。對林則徐在粵舉動，說是『某官憲奉大清皇帝之欽命，殘害實信之英人，強迫、凌辱大英領事。』在毫不容情地攻擊多年來粵省官憲收受規銀、助運鴉片、不法已極、大清政府開一眼鑒遠人犯罪、閉一眼不鑒官憲犯罪以後，提出六條要求：（一）償給貨（鴉片）價；（二）割讓一島或數島；（三）兩國文書平等往來；（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烟之船牽累正當商人；（六）廢止洋行商把持勒索並賠還欠款。當時英國主要要求在平等通

商，補償損失，對鴉片價諱稱貨價，足見自知不名譽，可能有意作一定程度的讓步。天津道陸建瀛建議，『嚴持禁烟爲名，以鴉片烟之至不至，決數事之許不許，』這是合理的交涉方針，琦善以爲『書生之見，』拒絕採用，與道光帝、穆彰阿密定一套卑劣的辦法。

琦善在答覆英軍統帥喬治·義律信裏，把一切責任推給林則徐（後來耆英訂南京條約同樣歸罪於林則徐）說：『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仰體大皇上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當，必當逐條查明，重治其罪。』所謂『林等，』是指林則徐鄧廷楨等抵抗派。英國侵略者還不便提出這樣的要求，清政府却保證重治其罪，也就是保證恢復鴉片貿易，作爲『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的條件。侵略者自然滿意，約定『中堂若赴廣東，我等即可永遠和好。』八月，英船退往廣東，道光帝命琦善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並諭沿海各督撫：『洋船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槍炮。』

二　懲罰抵抗派，開放烟禁

英船在天津時，喬治·義律等二十餘人赴琦善宴會，『嘻笑怒駡，有舞洋槍飛刀於坐上者。琦善隱忍受辱』（中西紀事）。禁人傳說。向道光帝却報稱『情詞恭順，窺其詞色，似有愧悔之心。』山東巡撫托渾布奏報洋船過境，『各人向岸羅拜，情形極爲恭順。』九月，洋船到浙江，欽差大臣

伊里布『遣其奴張喜赴洋船餽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洋酋伯麥搖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斷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貿易斷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豈仇林總督而來耶？』（聖武記）洋人肆行侮辱，投降派說是夷情恭順；洋人自稱『斷鴉片可，』投降派保證重辦林鄧。從表面看來，似乎是一片囈語，實際是中外協調，因爲祇有這樣，才能恢復鴉片貿易，解決交涉的中心問題。

道光帝根據夷情恭順的奏報（兩江總督裕謙因奏稱『英人呈遞書字，語句狂悖，』大受訓斥）來懲辦林鄧表示自己的『大公至正。』八月，林則徐偵知英兵船五艘在磨刀洋，派副將陳連升率兵船五艘載兵勇三千人往攻，英船戰敗逃走，擄獲英兵死屍十餘及軍器軍旗若干。道光帝得報，斥爲『貪功啓釁，殺人滅口。』不久，下一道諭旨說：『林則徐、鄧廷楨在廣東查辦鴉片，將逾兩年，尙未絕除根株，轉致該夷赴京畿呈訴寃抑，成何事體？已將該總督誤國病民、辦理不善之處，降旨宣示。』林鄧旣被加以『誤國病民、辦理不善』的罪名，自然應該受處罰，於是接着又下一道諭旨說：『英夷船隻游弋沿海，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諸省征調紛紛，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辦理不善所致。林則徐、鄧廷楨均交部分別嚴加處罰。』林鄧得革職處分，聽候琦善查問差遣，同時任命琦善爲兩廣總督。這是投降派整套陰謀的大成功。林則徐還想作最後請求，想去奪回定海，奏稱：『倘蒙格外天恩，寬其一線，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

竭血誠，以圖克復。』他的辦法是：『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爲壯勇，陸續囘去該處，詐爲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道光帝當然不理，在他反對『羈縻』（投降）的警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下面，硃批道：『汝云英夷試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於朕也。無理可惡！』這樣蠻橫的詞句，目的在恫喝林鄧及其他抵抗派，不敢再有所論爭。

林鄧革職，等於禁烟運動從此結束。十月，道光帝頒佈開放烟禁的上諭，很巧妙地說：『上年頒發新定章程（卽查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嚴立科條，寬予期限（一年六個月戒絕）……薄海內外，必已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咸知畏法自新。……卽日限期屆滿，或以無知觸法……是在內外滿漢諸臣，訓諭督催，不遺餘力，轉瞬限滿，無一藐法干罪之人，用副朕除惡務盡之意。』照章程規定，『吸食之案，止准官弁訪拏』，官弁不訪拏，那有『藐法干罪之人』，鴉片也就『永絕根株』了。

三　放手賣國的兩廣總督琦善

十月，琦善到廣州，首先替英人『代伸寃抑。』在義律先後繳烟印文裏，查不出林則徐的罪狀，便詰問磨刀洋襲擊，何人先開炮，既是襲擊，不待問是廣東水師先開炮，他要斬決副將陳連升

向英謝罪，發令指使的林則徐自然罪名也不小。這個荒謬的主張，被衆人反對，不曾實施，廣東水陸軍却從此解體。

琦善辦理外交的方針是『一切力反前任（林則徐）所爲，謂可得外洋懽心。』在軍事上實行撤防，裁減兵船三分之二，舵工水勇全部遣散。撤去海口內木排鐵鍊，任令英軍派小船探測內河水道，陸續起出水底暗樁及載石沉船，不許軍民禁阻。在政治上實行獨斷，自稱專辦夷務，省城文武官員不得參與謀議，連廣州將軍阿精阿、巡撫怡良那樣的滿洲貴族也被擯退，因爲這些人受林則徐影響，曾經出力禁過烟。他把人民看作多是漢奸，未到省之先，就預定『廣東省城漢奸充斥，舉凡一言一動，罔不潛相窺伺，爲夷人私通消息。』到省後，蔽塞自己的耳目，以『防制漢奸，『凡有報緝漢奸者，則訶曰：「汝即漢奸。」有探報洋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洋情事。」』他唯一親信，往來雙方傳話的所謂『通曉夷語八品銜鮑鵬，』是什麼人呢？是老鴉片商顛地的買辦兼孌童，因販賣鴉片，被林則徐訪拏，逃到山東，得托渾布推薦，變成琦善的心腹要員，一切交涉全由琦善、鮑鵬二人商辦。義律對鮑鵬，『言語倨傲，動加訶斥；』鮑鵬對琦善，裝模作樣，危言恫嚇？琦善對道光帝，謊話連篇，促成投降；道光帝對英軍，希望『夷情恭順，』自動退兵，送還定海，恢復禁烟前舊狀。作爲道光帝代表的琦善，實際是義律的代表（所謂『始終爲義律乞恩，』）在欺騙威脅甚至賄買下，琦善完全滿足了義律的要求。

琦善撤防以後，義律宣稱：『若多增兵勇來敵，即不准和。』琦善遵命不敢增調防兵。義律令琦善承認前在天津提出的六條，並指索香港及鴉片賠款七百萬元。琦善一一在口頭上承認，但不願出具文件。雙方爭點在如何割讓香港。琦善主張暗割，義律主張明割。義律宣稱『戰而後商。』十二月，英軍進攻沙角炮台，守將陳連升無援戰死，琦善聲言：『我不撤兵，必為彼所敗，』下令撤退各炮台守兵。英軍長驅直入虎門，提督關天培發炮抵抗，派專人回省城哭求增援，文武大員合力代求，琦善一概不理，連夜寫信派鮑鵬往川鼻洋見義律，秘密訂立賠烟價、割香港、開放廣州兩國公文對等往來等四條草約（川鼻草約，）英軍停止進攻。

『瞞上不瞞下』是中國官僚重要的辦事方法之一。琦善主張暗割香港，就是允許英國自由佔領，自己當作毫無聞知，日後被人揭發，不過得『失察』處分，政府也必然承認既成事實。可是義律定要滿清政府公開割讓，這使琦善陷入窘境，不得不正式奏請，又不得不造出一些重大事變，要求批准。沙角及虎門各炮台被攻，堅決不發援兵，是否故意造成失敗，以便訂立文據（琦善在刑部供稱：『因救急無策，備允代奏給與香港地方寄居。』又在奏摺中揑稱『同城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實際並無一人參與，）當時有人懷疑『此中曲折情形，』不是沒有理由的。道光廿一年正月，琦善兩次會見義律，只許鮑鵬一人在旁，行跡詭秘。道光帝令靖逆將軍密查有無受賄情形，後來抄沒家產入官，足見受賄的傳說不是沒有根據的。香港就這

樣被琦善出賣了。

第八節　清政府的對英宣戰（一八四一年（道光二一年正月）至一八四二年（道光二二年七月））

一　決心宣戰的原因

琦善在天津答復喬治·義律信裏說：『欽差大臣林等受人欺朦，則前項烟價，又將着落何人賠繳，』就是說，要林等及欺朦者賠繳。他到了廣東，找不着誰是欺朦者，林等又窮無所有，而烟價七百萬元又必需支付，這是第一個出乎道光帝意外的痛心事，也是決心用兵的主要原因。琦善揑奏：『英夷自知懊悔，願繳還定海並獻出沙角炮台，請准其就粵東外洋之沙角地方，泊舟寄居。』道光帝並不知香港地方離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若何，以爲荒僻小島交換定海、沙角是琦善『委曲從權』的『苦衷。』那時候他已經調湖南、四川、貴州兵往廣東聽琦善調度，準備示以聲威，大加懲創，取消烟價賠償。不料怡良揭發琦善私割香港，香港島上駐兵早被驅逐，居民早被逼令歸順，作爲英國國民，全出道光帝意想之外。他賠錢失地，計劃落空，怒不可遏，一變投降態度爲強硬。正月初，以英吉利索償烟價、請給碼頭爲由，宣佈討伐令，『着伊里布剋日進兵，收復定海；並着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並表示『烟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朕意已定，斷無游移』的決

心。中英兩國正式進入交戰狀態。

中英戰事，中國稱爲鴉片戰爭，英國稱爲通商戰爭。按照戰爭的起因說來，自然是由於禁烟販烟雙方的利害衝突，但在林鄧革職以後，戰爭起因完全不存在了。道光帝所宣佈、英國所進行的戰爭，它的性質，在英國方面是奪地詐款的侵略，在滿清方面，雖說是反抗侵略，但反抗意識卻非常薄弱，如果烟價有人（『欺朦者』）賠繳，定海眞正送還，道光帝決不會爲『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而戰，是顯而易見的。他出動兵力，原想『彼時該夷恐懼乞憐，再由該將軍等酌量情形，代爲奏請，』把敵人看作一嚇卽倒的弱者。交戰結果，大出他的意外，發現自己是弱者，他趕快停止反抗，又採取投降政策。

滿淸猜忌漢人，軍權和外交權絕不輕授漢員。林則徐因適逢禁烟，得『欽差大臣』名義，在他看來，確是『生逢盛世，蒙皇上特達之知』（與鄭夫人書）了。但大小行動必須奏報請求批示，勇餉、防費不敢動用庫款分文，權力是極其微弱的。琦善及其他滿員就完全不同，他們可以謊報軍情，調用弁兵；可以侵蝕餉銀，浪費庫款，卽使被人揭發，仍能獲得皇帝的信任和庇護。對英戰爭的慘敗，不止是兩國強弱的懸殊，滿人排斥漢人，膽大妄爲，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二　廣東方面的戰事（一八四一年（道光二一年正月至六月））

道光帝調集各省綠營兵一萬七千名，派皇姪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往廣東協同琦善『勦辦逆夷。』這些兵將都是分路陸續前往，無計劃的到廣州集合，因此廣東軍事可分爲琦善，楊芳，奕山三個時期。

琦善力主割讓香港，奏稱『地勢則無要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縻。』這是徹底的投降主義，但主戰的道光帝，毫無實際準備，憑自己的虛驕心，妄想『一鼓作氣，克服海隅，』受挫以後，同樣成了投降主義者，並不比琦善勇敢一些。琦善因爲面對敵軍，不管道光帝痛罵促戰，他總是堅持投降。二月初，英軍進攻虎門炮台，提督關天培率兵死戰，琦善不發援兵，關天培及將弁兵士四百數十人戰死，虎門失陷。上年林則徐所購西洋炮二三百門，全被英軍佔有。虎門敗後，琦善鎖逮入京。廣東戰事由楊芳主持。

楊芳是著名的內戰健將，因屠殺大量漢回人民有功封侯爵。對外戰事，他是投降主義者，在路上就奏請割香港，理由是『給嶴堆貨。』他改換字面，請『准令英屬之港脚商船在粵貿易。』『港脚』是印度各埠的統稱，准印度來船貿易，等於准英商貿易。道光帝下諭嚴斥說『斷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機宜。』楊芳得革職留位處分。三月下旬，奕山到廣州，主持廣東軍事。

奕山，也只有奕山，具備着結束廣東軍事的資格。他在統治階級裏地位極高，被看作有極大權能的人物，他都失敗了，誰還能說不該投降呢？滿淸政府政治、軍事、民族一切反動性，通過這樣

的人物，才充分體現出來，因此才招致充分的失敗。

奕山等首先是反對廣東軍民，『歷奏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故遠募水勇於福建而不用粵勇。官兵擒捕漢奸，不問是非而殺之。粵民久不平。』他們又疑忌外來弁兵，用親信滿人西拉本岱昌等當大將，『將各省之兵，互調分配，各離營伍。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無紀律。所發鹽菜口糧，厚薄不均。令十五兵共一帳房。』他們又縱兵殺掠，以收買兵心：『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爲漢奸，或刼其財帛。夷兵搶奪十三洋行，官兵雜入其中，肩挑擔負，千百成羣，竟行遁去。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應付囘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爲詞，當事者猶以衆兵追敵放賞。』奕山等招美女日夜飲酒作樂，軍官們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爲事，奔走鑽營，求製辦火藥、木料等肥差，千把以上軍官都在城內，不到營伍中去。這些都是當時人可靠的記載，只有隱諱，決無誇張。滿清對外作戰的將軍與軍隊，就是這樣不堪的腐朽物。

道光帝責成他們『分路痛剿，務使該夷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夷船聞風遠遁，空勞兵力，惟該將軍等是問。』這眞是駭人的夢囈！英國方面得知道光帝宣戰，派陸軍少將臥烏古、海軍提督巴爾克率大軍增援，定海英軍也集中廣東，共有兵船五十六艘，半泊香港，半入虎門，船上插『出賣鴉片』的旗幟，與鴉片販交換食糧銀錢以充軍餉。奕山和隨員們以爲『不戰則軍餉無可開銷，功賞無由保奏』，急於僥倖一試。四月初，英軍全部駛進虎門，準備進攻，奕山恰恰選定同日分

三路攻擊英軍，遭英軍反擊，紛紛潰退。英船到天字碼頭放空炮數聲，守兵逃散。泥城、四方兩炮台，不戰失陷。英軍據四方炮台用火箭火彈直打城中，奕山等面無人色；因英軍散布流言，說『專與官爲仇，絕不向民加害，』乃下令：『官兵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希望得些保護。英軍連發大小炮，城中兵民死傷無數，奕山等決計投降，在廣州城上豎起白旗，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向臥烏古行三跪九叩首禮呈奕山求降書。臥烏古提出休戰條約五條，奕山等大喜接受，戰事停止。

廣東地方這次所謂中英戰爭，前後凡七天（四月初一日夜半至初七日。）英軍步炮兵約二萬四千人，戰死十四人，負傷九十一人。滿清軍兵勇約三萬五千人，死傷不知確數。戰爭中破壞最顯著的是英軍搶掠十三洋行。它是滿清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實際執行者，如代官吏索賄，指勒物價，把持貿易，包運鴉片等一切阻礙正當貿易的惡劣行爲，都是洋行在政府支持下作爲合法的專業，被搶以後，全部破產，標誌着封建特權被外國侵略者擊破了。

按照休戰條約，一週內交給英軍贖城費六百萬元，英商館損失三十萬元。贖金繳清，奕山等率外省兵退駐六十里以外，英軍歸還所奪炮台，退出虎門。奕山搜括庫款四百萬及商民私財，照約實行。英軍陸續退去。

四月初八日，廣州解嚴。奕山奏稱：『初八日焚擊痛勦，大挫其鋒，』保薦大批有功員弁；又奏：

『義律躬豎乞撫，止求照舊通商，並將歷年商欠淸還。已暫准其與各國一體貿易，從前商欠業已代爲淸還。』道光帝諭稱：『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大敗改作大勝，投降改作受撫，賠款改作代還商欠，批准投降改作准令通商，一擧阿Q們居然大獲『勝利。』

阿Q們自稱勝利，引起人民及抵抗派廣泛的不滿，道光帝在輿論的壓迫下，曾令林則徐『馳赴浙江軍營』並指明：『如有摺奏，林則徐毋庸列銜，』就是說，不准他表示意見。兩江總督裕謙傾向抵抗派，很尊重林則徐。五月，英船在浙江洋面遊弋，道光帝怕林則徐鼓勵裕謙『妄動生事，』又怕抵抗派引證廣東軍事要求起用他，決計先發制人，給林鄧安上戰爭失敗的罪名。他下諭說：鄧廷楨『懈惰因循，不加整頓，所設排鍊，空費錢糧，全無實用，以致該省兵丁柔懦無能，諸多畏葸，思之殊堪痛恨。』又說：林則徐『既知兵丁染習甚深，便應多方訓導，勤加練習，其於夷務亦當德威並用，控馭得宜，乃辦事諸未妥協，深負委任。』根據這些莫須有的罪案，把林鄧『從重發往伊犂效力贖罪，卽由該處起解，以爲廢弛營務者戒。』奕山也用同樣的方法，說：『此次洋船開入省河，俱是漢奸引導，業經傳諭鄉勇分路搜殺多名。』實際上是收買地主武裝，寃殺人民多名。因爲眞漢奸有英人保護，他們是不敢殺的。按照『粤民皆漢奸』的成見，被殺者自然是表示不滿的『粤民。』

阿Q們鎭壓人民和抵抗派，只能堵人之口，到底不能服人之心。他們又採取一套欺騙手段

來製造上天保佑海疆平靖的謠言。六月，道光帝宣佈：『據奕山等奏請撤兵，分期啓行，已明降諭旨照議辦理，並諭令沿海各督撫酌量情形，奏請撤兵矣。』奕山又奏：『海風陡發，擊碎英夷房寮碼頭（香港）夷船被風吹沒無存，偶留船隻，又皆桅舵俱折。該夷等惡貫滿盈，竟遭天譴，從此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道光帝據奏宣佈上諭說：『仰蒙昊蒼垂佑，淹斃夷匪漢奸不計其數，帳房寮蓬，吹捲無存。所築碼頭，幷為平地，掃蕩一空，浮屍滿海。』上天替他毀滅香港，怎樣答謝呢？他頒發大藏香二十炷，令奕山等『分詣各廟宇虔誠行禮，答謝神庥，』並許保薦文武數百員。這一羣愚頑的騙子正在大顯神通、得意忘形的時候，英軍攻陷廈門，進取浙江了。

三　閩浙方面的戰事再起（一八四一年（道光二一年七月至二二年二月））

英政府接到川鼻草約，認為義律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不能全部實現致滿清宰相抗議書中所提各條件，是辦理不善，任命璞鼎查代義律為中國貿易正監督官，協同在華海陸軍，武力壓迫清政府訂立正式通商條約。七月璞鼎查到澳門，率大小軍艦二十六艘，兵士三千五百人向北出發。六月間，道光帝已諭令沿海各省裁撤防海兵勇，兩江總督裕謙得廣東方面探報，知道英國新調軍隊要進攻浙江，奏請免撤防兵。道光帝替英國辯護說：『該夷赴浙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且果別有思逞，斷無先將傳播透漏之理。』結果仍着裕謙『遵前旨將江浙調防官兵酌

量裁撤，不必爲浮言所惑，以致靡餉勞師。』這說明他在思想上絲毫沒有戰事再起的準備，行動上似乎儘可能給英軍以便利。他最親信的投降派首領穆彰阿是否暗助英人——是不無可疑的。

本期戰事可分爲三種戰敗形式：（一）顏伯燾廈門抗戰；（二）裕謙定海抗戰；（三）奕經結束戰事。

顏伯燾廈門抗戰

顏伯燾是極端排外主義者的代表，代替鄧廷楨做閩浙總督。到任以後，反對琦善、楊芳的『主款』，鄧廷楨的『主守』，提出進攻的主張。他造戰艦五十餘艘，募新兵數千，水勇八千，添築炮台三座，鑄新炮一千尊，準備到大洋上與英軍角逐。道光帝下令『撤兵省費』，水勇全數遣散，空船空炮等於廢物，但他仍派多數水兵出巡外洋。七月初，璞鼎查率大軍突襲廈門，顏伯燾急調水陸軍守鼓浪嶼，戰鬥相當激烈，擊沉英軍火輪船，兵船數艘，守將江繼芸以下將領戰死多人。鼓浪嶼陷落，廈門又陷，顏伯燾收集潰兵，退守同安縣，不久，英軍退去，顏伯燾奏稱失地收復。

顏伯燾虛驕自大，意氣用事，一戰即敗是必然的。不過他比投降派還是好得多。他力排所謂『撫局』，認眞籌備防務，戰時身臨前敵，親自督戰，戰後自認『喪師辱國』，報告軍情，不甚虛揑，——在當時應該說是難得的官僚。

裕謙定海抗戰

兩江總督裕謙是滿洲貴族中堅決主戰的唯一人物。道光二一年二月，英軍調往廣東，裕謙收回定海，鎮海農民擊退偵察隊二十餘人，捕得副船主等英人二名，裕謙在奏摺中敍述虐殺俘虜的情形說：『活剝其皮，以爲奴才馬韉；生抽其筋，以爲奴才馬韁，……再行凌遲梟示。』又令定海軍民發掘英人墳墓，在街上焚燒屍體。他如此野蠻殘忍，充分表現了地主官僚的殘暴性。不過『英軍踞定海，虐使定民，用法嚴酷，殺人者先以刀割裂其皮，納入水銀，周身灌注，遂活剝而懸焉』（中西紀事。）英國侵略者却也並不比裕謙更文明更人道些。八月，英軍攻定海，漢奸、投降派宣稱英軍是來『報剝皮掘屍之恨，』並非破壞大局。因爲裕謙是滿人，沒有被道光帝懲罰。

英軍艦二十九隻，火輪船兩隻進攻定海，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率守兵五千人血戰六晝夜，力竭戰死，定海再陷。中英開戰以來，定海抵抗最力，英軍受創不小，把鼓浪嶼的軍隊都調來增援。當時香港兵力單薄，裕謙請求道光帝轉令奕山進攻。奕山等每月開銷軍費二十餘萬兩，大飽私囊，奏稱『香港地方洋人並不久居，』又稱『守爲上策，攻戰次之，』完全拒絕進攻的上諭。裕謙及提督余步雲率兵四千守鎮海。余步雲是內戰老手，號稱『宿將，』對外却毫無戰意，說『家有妻女三十餘口，可憐，』不等英軍來攻先在招寶山懸掛白旗。裕謙召集各營將士對神立誓『不得以退守爲詞，離卻縣城一步；不得以保全民命爲詞，收受夷人片紙。』英軍攻招寶山，余步雲逃

走。鎮海城守兵，不戰自潰。裕謙投水死。寧波守城兵勇望風潰散。久居天津的大鴉片商郭子立『出示安民』管理寧波城。清軍退守曹娥江，以防衛紹興。

顏伯燾戰敗了，裕謙戰死了，敵軍侵佔寧波大城，快要席捲江南財富之區了。道光帝怎樣來挽救這個危局呢？他只能重複一番廣東方面的舊套其他辦法是不能有的。

奕經結束戰事

九月，道光帝任命皇姪奕經爲揚威將軍，文蔚、特伊順爲參贊大臣，牛鑑爲兩江總督，軍隊由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陝西、甘肅等省零星湊調，陸續前往浙江集合，重走着過去的舊道路。

奕經等到蘇州，藉口籌備軍務，搜羅美女，勒索供應，酗酒賭博，作威作福，駐紮三個月，不曾檢閱一次軍隊。宿遷人臧紆青建議：『浙江老兵不可用，除調川陝河南新兵六千外，宜多用士勇，水勇，招集山東河南江淮之士勇萬人，及沿海漁鹽梟販江湖盜賊二萬餘，分伏三城（定鎭寧）城中伏鄉勇爲內應，水陸並攻。以南勇爲北勇之目，以北勇爲南勇之膽。惟用散攻，不動大隊，不刻期日。陸路伺敵出入，水路各乘風潮，逢敵即殺，遇船即燒，人自爲戰，使彼出沒難防，而後以大兵壓之。』臧紆青的戰略思想是樸素的人民游擊戰思想。陸上水上城內隨時隨地擾擊敵人，等到敵人窮困，用正規軍配合游擊軍進攻，敵爲客、我爲主，敵勢孤、我勢盛，敵寡我衆，敵勞我逸，確是弱國戰勝外國侵略者的有效方法。奕經表面同意他的建議，但不實行他的計劃。

十二月，奕經做一個夢，見到『洋人紛紛上船，竄出大洋。』第二天早晨他宣佈吉兆，文蔚隨聲附和，自稱夜間也做了同樣的夢。二人大喜，決意用兵。道光二二年正月，奕經帶着同夢的文蔚進駐紹興，留不做夢的特依順守杭州。當時大雨大雪，所備火船薪草，都淋濕不堪用。三城兵勇佈置，要二月中旬才能辦妥。各路委員要求延期半月，奕經堅不肯等待，指定二十八日恢復三城。一個僥倖速勝的夢，把『原議分伏散戰之法，一變而爲排陣對戰之法。』臧紆青的作戰計劃，全部被破壞。

奕經、文蔚的速勝計劃如下：奕經率兵勇三千駐紹興，作爲後援。文蔚率兵勇二千駐慈谿城北，副將朱桂率兵勇二千駐慈谿城西，目的是鎮海。提督段永福率兵勇四千伏寧波城外，余步雲率兵二千駐奉化，目的是寧波。鄭鼎臣率水勇圖定海。奕經以爲內應擒縛英人，三城唾手可得，嚴令各軍不許攜帶火器火箭，只准用刀矛短兵。二十八日各路兵勇冒雨夜間出發。英軍探知奕經用兵計劃，早有佈置。段永福軍五百人入寧波城，與英軍巷戰，死傷過半，段永福督大隊到城邊時，得知英軍有備，立卽逃奔，不回防地，直走紹興。余步雲軍半路上潰散，浙江老兵不可用，又不帶火器，攻寧波軍就此一潰了事。朱桂軍派河南士勇五百人攻鎮海城，英軍應戰，城外招寶山亦開炮轟擊，士勇退回慈谿防地。英軍跟蹤反攻，朱桂率兵勇四百抵禦，文蔚拒發援兵，朱桂戰死。文蔚帶少數滿洲隨員連夜逃遁，沿路重賞轎夫船夫，愈快愈好。前線各營因失主將，陸續潰散。二月初，奕

經、文蔚逃回杭州，揑奏『漢奸勾結鄉勇倒戈相向，』『文蔚大營被漢奸焚毀，烟焰蔽天。』其實僅一天以後，英軍才到空大營擄獲輜重器械無數。又揑奏攻鎮海軍全軍覆沒，脫回僅七人，其實僅七人受傷，又揑奏慈谿英兵登陸一萬七千人，其實僅二千人。諸如此類，無非虛張敵人聲勢，表明自己戰敗無罪，最後奏請『暫示羈縻。』道光帝據奏，認爲『俱係實在情形，』決計投降，下諭『不許進兵，並不許擒斬洋人。兵勇殺一黑洋人卽行正法，並治官弁之罪。』三路中惟鄭鼎臣水勇在定海大有殺獲，被嚴令解散。奕經與奕山同樣，經過輕舉妄動、一觸卽潰、喪膽乞降三個程序，結束了浙江軍事。

第九節　清政府的求降難（一八四二年（道光二二年三月至六月））

奕經戰敗後，道光帝停止再調新兵，立卽派遣投降派首領耆英、伊里布『馳赴浙江，相機籌辦，設法羈縻。』他給奕經的諭旨裏說：『該將軍惟當協力同心，攘外安內，切不可再失事機也，』譯成眞實話，就是『要安內了（當時民間已發生起義和騷動）不要攘外，要奕經協同耆伊，切不可失去投降的機會。』道光帝抱着投降的誠意，英國侵略軍卻毫不理會，繼續向目的地南京前進。

一　乍浦失陷——希望『解仇通好』

定海是英軍侵略長江流域的根據地。英軍決計收縮兵力，攻取南京，乃於三月下旬，放棄寧波。奕經奏稱：『大兵進攻寧郡，逆夷畏逼，紛紛竄退，現在派員收復。』四月初，英軍守招寶山，放棄鎮海城。奕經又奏稱乘機暗襲鎮海，大獲勝利。道光帝獎勵這種欺騙，藉以維持崩潰着的『天威』。當時定海英軍只有兵船四隻，兵士千餘人，香港只有兵船十四隻，兵士千餘人。浙粵人民自願奮勇出襲，火攻洋船，奪回兩地，都被奕山、奕經禁阻，說是『恐觸其怒。』英軍根據地有靖逆，揚威兩個將軍替它看守，放膽進軍，先攻乍浦。

乍浦是江浙兩省海防重鎮，有滿洲駐防兵，平時驕橫放縱，凌辱漢人，當作奴役看待。四月初，英軍攻乍浦，滿人斥漢兵為漢奸，令守海岸炮台及城郊，自己守內城。陝甘兵竭力抵抗，死三百餘人。英軍攻東門不能勝，轉攻南門，福建水勇受滿人侮辱，不肯力戰，英軍攻入南門，這些駐防軍大都是廢物，束手等待着殺，很少人敢於對敵，被英軍殺死二三百人（中西紀事）。乍浦戰鬥，漢兵確極勇敢，英人分不清滿漢，以為滿兵敢戰；滿清官吏宣告戰況，影射漢兵所立戰績，替滿人掩飾恥辱，因此某些中外紀載，誤認乍浦滿兵是頑強的戰士。漢兵在戰陣上俘獲黑白洋兵十六名，送嘉興城囚禁。伊里布到乍浦，求見郭子立，願送還俘虜，等到送去，英船已開出海口，又送到鎮海，交

給招寶山英軍，希望『解仇通好，』英軍置之不理。

二　求降被拒，失陷吳淞口

五月初英軍攻吳淞口，奕經密令兩江總督牛鑑：『權宜羈縻。』牛鑑派人攜帶禮物往見英將，被拒不得見。牛鑑率三四千人駐寶山縣，提督陳化成守吳淞炮台。陳化成是中英戰爭中、與關天培齊名的戰將。他備戰認眞，自信可以一戰。他請牛鑑軍作後援，自己督炮台兵力戰，英軍死傷頗重，不敢正面突進。牛鑑陳列總督儀仗，率大隊增援，被敵艦瞭見，發炮轟擊，牛鑑驚駭，拋棄轎子靴帽，混入士兵中亂竄，全軍大潰。英軍登陸，前後夾攻炮台，陳化成力竭戰死。牛鑑一直逃回南京，上海寶山居民逃避一空，兩城不戰而陷，提督尤渤率陝甘兵守松江，英軍進攻，兩戰兩敗。自上海駕舢板小船試探行軍道路，又被崇明蘇州無錫等縣人民聚衆殺逐。英軍怕有力的抵抗，尤其怕人民的抵抗，它是孤軍客軍，必須避免久戰硬戰，因此退出吳淞口。

三　長江不守——城下定盟

陳化成戰死，道光帝令耆英、伊里布、牛鑑『馳赴上海相機籌辦，』就是要他們趕快講投降條件。英軍回答說：『現已集兵，不得不戰。』這些投降派仍要求免戰，請指定地點，約期會商，英軍

不答，入長江向南京航行。

南京在當時是僅次於北京的大都會，城門鎖鑰歸滿洲駐防將軍掌管，總督有急事夜間出城，不得將軍令箭，不能開門。它這樣被重視主要由於控制長江運河兩大水道，南京失陷，江浙大宗漕米不能北上，北京便成死地。英軍選取這個議降地點，比原計劃進攻京津更有利，因爲數量不大的陸軍不能深入內地奪取一個大國的京城。不過英國兵船要進長江也有極嚴重的困難。長江口非常廣闊，兩岸半爲黃泥所掩蓋，大船航行，必需不斷地測量深度，以免遭遇大沙灘。江口到崇明島末端，到處都有沙灘，崇明島到鎮江，水道十分曲折，鎮江以上還有不少險要。英軍「遣人探水，由沿江一帶上溯安徽至蕪湖爲止，共先後探過七次。每遇險要處，停舟泊岸，周行蘆葦間，不見一兵一將，然後放心前進」（英國副使馬利遜在南京談話）以牛鑑爲首的地方官吏，就是這樣的一些木偶。投降派認定「該夷船堅炮猛，非兵力所能制伏」（耆伊牛會奏）木偶般的不抵抗正是他們最「聰明的」辦法。

投降派不守長江，還有另一種計謀。英軍在寧波、乍浦發出佈告，都說「前往天津議和，遵國王所諭辦理，」這當然是滿清害怕的事。道光帝早已決心求降，在他看來，南京城下之盟，比「天津議和」要安全得多，所以他從不諭令長江設防。紳民請守險要，都被牛鑑駁斥，並且到處張貼告示，說「長江沙淺曲折，洋船斷不能入，」勸兩岸居民無庸驚慌。他從上海逃回南京，每天警報

傳來，一概不理，却天天派人探問耆英的行程。耆英似乎等待着英軍先到南京，態度從容，先在蘇常一帶逗留觀望。被投降派盼望的英軍，因爲水道不熟悉，大船時常擱淺，要等潮水高漲才能駛進，六月初八日才到達鎭江。

鎭江城形勢險固，居民號稱十萬戶，商業繁盛，無論人力、財力、地勢都可以堅守，阻遏敵船進犯南京。滿洲駐防軍副都統海齡把乍浦的舊樣又翻出來，拒絕外來援軍進城，令在城外作戰。駐防滿兵一千餘人，綠營兵六百餘人守城內，寥寥如晨星，守城器械一切不備。禁阻難民遷徙出城，藉口搜索漢奸，不論眞假，捕殺無數，造成極大的恐怖和混亂。城外軍抗戰二三日敗走，英軍攻入城內，先攻滿營。這時候滿兵才拚死地應戰。英軍受到堅強的抵抗，損失一百八十五人，爲報復這個損失，大肆屠殺，居民被擄掠燒殺，非常慘酷。英軍這種極端殘酷的手段，和貪慾無厭的鴉片販行動完全相符合。無辜的鎭江人民就在英國侵略者和滿洲統治者雙重摧殘下作了重大的犧牲。

璞鼎查受到意外的抵抗，主張退出長江，改往天津，馬利遜精通中國情形，竭力阻止說：『此（鎭江）中國漕運咽喉，扼以要挾，必可如志。』六月底，英兵船八十餘艘到南京下關江面，中艦、伊里布通知璞鼎查說：『欽差大臣已奉諭旨，永定和好，不日即可到省。』璞鼎查表示接受提議，七月初，耆英到南京。

第十節　投降派大『勝利』（一八四二年〔道光二二年七月以後〕）

投降派的求降，侵略者的求戰，實際是相互爲用的。當時人民對滿清廣泛的憎惡以及統治階級內部抵抗、投降兩派深刻的鬥爭，這使投降派必需利用英軍的求戰，才能借『萬不得已』作口實達到賣國的目的。英軍方面專尋抵抗薄弱的地區進兵，以求戰來求得滿意的受降條件。南京正是雙方會合的適宜地點。投降派首領穆彰阿公開發言了，他說：『兵興三載，糜餉勞師，曾無尺寸之效。剿之與撫，功費正等，而勞逸已殊。靖難息民，於計爲便。』依據這個賣國理論，耆英、伊里布上了一個『江南民風柔懦，男婦數萬呼號籲救。不若姑允，以保大局』的奏摺；道光帝下了一個『念江南數百萬生靈，一經開仗，安危難保，既經該大臣等權宜應允，朕亦祇可以民命爲重』的上諭。耆英、伊里布又上了一個『璞鼎查貌甚恭謹，詞甚諄切，不得不俯順其請』的奏摺；道光帝又下了一個『當告以大皇帝以誠相待，允准通商，汝國亦應以誠相待，斷不准再啓兵端，違背天理』、『通商和約，俱着照所議辦理』的上諭。南京條約訂定了，投降派大『勝利』了，只是中國人民受了『呼號籲救』的侮辱，封建奴隸又加上了半殖民地奴隸的負擔，災難重重，一百年還翻不過身來。

六月二十八日，英軍到下關，七月初三日伊里布、牛鑑接受英方條件。初九日耆英全部承認，

並奏請批准。二十四日（公曆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條約正式簽字。從提出到簽字，不曾經過一次會商，滿淸政府出賣中國的瘋狂性與英國侵略者的貪殘性，第一次表現在南京條約上。按照條約的規定：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爲通商港口；永遠割讓香港；賠償鴉片價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水陸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共二千一百萬元。其餘如海關稅則、保護漢奸、保護傳教等條，權利非常廣泛。浙江巡撫劉韻珂論條約的後果說：『夫國家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民所恃以納稅課通貨物者銀也。今法窮於夷，銀盡於夷，雖欲戢兵，其將能乎？』所謂『法窮財盡』就是中國在政治上主權不完整，在經濟上財物無限止外溢，人民生活加倍窮困，這恰恰是半殖民地社會的情況，南京條約開始了這種情況。

南京條約對投降派說來，確是大勝利。滿淸統治中國的兩個基本工具：武力是旗兵和綠營兵，政治是漢族官吏和紳士。在戰爭中，武力的極端腐敗完全暴露了（比較能戰的綠營兵如關天培、陳化成和定海三總兵都是抵抗派），滿漢官紳間矛盾發展到幾乎破裂的程度（如林則徐、王鼎及廣州團紳不服從官府指揮）。道光帝嚇得驚惶失措，他可以壓制抵抗派官紳，但無法禁止軍隊的臨陣潰散。他在批牛鑑奏摺裏說：『儻將士有所窺伺，稍有解體，將成瓦解，可設想耶？』流露出極大的焦急。他處在這樣一個環境裏，就是『文官愛錢而又惜死，武官惜死而又愛錢，加以兵無鬥志，民有亂心，帑藏空虛，脂膏竭盡』（劉韻珂致耆英書）岌岌可危的形勢中。在他面

前，擺着兩個敵人，一個是英國侵略者，一個是民間抗英反滿正在發生着的革命力量。要挽救滿清統治的危機，對侵略者投降，保存軍隊來鎮壓革命，自然算是他們的勝利。投降派開始就反對禁烟，從皇帝官員到兵丁差役，都得到鴉片的利益。南京條約絕不提鴉片一字，就是允許無稅大量輸入。『廣州自道光二十四年後，鴉片整箱運輸街市中，直如非違禁品』（帶威議和後之中國。）『鴉片貿易及吸用均成公開，並不隱避，靑天白日之下，街市中常見有運烟者往來』（中華紀事報。）洋商在通商口岸銷售，奸商運入內地，就算『中國貨物』，成為『各行之首業，』官吏收受陋規，仍恢復戰前的繁榮狀態，這又算是他們的勝利。他們是不是也有些損失呢？沒有的。賠償烟價六百萬，奕山已用追還商欠名義支付了，南京條約又付烟價、商欠九百萬，數日內由藩庫運庫及民捐（向南京人民勒捐）湊足六百萬元，交給英軍作退兵條件。這種已付未付的賠款，全部要人民額外負擔，政府中人絲毫也不肯撙節自己的奢侈浪費。試看道光帝的上諭說：『所稱商欠一節，除三百萬元由廣東查明商欠追還外，其餘斷難官爲保交。』這就是說，政府擔保向廣東商民勒索三百萬元。上諭又說：『至現議先交之六百萬元，自應酌給，以示誠信。除現在民捐一百數十萬兩外，其餘不敷之處，准其暫於江浙安徽藩運各庫通融借撥，統於捐輸項下還款。』這就是說，庫款只准暫借，要勒逼人民交出捐款來歸還，不許虧短分文。賠償軍費及本國軍費數千萬元，自然用同樣的辦法。他諭各督撫說：『國家經費有常，必應量入爲出（實際是

量出爲入，）現在軍務緊要，費鉅用繁，尤須妥爲籌畫。在外籌畫一費，卽在內省撥一項。若各督撫熟籌良法，卽行條議具奏。至應徵一切新舊正雜錢糧，按款依限徵收，毋使短絀。』這就是說，巨大的軍費作爲額外捐款，人民已負的苛捐重稅，不許缺少或拖欠。各省督撫遵照上諭，熟籌所謂良法，不外勒捐和增稅。當時人民的痛苦怨恨，從劉韻珂致耆英書裏反映了一些。他說：『議給之款，各省分撥。承示此項銀兩須勒紳富捐輸歸款。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爲數實已不少。若責以賂夷之款，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議增糧賦，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毒之氣，故剿夷之銀可勸捐，而賂夷之銀不可勸捐。』劉韻珂代表紳富抗議，全部捐款自然落到小民身上。

滿淸政府搜括財物，那種貪虐無恥，連口頭上理由也是不講的。上海開市，內地湖絲運往上海，比戰前運往廣州路近，捐稅無疑應該減少，耆英却規定：『查明赴粵路程，少過一關卽補納一關稅數。』英領事替華商求免補納，得到的答復是『定章不能更改。』上海開市，粵海關收入短少，耆英商得璞鼎查同意，把主要輸出品茶葉每擔（百斤）增稅兩倍，次要輸出品棉花每擔增稅一倍。原來稅額茶葉每擔九錢，棉花每擔二錢，已是輕重懸殊，增稅以後，廣東一帶茶業出口大受摧殘，他不顧這些，只求粵海關收入『有盈無絀。』在內穆彰阿，在外耆英，都搜括有『良法，』勝任道光帝的腦和手。

耆英善於執行對外國慷慨出賣、對人民無情剝削的政策。他的外交方針是『抑民以奉外，』

他的外交方法是『外國人祇可計誘，用好言哄騙，一味奉承。』這些還不夠，他得在文字上給道光帝製造一些體面，什麽『該夷執禮甚恭，情極馴順，』『上持國體，下順夷情』之類，使道光帝有面子來批准屈辱條約。他具備着這一套手段，到廣州訂立下列條約：(一)中英虎門條約（道光二三年）；(二)中美望廈（澳門附近村名）條約（二四年）；(三)中法黃埔條約（二四年）。這些條約中包括片面的最惠國條款、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三個最基本的不平等條款，確定了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

第十一節　圍繞着鴉片的各種鬪爭

臭穢的鴉片當作中英兩國鬪爭的中心，是十九世紀中期特有的社會現象。那時候，英國資本主義工業正在興旺發展，但並不是絕對強大。在中英貿易上，英國的棉毛織物只抵得中國的湖絲、綢緞，印度的棉花、洋米，遠抵不得中國的茶葉、大黃。英印財政依賴對華貿易，成爲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中國自給自足而有餘，粵海關每年收稅不過百餘萬兩，確是『稅銀何足計較』。中國無求於英，採取傲慢自大態度，英國有求於中，採取隱忍遷就態度，這是很自然的事。中國統治者意識到無限制通商，會招致封建社會的解體，規定禁例，限制或禁止中外交通，如茶葉，不得超過五十萬擔；大黃不得超過一千擔（乾隆時每國限購五百斤）絲、綢、銀、錢、米、穀、荳、銅、鉛、鐵、錫、硝磺、書

籍等物，不准通商，中國商船不准出外洋貿易，洋人不准入內地，洋婦不准到廣州商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表現嚴格的閉關精神。更主要的原因是「清朝害怕外國人會扶助很大部份中國人那種不滿意滿洲人奴役他們的情緒，用這種（閉關）方法來使人民不與可恨的外國人發生任何往來。」滿清政府（與明朝比較）對閉關政策特別堅持，排外思想特別濃厚，對新事物特別憎惡，對舊經驗特別保守。它不僅為了保護封建制度，而且還為了維持異族統治二百年來少數滿族壓迫漢族的成法，它決不敢輕易修改，這使中國的大門格外緊閉起來。英國資本主義的任務是要開闢世界市場，決不允許中國關門，但它的正當商品布疋不能負起這個責任，唯一有效的敲門磚只能用臭穢的鴉片，雖然他們也知道這是「不名譽」的商品。

英國不得不利用鴉片，表示它資本主義力量還不夠強大，中國一部份統治階級對鴉片表示歡迎，因為和他們墮落、荒淫、貪污、無恥一切黑暗腐爛的性質相符合。一部份人表示拒絕，因為他們保持着民族自尊、抵禦外侮的歷史舊傳統。前一部份人多數是滿人，後一部份人多數是漢人。鴉片戰爭從中英兩國關係說來，是老大的封建主義社會與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鬥爭，也就是閉關自守與開闢市場的鬥爭。從中國內部說來，是抵抗派與投降派的鬥爭，這一鬥爭表現在思想上成為進步傾向與守舊頑固的鬥爭，表現在政治上轉成滿漢民族的鬥爭，鬥爭的結果，英國侵略者、滿洲統治者贏得勝利，中國人民、進步傾向者遭受失敗。

一　英國資本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的鬥爭

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者必然戰勝。爲什麽？因爲他的對手是守舊頑固的、投降主義的、猜忌漢人的滿洲統治者。也就是說，腐爛了的封建主義决不能對抗新興的資本主義。上面所舉事實完全證明了。但英國遭遇的對手，如果是另一部份封建主義者，就是有民族精神的、進步傾向的抵抗派，那末就會改變戰爭形勢。在當時，抵抗派如林則徐、臧紆青以及著書立說的魏源（聖武記、海國圖誌）夏燮（中西紀事）都主張發動民衆、『以夷治夷』（利用國際矛盾），他們的軍事路線含有民族戰爭的性質，外國侵略軍最害怕的正是這樣的一種戰爭。

英軍的長處是船堅炮利，封鎖海口；它的短處是離本國遙遠，兵力不能過大，給養困難，人地生疎。就長處說，英軍也並不佔絕對優勢，那時候兵船還是帆船，火輪船只供通訊，效用不大。大炮射程比中國土炮遠，確是英軍的特長，但中國購入西洋（葡萄牙）美國大炮，可以對抗。封鎖海口對中國妨礙極微，它不靠航海通商立國，甚至希望永遠閉關孤立。英兵船吃水深，只能停泊洋面，不得中國引水引導，不敢行駛近海，更不敢駛入內河。兵士登陸，必需用舢板，每隻容十人至二十人，當然不能攜帶大炮。中國防範嚴密，禁止漢奸接濟，它就無法取得大批舢板和食物。如果中國海口都採取林則徐的辦法，英軍即使奪得幾個定海那樣的海島，對中國並無大妨害。英軍只

有得到中國投降派的應援時，才克服了短處，並獲得超過其長處的過分效果。

中國方面一切落後，不只是船不堅炮不利，但並不等於說，必不能作有效的抵抗。軍事上採取『以守爲戰，以逸待勞』的戰略，採取『分伏散戰，水陸並攻』的戰術。用水陸正規軍守海口，水勇火攻敵船，陸勇協助正規軍作戰，團練守衛鄉土。洋兵登陸，任何人得『持刀痛殺。』林則徐、臧紆青這種軍事思想，符合於民族戰爭的法則，是很可珍貴的。在林則徐手上，英軍不能在廣東得志，證明這種軍事思想的正確。外交上林則徐、魏源等強調『以夷治夷，』並非主觀的空想。美法兩國想奪取英國對華貿易的利益，葡萄牙怕英國奪取澳門，願供給中國船炮及新式技術，並通報新消息，這都是事實（林則徐政書及聖武記）別一可惜的機會也被投降派放過。道光二〇年滿淸藩屬廓爾喀國（卽尼泊爾國）向駐藏大臣稟稱：『小國與底里所屬之披楞部相鄰，每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小國願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屬，以助天討。』所謂底里卽英吉利，披楞卽孟加拉，京屬卽廣東，滿淸政府不加調查，照例予以飭駁說：『蠻觸相爭，天朝從不過問。』二二年廓爾喀又派使人來商議，仍被『逐一指駁，以杜妄念。』如果中國助兵助餉，聯合廓爾喀攻入鴉片主要出產地孟加拉，至少使英軍有內顧之憂，不敢放膽侵略。上述軍事外交各種有利條件，中國很可以利用來爭取勝利。但投降主義的統治者，他們需要失敗才適合自己的利益，不願利用這些條件。

二　抵抗主義與投降主義的鬥爭

鴉烟初期，統治階級有抵抗、妥協、投降三派意見。定海失陷以前，抵抗派得勢，妥協派一部轉入抵抗派（如鄧廷楨、怡良）。定海失陷以後，投降派得勢，一部份抵抗派轉入投降派（如怡良、劉韻珂）。實際鬥爭的只有抵抗投降兩派，妥協派不起什麼作用，多數轉到投降派方面。

抵抗投降兩派思想上基本不同點在於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上。抵抗派從民族自尊心出發，拒絕外國勢力的侵入，雖然他們也是傲慢自大對世界情況無所知，但在民族遭受危害的時候，他們願意探查外國情況，學習外國技術，這是進步的傾向。抵抗派的路線，無論戰勝、戰敗或長期戰（多半是長期戰。中英都不甘失敗，要求繼續戰爭），都起着促進中國進步的作用，這樣的戰爭對中國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另一種人如顏伯燾、裕謙，他們形式上類似抵抗派，實際上是極端頑固的閉關主義者，這種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結果就是失敗。投降派從壓迫人民、保持少數人私利出發，他們淸楚懂得只要政權在手，民膏民脂儘夠剝削，中國遭受任何傷害，對他們私利並無妨礙。不僅如此，中國任何一個傷害，對他們還都是乘機獲利的機會。投降派的路線，顯然是守舊頑固、阻止生產力進步、依附外國侵略者、引導中國走向殖民地的路線。這一路線直到今天還沒有消滅。中國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國主義的鬥爭史。

抵抗派和投降派思想的相反，看下列幾個例證就夠明顯。

同是對外國情形無知，林則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逐漸由無知走向有知；琦善相反，說：『我不似林總督，終日刺探外洋情事，』永遠不願有知。

同是面對外國船炮，林則徐主張抽關稅銀十分之一造船製炮，『師敵之長技以制敵。』道光帝批駁說：『一片胡言。』耆英說：『該夷船堅炮猛，非兵力所能制伏。』南京訂約後，伊里布到廣東辦善後事宜，道光帝諭令『不得僱用夷人製造或購買輪船。』中美訂約後，美國贈送槍炮圖樣、陸海軍戰術及建築炮台法等書籍，耆英不敢收受。廣州人潘仕成『捐貲延佛蘭西洋官雷壬士於家，造洋船洋炮，又造水雷，能水中破船底。所捐造二桅戰船四艘，材堅工巧，悉如西洋式。』這個新式軍需工業的萌芽，是違反政府意志的。道光帝不願民間學會製造新武器，要潘仕成捐獻製成品，實際就是消滅這個萌芽的存在。

同是用兵，林則徐說：『勦夷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他主張訓練本地軍隊炮術精熟，不需『遠調百萬貔貅，祇供臨敵之一哄。』道光帝恰恰是各省抽調兵丁，雜湊成軍，一聞炮聲，便『紛紛潰散，幾同兒戲。』

同是利用人民，林則徐說：『民心可用，』『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英軍）命而有餘。』投降派抱定成見，『詆義民爲頑民。』奕山說：『粵民皆漢奸；』推諉自己的戰敗說：『洋船闖入

省河，俱是漢奸引導。』道光帝掩飾無恥的投降說：『朕因億萬生靈所繫，實關天下大局，不得不勉允所請。』

這樣絕對相反的觀點，反映出少數貴族地主與多數普通地主利害的矛盾，同時也反映出統治的滿族與被統治的漢族間嚴重的矛盾。

三　滿族與漢族的鬥爭

滿族統治漢族，無時不在危疑猜忌中，尤其是外患臨頭，更增加了疑忌心。統治階級內部以抵抗派首領林則徐爲中心，展開很露骨的鬥爭。

定海失陷，道光帝歸罪林則徐，不久得革職處分。這是絲毫沒有理由的懲罰。奕山在廣東大敗，又歸罪林鄧充軍到新疆。當時黃河在河南東部決口，漢軍機大臣王鼎奏留林則徐襄辦河工。照例河工完成，該受重賞，至少要減免充軍罪。恰巧奕經在浙江大敗，道光帝仍令林則徐往伊犂効力贖罪。這是什麼用意呢？投降派把一切失敗的責任推給林則徐，抵抗派要推薦林則徐再辦洋務，道光帝蠻橫地迫令仍往伊犂，顯然是拒絕漢人參與軍事、外交大權。這樣無情的抑漢政策，給漢族官員極大的刺激。王鼎哭泣流涕，送林則徐上路，林則徐也做了兩首詩，有『寶劍還期賜上方』的句子，就是說要『斬佞臣（穆彰阿）頭。』相傳王鼎回到北京，痛罵穆彰阿，自殺保薦

林則徐可大用。林則徐哭王文恪公詩有『衞史（史魚）遺言成永慽，晉卿（范文子）祈死豈初心』句，自殺屍諫大概是事實，一個漢軍機大臣自殺來反對滿軍機大臣，在官僚社會裏是極少有的異事，足見滿漢鬥爭是如何的尖銳。

南京條約訂立以後，輿論更是嘩然。道光帝為和緩羣情，玩了如下的手法。

二二年九月，『牛鑑着即革職拏問，由耆英派員解京交刑部治罪』（二四年釋放）牛鑑只是投降派的追隨者，被革職治罪；投降派首領耆英却做了兩江總督。對粵浙大敗的負責者，僅僅『召奕山、奕經、文蔚來京。』絲毫不負責任。這樣的處置當然不能服人心。不得已又下諭：『奕山、奕經、文蔚均着交部治罪，以示懲儆。』這種手法還是騙不過衆人，他只好宣布『奕山、奕經、文蔚鎖拏解京，革去職任，定為斬監候，秋後處決。』短時期內接連下三道上諭，三個貴族從無罪到有輕罪又到有重罪，並保證秋後斬首，可說是滿洲統治者對漢族臣僕從來未有的大讓步。於是漢官們受騙了。道光帝却另玩一套手法。

十一月，宣布余步雲『見敵即退』的罪狀，執行死刑。『見敵即退』的不只是余步雲，但裕謙却因失援敗死，殺余步雲含有替滿人報復、向漢人示威的意義。預約秋後處決的三個貴族，在這一示威下掩護過去了。二二年三月，『賞琦善三品頂帶為熱河都統，』這個賣國賊也曾被輿論壓迫，於二一年六月宣布過『斬監候，秋後處決』的判決，過了兩個秋後，又抬起頭來，經過這

個嘗試，『賞文蔚爲古城領隊大臣，奕經爲葉爾羌幫辦大臣，』把罪惡尤大的奕山留下觀望風色。果然輿論大嘩，由御史陳慶鏞出面上一本辭氣嚴厲的奏摺，主旨是說：『琦善等三人起用爲刑賞失措，無以服民。』賊膽心虛的道光帝受了反抗，只得厚着臉皮自認一些錯誤說：『總由朕無知人之明，以致琦善等迄無成功。朕惟有反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諉罪臣工，以自寬解？』這些欺騙性的辭句，目的是要免求琦善等『斬監候』的罪名，他在自己認錯以後，接着說：『琦善、奕經、文蔚均着革職，卽令閉門思過，以昭賞罰之平。』『斬監候』可以變成『閉門思過』，爲什麼林、鄧必須充軍到新疆？七月，他把鄧廷楨釋放囘籍，企圖和緩漢官們的不平。漢官們又受騙了，他們是滿洲統治者的臣僕，不可能有進一步鬥爭的勇氣。十月，道光帝任命『奕山爲和闐辦事大臣，奕經爲葉爾羌參贊大臣，琦善爲駐藏大臣，』漢官們不敢再表示抗議。耆英辦完虎門、望廈、黃埔三條約，賣國工作告一結束後（二五年，）始釋放林則徐囘京。滿洲統治者玩弄權力，制服抵抗派，但不能制服他們的內心。首先是林則徐，他在送鄧廷楨囘籍詩裏說：『靑史憑誰定是非，』不滿投降派的顚倒是非；又說：『歧路又歧空有感，』不滿淸政府的昏亂指導軍事、外交錯中又錯，錯謬到底。抵抗、投降兩派對立，心理上依然存在。

兩派心理上對立，也就潛伏着滿漢統治階級的裂痕，這對滿洲統治者是極大的不祥徵兆。道光帝與穆彰阿同謀賣國，無法犧牲同謀者來消除這個矛盾。林則徐答邵懿辰書裏說：『夫爲

國首以人才爲重，然有才而不用與無才同，用之而不使之盡其才與不用同。且當其未用之先猶有所冀也，及用之而不能盡其才，或且以文法繩之，猜忌譖之，則其人之志困而不能自伸，而天下之有才者聞之亦多自阻』（道光二九年，即則徐死前一年。）書中所說的完全是他本身的經驗，『天下有才者亦多自阻』也是事實。這個矛盾的嚴重，威脅滿洲統治到如此程度，就是三○年正月道光帝病死，臨死遺言：不許配天、祔廟、立功德碑，表示對漢官們懺悔，實際是對漢人作最後一次欺騙。六月，太平革命在金田爆發，滿洲統治者着實驚慌。十月，咸豐帝硃筆宣布穆彰阿耆英罪狀：『從前夷務之興，穆彰阿傾排異己，深堪痛恨。……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英夷船至天津，伊猶欲引耆英爲腹心，以遂其謀，欲使天下羣黎復遭塗炭。其心陰險實不可問，潘世恩（漢軍機大臣）等保林則徐，伊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穆彰阿暗而難知，耆英顯而易見，然貽害國家，厥罪惟均。』雖然處罰只是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耆英『降爲五品頂戴』但是非算是論定了。在一致反對太平革命的基礎上，滿淸統治階級又團結合作起來。

第二章　中國人民的反英反滿鬬爭（一八四一年（道光二一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〇年））

第一節　言論

上章已經敍述過統治階級怎樣腐敗墮落、投降外國侵略者、大量出賣權利的事實，現在我們該注視中國人民怎樣開始他們反外國侵略、反滿洲統治的革命鬥爭了。這種鬥爭不管它是原始的，規模不大的，意識模糊的，方法陳舊的，甚至有時帶些野蠻氣味的，但必須承認它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開始，也必須承認它有無限的前途。

在英國侵略軍進入中國，滿清政府投降侵略者的同一時候，中國產生了反英反滿的人民武裝。反英武裝一部份是人民自發的組織，一部份與反英的地主官僚合作，受他們的領導。反滿武裝一般是人民祕密的組織。反英武裝發展爲反帝運動，反滿武裝發展爲反封建（以前的反滿不可能發展爲反封建）運動。

第二節　反英武裝鬬爭

英國侵略軍足跡所到的地方，無例外地遇到人民武裝反抗。英軍避免與人民武裝對抗，唆使投降派官吏來破壞反抗，這種方法是暫時收效的，但同時也推動反英反滿鬥爭的發展。

中英衝突的焦點在廣東，英國的侵略，滿清的賣國，在廣東人民面前暴露得尤爲明顯，因之廣東人民反英反滿的義憤也特別強烈。

廣東方面

道光二一年四月，英軍『由泥城而上四方炮台，凡所經由之路，曾無一兵施放槍炮者』（御史曹履泰奏）初六日，奕山投降英國侵略軍，訂屈辱條約，獻贖城費六百萬元。人民激起熾烈的愛國義憤，準備反抗侵略者。初十日即公曆五月

平英團

三十日，英軍千餘人退出四方炮台，在城外擄掠，還企圖到佛山鎭擄掠，經過蕭關三元里，廣州城西北十餘里村民鳴鑼聚衆，豎立平英團大旗，攻擊英軍。附近一百〇三鄉（亦稱九十六村、又稱百十八村）男婦民衆數千人（王廷蘭說數千人，一說一萬至一萬五千人，一說數萬人，各書不同）奔集平英團旗幟下，圍英軍數重。英軍整天冒死突圍不能出，民衆愈聚愈多，殺英兵官二人，黑白洋兵二百餘人。義律率兵往援，又被圍困。義律危急，派漢奸混出重圍，向廣州知府余保純求救。奕山大駭，急令余保純出城，用欺騙威脅手段強迫民衆解散。三十一日，余保純保護義律率殘兵逃回船上。同時三山村民衆擊殺別路英軍百餘人，獲炮二尊，刀槍九百餘件。佛山鎭民兵在龜岡炮台圍攻英軍，殺數十人，又擊破來援的舢板船數隻。新安縣武舉人庚體羣組織火船三隊，初

四夜半攻襲虎門停泊的大兵船，燒燬一艘，餘船連夜逃走。十七日洋船陸續退出，有大船擱淺不能動，鄉民羣衆要用火攻，被官府禁止。當時反英起義是廣泛的羣衆運動，三元里平英團聲勢最大，所圍擊的英軍也最多，這次運動以平英團爲代表是恰當的。五月三十日那樣光輝的革命發動日，是値得永遠紀念的。

義律被廣東人民懲創，自覺慚愧，出『告示』說；『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毋再犯。』人民作檄文斥責說：『爾自謂船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由奸相（琦善）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犯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卽非大淸國之子民。』義律被斥，知民氣旺盛，不敢報復。

平英團所代表的民衆只認識林則徐和琦善一流人的區別，還不能認識到滿淸是人民的仇敵，在這樣的認識程度上，他們與反英的地主官紳合作起來，甘心作滿淸的『子民』。至於一般著述說平英團僅是因英兵『輪奸一老婦人起衅，』那是有意誣衊或誤信傳聞。平英團有組織、有誓詞（中西紀事）決非倉猝爲合。道光二十二年兩廣總督祁墳奏稱：『夷人詞氣傲慢，省城十三洋行原任夷人各水手亦每每欺侮平民，或乘醉搶取貨物，或凌辱過路婦女，均經地方官當時彈壓，尙未激成事端，而士民蓄怒已深，爭欲得而甘心。』這也祇是次要原因之一種。眞正起義

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英國用武力侵略，中國人民就用武力來反抗侵略。

昇平社學

林則徐在粤曾辦民團和鄉勇，團由紳民自辦，勇由官府發餉。南京訂約後，英人要求進廣州城，紳民一致拒絕，表面理由是舊例洋人不准進城，實際是抗議強迫訂約。官吏怕見洋人，也不願他們進城，對紳民頗表同情。二三年，南海番禺兩縣『紳士耆老，傳遞義民公檄，議令富者助餉，貧者出力，舉行團練。按戶抽丁，除老弱殘廢及單丁不計外，每戶三丁抽一，以百人爲一甲，八甲爲一總，八總爲一社，八社爲一大總。旬日之間，城鄉鎮集，燈楮旗布爲之一空』（中西紀事）。省城附近各鄉設昇平社學公所（平英團一百三鄉組織在社學裏，成爲基幹力量，）作爲團練機關。東路各縣設東平社學公所，與昇平社學互相聯絡。這個組織有巨大力量，璞鼎查因而不敢強硬要求進城，伊里布、耆英之流也因而不敢私許英方要求。社學『不藉官餉，亦不受地方官約束，』唯一宗旨就是監視官府私許英人進城及其他賣國行爲。二六年曹履泰奏摺所謂『粤民與英夷爲仇讐，即與地方官爲仇讐，』確是實情。伊里布被英方迫促，不敢不許，又被社學監視，不敢私許，憂愁發病死。耆英同樣兩面爲難，他曾用『匪徒滋擾』、『無賴游棍造言生事』等惡毒詞句誣衊民衆抗英行動，到底不敢公開反對社學。他是最狡猾的官僚，一面與英人私定兩年後入城的密約，一面運動內調離開廣東。二七年徐廣縉繼耆英爲兩廣總督。當時社學發展情形照二九年徐廣縉所說：『今城廂內外街之團勇，戶戶出

兵；合計不下十餘萬人、而且按舖捐貲。儲備經費，合計有數十萬金；』又說：城廂社學『居民則以工人，舖戶則以伙伴，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註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籌備經費，製造器械，添設柵欄。其團勇至十餘萬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則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卽至小街僻巷，亦皆竭力捍擋，爭先恐後。』這裏可看出城廂社學的嚴密組織和鬥爭情緒。鄉閭外縣同樣旺盛，合計人數至少數十萬，眞是空前偉大的人民武裝。

社學成立以後，做了多次鬥爭。著名的有二二年燒洋館鬥爭，起因是『紅毛黑夷水手，在十三行地面，向華民買食水果，不給錢文。賣果者向討，反被該夷用刀劃傷。』民衆不平，攻燒洋館。二三年反香港開市鬥爭，起因是『該夷欲在香港設立碼頭，希圖華商往來販運，將來出口入口貨物，稅皆出於華商，該夷竟可坐享其利。』社學聯合商人拒絕『與英夷互市。』璞鼎查壓迫伊里布禁止罷市，伊里布愁死，最後英方只得『允遵照舊章，泊船黃埔，不敢膠執在香港交易之請。』二五年驅逐廣州知府劉潯的鬥爭，起因是香港總督德庇時帶水兵一千餘人，佔領炮台，將炮眼釘塞，兵船直入省河，要求入城。耆英出告示禁止人民阻撓，人民大嘩，撕毀告示，屢出屢撕。耆英無法，派劉潯到洋船祕密商訂進城日期。被社學偵知，立卽發出揭帖，遍貼城廂內外，約定『夷人入城之日，閉門起事。』劉潯從洋船回城，社學數千人攻入府署，燒燬朝珠公服。劉潯跳牆逃走。耆英想分化社學，請紳士轉勸民衆，紳士答稱『衆怒不可犯。吾鄉之民能爲國家効勦力，不願從撫。』社

學又出揭帖，約期攻擊城外十三洋行。德庇時怕事件擴大，退回香港。耆英被人民監視，難於放手媚外，不久也退回北京。

最大一次鬥爭是二九年反進城鬥爭。耆英密約兩年期滿，香港總督文翰帶兵船到虎門外要求履行條約。徐廣縉得社學支持，親到洋船表示拒絕。第二天大批兵船火輪船闖入省河，南海、番禺、各鄉社學先後趕來，準備戰鬥。徐廣縉上洋船交涉，文翰企圖扣留他迫使承認進城密約。省河兩岸社學呼聲震天動地，等命令即時開戰。文翰恐懼，請『罷兵修好』，不再提入城要求。

耆英這個大賣國賊，當然不會允許社學存在。一心要把它分化以至於消滅。他把社學描寫成：『無事散處田間，有事聽官調遣，法有類乎士兵，意不外乎保甲。有公正紳士為之鈐束，近年以來，不惟滋擾府署、與官為仇者，社學之人不與其事。即焚燬公司館與夷搆釁者，亦並無社學之人』（駁覆曹履泰奏。）肯定社學完全是保甲，不與聞政治的官辦組織。這個奏摺配合道光帝的上諭，顯然是投降派玩弄大陰謀。那個上諭說：『有人奏，廣州府一帶（昇平社學根據地）土匪刦掠為生，結黨聚會數萬餘人。其著名積匪，如香山、新會、順德等處，姓名皆歷歷可數。近來匪徒漸多，地方文武不肯實力查拏，以致農民不安耕作。着耆英按名拏獲究辦，務使盜賊肅清，農商安靖。』耆英慣於誣衊民衆，如說燒洋館『皆係無賴游棍及俗名「爛崽」等輩所為，一經查拏，旋即逃散，』說驅逐劉潯是『匪徒藉端滋擾，務獲首要各犯，置之重典，以儆效尤。』他企圖根據上

論『肅淸盜賊』來分化社學，但社學團結得很堅固，紳士也不曾受騙分化，雖然被他殺了些人，但投降派陰謀却是失敗了。

福建方面

道光二一年七月，英軍攻佔廈門，顏伯燾逃往同安，『夷人在廈門肆掠，有鄉民陳氏與之接仗，夷衆五千，我兵五百。夷用車炮，民用抬槍。一以擊十，夷兵死者以百計，傷者以千計。陳氏之死者三人，傷者十二人耳。是以不敢久駐廈門而退屯鼓浪嶼』（謝蘭生：思忠錄，中西紀事摘引。）這個記載也許誇大一些，但陳氏以主擊客，以多擊少（英兵當是少數）擊退敵人，則可信是事實。

浙江方面

英軍侵佔定海、鎮海、寧波，當地有黑水黨，狙擊敵人，英人在定海用剝皮慘刑對待人民，足證鬥爭的激烈。鎮海鄉民擊退英軍偵察隊，俘獲副船主嗢哩。嗢哩口供說：『我船上共有黑白鬼三十五人，廣東漢奸四人，載的烟土洋布各貨向在廣東買賣。二十天前兵頭璞鼎查叫我們同了嗢囉三桅船、叮嘛的兩桅船同到浙江洋面，以銷貨爲由，探聽各處海岸防守情形。我們三船就駛到浙江洋面游弋了五六日。因無人到船買貨，無從探聽消息，缺少淡水食物，望見沿海「山砌」住有人家，我帶了白黑鬼二十多人，駕坐舢板小船，登岸搶擄，不料岸上埋伏兵民，把我們同咪哈吻（印度人）砍傷擒住。其餘各鬼子也有受傷逃回船上的，也有打落海中的，我沒有看得明白。』這是可信的材料，說明鎮海人民是盡了保衛國土

的責任。

江蘇方面

英軍侵入吳淞口，佔領寶山、上海、駕舢板船向內地游弋，不少人被沿江居民狙擊斃命。後來改走長江，探路到靖江縣城，英兵十餘人被逐逃走出城，有童子從城上投磚擊死『白夷』一人。第二天，英船三艘開大炮轟城，靖江人拒戰，用抬槍殺黑鬼十餘，最後擊中敵船火藥艙，一船燒燬，兩船逃去。牛鑑得報告，嚴斥靖江人民『大膽生事。』

英軍攻破鎮江，停船江上。瓜州、儀徵、一帶『鹽梟，』攻襲英船，燒燬不少船隻。鹽民是勇敢的戰士，耆英等正在進行投降，怕得罪英軍，用『招撫』名義誘騙鹽民。道光帝批准『招撫』的上諭說：『儀徵濱臨大江，梟徒乘間竊發，現在招集頭目，尚就約束，仍當妥爲彈壓，毋任滋生事端。其事平之後，應如何設法解散之處，着斟酌妥辦。』鹽民爲了抗英受招撫，招撫了却失去抗英的自由。滿清招撫鹽民，爲了阻止抗英並於事平後解散。在同一上諭中說：『沿江各村自相團練，均着照所議妥爲辦理，』就是說，事平後解散。

以上所記，雖然簡略，却說明了一個規律：凡英國侵略軍所到的地方，一定有人民反侵略武裝出來抵抗。馬克思說：『在一切實際事務中——戰爭也是一種實際事務——華人遠勝於一切東方民族，』就是因爲中國人民有這樣一種反抗精神。

第三節　反滿武裝鬥爭

中國人民（漢回苗瑤等族）一貫進行着反滿起義，但滿清政府在政治、軍事上積累了鎮壓人民的豐富經驗和內戰技術，常是獲得勝利。它是生成用來對內鎮壓的一套統治機器，一遇到新的外國侵略者，對內的虎狼突變爲對外的羔羊，它再想在人民面前恢復虎狼的地位是困難了，就是說，一切力量都削弱了。中英戰後，反滿起義蓬勃發生，短短十年，從單純的反滿起義，發展到反滿反封建的太平天國革命。

鴉片戰爭的結果，支出大量賠款及經費，洋烟廣泛流行，土烟普遍種植，洋貨低關稅輸入，土貨重關稅輸出。這一切，既破壞社會生產力，又加重人民的捐稅負擔。過去皇帝要裝着『不言利』的假面目，搜括比較暗藏些，現在公開『言利』了。兩三年內，連下『籌畫經費』、『各支款減平兌放』、『開捐輸』（賣官）、『裁浮費歸公』、『查私墾隱賦，勒限照例升科』、『嚴催漕米，早兌早開』、『封禁沿海私灘，嚴拿私梟』等等一大串搜括的上諭，並定出『着賠』、『分賠』『攤賠』、『代賠』、『溢領』、『覈減』等名目，向官吏搜括，而實際是動員全體貪官污吏加緊向人民搜括。當然他也要玩些欺騙手段，表示爲民『興利除弊』，例如他指出：『向來完漕紳富謂之大戶，庶民謂之小戶。以大戶之短交，取償於小戶，因而刁劣紳衿挾制官吏，索取白規。大戶包

攬小戶，小戶附託大戶，又有包戶之名。以致畸輕畸重，衆怨沸騰。』糾正的辦法是：『所有前項大戶、小戶、包戶各名目，概行禁絕。一律均收，』這其實是一句絲毫不生效力的空話。又如二五年以『皇太后七旬萬壽』名義，普免道光二〇年以前民欠銀糧。事實上普通農民決不能拖欠錢糧到五年以上，所謂民欠就是紳欠，紳欠免了，官替紳欠挪移的墊款（州縣官每年解交藩庫錢糧不得少於七成）便無着落，他們『懇恩豁免各州縣歷年墊完民欠，』被道光駁斥不准，只好仍向普通農民設法補償，農民反因免欠而加重了負擔。這種破壞生產，增強剝削的措置，促進反滿運動高漲，是很自然的。

閉關時代，皇帝到大小官吏保持着一級高過一級的威嚴，在人民思想裏造成他們不可侵犯的虛象。戰爭中皇帝以及大小官吏對外國侵略者驚慌怯懦，醜態畢露，而外國侵略者，人民是敢於對抗的。這樣，不可侵犯的威嚴是動搖了。抵抗主義爲人民所擁護，代表人林鄧却無理由地被充軍。投降主義爲人民所痛恨，琦善、耆英之流却掌握大權，包辦賣國。對照之下，滿漢分界特別顯明。所謂『滿漢一體，不分畛域』的騙術揭破了。廣東浙江兩次大出兵，除『御駕親征，』這算是第一等武力，似乎應該無敵，可是他們潰敗得像兒戲一般。當時如于庭蘭（廣東按察使）一類人已看到：『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可知。從此爲外邦所輕，吏恐無賴匪徒漸生心於內地。』的確，滿清軍的實力被人民看破了。這些也都是促進反滿運動高漲的

原因。

依據東華錄道光二一年至二九年所記關於漢回番瑤各族起義及騷動事件，九年中凡一百十次。二七年最多，凡二十六次。二八年十次。二九年十六次。二九年以後不是事件減少，而是事件太多，地方官吏無法收拾，只得隱匿不報。三〇年六月爆發了太平天國革命。

第四節　中國人民與統治階級所走的不同路綫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會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了。戰前的歷史僅是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史（異族統治本質仍是地主政權；）戰後的歷史是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史，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封建主義依附帝國主義，反革命力量特別頑強，人民革命過程因之也特別曲折和艱苦，但一百年來革命力量繼續在壯大，到今天已是接近一最後決鬥取得徹底勝利的時候了。百年來鬥爭史刊成簡表如下：

（一）中國人民

- 反帝國主義：平英團
  - 昇平社學
  - 義和團
- 反封建主義：太平天國—同盟會
- 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
  - 人民革命路綫
  - 中國國民黨（改組後反革命的一段）
- 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改組前）

（二）統治階級

- 當權部份：投降派——湘淮軍閥——晚清政府——北洋軍閥——××蔣反動派——對內鎮壓對外投降路綫
- 不當權部份：抵抗派——戊戌維新派——君主立憲派——改良主義路綫

第三章　太平天國革命（一八五〇年（道光三〇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一二年））

第一節　緒言

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創造了世界市場。自從南京條約訂立，五口通商，中國以半殖民地的資格，進入世界市場了。閉關時代，人民受封建剝削，已經極其痛苦，鴉片戰後，又加外來的資本主義剝削，這種新式剝削，破壞了中國手工業，使數千年來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合成一體的社會機構開始在某些地區趨於瓦解；更嚴重的是促迫滿清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猛烈增加封建剝削的強度，繁重得難以負擔的舊捐稅上，又加上新捐稅，用以塡補賠款和鴉片貿易的虧額。鴉片戰後十年間，中國社會驟然遭遇這種史無前例的大變動，不論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村，全部震蕩起來。舊的財政、經濟、政治、禮教各種制度，愈更成爲中國人民的禍害，新的人民的反封建革命運動，在這樣時代條件之下是必然要發生了。而揭開這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就是馬克思稱爲『處於社會革新底前夜』的太平革命。那時，以英國爲首（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四分之三）的外國侵略者與滿族皇帝爲首的封建剝削者，給予人民最大的痛苦，試看下列事實，英國的鴉

片，滿清的暴政，顯然是痛苦的源泉。

英國輸入紡織品價額表（單位千金鎊）

年份	棉織品	毛織品
一八四二年	四七〇	一四六
一八四三年	八九五	四一七
一八四四年	一、四五七	五六五
一八四五年	一、六三六	五三九
一八四六年	一、〇二四	四三九

一八四二年—四五年，輸入額增長，到四六年開始低落，此後十年，輸入額平均說來幾乎沒有變動。這說明英國布匹對中國紡織手工業起了破壞作用，但不是嚴重的。輸出方面，中國絲茶逐年增長，在中英合法貿易上總是佔優勢，足夠抵補布匹及其他商品的價值而有餘。英國對華經濟侵略，主要依靠可恥的鴉片貿易，從南京條約的成立時起，鴉片貿易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大量輸入中國，每年換取等於數百萬金鎊的銀兩出口。從一八四〇年—五〇年，英國輸入鴉片箱數如下：

一八四〇年　二〇、六一九箱

一八四二年	三三、五〇八箱
一八四四年	二八、六六七箱
一八四六年	三四、〇七二箱
一八四八年	四六、〇〇〇箱
一八五〇年	五二、九二五箱

十年間，鴉片輸入增加一倍以上，消費者主要是統治階級中人，他們施行各種搜括方法，強迫人民補償耗失的銀兩，鴉片貿易繼續上漲，正與政治愈益腐朽，剝削愈益殘酷，銀源愈益枯竭，人民愈益困窮成正比例的發展。當時全部政治機關兇暴貪汚比鴉片戰前更甚，連曾國藩那樣殘忍的漢奸，也不能不認爲『百姓頗連困苦，』舉出一些『民間疾苦，』勸告咸豐帝『務思所以更張之』了。照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所說：第一，是『銀價太昂，錢糧難納』——『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每石平均價三千文）今日兩錢換錢二千，則石米反得銀一兩五錢。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州縣竭全力以催科，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扑滿堂，血肉狼藉。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拏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鎖其親戚，押其鄰里，眞有民不聊生之勢。』這裏所謂小民，當然不是地主豪紳，這種人或與官吏勾結，朋比爲奸，或放高利貸，兼併土地，與其說受加賦之害，不如說受加賦之利，土地集中

現象在鴉片戰後特別緊張，地主豪紳因中小農破產，經濟反趨繁榮，鴉片銷路也順利擴張了。那時候中小農民生活的窮困是難以形容的，例如江浙產米地區，米一石平均值錢三千文。銀價在道光元年，每兩換錢千一二百文，道光一八年，換錢一千六百文，二五年，京中換錢約二千文，外省換錢二千二三百文，農民賣米所得，以錢折銀，實際減縮一半左右。官府徵收地丁，定價銀一兩，道光一九年，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後漸增至二千餘文以至二千八九百文，總比市價高數百文。農民完納地丁銀一兩，歷年遞增須賣米一石，再加漕米折銀，每畝又需米數斗，平常年景一畝產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完納地丁漕米，已經剩餘無幾，暫時拖欠就遭血肉狼籍的慘刑，破產更不可免，因此他們唯一的生計，是壓縮自己的生活費，限於豆麥蠶桑紡織等副業範圍內，一遇天災疾病及其他意外事，副產不夠養生，當然成爲高利貸的犧牲品，佃農僱農生活尤其惡劣，上等佃戶耕田二十畝，每畝所費種籽、肥料、牛具、農器、農忙幫工等約一千文，春季缺糧必需填補，一般向當地富戶借貸錢米，秋收時加倍償還。每畝產米不過二石，共收四十石，還田主租米二十石，還債主錢四十千，米若干石，一年辛苦耕作，剩餘極微，經營副業，又需借人本錢，支付重息。中下等佃戶負債更多，終身不能脫離高利貸的盤剝。僱農工資通常每年十千文，無力娶妻成家，依附僱主過奴隸生活，是農民中最苦的一級。因地主的剝削，中小農佃戶繼續破產失業，多數轉入僱農或流民羣中，人口過剩成爲社會極嚴重的危機，止有革命才是出路。

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爲盜夥，火其居而械繫之。又或責成族鄰，勒令縛盜來獻，直至總解到縣，又復索收押之費，索轉解之資。故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卽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這裏所謂盜賊，實際也是饑民反抗富戶，眞正盜賊，却是全部行政機關，從官吏到兵役，無不『焚毀民房，訛索財物，』借口捕盜，實行燒殺搶奪，殘暴遠非普通盜賊可比。

第二是『盜賊太衆，良民難安』——『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迹。或反借盜

第三是『寃獄太多，民氣難伸』——『人民控告官長吏役，大率皆坐原告以虛誣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脫然無事，一家久訟，十家破產。往往有纖小之案，累年不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聞之髮指者。』這裏所謂寃獄，實際就是法律保障貪汚。統治階級的法律必須僞裝一些公正面目，才能欺騙人民，現在眞面目完全暴露，法律喪失信用，『令人髮指』的原因在此。

曾國藩代表一部份缺乏政治勢力的有產者訴苦，社會極大多數窮民的寃苦，他是不理會的。但僅就這三條說來，滿淸官僚政治的黑暗，農業生產的摧殘，足夠證明人民要求革命的正當了。他在議汰兵疏裏又說『兵伍之情狀，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見賊則望風崩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滿淸養綠營兵七十萬，八旗兵二十五萬，全國分駐一百萬武裝強盜，配合號稱官員吏役的文法強盜，共奉滿洲皇帝爲渠魁，一致向人民敲剝，悍然不顧。這樣一具殘暴腐敗的統

治機器。止有對滿洲貴族、漢奸、地主、外國侵略者有存在的必要，從人民方面看，除了搗毀它，再沒有自救的道路。

中國人民反抗滿清，從來不曾停止，鴉片戰爭前後，南北各省反滿秘密結社，非常發達。被統治階級發覺的已經是名號繁多，實際並不止這些。例如咸豐元年七月戊子上諭「近來四川之嘓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東安徽匪徒，結黨成羣，幾於所在多有。」事實上捻黨散佈河南、安徽、山東一帶，爲北方白蓮教天理教兩次大起義以後新起的大勢力，齋教散佈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一帶，爲兩宋魔教（北宋末魔教主方臘起義）的流派，都不是僅限於一省。勢力尤大的天地會（又稱洪門、三合、三點）分長房福建、二房廣東、三房廣西、四房兩湖、五房浙江，會員佈滿南中國，以「反清復明」爲共同宗旨。其他小派別，單是湖南一省就有串子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紅黑會、紅簿教、黑布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各有秘密結社大致相類，這種散漫小規模的結社，不論它思想如何愚昧，方法如何落後，本質都是窮苦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一個力量。從鴉片戰爭起，大小會社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發動武裝起義，較著稱的如下：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陽縣人鍾人杰聚衆數千人起義，自稱鍾勤王，並竪都督大元帥紅旗，次年戰敗被殺。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岡州人曾如炷起義。

一八四四年——臺灣嘉義縣人洪協等起義。湖南耒陽縣人楊大鵬等聚衆抗糧起義。

一八四五年——清山東巡撫發兵捕殺捻黨。

一八四六年——雲南永昌回民起義。湖南新田縣人王宗獻起義。江蘇昭文縣人金得順等起義。

一八四七年——天地會首領雷再浩、李世得等起義，進攻全州，湖南廣西天地會員準備響應。

一八四八年——清廷諭兩廣、湖南、江西各督撫嚴拏天地會員。

一八四九年——廣西大饑，鄉村間飢民千百成羣，向富戶借貸錢米。富戶辦團練，藉口保全身家，請州縣官出示，特准對飢民「格殺勿論」。統治階級的殘忍性完全暴露，天地會和飢民紛紛起義，揭「官逼民變」、「天厭滿清」、「朱明再興」、「替天行道」、「劫富救貧」等旗號，攻佔城市，誅戮官吏，聲勢大振。廣西一省起義軍多至數十部，每部有衆數百人以至數千人，其中大部如湖南新寧縣天地會首領李元發佔據廣西、湖南、貴州三省邊境，三省天地會起兵響應，元發遭清兵剿攻，戰敗被殺。又廣西貴縣盜魁張嘉祥（降清後改爲張國樑），迎合飢民心理，提出「上等的人欠我錢，中等的人得覺眠，下等的人跟我去，好過租牛耕瘦田」四句口號，大得貧苦人擁護，在各部中兵力最強，不久張嘉祥戰敗，投降清軍，成太平天國的勁敵。當時清兵腐朽不能作戰，

止是利用天地會山堂分立，缺乏統一指揮，盜魁貪得小利，並無政治思想等問題，居然收各個擊破、壓平反抗者、賄買反革命走狗的功效。可是太平革命軍與其他起義軍不同，它有堅強的軍事組織，統一的宗教信仰，顯明的政治綱領，強烈的民族意識，繼各部起義軍失敗之後，衝破清兵包圍，展開偉大場面，這決不是偶然的。

第二節　太平革命準備時期（一八四三年（道光二三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〇年））

商品、基督教、大礮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整套工具。基督教裝着偽善的面貌，另一面貌是猙獰地開放火礮，總目標在暢銷商品，主要是鴉片。馬克思說：『歷史之所以需要麻醉中國人民，為的是要把他們從歷史的愚昧狀態中喚醒起來。』的確，鴉片使中國統治階級愈益腐爛，對中國人民卻『不曾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太平運動採取基督教某些教義作為反封建思想的根據，這也是因鴉片而驚醒的一種表現。

一八〇七年（嘉慶一二年），英國傳道會派遣瑪禮遜博士到廣州傳教，譯耶教聖經成華文。他的第一信徒梁亞發著一種傳道書叫做勸世良言，在路上分發宣講。一八三七年，洪秀全到廣州應秀才考試，無意中得勸世良言，秀全是天資聰明，熟讀經史，很有才學的青年士人（二十五歲）他在科場屢次失意，激起反抗思想，試罷歸家，裝瘋病四十餘日，說自己上天堂受了上帝

的天命這是歷史上『符端』『受命』的舊傳統，與魔教拜日月神，白蓮教拜彌勒佛同一意義，借用作號召民衆的旗幟。秀全病中吟詩有『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飮和，擒盡妖邪投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等句，純屬政治性質，並無顯著的宗教色彩，洪秀全與基督教的第一步關係僅利用上帝、耶穌兩個名詞，宣稱自己受了天命。

一八三八年、四三年，秀全兩次應試，又遭失敗。那時候滿淸政治軍事全部的無能在戰爭中完全暴露，他決心拋棄科舉，實行起義準備。他和同窗馮雲山等研究勸世良言，附會書中詞句，證明本人確實接受了耶穌的天命，他創立上帝教，勸人在上帝面前悔罪，不事邪神，不行惡事，遵守天條。秀全、雲山都是貧苦塾師，他們不顧失業的困難，把孔子牌位毀棄，結果學童驚散，書館停閉，不得不離開花縣本鄉，遠赴廣西傳教。封建社會的『至聖』孔子竟被看作邪神，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

一八四四年秀全、雲山到廣西貴縣傳上帝教，農民百餘人受洗禮入教。一八四五年，雲山轉入桂平縣紫荊山向礦工宣傳，秀全回花縣製造傳教文書。原來上帝教止有一些簡單教義，主要是不拜偶像邪神，獨拜眞神上帝，信奉耶穌，可得天堂永久快樂。這種教義不能號召廣大羣衆，需要理論的補充，秀全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論兩篇，確掌握了窮苦人民的心理，初步發動反抗的熱情。救世歌勸人要作正人，切戒『淫』『忤父母』『行殺害』『爲盜賊』『爲巫覡』

『賭博』六個不正行爲。他在戒條裏輸入政治上的平等思想，說『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專？上帝當拜，人人所用』『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視之皆赤子。』天子的稱號和祭天的特權，一向歸皇帝獨佔，人民是皇帝的奴隸臣妾，『僭』號『侵』權便是大逆不道。人民都自稱天子，都有權拜自己的天父，恰恰破壞了封建制度的等級精神。因爲人人都是兄弟，殘虐成性的統治階級自然是『嗜殺人民如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人民殺草寇完全是正義，戰爭所引起的禍災完全是草寇的罪惡。

醒世論裏又灌輸經濟上的平等思想。他根據『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這個原則，說『天下（世界）多男人盡皆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併之念。』顯然，那些滿洲人、官吏、地主、高利貸者剝削吞併，都是反『上帝之眞道』的妖魔，必需殺逐，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變凌奪鬥殺之世爲公平正直之世。』他引述孔丘『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謂大同』一段話，想實現『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上德』的太平世界。這種主觀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稱爲『中國的社會主義』）要求根據無貧富之分的新原則重新分配財產（製定天朝田畝制度）。當馬克思在歐洲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同時候，洪秀全也提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雖然是空想，却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偉大氣魄。

政治上經濟上兩大平等是在封建壓迫之下困苦不堪的廣大人民主要是農民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救世醒世兩篇論文，剝去它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民主主義思想的本質，太平革命運動就在這個平等思想推動之下壯大起來。

太平天國起義記載秀全當時對族弟洪仁玕的祕密談話說：

「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爲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耶？」

「如果上帝助吾恢復祖國，我當敎各國各自保管其自有之產業，而不侵害別人所有。我們將要彼此有交誼，互通眞理及知識，而各以禮相接。這是我心中之大願也。」

這是秀全的民族平等思想，一八四六年，秀全依據這個思想作原道覺世訓，覺世訓是指出戰鬥目標的論文，它反覆說明『閻羅妖乃是老蛇妖鬼也，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所謂閻羅妖，實際就是人間的滿洲皇帝，所謂『閻羅妖之妖徒鬼卒』的各種偶像，就是人間的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賊，統治者口口聲聲責備人民『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應該感戴皇恩，覺世訓却說皇上帝造天地萬物，保佑人有衣有食，人明明沾皇上帝的恩典。那些妖魔敢冒天恩，該誅該滅，那些感戴邪魔恩典的人，是『良心死盡，大瞞天恩，竟與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他把皇上帝與閻羅妖對立，勸告人民脫離妖魔的迷惑，獨拜眞祖皇上帝，又把

皇上帝與人間皇帝對立，認為『他是何人，敢靦然稱帝，妄自尊大。』在迷信神權王權的社會裏，給人民一種勇氣，敢於反對偶像，閻羅及皇帝，不管勇氣的來源出於宗教迷信，到底起着革命的作用，就宗教說，一神教比多神教拜物教也是大進一步。

醒世、救世、覺世三篇的製成，奠定了太平革命的理論基礎。

一八四七年，秀全離花縣到廣州禮拜堂從美國牧師羅孝全學耶穌教義，得讀新舊約聖經。他學了些對上帝禮拜的儀式，就去廣西尋馮雲山，在紫荊山設立上帝會機關，共同製定上帝教各種儀式及十條天條。它把人生日常動作，都表現為一種宗教儀式與上帝聯繫起來。教徒集會禮拜有讚美上帝詩，入教受洗有悔罪奏章，朝起夜睡有拜上帝祈禱文，吃飯有感謝文，其他如災病、喜慶、喪葬、生日、滿月、迎親、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動土、等事，都有祭告上帝奏章。禱文大意不外『祝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誅滅妖魔，萬事勝意，』『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福』一類免禍得福的願望，統治階級中各個等級都有權壓迫人民，因之幻化為各種偶像鬼神都有權血食，上帝教集中禍福大權在一個皇上帝，也就是止承認一個人民自己的權力，這些迷信瑣碎的儀式，都成為組織革命羣衆的重要方法。

十條天條模仿摩西十誡，前四條屬宗教信仰，後六條即救世歌所舉五不正的條文規定，在平時當作教徒的生活法則，戰時變為軍事紀律（上帝教徒死後不用棺木，只用布帛裹屍體，也

是爲戰爭便利）天條比禱告儀式起更大的組織作用。

上帝教具備了理論和組織，派人四出宣傳，教徒人數大增。秀全與雲山等寫奏章祈禱上帝，祕密蓄髮，選擇紫荊山險固地方作根據地，聚集會衆準備起義。爲要鼓勵羣衆的誅妖勇氣，秀全率馮雲山等往象州搗毀甘王廟。甘王是殺母、貪婪、淫亂的著名兇神，象州人怕他作怪降禍，祭祀非常虔敬。秀全入廟宣佈甘王十大罪狀，舉大竹杖擊毀神像。從此秀全威名大振，入教者愈衆。上帝教徒到處破壞廟宇偶像，宗教信仰轉成宗教鬥爭。地方紳士認爲『拜會謀叛』起團練擒獲雲山等送桂平縣獄，會衆籌集數百串錢營救雲山出獄，宗教鬥爭轉成政治鬥爭。一八四七年，上帝教起義準備初步完成。四八年至五〇年，上帝教與團練鬥爭愈益尖銳，起義準備成熟而爆發了。

一八四三年秀全創教，四四年到廣西傳教，四五年製作宣傳論文，四七年定組織規章，建立起義根據地，開始革命行動，前後五年，上帝教竟成有實力的革命團體。五〇年起義前，以桂平縣紫荊山爲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南到博白、陸川，北到武宣、象州，在黔鬱兩江流域的村落和山嶺裏，都散播了上帝會的種子。這樣迅速的發展，主要由於滿清統治腐爛不堪，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主觀方面利用宗教迷信推行平等思想與組織，配合了客觀的革命要求。

一八四八年以後，上帝會與地主武裝團練進行着激烈的鬥爭，正如李秀成自傳所說『團

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在鬥爭發展中，洪秀全、馮雲山二人組成的領導核心當然需要擴大，陸續加入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四人，最後加入洪大全，成為七個人的領導集團。這個集團的結合與分裂，決定太平革命的勝利與失敗，這裏就必須敍述七人的階級成份及簡史：

洪秀全——廣東花縣客家人。中農家庭，父兄耕田謀生，家境窮困。秀全七歲（一八一九——嘉慶二四年）入塾讀書，聰明異常，五六年間，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古文多篇，父兄和親族都希望他科舉成名。十六歲因家貧失學，助父兄耕田，十八歲（一八三〇年）受聘為本村塾師，直到三十一歲（一八四三年）創立上帝教以前，不曾離開村塾教師的職業。一個讀經史多年，功名心極重，屢次應試得不到秀才的失意人，悲憤不平，在鴉片戰爭後，走向革命道路是很自然的。他的學問知識使他可以創教作教主，但實際傳教的是馮雲山，領導羣衆的是楊秀清，教主與教徒中間隔着一個媒介體，這使他脫出簡單的塾師生活，又進入高高在上的教主生活，不能積累起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去實際領導太平革命。

馮雲山——花縣客家人，與秀全同窗，也同是有才學考試失意的窮苦塾師。秀全創教，雲山首先受洗。一八四四年，二人到廣西貴縣傳教。不久，秀全歸家製造宣傳論文。雲山留桂平紫荊山，親身雜泥挖土，充當苦工，向附近各山燒炭工人、礦工及農民宣傳新教，到四七年秀全回紫荊山

時，信徒已有數千人，造成雄厚勢力，號稱「拜上帝會」。二人共訂宗教儀式及天條，開始作起義準備。雲山被團練捕獲押入縣獄，秀全回廣州設法營救，楊秀清等燒炭工人籌集錢數百串充賄路。四八年初，雲山得釋放歸山，教徒人人歡欣，即時殺牛宰馬，獻祭上帝，感謝天恩。雲山出獄後往花縣尋秀全，四九年六月才同行歸山。他是上帝會主持者，離會一年以上，不曾指定代理人，會衆無人統率，發生分裂現象，這是極可惋惜的。

楊秀清——桂平縣平隘山客家人。世代以燒炭種山爲業，秀清幼年喪父母，曾離家流蕩，五口通商前，結夥伴護送洋貨，交結許多兩廣江湖上豪客。上海開埠，廣州國際貿易衰落，秀清失業歸家，仍作燒炭工人，他「識字無多，奸譎異常」（賊情彙纂）所謂「奸譎」實就是他的閱歷和智謀，高出一般常人。馮雲山出獄回花縣，會衆發生動搖，楊秀清自稱上帝附身顯聖，發布號令，團結會衆，這在當時也還是必要的手段，秀全回來，不得不追認聖言，從此代上帝傳言的大權專屬秀清，洪馮都是廣東籍，不及秀清與羣衆有鄉土關係，再加上帝附身，秀全要跪地聽命，甚至接受杖責，秀清權力在羣衆中提高到第二教主的地位。馮雲山不幸早死，秀清掌握軍事政治權全部及宗教權半部，秀全權不稱位，潛伏着後來楊韋內訌的禍根。

蕭朝貴——武宣縣農民，破產流落，糾合勇士入山，護送往來商客，與楊秀清結識，約爲義兄弟。廣州商業轉移上海，楊蕭失業，同入上帝會成羣衆首領。秀清稱上帝附身，朝貴稱耶穌附身，後

來都被洪秀全承認有代言權。秀清多智謀，朝貴忠實坦率，勇敢剛強，衝鋒第一，代表農民的革命性。楊蕭關係較深，秀全妹宣嬌嫁給朝貴，增強洪楊兩方面結合。朝貴在攻長沙時戰死，與馮雲山的早死同是重大的損失。

韋昌輝——桂平縣金田村人，地主兼典當商，為一縣首富，捐得監生，出入衙門辦事，又是豪紳身份。一八四九年，廣西饑民發動分糧，富戶多破家，昌輝獨能慷慨施予，得本縣一部份民衆擁護。上帝會勸昌輝入會，借他的紳富名義和資財，組織保良攻匪會，掩護革命活動。他出身剝削階級，貪污官吏指為謀反，被迫參加金田起義，在太平軍領導集團中是唯一動搖分子。後來楊韋內訌，大局敗壞，他是主要負責者。

石達開——貴縣北山里客家人。石家是當地土豪大姓，人口多，富有財產。達開讀書有大志，文武備足，加入保良攻匪會，同謀革命。韋、石二人都是當地多年紳富，各擁有一部份羣衆，他們對上帝會關係較淺，在領導集團中地位也較低，因之達開雖是第一等軍事政治人才，却不能取得洪楊的絕對信任。

洪大全——湖南衡山縣人。他在供詞裏自述：『自幼讀書作文，屢次應試，考官不識我文字，屈我的才，就當和尚。還俗後，又考一次，仍未取進。我心中忿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天下地圖，都在我掌中。古來戰陣兵法，也都留心。』他和洪秀全一樣，應試失意，轉向革命。秀全接觸一些西洋

文化，創造平等思想的上帝教，大全生長在內地，止能組織舊形式的天地會，自然，上帝會是較前進的。可是天地會勢力浩大，大全遊行兩廣兩湖各地，結識山堂首領，擁有廣泛的羣衆。上帝會是新起的、一個地區的團體，羣衆基礎遠不及天地會。金田起義後，大全以天地會大首領軍事專家資格前來合作，上帝會推尊他爲天德王，居次於洪秀全的地位，是有政治意義的適宜處置。洪大全的眞姓名是焦大，參加起義後，改稱萬大洪（朱洪萬都是天地會的貴姓，天地會本尊奉萬雲龍爲開山始祖）他對天地會用萬大洪姓名，爲的便於號召會黨。對上帝會又用洪大全姓名，表示與洪秀全有兄弟對等的關係。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國二年，咸豐二年）在永安圍城中用天德年號頒發告示，對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人民，號召『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狠吏盡行除滅救民於水火之中』，全篇不見一句宗教語，與上帝會開口必稱天父天兄顯然不同。太平天國用陽曆，天德仍用陰曆（但承認太平曆），太平天國領導人稱王，萬大洪自稱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又有都督大元帥稱號），不受天德王名義。天地會沿用天德二字以爲理想中小主的年號（起於康熙時張念一奉朱三太子起義），非朱姓的起義人多自稱大元帥（如一八五〇年廣州發現天德二年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萬大洪即洪大全，是天地會首領殆無疑問。他承認『奉天承運太平天國』，洪秀全討清詔書裏也自認『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在復明反滿一點上，天地、上帝二會是可以合作的。

以上七人，從團結方面說，在太平天國名義下，一致反對滿清統治者；農民、手工業工人、運輸工人、會黨、流氓、以及一部份失意的士人、被欺壓的地主商人，都有代表參加了這個領導集團，形成龐大無比的革命聲勢。滿清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在永安戰敗後，感到『此賊不是尋常的賊，總願勇人不要同我一樣才好，』這就是團結所表現的威力。但從分歧方面說，首先是上帝天地二會存在着裂痕。上帝會崇拜一個眞神，楊秀清代眞神發言，因之楊秀清等於眞神。天地會標『反淸復明』爲宗旨，並非宗教團體，洪大全在自述裏說：『妖術行爲，古來從無成事的，』他不能聽從楊秀清指揮，可以推見。其次是上帝教本身，洪馮爲一組，楊蕭又另一組，洪馮創教，楊蕭代上帝耶穌發言，宗教領導二元化，隱藏着分裂的嚴重危機。韋石並非上帝教信徒，韋被迫參加，石『讀書有大志』在一定時機下，韋可以爭權內亂，石可以負氣獨立，簡單的宗教迷信是不能束縛他們的。洪（大全）馮蕭三人早死，洪楊韋石四人間紛歧的因素繼續發展到分裂，蓬勃的太平天國也就由衰弱而至於崩潰了。

太平革命的基本羣衆，在金田起義時，一般是廣西人、客家人、上帝會人（教徒總數約三千人。）按職業區別，有下列二類。

第一類

燒炭工人——上帝會主幹之一，首領楊秀清、蕭朝貴。上帝會人多數燒炭爲業，俗稱爲炭黨，集中地在桂平縣平隘山。

第一類羣衆

礦工——鴉片戰爭後，道光帝令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等省招商開礦，廣西開礦最多，貴縣招集客家人開採銀礦，馮雲山入北山里山中宣傳上帝教，成為上帝會主幹之一，起義參加者約千餘人。

客家農民——鴉片戰後，道光帝令各省廣開荒地。廣西地廣人稀，廣東或鄰省客家人多遷來墾田謀生。客家村落不及本地士人村落強大，常被士人掠奪，彼此感情極惡，往往尋仇械鬥。一八五〇年，貴縣士客發生大械鬥，客家戰敗，男婦老弱三千餘人棄田產逃走，隨北山里礦工隊加入金田起義，成為主幹之一。

這一類工人農民數千人是太平軍最基本的戰士。其他陸續參加的，正如李秀成自述：『從（入教）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太平軍中農民佔最大多數，不限於客家人也不限於先入上帝教，他們的共同信仰是『同家食飯』、『自由平等。』

第二類羣衆

韋昌輝部屬約一千人，隨昌輝參加起義。這羣人有農民、商人、流氓，後來一部份結成韋黨。

變兵——金田戰前一天（十一月二十八日）清軍中客家軍人數千反清加入太平軍。

會黨——金田起義，洪秀全允許三合會首領八人率部加入，條件是同拜上帝及遵守會規

（天條。）其中七人嫌會規太嚴，相率退出。獨有羅大綱愛太平軍的紀律及教義，改奉上帝教。此後，『秀全誡其部屬不再收容三合會人物於其軍中，惟其甘自改變其舊習而遵從眞道者始行納之』（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

交通運輸業失業者——鴉片戰前，廣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貨經兩條大路。一路起廣州經大庾嶺沿贛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廣州經南風嶺達湘潭。容閎西學東漸記說：『湘潭及廣州間，商務異常繁盛，交通皆以陸勞動工人肩貨往來於南風嶺者不下十萬人。』兩路水陸運輸、護商、旅店、商販等業及依附爲生的人數當不下百萬。商業中心移到上海。兩廣贛湘驟增百萬失業者，腐朽的社會是經不住這個地震般的劇變的。他們要求生活，就必須反抗社會舊秩序，參加太平軍的如楊秀清、蕭朝貴、吳如孝、（封顚王、）羅苾芳都是這一類人，其餘不知名的當不在少數。不過天地會對他們的影響遠比上帝會大，萬大洪告示，主要就是對這羣失業者發出號召。

被迫參加者——太平起義記：『清軍戰敗，遷怒於新墟居民，焚燒一二千鋪戶而搶掠財物，且又捕殺居民多人，故加以逆黨或助逆之罪。』此等殘酷行爲令人民憤激不勝，許多人留在家中本欲拜上帝而不願加入革命運動的，至是迫得離家而投入洪軍。

這一類人品類較雜，但在宗教信仰、軍事紀律的統一領導下，也成爲重要的革命戰士。

以上兩類，到金田起義前後，總數已達萬人，這是堅強統一的團體，具備政治思想、組織、領導

集團、基本羣衆、人民同情擁護等必要條件，從創教到起義不過八年，準備完全成熟。容閎說：『予意當時即無洪秀全，中國亦必不能免於革命。』自然革命並非少數人的製造品，容閎指出了主要的一方面，但洪秀全能首先提出並實行反封建革命（雖然因幼稚、錯誤而不免失敗）他個人所起的倡導作用，還是不容否認的偉大成就。

第三節　太平革命勝利時期（一八五〇年〔道光三〇年〕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

本時期又可分前後兩期。前期從一八五〇年——道光三〇年六月金田起義至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二月攻克南京，革命形勢飛躍的發展；後期從咸豐三年二月建都南京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八月楊韋內訌，革命陷入停滯狀態。從飛躍到停滯，完全是由於領導集團裂痕的加深與戰略指導的錯誤，滿淸方面却因此獲得重新調度反革命力量的機會。

一　前期的革命形勢——飛躍

上帝教徒到處搗毀廟宇偶像，與地方紳士衝突日趨激烈，『各教徒感覺有聯合一體共禦公敵之必要。彼等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爲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均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產制度，人數愈爲加增，而人人亦準備隨時可以棄家集合』（太平天國

起義記。）革命羣衆的鬥爭情緒能高到如此程度：道光三〇年六月，太平軍在紫荊山前金田村公開豎立義旗，陸川、博白、花洲（屬平南縣）、白沙（屬桂平縣）各地也同日起事。十月，各地會衆到達金田，十一月，大破清軍。咸豐元年閏八月攻克永安州（蒙山縣），建立太平天國。

太平軍駐永安城半年，頒行各種制度，建國規模大體具備。秀全被推爲太平天王，再由天王大封官職，王是最高官職，分四等：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列一等，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列二等，翼王石達開列三等，『以上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太平天國政制、軍制、曆法都是馮雲山訂製。他當然知道節制權應屬天王，但楊蕭取得代天父天兄發言權，事實上秀全早受楊蕭主要是楊的節制，論宗教地位及起義功績，雲山不在楊蕭下，也因同樣事實，不得不退居第三位。領導集團內部的分歧，在建國開始已顯示分裂的危機，這個危機又是在發展而無法克服的。

太平軍初起，清軍每戰必敗，咸豐帝派首席軍機大臣賽尙阿督大軍圍攻永安城。咸豐二年二月，城中糧盡，太平軍突圍，大破清軍，殺四個總兵官，乘勝進攻桂林。在突圍中，洪大全被清兵俘獲，這是巨大的損失，天地會有廣大的羣衆基礎，有二百年的反滿歷史，有自己崇奉的萬雲龍大哥和五祖，有傳統的組織形式和特殊習慣，另方面它沒有上帝會那樣統一組織與嚴格紀律，這些，都阻礙了它和上帝會的合作。洪大全在承認太平天國和天王是『明太祖後裔』兩個條件下，用天德年號、天下大元帥名義與上帝會聯合，地位是對等的。這一聯合形式的發展，不僅天地

會可在政治經濟平等的思想下合作，就是北方的捻黨、白蓮教西北的回民、西南的苗民，也可以同樣聯合協力行動。這種反滿大聯合，在上帝教領導下，可以推倒滿洲統治。洪大全被俘，天地會失去有力首領，此後天地會員或單獨起義，或改奉上帝教加入太平軍，不成爲一個對等聯合的力量。上帝會也從此合併拜上帝與革命爲一事，不許太平軍中有非上帝教徒。上帝會與各種反滿勢力不能合作，從永安突圍後開始，所以太平軍喪失洪大全，對革命前途有極嚴重的意義。

桂林是廣西反革命的中心地，提督向榮、狀元龍啓瑞率綠營兵、團練固守，不敢出戰。太平軍架雲梯猛攻，婦女助戰，兒童吶喊助威。但清軍有鎗礮，太平軍不能取勝，解圍北上攻克全州。從全州到湖南路上，馮雲山戰死。雲山死後，洪秀全勢更孤弱，大權盡歸楊秀清。太平軍進攻長沙，沿路吸收羣衆五、六萬，其中挖煤工人數千，另立土營專開地道攻城。蕭朝貴在長沙城下陣亡，太平軍圍攻兩月不能破，轉攻岳州，十月，克岳州。

咸豐二年二月到十月，太平軍損失三個領導人。當時缺乏戰事經驗與攻城武器，將士全憑勇敢衝鋒，用血肉換取勝利。清軍不敢對陣作戰，專靠城池與鎗礮，馮蕭都是中礮死的，桂林長沙都是靠鎗礮守住的。太平軍痛感軍械的重要，在岳州獲得大量船隻及器械鎗礮，實力大增，改變「欲取湖南爲家」（李秀成自述）的計劃，決心進攻湖北。

十一月，太平軍自岳州水陸兩路並進。十二月，佔領武漢三鎮。咸豐三年正月，太平軍水師有

船一萬艘，載糧食軍火財物，蔽江東下，陸軍夾兩岸前進，水陸號稱五十萬人。沿路民衆踴躍從軍，聲勢浩大，淸軍喪膽，望風崩潰。太平軍連克九江、安慶、太平、蕪湖，水陸號稱一百萬人。二月初八日攻克南京。

南京的攻克，自然是革命一大勝利，但還不是滿淸的致命傷，『此時天王、東王尚是計及分軍鎭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爲業』（李秀成自述）這個計劃完全正確。證以後來林鳳祥、李開芳率偏師北征，直到天津附近，嚇得咸豐帝預料到『北京快要失陷，詔諭各省巡撫將皇帝的收入送到行宮所在地熱河』（馬恩合著：亞洲與俄國引一八五四年二月東方郵電，）滿淸勢力在北方空虛腐朽可以想見。如果此時天王東王率主力軍乘大勝餘威，長驅北上，滿淸措手不及，除倉皇逃遁，決無他途可走，全國反革命失去滿洲主子，就是最兇惡的曾國藩，也無法組織湘軍。可惜洪楊對這一計劃是動搖的，楊秀淸聽信一個湖南老水手『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的話，決計定都南京。這說明太平軍領導思想上保守主義戰勝了進取主義安富尊榮觀念戰勝了刻苦戰鬥觀念，總之是機會主義戰勝了革命主義。這個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太平革命失敗的決定因素之一。

太平軍別一大失策是棄地不守，岳州、武漢、九江、安慶等地，全部放棄，滿淸官吏很快的恢復統治機構，殘殺革命民衆。如果派兵駐守，援助當地民衆反抗滿淸統治，擴大革命佔領地。南京形

勢也就會鞏固起來。太平軍不知守地，清欽差大臣向榮率盜魁張國樑自廣西尾隨在後，止隔十天，向榮到達南京城東孝陵衛，成立江南大營。又一滿清大帥琦善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各軍自河南至揚州，成立所謂江北大營。南北大營都是些八旗兵綠營兵，不堪一戰，但政治影響對滿清有利。滿清在江浙上海搜括財物，供給兩大營，大批流氓強盜應募入營，兵力愈益強大，盜魁張國樑兇悍善戰，成爲主幹人物，它戰鬥力雖不及湘軍，但對南京是一個大威脅。

戰略上的失策，要引起嚴重的後果，但太平軍還有極大成功的一面，使它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造成堅強的基礎。這就是百萬人民的直接參戰與廣大人民的擁護革命。太平軍從廣西出發，沿路誅戮妖魔（官、幕、吏、役）焚燒衙門、糧册、田契、借劵，殺逐豪紳、地主、和尚、道士——這種人多數是土地佔有者或高利貸者。人民驟脫封建剝削的束縛，感受革命所給予的愉快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他們參戰，當然不是所謂脅從；擁護，當然不是所謂好亂。太平天國野史說：『沒入財物，必擇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但每以擄得衣物，散給貧者，並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湘楚之民大有「奚我後，后來其蘇」之概，太平軍至則爭迎之，官兵至皆罷市。』這是事實，就是反革命渠魁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天平天國的基礎就建立在這個事實上。

滿清軍隊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根本不知有所謂紀律。太平軍恰恰相反，普遍保持極嚴格的

軍事紀律。李秀成自述說：『天王駕入南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律嚴，故癸丑（咸豐三年）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事實上太平軍紀律始終良好，連曾國藩也不敢否認這個事實，太平軍的基礎就建立在這個事實上。

太平軍錯誤戰略的影響剛在開始，而革命基礎却已迅速長成，這就是前期飛躍發展的原因。

二　後期革命形勢——停滯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後，正式成立國家政權。軍事、外交、政治、經濟都是急待處置的重大問題，太平軍實際領導者楊秀清怎樣來處置這些問題呢？他是『才能極大』、『令嚴軍民畏』的剛強人物，他依據平等原則，建立起嶄新的天國制度，成績是偉大的。但因為他人權利之爭，釀成內部大變亂，錯誤也極大。

要勦滅滿清必需北征，要鞏固南京必需西征，要斷絕滿清財源必須東征，太平軍處置三方面軍事，基本上是失敗了。當時南北各地民衆紛紛起義，對太平軍絕對有利。黃河流域捻軍大起，首領有張洛行、李兆受、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龔得樹等，張洛行勢力最大；長江以南以至

珠江流域，天地會到處發動，陳開起兵廣東佛山縣，黃威起兵福建廈門，劉麗川起兵上海最爲著名。此外較小事變眞是不可勝數，例如湖南，照曾國藩說：『去年粵逆入楚，凡入添弟（天地）會者，大半附之而去』（咸豐三年二月，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但是他在移駐衡州摺裏表示驚慌失措，認爲『若非痛加誅鋤，則禍患將無了日。』他說：

『數月之間，四屬匪徒屢次滋擾，如長寧有白沙堡之案，衡山有草市之案，永興有獅子寨之案，安仁有焚燒衙署之案，桂東有縣城失守，戕害把總之案，宜章臨武有廣東匪徒滋擾之案，永明江華有廣西匪徒竄入，戕害千總之案。此外四屬中聚衆倡亂，搶劫拒捕，爲案甚多，未及一一上瀆聖聽。』

這樣多的起義，證明在太平革命影響下，人民憎恨滿淸已達頂點，曾國藩不認爲滿淸統治完全破產，却描寫成：『皆由上年粵匪經過衡永郴桂一帶，裹脅最衆，或久授僞職，或飽掠潛歸，以致莠民構煽，甘心從逆，動輒貼粵匪之僞示，張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兒偸盜，三五成羣，亦敢倡言謀亂，毫無忌憚。』事實上太平軍不曾經過的地區，同樣如火如荼在爆發，而太平軍佔領的地區，人民安居樂業，擁護太平軍。曾國藩自己供認：

『伏查崇（湖北崇陽縣）通（通城縣）兩縣向爲匪盜嘯聚之區，自正月以來，居民多已蓄髮，樂爲賊用。其旁近州縣，如通山蒲圻大冶興國咸寧嘉魚等處，皆已爲賊所據，官兵到境，無土人爲之嚮導，無米鹽可供買辦，人心之壞，實堪痛恨』（咸豐四年三月，報崇通勦匪勝仗摺。）

根據上述例證，可以斷定太平軍無論北征、西征、東征都有可能獲得最大的勝利，但太平軍並不能利用這樣優越的形勢。

北征——太平軍克南京，即派林鳳祥、李開芳、羅大綱率兵攻下鎮江揚州二重鎮。洪楊計議北征，羅大綱主張「欲圖北必先定豫，車駕駐汴，軍乃渡河，若懸軍深入，犯險無後援，臣不敢奉詔」。洪楊不聽大綱這個正確主張，派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率兵五萬自揚州出發。三人都是廣西老兄弟，忠勇有餘，智謀不足，臨行又受洪楊「師行間道，疾趨燕都，毋貪攻城糜時日」的詔諭，北征軍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咸豐三年四月，破安徽鳳陽城；五月入河南，攻開封；六月，渡河攻懷慶。滿清集合北方軍隊死力防堵，吉文元戰死。七月，棄懷慶攻入山西，沿路血戰，餘衆不過二萬。楊秀清僅派兵二萬往援。九月，北征軍入直隸，攻至天津，清軍聯合團練開放河水，四野漫沒。十月，退靜海一帶。北征軍不慣北方冬寒氣候，耳鼻凍裂，手足潰爛，糧食又缺，清軍四面圍攻，兵力大受耗損。咸豐四年正月，北征軍放棄靜海，轉至阜城，與清軍相持。五月，李開芳率一軍攻入山東高唐州，迎接南京新來援軍。林鳳祥困守直隸連鎮待援。四月，南京援軍在山東戰敗，林李分散不能會合，勢更孤弱。咸豐五年正月，林鳳祥軍糧盡，兵士饑極不能舉刀矛，連鎮被清帥僧格林沁攻陷，全軍戰死，無一人求降。清軍全力合圍高唐州，李開芳軍兵精糧足，堅守不屈。四月，清軍引運河水灌城，李開芳軍全軍淹沒。

北征軍勇敢堅決，血戰兩年，全部戰死，眞不愧爲革命戰士、民族英雄；雖然戰敗，連曾國藩也驚歎它的『堅忍不屈』。北方大平原利於馬兵，地近北京，滿淸統治比較鞏固，北征軍多是廣西湖南山鄉人，不慣北方的氣候、地形、麵食；又不通北方的言語、風俗、習慣，再加宗教隔閡，難與民衆接近；這些，都是北征軍的劣勢，戰敗是不可免的。如果，不是孤軍深入，先聯合河南安徽湖北山東一帶捻軍，旣可掩護西征軍保守武漢，又可增加馬步實力，南京援軍也不會沿路被堵，北征勝利的希望還是很大，可惜被楊秀淸的錯誤指導斷送了。

西征——要確保南京，必需確保長江上游武漢、九江、安慶三大據點，關鍵尤在武漢的得失。太平軍與反革命湘軍長期戰爭，實際就是上游三大據點爭奪戰；最後終因內部不團結，發生內訌，被反革命戰勝，武漢落入胡林翼手中，曾國藩得專力進攻九江、安慶，太平軍從此止能作防禦戰了。咸豐三年，與北征軍出發同時，南京派遣胡以晃、羅大綱、賴漢英、石祥貞、韋俊進兵安徽江西，五月，克安慶，圍南昌。吉安等地民衆起義響應，聲勢大張。淸軍危急，曾國藩在湖南被迫出湘勇數股來援，一戰潰敗，羅澤南部死傷最大。太平軍久攻南昌不下，退兵攻取九江，吉安等地民軍被湘勇羅澤南部擊滅。四年六月，攻克武昌，曾國藩湘軍水陸並進，會合其他淸軍死力爭奪武漢，八月，陷武漢，經幾次大戰，太平軍退出湖北境。湘軍圍九江，守將林啓容善於戰守，屢破湘軍，但形勢對湘軍有利。

西征軍由石達開指揮，在江西境內大破湘軍，再度出兵攻武漢，五年正月，進克漢口漢陽，曾國藩攻九江不下，湖北又告急，他是第一等重視上游的，分全部兵力為四股，令頭等漢奸胡林翼、羅澤南各率陸軍一股，彭玉麟率長江水師一股援救武昌，留塔齊布五千人圍九江，二月，太平軍克武昌。這一次大戰是革命與反革命雙方決死的鬥爭，太平軍雖然獲得暫時的勝利，但滿清政府與曾國藩湘軍密切合作，竭盡全力從失敗中求取勝利，太平軍方面却因領導集團內部不和，在決定關頭，從勝利轉入失敗。這裏必需敍述戰爭指導者楊秀清與軍事指揮者石達開的事蹟，說明太平軍失敗是極可痛心的內訌產生的必然惡果。

咸豐三年，胡以晃攻克安慶，人民不習慣太平宗教與法制，頗多抗命。『天王命達開赴安慶一帶安民，達開既至安慶，以誠意相要結，擇村里之有聲望者為鄉官，緝盜賊，嚴軍旅，使各安其業，更督民造糧册，按畝輸錢米，於鄉里之豪暴者抑制之，無告者賑恤之。立榷關於大星橋，徵江面商稅。軍用裕而百姓安之，頌聲大起』（太平天國野史）這是最基本的建設，可是不滿三個月，『東王楊秀清忌之，以燕王秦日綱代達開，命還京襄理朝政。』

等到咸豐四年七月，曾國藩湘軍大舉攻破岳州，進攻武漢，才再派達開率兵往救。到鄱湖，湘軍已奪取武漢，入江西省攻九江了。達開守安慶，出兵援九江，大破曾國藩軍，又大破羅澤南軍。湘軍陸軍受挫，水師仍在江上猖獗。十二月，水師主力駛入鄱陽湖，達開築壘斷水師後路（湘軍水

師因此分爲外江內湖兩部）命胡以晃，羅大綱率小艇襲破曾營，奪得曾國藩座船，國藩駭極投水尋死，被附近小船撈起，倉皇逃入羅澤南營。（這個漢奸頭子四月裏在靖港曾投水尋死一次，回長沙整頓了一番湘軍，這一次又大敗尋死，確是悲觀失望到極點，在羅澤南營寫遺疏千餘字，準備再尋死。羅澤南竭力苦勸，說是『天若不亡本朝，此老必不死』，果然，他又幹起漢奸勾當了。）達開乘勝進克武昌。六年，攻南昌，湘軍撤九江圍兵數萬人援南昌。達開兵力才數千，自率敢死士夜襲樟樹鎮湘軍大營，湘軍最怕達開，不戰潰逃，達開率騎兵數十人猛追，湘軍全軍大奔不能止，曾國藩逃入南昌城困守。江西八府五十餘縣都入太平軍手中。石達開既克武昌，曾國藩深知『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爲恢復之計』（與胡林翼書）出四分之三兵力與西征軍爭武漢，江西湖北兩省大戰以來，湘軍敗多勝少，大將羅澤南，塔齊布相繼斃命，曾國藩在南昌危城中，內外隔絕，『凡江楚文報自賊中經過，輒被殺害，臣等雇募長髮探卒，臘丸細字，作爲隱語，以通消息』（五月，陳明鄰省援兵協餉片。）他驚駭到『道途梗塞，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魄屢驚，』已成甕中鱉的形勢。他是被當時漢奸等奉爲唯一領袖的，羅澤南所謂『但留曾公一人在，其他均不足計』的，南昌如果攻下，國藩就擒，等於滿清政府和漢奸們失去靈魂。正在兩軍肉搏最緊張的時候，七月，楊韋內訌勃發，石達開聞變，急自湖北洪山馳回南京，被洪秀全解除兵權。達開畏禍率部自由行動，從此太平天國轉入衰亡階段，無力再爭上游。十一

月湘軍攻陷武昌大舉進攻九江城，

石達開是曾國藩最怕的敵人，說『逆首石達開狡悍爲諸賊之冠』（咸豐八年，陳明石達情形片。）咸豐帝聽說楊韋內訌，喜歡得大發幻想，命曾國藩準備達開來歸，說『倘向曾國藩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或使先自立功贖罪，再邀重賞，亦當預爲籌畫』（十月二十日上諭。）反革命對他畏懼重視如此，洪秀全却自壞長城，迫他逃出南京。北征軍因孤軍失援，放走了咸豐帝，西征軍又因內部衝突，放走了曾國藩，兩次失機，革命頹勢很難挽救了。

東征——江南江北兩大營威脅南京，太平軍留大部份精銳守城，兵力不能出鎮江以東。江浙地方富庶，從財源說，正如曾國藩所稱『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一里取一里之財，究竟遠勝於他省』（同治元年，近日軍情片。）從軍事說，南北大營招募兵丁費，北京政府官員旗人生活費，主要依靠江浙上海三處供給，正如胡林翼所說『江浙爲倉庾根本，京師性命所系。』東征江浙，正是破壞南北大營援助北征軍，削弱北京政府的必要處置，洪楊在這方面完全不加考慮，是最大的失策之一。

太平軍攻克南京，人們都預料上海一定是攻擊的目標，英領事組織義勇團保護租界，清官吏要求各國干涉，保護上海城，被各國拒絕，當時上海有廣東人八萬，福建人五萬，都同情太平軍，準備起義響應。咸豐三年九月，廣東七首黨（天地會的一派）首領劉麗川聯合福建青巾黨首

領陳亞林及江西縮錢會二千餘人，從北門攻入知縣衙門，佔領上海城。這次起義止殺死一個知縣官，傷一個北門守門人，秩序非常良好。粵閩贛同鄉及上海人寧波人整千的加入，勢力大增。他們用大明太平天國名義出佈告，一律蓄長髮，但不奉上帝教。他們在美國教士家中發現馮雲山的幼子，立即歡迎入城，化五百銀元買一匹好馬讓他騎上，在城內遊街，很熱鬧。這就是天地會對太平天國的態度。他們派代表到南京接洽，呈上一個奏摺說：『臣劉麗川，廣東香山縣人，向因貿易寄居上海。見官激民變，首先率領衆兄弟起義。數月之間，克服三城，封儲倉庫，以待大兵之至。並獻寶刀一柄，以表忠忱。』洪楊認匕首黨是天地會的支派，有『腐敗之習慣，放恣之性癖，』拒絕合作。起義軍與清軍三萬人交戰，不管大礮轟城，也不管開地道進攻，屢次殺敗清軍，不少清軍自動投到起義軍方面來。咸豐四年十二月，法國水師提督及領事聯合清軍攻城，法艦發炮轟擊，轟毀東北角城牆，法軍二百五十人率大隊清軍登城，起義軍奮勇抵抗，殺死法軍十三人，擊傷五六十人，清軍死一千二百人，傷一千人。法軍逃走，清軍還留在城上，上海幫首領小錐子（卽潘可祥）率一二百人上城搏鬥，全隊大聲呼喊。『清軍聞聲，心驚胆震，急忙奔逃，出城門也來不及了，卽從城上跳下，其時天寒冰結，清軍許多跌死城下，有些跌在長矛之上，有些斷腿折骨，傷者皆被抬回清營。清軍既逃回本營，黨人復關閉城門』（雅蘭教士：太平軍紀事。）清軍得租界援助，圍困上海城十七個月，咸豐五年正月，起義軍糧食斷絕，終於放棄縣城，突圍逃走。如果太平軍不因宗教

偏見，派兵援救起義軍，確實佔領上海，外交上（當時英美聲稱守中立，）財政上都有極大的利益，滿清後來也不易組織淮軍、「常勝軍」戰局可能發生另一個面貌。

淸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戰勝上海起義軍，五年正月，進攻鎭江，江南大營加緊圍困南京，太平天國的形勢危急。楊秀淸派遣李秀成、陳玉成等四水相救鎭江，大破江蘇軍，殺吉爾杭阿。六年三月，秀成渡江，擊破江北大營。秀淸又命李秀成、陳玉成等進攻向榮大營。五月，李陳軍從西面，鎭江軍從東面來攻，恰巧石達開率軍來援，三面奮擊，大破向軍。張國樑挾向榮突圍逃往丹陽（七月向榮死，和春代爲欽差大臣，）三四年來圍困南京的江南大營一戰瓦解，楊秀淸見外敵已去，開始在南京發動內亂。

軍事是革命的骨幹，太平軍將領和士兵都是勇敢堅決的戰士，可是在錯誤指導下，雖然戰爭中獲得不少偉大勝利，到底不能得到應得的果實，革命發展陷於停滯了。

第四節　天國建設諸問題

外交問題

上海是英美法三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它們不願中國有新的變動，尤其不願上海有新變動。咸豐三年四月，英公使卜亨給太平天國信裏說：「總之中國既准五口通商，則無論何人，有損我商務者，我國惟以兵戎從事。」這就是各國對太

平天國的一般態度。

當時滿清政府大施卑汚賣國手段，要求外國援助。一面宣稱租界西人都贊成清政府，歐洲兵船十餘艘，準備協助『剿匪』進攻南京，一面劃上海內外城廂地，請各國海軍保護。各國拒絕不允。清政府計窮，乃偽造太平軍排外告示，威嚇外人。英香港總督邦漢親到南京訪問太平軍首領，天王接見邦漢，自稱為教主，稱英國為藩屬，英王為藩臣，邦漢很不愉快地囘去。

其實太平天國方面，不懂得國際情勢與外交手腕、禮儀等，那是不足怪的。外國侵略者反對太平天國，主要並不在洪秀全的傲慢態度，而在他們的正確主張，就是國際地位平等（中外是兄弟之國，要共同生活如弟兄）國際貿易的完全自由，但嚴禁鴉片輸入。其次是『將來外國人可以隨便用汽船、鐵路、電線及其他西洋器具而無礙』（太平軍紀事。）當時侵略者自稱『文明傳播者，』把中國人當作野蠻人對待，而國際貿易情況，舉一八五五年為例，上海輸入總額達一百六十萬鎊（現金和鴉片不在內，）其中英國佔一百一十二萬鎊，美國佔二十七萬鎊，其他國家佔二十萬鎊。上海輸出總額則達一千二百六十萬鎊，其中英國佔六百四十萬鎊，美國佔五百三十九萬鎊，其他國家佔十萬鎊。這樣巨大的輸出超額，完全靠鴉片輸入來抵補。一八五六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值三千五百萬元，英印政府在這一年內，鴉片收入二千五百萬元，佔國家收入總額的六分之一（一八五三年佔七分之一。）嚴禁鴉片，等於致英印政府於死命，這是英國

爲首的侵略者反對天國的基本原因。其次，天國允許將來外國人可在中國辦新式交通和工業，那時資本主義還沒有達到帝國主義階段，不能大宗向國外輸出資本，事實上等於天國有將來自辦新式交通的意志。英國會議員斯特卜萊登對選舉人演說：「假使中國成爲一個大工業國，那我就不知道，歐洲從事工業的居民如果不將自己降到自己競爭人的地位，如何能夠經受得住和這些競爭人的鬥爭」（資本論引）。他們深怕『世界上生活程度最低的中國人』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反對天國的第二原因。所以英美法雖然宣布局外中立，是對蓬勃發展的太平革命勢力有所顧忌，並非善意的眞正中立。太平天國考慮禁烟問題，不願引起外國衝突，採取消極政策，停止向江浙作軍事行動（賴文光『供辭』說明這種政策確是畏避外國侵略者。）其實乘革命漲潮奪取上海，與英國訂約逐年減少鴉片輸入量，英國爲保持絲茶貿易（產地在天國境）及發展布匹貿易（英國特產），衝突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政治思想與宗教問題

洪秀全倡導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中國廣大窮苦人民反官紳地主富商高利貸一切封建剝削制度的產物，同時它又是英國大砲的產物，這就是說，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與世界資本主義發展有機地聯系着。秀全生在國際貿易發達的廣東，通過基督教接受某些資本主義影響，與人民反封建剝削的實踐要求結合起來，再加上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與周禮中制度，形成一套特殊的上帝教義，其中包含着的民主內容，主觀

有共產主義的空想，客觀上正是資本主義要求發展的反映。

洪秀全的上帝是平等、自由、博愛的上帝（楊韋內訌以後，上帝變樣了）是戰鬥誅妖的上帝，總之是一個革命的上帝。恩格斯說：『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在當時（歐洲資產階級開始革命時代）都要帶上宗教的外衣，而且首先必然要反對教會（天主教會）』上帝教正是這樣的宗教，它不要在中國有六七千教徒的天主教做朋友，却要和一千四百教徒的基督教做兄弟，這不是偶然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權力集中的天主教會，而有散漫繁雜的菩薩、神仙、孔子、祖先、以及無數牛鬼蛇神，替封建統治者服務。洪秀全把『正』的方面集中出一個『皇上帝』，『邪』的方面集中出一個『閻羅妖』，鬥爭營壘劃分得很清楚。他開始傳教，一個地方紳士勸說：『中國人皆拜偶像的，讓他們自由拜神罷，』這個統治階級的所謂自由，被他拒絕了，他把自己書塾裏的孔子牌位拋棄，又打毀威風極大的甘王爺神像，上帝教徒受他的感化，從舊神權中解放出來，敢於向人間社會要求信仰自由。當桂平縣官吏派兵捉拿洪秀全、馮雲山時，教徒大呼『我們要拜什麼神是不能受人號令的』（太平軍紀事）金田起義後，清兵屠殺新墟，教徒直立受刑，不肯下跪，對清兵大呼『爲何遲遲不動手，要殺便殺罷，我是不怕死的』（太平天國起義記）這是多麼英勇的戰鬥精神啊！

救世、醒世、覺世三篇是上帝教根本教義，要求在上帝統率下，國與國平等，人與人平等，男與

女平等，貧與富平等；反對私，反對妖，反對不正，反對壓迫，充滿着對閻羅妖戰鬥的勇氣。此後天國教義，都從三篇教義出發，成爲太平革命運動的最高原則。

上帝教包含宗教迷信與革命思想兩部份，在廣西，迷信部份曾起了極大的組織作用，但從全國範圍說來，一般人保守拜鬼神尤其是拜祖先的習慣，不能輕易放棄，外國神耶穌更不合鴉片戰後全國反侵略的心理。太平軍入湖南境，如果參照萬大洪告示的方法，強調反滿革命理論，少提天父天兄一類耶教迷信，號召力定會增大無數倍。可是太平軍不懂得一出廣西，宗教部份必須放鬆的道理，自湖南到南京途中用東王、西王名義發布奉天討胡、奉天誅妖、諭救世人等檄文，後兩道勸人丟邪神，拜上帝，信奉上帝教；前一道申明民族大義，鼓舞革命義憤，文字極強健有力，但至少被後兩道打折扣一半。據比較可信的傳說，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守建國的策略，勸放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走。不論左宗棠果有其事與否，反滿不反孔，確代表一部份士人的思想，這種人既不像官僚那樣腐朽無能，又有能力去欺騙落後民衆，是一種不可輕視的力量。曾國藩討粵匪檄特別強調：『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又說『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這一宣傳，曾國藩勝利了。湘軍的領導骨幹是士人，借『衞道』名義掩護漢奸的實質，如果太平軍對士人有正確政策，

可以削弱湘軍一部份實力，

太平軍出廣西境，落後的人民對完全陌生的上帝教，自然會看作外國教，接受曾國藩「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的惡宣傳。太平軍在信仰方面，應改「打倒一切偶像」爲「打倒菩薩、神仙、淫祠」，不必毀孔子關岳廟，更不必強迫人民尊拜上帝，理論方面應發展儒書中進步學說（救世、醒世兩篇就是這樣做的）與平等思想結合，不必把儒經當作「妖書」。這是革命的讓步，也是對反革命的進攻，止有這樣，才能減輕社會的阻力，打擊曾國藩一類人的陰謀。但後來洪楊愈更偏重發展迷信部份，尤其是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遂行私意，僭妄自大，造成「宗教腐化」（太平軍紀事評語）及洪楊衝突的惡果，發動革命的工具却轉化爲破壞革命的毒素了。

經濟問題

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在南京刊布天朝田畝制度，這是天國政治經濟的基本思想。文件中有下列一段話：

「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

根據這個廢除私有財產的原則，在土地問題上產生分田法，根本推翻地主佔有土地制。

『分田云者，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爲上上田，可出一千一百斤爲上中田，以下遞減至四百斤則爲下下田。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各按家口之多寡（不分男女）以行分田。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者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上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半，分上上田五分。一家六人，則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半。』

這個分田法規定得如此詳盡細密，就不得不陷於空想，據現有各種史料看來，它似乎不曾實行過。不曾實行的原因，首先是土地與人口的配合，情形非常複雜，不如想像那樣容易；其次是滿清軍隊不斷進攻，燒殺搶掠，天國領土常起變動，農村秩序無法安定。但從另一意義看，也可以說實行了田地分配。光緒三年兩江總督沈葆楨奏報江寧府屬勸墾情形說：『鄉民自種自食，每戶不過十數畝而上，餘地招募客民，給以資本，倘加催索則席捲潛逃。』太平戰後地廣人稀，一個勞動單位（一人）一般佔田十餘畝，與現存太平天國寶安局執照：『周志記田主租捐報明，計田十四畝八分』大致相符，據天國一三年便民由單：『馮嘉龍戶本年應完漕米二斗四升，』如按十四畝餘計算，漕米在總收入中僅佔極小部份。因爲地主高利貸者或死或逃，土地歸耕者所有，土地剝削已不存在；滿清地方政權摧毀，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所舉的三條暴政也已廢除，農民有田可耕，無各種剝削，僅對天國政府繳納輕微的糧米，生活確是改善了。太平天國外記說賦稅極輕，農田視土地之肥瘠，分九等課稅。照曾國藩（同治二年）說：『民間耕獲，與賊各分

其半；』照楊秀清奏『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照李秀成自述『蘇州百姓應納糧稅並未收足，田畝也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照林彩新勸諭青岩民衆檄文（同治元年）『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依據這些材料，太平軍取之於農民的主要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至所謂照舊捐糧，如果照滿淸漕米舊規『錢糧之重甲於天下』的江南，每畝正額不過二斗內外，即使加上『漕斛』『幫費』，總數也不過六斗，估每畝產量（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中三分之一左右，（滿淸錢糧太重，不在額數而在米變錢，錢變銀及其他折色、浮收、訛詐、刑追等惡弊）尙不及『公私各半』；天國農民生活與滿淸統治時期對照，顯然有天淵之別。這就給『最純粹的、最澈底的、完滿到合於理想的資本主義』造成最迅速發展的先決條件，太平革命的偉大意義在此。曾國藩爲首的一羣賊匪所『痛恨』的理由也在此。

在廢除私有財產制（實際上只是要求廢除封建私有財產）原則下，又產生聖庫（藏銀錢）聖糧（藏米糧）制度。太平軍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領俸錢，止是食肉有區別，天王每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等於滿淸知府官）每日半斤，總制以下不給肉，每逢禮拜日，各官開單赴聖庫、聖糧領禮拜錢、糧米油鹽及祭上帝物品。兩司馬（管轄二十五人的小軍官）每七日給錢一百文，普通兵士五十文，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斤，油鹽各七斤，另外有買菜錢，下級軍官可向上級請求，錢數不等，買猪鷄等供衆兵會餐。原則上天王到士兵不准私蓄財產，衣食

器物一切生活費用（包括醫藥、殘廢院、老人館）全由公家供給，實際也是極大多數官員及士兵始終保持嚴格紀律，表現高度的革命純潔性。例如維多利亞主教稱太平軍紀律『較清教徒尤為嚴正，』反對太平天國的卜羅斯在致魯寒爾信裏，不能不承認『寧波已為亂軍所據，城內尙無殺戮之事，生命財產之損失極少，亂軍秩序奇嚴』這個事實。

在廢除私有財產制原則下，又產生近於工業國有的諸匠營制度。太平軍領土內，集中各種工人，按技術分別設立諸匠營。照賊情彙纂所載，有木匠、金匠、織匠、金靴、繡錦、鐫刻等營，這種匠營止管生產物品，不管收發。又有各種典官，如典紅粉，主製造火藥；典硝，主煎熬硝磺；典鐵，主製造兵器、鐵器；典銅，主製造銅器。典官管製造兼收發，與諸匠營同為管理生產的機關。這個制度已近於手工工場性質，比手工業提高一步。據賊情彙纂的批評，稱為『各儲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足見生產效率是優良的，如果繼續前進，可以順利地轉到機器工業階段。

廢除私有財產的理想，在實行時表現為摧毀地主階級、耕者有其田，官員兵士生活共產化，工業國營三種形式，基本上是成功的。後面兩種所以成功，由於前一種的成功；前一種所以成功，由於太平軍領導者的實際行動不是硬照教義的空想，而是照顧到農民、商人（主要是農民）的客觀要求。天朝田畝制度規定：

『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麻布帛雞

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

張錫庚難民陳述賊情記載下列詞句，與太平軍告示（天下農民米穀……商賈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語意符合。

『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終年所得粒米全行歸天王收去。每年每大口給米一石，小口減半，以作養身。鋪店本利，亦歸天王，不許百姓使用。』

這自然是不能實行的辦法。定都南京不久，修改政策，對農民採取徵收漕米，對商人採取自由貿易，天國軍事政治才獲得穩定的經濟基礎，農村因之組織起來，金融因之活動起來。

天國領土內採取古代寓兵於農的組織法，普遍建立守土鄉官制。鄉官編制與軍隊同，平時管理民政（徵糧、工程、教育、辭訟、保舉）由每家出一人當兵，即成鄉軍，鄉官即成軍官。編制法全照周禮，就是五家爲伍，設伍長一人；五伍爲兩，設兩司馬一人；四兩爲卒，設卒長一人；五卒爲旅，設旅帥一人；五旅爲師，設師帥一人；五師爲軍，設軍帥一人。每鄉共一萬二千五百家，成軍得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軍帥以下各鄉官，全由人民公舉。『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天朝田畝制度。）這雖然止是有限的民主權利，但在統治階級看來，已是恐慌失色，賊情彙纂說：『賊之牢籠人士，聯絡方域，計蓋無踰於此者。』換句話

說就是專制統治最怕民主政治，天國人民已經獲得初步的選舉鄉官權、地方自治權，不僅從古所無，直到今天將近百年，除在各××區已經實行了比這完備多倍的民主政治外，在其餘許多地方，人民還不曾取得這些權利。

太平軍對國際、國內貿易，採取自由政策，抽稅極輕。『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細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以鹽、布、棉花、煤、米爲粗貨，絲綢、蘇貨爲細貨。抽稅之後，給以船票一張，如遇他軍，可以驗票放行，無票則沒收之』（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外紀比較滿淸與天國兩方商稅，得出如下的觀感：

『余自仙女廟（江蘇江都縣屬）購米後，回南京，途中遇釐卡甚多。每二三里卽有一所，草屋中懸「抽釐助餉」字樣。自仙女廟至瓜州（南京對岸儀徵縣屬）釐卡二十處，所定之稅，視法定額增加數倍，任意剝削，小民控訴無門。』（這是滿淸統治地區的捐稅。）『太平軍於各處所設之稅局，其組織極公平正確而簡單。每鎭每村設一所（大概是指鄉官所管國庫）貨物已納稅者，給與憑照，不再於他處科斂。絲業之所以發達，未始不由於稅法之良善也。歐人之至南京貿易者，皆能言之。』（這是太平天國治下地區之捐稅。）

太平天國稅法良好，境內平安，（例如一八六〇年，容閎帶現銀四萬兩，在天國太平縣買茶葉二十八船，回上海）農民購買力增強，自然促進商業的發展。英敎士洛勃斯克給香港日報通

信說：『南京城外，商務發達，秩序安謐，城內居民則衣食豐足，安居樂業。』這樣繁榮情況，外國商人應該也是歡迎的，事實卻相反，因為他們是侵略者，愈引起對天國的憎惡，試看下列輸出入表；

絲茶輸出（茶單位十萬磅絲單位千包）：

	茶		絲
	上海	福州	
一八五一年			二〇
一八五二年	六〇〇		
一八五三年			四一
一八五四年	五〇〇		
一八五五年	八〇二	一五七	五八
一八五六年	五九三	四一〇	
一八五七年	四一〇	三二〇	
一八五八年	五一〇	二八〇	八六
一八五九年	三九〇	四六九	
一八六〇年	五三五	四〇〇	六九

上海出口的茶，大部份產地在天國境內，絲也佔不小部份。絲茶輸出總額一般是比起戰前

增長，英國來抵補的鴉片輸入同樣增長起來。

	上海鴉片輸入	全國鴉片輸入 （單位：百箱）
一八五三年	二四二	六六五
一八五七年	三一九	七二三
一八五八年	三三〇	七四九
一八五九年	三三七	七五八
一八六〇年	二八四	五八六

太平軍境內絕對禁止鴉片（可能少數輸運入境），因之上海輸入鴉片不及全國總數的一半。一八六〇年李秀成攻入江浙，陳玉成大戰安徽湖北一帶，上海及全國銷路大減，太平軍與鴉片貿易不能相容，英國政府看得很清楚。而且英國又必須採購一部份江西安徽茶（一部份在福建廣東採購）及江浙生絲，不得不忍痛用現銀購買。上海道吳健彰記咸豐三年英兵船訪問南京情形說：「英船至鎮江，賊目用旗招往過船相見，云「如有大炮火藥米糧可來銷售。」英夷告以此等貨物如賣與你等，有違中國和好，如要烟土，儘有可售。答云「我處不用此物。」」英國侵略者開始就憎惡太平軍，因為它是鴉片的仇敵。滿清政府取相反的方面，一面儘量歡迎鴉片，一面向侵略者搖尾求援。例如咸豐三年署兩江總督楊文定致英美兩國公使照會說：

「爲借船助剿以安商民而全永好事：竊自賊匪據船東下，連陷江寧鎮江……欽差大臣向榮亦以須借貴國火輪兵船爲望。……希念兩國通商合好已久，今商民被擾，貿易不通，且賊匪烟禁甚嚴，一遇我國吸烟之人，無不被殺。統希速發火輪兵船來江剿擊，本署部堂欲爲商民除害，斷不大言欺人。倘蒙允發火輪兵船前來洗蕩賊匪，必當奏明皇上，加重酬勞，而貴國借兵恤鄰之聲名，亦永傳不朽矣。」

楊文定無恥到借太平軍嚴禁鴉片作爲理由來恐嚇利誘英美，充分暴露出統治階級的卑汚賣國心理。曾國藩以及後來的那些獨夫民賊，思想上完全是楊文定的繼續。

太平天國在土地政策、商業政策上的成就，使外國侵略者與封建統治者由恐慌而聯合。太平軍却因領導集團內訌，使反革命有機會來摧毁這個成就，中國社會從此停滯了一百年。

婦女與婚姻問題

太平軍根據平等自由的原則，作了偉大的婦女解放運動。恩格斯說：『在每一社會中，婦女解放底程度，是一般解放底天然尺度。』傅利葉是說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我們可以說，太平軍是實行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太平軍看婦女是姊妹而不是奴隸，因此與看作兄弟的男子一切平等。在婚姻上，『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天朝田畝制度。）在經濟上，『各按家口之多寡以行分田，不論男女』（同上。）在政治地位上，女官與男官同等，最高官級是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開科取士，男女同有應試權。在軍事上，有女軍四十軍（每軍二千五百人）『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胆同殺妖』（永安城突圍詔。）在生產上，

設立女館，學習工藝。在軍律上，『凡強姦經婦人喊冤，定卽斬首示衆，婦女釋放。如係和姦，男女皆斬。』其他如禁纏足，禁買賣奴婢，禁娼妓，禁人民蓄妾，所有惡俗，悉數剷除。這樣澈底的婦女解放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前，世界歷史上不曾有過第二個，眞是人類最光榮最先進的行動。曾國藩號召『扶持名教，敦敍人倫』（討粵匪檄）就是要驅迫婦女回到奴隸圈裏去生活。

婦女解放運動改變了婦女的卑弱姿態，英人吳士禮在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裏說：『此處（南京）與全國吾所曾遊之其他城市大異之點，卽是婦女隨便遊行或乘馬於通衢大道，而又絕不裝模做樣害怕外國人如其他中國婦女所常爲者，亦不迴避我們。』從纏足羞怯到大街騎馬，不避外人，無疑是解放運動的效果。吳士禮卻誣衊太平軍擄掠美女供淫亂，侵略者仇視進步，本無足怪。可惜是太平軍領導集團中人多數納妾，洪楊尤縱慾腐化。吳士禮說：『他們每藉神聖下凡的啓示以爲作惡行淫的護符，甚且藉以廢除第十誡，』這是事實。楊韋二人爭奪美色竟成爲內訌的原因之一，不免給解放運動留下一個汚點。

太平天國的建設在政治經濟方面一般是成功的，外交方面避免衝突，取得英美法形式上的中立，還不算大失策，只有軍事方面戰略指導錯誤，失去搗毀滿淸中央政權的機會。雖然石達開在上游仍能保持進攻形勢，擴大革命領土，但卻在勝敗相持的緊急關頭，發生內亂，便功敗垂成了。

第五節　太平革命衰敗時期（一八五六（咸豐六年）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

本時期可分前後兩期。前期從一八五六年楊韋內訌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八月安慶失守，革命勢力處在防禦地位。曾國藩逐步進逼，戰爭是爲了打破合圍形勢。後期從安慶失守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六月南京陷落，革命勢力處在被圍困地位，反革命合圍成功，戰爭爲了解圍，自然解圍是不可能的，太平革命終於失敗了。

一　前期的革命形勢——防禦

永安封王以後，楊秀清專擅領導權，洪秀全退居閒散，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向榮迭次詢訪難民口述賊情片裏說：『臣等於抵金陵後，每見城中逃出難民必詳加訪問，僉稱洪秀全實無其人，聞已於湖南爲官兵擊斃，或云病死，現在刻一木偶，飾以衣冠，祕置僞天王府內，楊逆七日一朝，其餘受僞職者皆不能見。』雖說是謠傳，洪秀全止是名義上的領袖，可以想見。秀清上逼秀全，下壓韋石，彼此猜忌怨恨，繼續增長。咸豐六年七八月間，向榮已敗逃，南京城圍暫解，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他選擇這個時機，顯然顧慮到發動內亂時，免外敵乘機攻城。北翼二王也密謀『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殺』（李秀成自述。）韋昌輝是豪紳地

主出身野心極大，自成一個次於楊黨的所謂韋黨。秀全密令昌輝圖楊，昌輝從江西急速入京，殺秀清及楊黨（當然不全是秀清私人）數千人。達開在湖北洪山『知道京城殺害許多之人』，狠狠趕回，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翼王走上安省。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各衆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洪仁發）福（洪仁達）兩王。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固執，認識天情，與我天王一般之意見不差；壓制翼王，逼翼王他逃。』這是李秀成所說當時實情，最為可信。從這裏可知大批革命戰士在楊黨、韋黨罪名下被冤殺，損失是不可數計的。洪秀全違反衆意，逼走石達開，他是唯一勝任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物；如果天王親理朝政，任達開為輔佐，局面可能比秀清專政時期好轉；秀全這一謬誤處置，損失也是不可補償的。達開走後，秀全依然過着腐化生活，隱居深宮，朝政委託衆人厭惡的蒙得恩（嬖臣）、洪仁發、洪仁達（二洪是秀全胞弟）三人掌管，後來又加入洪仁政、洪仁玕（二洪是秀全堂兄弟）二人。這些人都是貪鄙齷齪，專做危害天國惡事的破壞者，弄得『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各有散意』（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陳玉成為首的革命力量在戰場上支持，天國早就覆亡了。太平軍一壞於楊秀清的專擅跋扈，再壞於韋昌輝的瘋狂屠殺，最後壞於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是最後一壞，歷時較久，禍國的軍令政令迫使太平

軍逐步削弱以至於潰滅。

石達開是個人英雄主義者。洪氏集團和他決裂，並不等於太平軍和他決裂，不該獨立行動，企圖自己創業。他的錯誤行動，終於覆軍喪身。太平軍也勢孤敗滅，個人英雄主義害了他又害了太平軍。

韋昌輝殺達開一家人，達開在安慶調湖北洪山軍到安徽寧國，準備報仇。秀全借東楊餘黨之力殺昌輝，召達開入京，用『留京輔弼』名義，解除達開兵權。東楊餘黨謀大殺韋黨，幸得陳玉成反對，說：『太平軍皆東北二王舊部，如欲株連，非殺盡太平軍不可。』但楊韋兩黨結成深仇，人人自危。當時守武昌城主將正是昌輝的兄弟韋俊，他是太平軍驍將之一，如果城外洪山援軍不撤退，楊韋餘黨不互仇，武昌可以堅守不失。洪氏集團既不派遣新援軍，又不安慰守城軍心。十一月，韋俊因糧盡退出武昌。咸豐九年韋俊投降湘軍，太平軍從此喪失上游重鎮，無力再圖恢復。達開受洪氏排斥，疑慮不安，又感到大勢已去，南京難保，咸豐七年五月，約集將士十餘萬人往安慶，與太平軍分裂，自成一軍。

正當太平軍內部分裂的時候，反革命陣營也起了頗深的裂痕。原來咸豐帝並不信任這個漢奸頭子——曾國藩，相反，對他和他的湘軍懷着極大的猜忌心。咸豐帝聽到楊韋內訌，非常快意，十月二十日上諭作出兩種估計。一是『該逆（石達開）於諸賊之中，最爲凶悍，若令回竄江

西，占踞數郡，煽惑莠民，其勢愈難收拾。』一是『該逆倘向曾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或先自立功贖罪，再邀重賞。』他看重第二估計，怕曾國藩貪功殺降，預先把它指出。對曾國藩則加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卽不遽加該侍郎等以貽誤之罪，該侍郎等何顏對江西士民耶』的訓斥，準備成功以後，免得曾國藩及湘軍將領恃功要挾。咸豐帝一貫採取這樣的態度，從來不給他軍政實權。曾國藩在瀝陳辦事艱難仍懇終制摺（咸豐七年六月）裏訴苦說：『臣未奉有統兵之旨，歷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官兵，所居兵部堂官之地，而事權反不如提鎭。』又說：『臣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爲客，視本管上司爲主，賓主既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這些『艱難』還不算，再加上中央政權的『部』和他爲難。他說：『部頒緊要之件，亦不徑交臣營，四年所請部照，因久稽而重請，六年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尙無交到確耗。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劄，皆由督撫轉交臣營，常遲久而不到。』部不承認他是正式統兵大員，因爲他『未奉有統兵之旨』。咸豐帝連差遣他作軍事行動，總是避免『旨』，止用『廷寄』（軍機大臣轉達）的形式。曾國藩受盡了皇帝、部、地方官的明氣，還要受各方面的暗氣，他說：『外間時有譏議，或謂臣係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或謂臣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或謂臣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迄今歲月太久，關防之更換太多，往往疑爲僞造，釀成事端。』但是曾國藩堅決的反革命，不論遭受多少明氣暗氣，總抱定『低首茹歎，但求集事，雖被侮辱而不辭』。他上了這個訴

苦奏摺，原想滿洲主子給他一些實權，不料咸豐帝毫不體恤，竟奪去他的湘軍統率權，下諭『准其開去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曾國藩大出意外，再上一個奏摺，表示『軍勢未定，寸心難安。』咸豐帝又給他硃批說『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卽楚南也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反革命內部矛盾與革命內部矛盾互爲因果，如果翼王能善處逆境，忍受挫辱，竭力保持內部和平，必然等到反革命內部矛盾擴大，湘軍被綠營兵壓倒的機會。曾國藩在家閑住一年，因石軍攻入浙江省常山、開化，援浙湘軍將領不服調遣，咸豐帝恐慌，給他辦理浙江軍務名義，去『挽救東南大局，』他『奉命卽行，』又掌握了湘軍統率權，而石翼王却成爲無根基的孤軍了。

石達開率大軍到安慶，轉入江西，攻取許多郡縣。當時情形是『拏獲賊中僞文，均稱石達開諭令諸賊謹守江西。凡江西境內之賊概未調赴下游，而下游之賊反由景德鎮以赴援撫（撫州）建（建昌），蓋安慶爲石逆舊踞之巢穴，江西爲石逆新陷之土地。諭旨所謂石逆糾合黨與，自圖占踞，已可概見』（曾國藩咸豐六年十一月，江西近日軍情據實覆奏摺。）照曾國藩的估計是：『以大局言之，北岸安慶，南岸九江，該逆之所必爭也。以江西言之，瑞州、臨江爲根本，撫州、吉安爲膏腴，亦該逆之所不肯輕棄也。』如果達開眞像曾國藩所料那樣做，據安徽江西兩省，與陳玉成李秀成遙相應援，夾擊湘軍，不僅九江安慶可以堅守，陳玉成不會失援敗死，楊韋餘黨投降清軍可能減少，而且那時候捻軍已與太平軍合作，戰爭擴展到中原地區，革命反革命的決門，勝敗還

是未可知的。石達開不顧皖贛有民衆擁護的有利條件，卻決心遠征四川，自立一國。路線錯了，雖然擁數十萬大軍，轉戰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西、廣東、貴州、湖北、四川九省，歷時七年，表現了革命軍隊的高度堅韌性，到底不免一敗塗地（同治二年在四川大渡河戰死）。狡猾的曾國藩，看出達開已不是大敵，咸豐九年，定四路進兵策，一意取安慶南京，把達開軍當作『流賊』放到第二等地位上去。

石達開走錯了路，太平革命重擔不得不加在李秀成、陳玉成二人肩上。陳李都是天才的軍事家，陳保衞安慶，縱橫上游皖鄂兩省，與曾國藩湘軍、胡林翼楚軍、勝保北軍相持數年，曾胡竭全力抵抗，僥倖獲勝，陳敗安慶失陷。李保衞南京，克復下游江浙兩省，與曾國藩湘軍、左宗棠湘軍、李鴻章淮軍、戈登『常勝軍』、英法侵略軍力戰數年，勝敗略等，李敗南京不守。陳李失敗主要由於洪氏集團從中破壞與石達開不願配合作戰，第二個原因才是外國侵略者直接幫助滿淸，共同鎮壓太平軍。

本期戰爭以陳玉成安慶保衞戰爲主，李秀成東征軍爲輔，戰爭目的在打破反革命軍進攻南京。

陳李聯合

楊韋兩黨互殺，再加石達開帶走將士十餘萬人，太平軍實力大受耗損。陳玉成勇猛有戰功，又是洪仁玕的姪壻，李秀成新招張洛行、龔得樹等部捻軍，號稱五

十萬，兵力最大。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陳李來支持局面，但並不眞心信任。

作戰

咸豐七年九月，和春張國樑陷鎮江。八年三月，和張進至雨花臺，又建立江南大營與德興阿的江北大營隔江呼應，掘長溝，困南京城。四月，九江被湘軍李續賓部攻陷，守將林啓容全軍一萬七千餘人戰死，無一人投降。這時候南京、安徽同時危急，天王下詔在外將領勤王，沒有人奉召來救。天王只得封秀成爲忠王（玉成先封英王）都督中外諸軍。秀成威信極高，親到安徽樅陽鎭（桐城縣東南）大會各鎭將領百餘人，慷慨誓師，諸將都願服從指揮，太平軍重新團結起來。在樅陽大會上定計先破江北大營，通南京糧道。八月，秀成聯合玉成前後夾擊，大破德興阿、勝保馬步軍，殺萬餘人。又大破張國樑援軍，江北大營潰散，南京與江北的交通恢復。李續賓得九江，乘勝進攻安徽，連陷太湖、潛山、石牌、桐城等地，九月，攻三河鎭，陳玉成率兵往救，李秀成援軍繼進，大破李續賓軍。李續賓是湘軍主力，一戰被殲滅，文武官死四百餘人，兵卒死六千餘人。反革命所受打擊，止要看胡林翼自供就很明白，他說：『三河敗潰之後，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於一旦，而且敢戰之才，明達足智之士，亦凋喪殆盡。』這兩次大捷，都由於陳李兩軍聯合作戰，此後陳玉成經營安徽，拒湘軍進攻安慶，李秀成守浦口，拒江南大營的進攻南京，陳李兩軍各當大敵，事實上不能機動佈置，互相救援了。

陳玉成

咸豐九年，曾國藩胡林翼定計，合湘楚兩軍水陸全力四路進攻，安慶陳玉成

安慶保衛戰

聯合張洛行、龔得樹等捻軍十餘萬人奮力抗擊，激起革命反革命空前激烈的戰鬥。正當兩軍在太湖、潛山一帶惡鬥，十月，池州(貴池縣)守將韋俊投降湘軍，『情願收取蕪湖、太平關、建德等處，立功贖罪。』這個無恥的叛賊『久踞池州，所部不下數萬，強悍衆多，』『且係狗逆(曾胡極怕陳玉成，呼爲狗逆、四眼狗以洩忿)舊屬，於用兵機謀，早能覷破』(胡林翼致楊載福書)。曾胡如獲至寶，賞他一萬兩銀子，一個『遊擊』虛銜，他也表示『投誠歸順，無有二心，請調赴皖北，以圖報效。』他要取得信任。對玉成軍確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九年十一月，兩軍大會戰，一〇年正月，玉成軍戰敗。胡林翼稱這次戰爭爲『軍興數年以來僅見之大戰』(克復太湖縣城疏)。『此次血戰似係軍興以來未有之奇，他省兵將似難如此堅強果毅』(復官文書)。當『前敵軍情萬分吃緊』的時候，急得曾國藩幻想『狗已冥誅，』胡林翼急得『近日肝氣決裂，見兵將尙和，見吏則不是可解，有痛詈不堪者，自知太過而怒不可遏，大約是病矣』(致曾國藩書)。大戰的結果，太平軍失去太湖、潛山兩個縣城，湘軍曾國荃進駐集賢關，開始圍攻安慶。

陳玉成敗後退軍，會合李秀成，攻破江南大營。胡林翼料到太平軍秋後定要反攻，惶恐地說：『不過三個月，狗肢又壯，狗膽又雄，楚其旰食矣。又終是天下之禍根，弟苦心焦思六七年矣，竟未能屠滅此賊』(致丁月台書)。五月，他請求咸豐帝允許添募湘南勇丁，說『去冬今春兵力未

分，四眼狗陳玉成以十萬之賊，西犯以救潛山、太湖，臣等與曾國藩合力圖謀，血戰月餘，屢瀕於危，幸而勝之。今則江東各路全軍破壞（指江南大營潰散）賊勢既無所顧忌牽綴，必掀全力全勢悉數西犯以謀楚軍。是楚北、皖北之危迫情形，不待智士而已知之矣』（奏陳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他竭力籌備戰守，嚴密戒備，趁玉成軍在下游，催促楊載福、彭玉麟水師攻取樅陽。他說『樅陽爲安慶之吭，苟不得樅陽，不能合圍，即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五月，楊彭督率韋俊部血戰攻破樅陽。這個叛賊立了大功，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說：『韋軍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則此功極大，戰績良苦。』要國藩令韋俊率重兵守樅陽，並保薦他得官職。太平軍失樅陽，安慶形勢愈益危急。

九十月間，玉成率黃文金、楊輔清、吳汝孝等聯合捻軍龔得樹、孫金星等十餘萬人救安慶。曾國荃被猛攻，準備撤退圍城軍，韋俊自樅陽出兵斷絕糧餉道，玉成軍乏食。國荃用韋俊計屢獲勝利，玉成退歸桐城。

與玉成救安慶同時，李秀成自浙江回南京，奉天王命援皖。江西湖北各州縣起義首領四十餘名，派人向秀成『公呈降表投軍。』約定援應太平軍。秀成軍攻破皖南黟縣，入浙江轉向江西進發。

咸豐十一年春，陳玉成直搗胡林翼的老巢——武昌，李秀成直搗曾國藩的老巢——祁門，

造成太平軍與湘楚軍戰爭以來最緊張的一次大戰鬥。陳玉成軍自桐城經霍山縣攻入湖北，沿途打敗敵軍，勢如破竹。二月，攻克孝感、黃州、德安、隨州、黃安、黃陂等城，民衆武裝響應，僅德安一處，就有二萬二千餘人。當時胡林翼楚軍駐太湖，助曾國荃圍安慶，不曾想到玉成行軍『風馳雨驟，晝夜兼行，』飛調水陸援軍，一時緩不濟急。武昌城總督滿人官文，昏瞶無能。守城旗兵綠營兵總數不滿三千。他料定武昌必失，大勢已去。本來太湖大戰，已經嚇成大病，這一次悲觀已極，索性連『軍報亦廢擱不閱，五心燒熱如火炙，夜間尤甚。咳嗽吐濃紫色血，』希望速死（八月裏吐血死去。）這個危局怎樣得救呢？自咸豐八年，英國在漢口取得租界，它用武力阻止陳玉成渡江取武昌，把一羣反革命從絕處救活了。玉成分兵協助人民守城，自率萬餘人回救安慶。

李秀成屢破曾國藩軍，三月攻克景德鎮，絕曾軍餉道。曾國藩是向來不上戰場的，這時候急了，三月，親到休寧督各軍攻徽州城，希望打通浙皖交通線，一戰大敗，逃回祁門，秀成軍圍祁門猛攻，曾國藩困守絕望，寫遺囑給妻子，準備自殺。這個漢奸頭子三次尋死，靖港、鄱湖是倉惶失措，這一次是計窮力竭，形勢比前兩次更嚴重。自然，所有漢奸都拚命救他，左宗棠在樂平打了大勝仗，秀成撤圍入江西，攻克大部份郡縣，把安徽放鬆了。他得江西湖北起義首領和民衆接應，行軍順利，四月，由密安、瑞州進佔修水、武寧，逼近湖北。胡林翼全力抵禦，節節敗退。六月，秀成佔領興國、通城、蒲圻、崇陽一帶城池，武昌萬分危急，嚇得在太湖的胡林翼『咳逆彌甚，嘔血日至升餘，形銷神

瘁，氣息奄奄』（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秀成無意進攻武昌，長江被湘軍水師封鎖，望見楚北的玉成軍旗幟，也未設法渡江會合。他收得起義民兵三十萬退出楚南，經江西攻入浙江，放棄與陳軍的配合作戰。三月間，玉成率馬步精兵回救安慶，與曾國荃水陸軍大戰，不能取勝，他留下劉瑲林率『平日第一枝悍黨，戰守可恃』（曾國藩語）的精兵守集賢關營壘，自己去南京求救。五日曾軍攻擊集賢關，劉瑲林被殺，這次戰敗，損失異常巨大，曾國藩說：『查粵逆自出擾以來，我軍所斬長髮老賊至多不過數百名。此次殲滅長髮賊至四千名之多，實為從來所未有』（官軍圍攻赤崗嶺賊壘悍賊殲除摺）。胡林翼說，瑲林是『悍摯著名，四眼狗所依賴，此次就擒，老賊誅戮殆盡，功抵塔忠武（塔齊布）、岳州、李忠武（續賓）九江矣』（致曾國藩等書）。玉成得到敗報，趕回再救安慶，但精銳傷亡太多，雖經幾次血戰，仍不能挽回頹勢。八月，安慶終於陷落了，守將葉芸來率全軍戰死。

陳玉成想去湖北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由將，連夜各扯隊由六安而下廬州（合肥）。英王見勢已不得已，亦是隨回轉到廬城。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煩意亂，願老於廬城，故未他去。坐守廬城，愚忠於國』（李秀成自述）。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四月，廬州失守，玉成率殘兵往壽州（今安徽壽縣），被團練苗沛霖誘獲，獻給清帥勝保。這個太平軍兩大支柱之一的英王為革命犧牲了！他死時還只有二十六歲。

陳玉成的主要對手是胡林翼，他怎樣畏懼玉成呢？他說『賊勢較石逆爲少，賊計較石逆爲狡爲悍』（致金觀察書）他尤其畏懼玉成的深得民心，在致羅溶村信裏說：『昔年民欲賊來，不肯清野，近年民不願（？）賊來，然尚不肯清野也。欲清野，尚待創深痛鉅之後。』於是自己率領一羣民賊來製造『創深痛鉅』，教州縣官要『居今日而圖治，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必須辣手示懲，使知畏法』（復襄陽縣賀月樵）這等於說『不聽反革命的命令者殺無赦。』又教軍官放火燒城，說『得城之時，密派勇丁各持一炬，將城內大小房屋米糧付之一炬，片瓦不留，則異日必無賊可守矣』（復吳幹臣。）統治階級推崇備至的『胡文忠公』就是這樣一個出賣民族專門殺人放火的強盜。他還強迫文武官員搶糧，在札余副將霍山縣裏說：

『查霍山樂兒嶺附近等處士民無仇賊之心，有助賊之意，將所有穀米囤聚，不碾不售，以致兵食缺乏，試問是何居心？應由余副將嚴查有穀有米之家，出示封鎖，勒令運營出售。如該處士民始終抗玩，其中必有不明大義，甘心助賊倡率阻糶之紳民，仰即查明捆斬十餘人，並將米穀充賞，倘該將有心討好，不知輕重緩急，姑息養奸，定于嚴參。』

紳民有米不願出售，這就該『捆殺十數人麽？』他又不反省一下，爲什麽紳民『有助賊之意，無仇賊之心，』這不是所謂官實際是民賊，而所謂賊，實際是民友的鐵證麽？自然，民賊是不能反省的，因爲他們的頭腦是剝削階級的。試看他致前敵各營書：

「粵賊竄擾以來皖民受禍既久迷溺尤深誠恐軍行之際賊黨造作謠言，蠱惑人心，果於從逆，亟應出示曉諭，破其從前之惑，予以自新之途，亦解散賊黨之一法……俾其家諭戶曉，去邪歸順，實爲至要。」

人民解放叫做『受禍』，覺悟叫做『迷溺』，當滿洲奴隸叫做『去邪歸順』，堅決反抗異族侵略者叫做『果於從逆』，這就是從民賊們特殊頭腦裏發出來的特殊語言。

民族英雄陳玉成被反革命殺害了，還被描寫成殘暴無比的『狗逆』，究竟誰是狗是逆呢？可看英國人令利揚子江日記：

「此處（指南京上游大通地方）村落，荒苦不堪言狀，其破壞之遺跡，大都政府黨兵士之所爲也。太平黨兵士之蹂躪，焚燬寺院，瓦礫無餘，此其遺跡，所有而是。而政府黨兵士之蹂躪，則父老痛哭而談，以爲奸淫婦人，恣意殺戮，慘無人道，太平軍之暴行，不過强人民爲其運輸粮食，若凌辱婦人，則往往處以死刑，罪人之首，高揭於犯事之地。尤記太平軍之名將所謂英王者，訓其部下，不得妄取民間一物，政府黨之兵士不及遠矣。」

李秀成南京破圍戰

江南北大營是咸豐帝與曾國藩也是反革命內部滿與漢矛盾的產物。咸豐帝的計劃是湘軍出力，江南北大營收功，因此對它特別重視，兵額增至七萬人，餉原指定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廣東、江西等地供應，幾乎佔東南財力的大部份。大營唯一戰將張國樑與和春成見很深；軍隊是滿人、兩廣人、各地流氓的雜合體；軍風紀是『將驕兵

惰，終日酣嬉，不以賊匪爲意。或樂桑中之喜，或戀家室之私，或羣與縱洒酣歌，或日在賭場烟館，淫心蕩志，極樂忘疲』（胡林翼飭各統帶查辦各營）它逼近南京，形式上成爲可怕的大敵。但實際大敵是上游的湘楚軍。太平軍對江南北大營應取守勢；對湘楚軍應陳李聯合全力攻擊，首先要確保安慶。

成豐一〇年正月，張國樑攻陷九洑洲要塞，南京震動。胡林翼給曾國藩信說：『江南得九洑洲，歆動一切，東南成功尙早，我輩自行其志，不睬他人。』曾胡看得很眞切，一心爭奪安慶，李秀成却看錯了，定策消滅大營。秀成率精兵自皖南攻入浙江，以調動江南大營。二月，破杭州城。大營果分兵救浙江，秀成軍從間道馳回南京城外，玉成軍也從上游來會。閏三月，大破江南江北兩大營，和春張國樑敗死，大營潰散。

這次戰爭在革命反革命雙方都是重要的關鍵。太平軍方面，李秀成着重下游用兵，想佔領江浙兩省作根據地，他到江西湖北，是招收投軍新兵，目的不在爭奪上游。陳玉成往來江北成了孤軍，得不到秀成軍的有力援助。從此太平軍形成江南江北兩個獨立軍，勢力分散，江浙軍事勝利，反加速南京的陷落。反革命方面，成豐帝計劃失敗，不得不全部依靠曾國藩，給他兵部尙書銜，署理兩江總督的軍政實權。指揮統一了，餉源充裕了，反對派不敢爲難了，湘軍的勢力和地位從此大進一步。左宗棠聽到潰散，歡笑道『天意其有轉機乎！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

番洗蕩，後來者庶可以措手耳。』胡林翼聽到曾國藩得兵權、政權，喜歡道：『滌帥誠得督符、兵符，則否極而泰，剝極而復，天下士氣爲之一振。』反革命的喜歡就是革命的困難，李秀成還在注目江浙上海，不急救安慶，敗局不可挽回了。

二　後期的革命形勢——困守

安慶失守，南京危在旦夕，正是太平軍振作精神，死裏求生的緊急關頭。李秀成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可是洪秀全和洪氏集團裏腐化的習氣太深，眼中只看見南京一座孤城，心中只依賴天空一位『上帝』，拒絕李秀成棄城運動，向遠大處現實處開闢新環境的建議，終不免於亡國慘運的迅速到來。

楊韋內訌後，洪秀全在精神上消失了永安以前的發皇氣象，也消失了內訌以前的信人勇氣，繼續增長的却是暮氣沉沉的保守思想。他要保有自己的地位，對臣下採取有疑忌沒有團結，有懲罰沒有愛護的消極手段，像李秀成陳玉成那樣忠義有功人人信服的大臣却更遭他的猜疑，竟亂封九十多個王來互相牽制。結果『人心不服』（李秀成語）『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曾國藩語。）太平軍呈瓦解現象，許多主要將領投降滿淸，出死力攻擊太平軍，變成了滿淸的猛將；這固然由於叛徒們無恥貪生，出賣革命，但秀全猜疑政策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洪氏集團專擅政權，把楊秀淸時代建立的聖庫、聖糧制度破壞無遺。照李秀成自述所說：『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強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京城，渠滿城逢屋查過，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按戶查尋男女（人口），不得安然。』就在最後一次圍城中，還是『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我（秀成）在京並未任闔城之事，』見秀成『慈愛軍民，恐有圖害國之心，聲言我（秀成）忠而變奸。』李秀成所說『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事實上洪氏集團正是秀全猜疑政策的產物。

洪秀全和洪氏集團本身並無兵力，不能抵禦反革命的攻勢，握兵權的李秀成，軍事上自有一種見解，與洪秀全不合，對洪氏集團更是嚴重的對立。太平軍內部紛岐，力量分散，大局無法挽救，但天國還能延長三年，這全靠李秀成爲首的一枝軍隊對革命無限忠誠和江浙人民對革命的有力支持。

咸豐一〇年閏三月，秀成軍破江南大營、追擊潰兵。四月，取得常州、蘇州、嘉興等地，江浙肥沃地區大部份歸入天國領土。這種意外迅速的戰勝，與其說太平軍的勇猛，不如說人民力量的偉大。例如李秀成到蘇州城外，『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民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和兩帥官兵。」』秀成在新領土施行善良政治，民心悅服，合力守衛解放地區。滿淸江蘇巡撫薛煥勾結美國人華爾率洋兵進攻靑浦縣，秀成率兵迎擊，『兩陣交鋒，鬼兵大敗，殺死鬼兵六七百人，得

其洋鎗二千餘條，大炮十餘條，洋刀三百餘口，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圍』（李秀成自述。）乘勝攻克松江，進兵至徐家匯，離上海十八里（曾國藩也承認『上海舟師（洋兵）大挫，危迫殊甚。』）英法兵替滿淸守上海城，秀成準備進攻，因嘉興方面軍情緊急，退兵救嘉興，上海解圍。

這一次追擊戰，是洪秀全陳玉成解救安慶的計劃。原計劃是『派楊輔淸、李世賢、李秀成等直取蘇常，再攻徽浙，以入江西；又派吳如孝、張洛行由定遠壽潁六霍入湖北，定於秋間，四路大舉』（曾國藩安慶軍營搜獲陳玉成自南京發來密件。）這計劃確打中了滿淸的要害，反革命全體大恐慌，議論紛紛，都注目到下游地方，咸豐帝認爲湘軍『規取安慶，頓兵堅城，卽使安慶得手，亦屬得不償失，』嚴令『曾國藩接奉此旨，卽統率所部兵勇，徑赴蘇州，以保全東南大局，毋稍遲誤』（十年四月，上諭。）老奸曾國藩，胡林翼是不動搖的，他把湘楚軍主力死釘住安慶，奏稱『但求立脚之堅定，無論逆氛之增長』（曾國藩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摺）一面保薦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分任浙蘇贛三省軍務，自己督大軍全力進攻安慶，洪陳計劃被曾胡破壞了。

李秀成似乎不曾參與洪陳謀議，自述說『自六解京圍（江南大營潰散）之後，息兵三日，天王嚴詔下頒，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取蘇常，限我一月肅淸回奏。人生斯世，時爲其用，不得不從。』他出兵是勉強的。後來用兵順利，民情愛戴，又見物產富饒，洋兵易打，產生取江浙作根據地的思想，對上游甚至南京比較看輕了。九月，陳玉成在安徽大戰，『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領

軍而掃北。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啓奏，不欲掃北。我主盛怒，責罰難堪。此時亦無法處，出師而上江西、湖北』（李秀成自述）當時江浙並無大敵，曾胡又不曾中計，調秀成軍援皖是完全必要的，不過那種強迫命令的方式，使秀成不能忘情江浙，咸豐一一年上半年經江西入湖北，收新兵三十萬。石達開部逃兵二十萬，又回到浙江來。陳玉成在皖北戰敗，奏調秀成兵千餘人助守安慶，秀成不甚願意，並預料『其省不能保也。』集賢關慘敗後，又不撥大兵助玉成恢復實力。安慶失陷秀成至少要負不相救的責任。

安慶失陷的危險性與曾胡的戰略目標，秀成沒有足夠的認識，加深了洪秀全及洪氏集團對秀成的猜疑與裂痕。洪秀全的戰略思想着重在上游，用兵江浙止是牽制性質。咸豐八年滿清與英法（兩個主要侵略國）訂天津條約，出賣長江流域，英法更不許革命勢力的伸張，反對太平軍到達江浙地區，秀全深知這種情形，一向不主張東進。十年，英法聯軍準備進攻天津，怕太平軍來上海，英法軍艦隊司令賀布往南京，提出『太平軍不得行至距上海、吳淞二日路程以內，英軍也盡力阻止清軍從上述二地攻擊太平軍』的條件。得秀全允許，約定以一年為有效期限。秀全利用這個時機，規定用兵限於江浙內地，不攻上海，避免與侵略者直接衝突。英法聯軍在北方獲得意外迅速的勝利，背約攻擾太平軍，引起太平軍的反擊，當時反擊是需要的自衛，但進攻上海卻給英國藉口保護上海正式作戰。賴文光說：『忠王李秀成，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

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賴文光：自述。）忠王經營江浙，顯然與秀全計劃不合，被看作違反『君命』的自由行動。洪李間失和，雙方都該負責，但在力爭上游這一點，秀全並不錯誤。曾國藩稱『洪逆老於戎行』，足見反革命是認識他的。

李秀成於一一年六月，自湖北經江西攻入浙江，克浙東各府縣，十一月，克杭州省城，浙西相繼攻克，浙蘇兩省膏腴盡爲秀成所有。曾國藩稱：『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太平軍的聲威，確把一切反革命駭倒了，連曾國藩也動搖起來，要曾國荃遵旨去救蘇杭。國荃卻說『不然。金陵爲賊之根本，我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援護，而後可以圖蘇杭之地。』國藩因此又堅持原定計劃，派國荃到湖南添募新勇，準備進攻南京。滿洲主子西太后給國藩節制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軍政大權，並公開宣示『江浙等省軍務朕惟曾國藩是賴。』這是滿洲皇帝第一次對漢族奴才低頭，但這個奴才有誰可賴呢？當然他止有向外國侵略者屈膝依賴。

曾國藩的計劃首先依賴外國侵略者保護上海，說『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同治元年二月，遵旨通籌全局摺。）其次是想乘太平軍英勇抗擊侵略者的機會，從中取利。他說『臣處搜獲僞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爲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

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粤逆之會也』（三月，籌議借洋兵剿賊摺。）他又規定對洋兵應取的奴隸態度，說『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更無防範之方』（六月，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他那種對太平軍幸災樂禍，對侵略者奴顏婢膝的漢奸民賊思想，被一切反革命分子奉爲典範，李鴻章，左宗棠都依樣實行了。李秀成敍述當時漢奸軍『忠信篤敬』的情況說：『鬼兵到太倉攻打，外有清兵前來助戰，打入城者，鬼把城門。凡見清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官兵不敢與言，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但漢奸軍還有另一副兇殘面目，李鴻章與彭玉麟書說：『該軍（『常勝軍』）往往破賊，而不能多殺賊，故須我軍偕作，以輔其力之所不逮也。』這樣絕非人類所有的殘忍性，甚至戈登也以爲太甚，斥責李鴻章，鴻章的答覆是『此中國而非歐洲也。』這就是說按照中國統治階級的特性，應該瘋狂屠殺中國人民。不過這自然不是因外國反革命者如戈登那一類人對中國人民還有些人類同情心。李秀成、譚紹光（守蘇州主將）致戈登書說：『戈登桂（貴）台惠覽：頃接來信，知欲放出受傷諸人，以便醫治，並欲往來買賣槍炮，兼有回去之人，道及我處待人情誼，故來候函，具見桂台義重情摯……今者桂台之助清朝，亦猶白聚文之來我處，各從其便。至各人軍裝砲械，彼此皆知底細，你處圖利，我處置辦，聽從通商，原無禁令，此時你處如有槍炮洋貨，仍即照常來此交易，若或桂台肯到我處，我等亦樂共事……即或桂台一騎進城亦

無不可。』這裏說明太平軍行動文明，放回受傷俘虜，使戈登不敢過分殘殺太平軍，更重要的是軍火貿易，有利可圖，使他不願過度破壞太平軍。

李秀成佔領江浙，外國侵略者當然要武力干涉。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率淮軍八千人到上海，聯合英法軍，『常勝軍』開始對太平軍作戰。太平軍抗擊反革命聯軍，勇敢堅決，充分表現中國人民無限的英雄氣概。反革命聯軍有強大的力量：第一，英國、法國駐滬海陸軍，配備着當時最新式的武裝，有英法反動政府作後盾，聲勢最盛。第二，美國流氓華爾統率的『常勝軍』人數約五千，外國軍官約一百五十人，軍餉每年多至九十萬兩，每攻下一城，滿清酬華爾本人銀三萬或三萬六千兩（戈登攻下蘇州城酬銀八萬兩），將佐兵士得大掠城中財物人口，作爲酬報。『常勝軍』是一枝新式武裝的強盜軍隊，有居住上海的官僚、買辦、紳士、商人作主要後盾，這些人把華爾當作救星，大商人楊坊送女兒給他，鼓勵他的戰意。第三，李鴻章統率的淮軍是一枝屠夫軍隊，武器用外洋鎗砲，專跟在外國軍隊後補充殺人並接收土地。它有整個統治階級作後盾，被認爲江蘇方面的主力軍。這個聯合軍是反革命的結晶體，力量不容輕視，但李秀成却打了一連串的勝仗，不曾失敗過。聯合軍一敗於太倉，再敗於嘉定，三敗於青浦，法水師提督普羅帖戰場斃命，英法軍棄嘉定青浦兩城逃走，李秀成說『那時洋鬼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確是事實。不過戰爭勝利，並不能挽救南京的危急。

正當秀成在下游用兵，五月，曾國荃圍逼南京，紮營雨花臺附近。天王調秀成軍來援，秀成集諸將會議，議定『待二十四個月之後，再與曾國荃決戰，』天王急了，『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秀成被迫歸救南京，閏八月，親率大軍三十萬號稱六十萬進攻圍城軍，大戰四十六日，曾國荃死力抵禦，曾國藩飛調『常勝軍』應援，『常勝軍』不敢前來，形勢確極危急。秀成軍因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部下各王不肯齊心合擊，曾國荃得僥倖守住營壘。『自攻未下，我主嚴責革職，調我當殿明責，即飭我進兵北行，不得不冒雪而往』（李秀成自述）。當時上游反革命兵力薄弱，賴文光、陳得才在湖北、河南、陝西行動，聲勢浩大，洪秀全派秀成北進，會合賴陳軍，從上游來解除南京，原不失爲一個計劃。可是疑忌秀成過甚，既損他的威信，又奪他的兵權，調還秀成『手下各將，任王次兄洪仁達亂爲，』江浙留守軍無人調度，任其自行。君臣上下互相猜怨，離心離德，全局更接近瓦解的形勢。秀成率孤軍轉戰江北，進到安徽壽州。曾國藩定計『急爭金陵老巢，以攻其所必救，』同治二年五月，竭全力攻破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石壘。『那時京內驚慌，天王差官捧詔，召我（秀成）回京，當即分軍回轉，』軍士戰死、落隊及飢寒病死前後失去十數萬人，戰鬥力大受損傷。

南京陷落，這時候已經決定了。李秀成建議：『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棄城別走有

兩個方向。走向上游聯合賴陳軍、捻軍、回軍在北方發展，證以後來捻回的強大，建立新國不是不可能的。走下游佔江浙閩粵沿海各省，利用同情革命投効太平軍的不少外國友人，運入新式軍火，繼續抵抗反革命聯合軍，也可以支持危局。曾國藩深怕太平軍『變爲流賊，更難收拾，』足見秀成這一建議是可以實行而有效的計劃。在反革命方面，當時湘軍已是精疲力盡，矛盾到處發生。首先是滿洲主子對曾國藩的猜忌。曾國藩瀝陳餉絀情形片說：『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權利。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權利者，每遘奇禍，外畏清議，內顧身家，終夜悚惶，且憂且懼。』其次是湘軍本身腐化沒落，『臣帶兵九年，今年始有餉匱兵逃之事』（同治二年、曾國藩近日軍情並陳餉絀情形片）湘軍初起『用儒生將農人，今則所謂儒者不儒，農者不農』（湘軍志營制篇）。其三是新起的左宗棠老湘軍、李鴻章淮軍自成勢力，用兵各有企圖，單獨行動，不受曾國藩調度（湘軍志曾軍後篇）。反革命陣營有這許多裂痕，如果洪秀全聽從秀成的建議，自率一軍北進聯合捻軍，命秀成回江浙團結部屬，攻擊沿海各省，南北呼應，重振戰局，滿清必然驚慌失措。卽使調湘軍追擊，在滿漢矛盾下（北方清帥官文、僧格林沁地位比曾國藩高，仇視湘軍）曾國藩喪失漢奸信用，無法再施展湘軍的長技（湘軍失長江水師，又無馬隊，戰鬥力減去大半）無疑的要潰敗。可惜洪秀全疑秀成有異心，更着重提防內變，不放秀成出京，君臣困守危城，坐待滅亡，給左李在江浙方面順利地擊破各個

孤立的太平軍守將。

同治元年正月，左宗棠從安徽進入浙江衢州城（滿清在浙江唯一的城池），太平軍大將李世賢阻擊左軍，到六月，左軍還不能出衢州境。閏八月，世賢回援南京，左軍才得沿錢塘江進攻。浙江的失陷，左軍和江蘇李鴻章軍一樣，都是跟在外國反革命軍後面，做殺人、收地、擄掠的工作。外國反革命軍的取得勝利，却因太平軍失去李秀成的領導，各地孤立無援，軍心動搖，沒有整個戰守計劃，浙江失陷，不從左軍入衢州城開始而是從英法軍攻陷寧波開始。

左宗棠攻陷浙江省

同治元年四月，英法軍艦砲擊寧波城，英法陸軍聯合滿清寧紹台道張景渠所率海盜攻城，太平軍退至鄉間抵抗。李鴻章請華爾自上海率「常勝軍」往援英法軍，至慈谿縣（離寧波三十里）。太平軍擊斃華爾。

閏八月，花旗國副將法爾斯德輪船到定海，會同官兵民團合剿「海盜」（左宗棠：定海兵團會同輪船搜捕海盜情形片。）

十月，「法國因寧波海口吃緊，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帶兵防剿。該副將在寧波所需中國兵丁「千五百名應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常勝軍」舊章）支放」（左宗棠：發給勒伯勒東劄憑片引上諭。）

十一月，上諭『左宗棠、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可恥的名稱！）攻克上虞一摺……惟據法國公使哥士耆言及蟲城竟日，而城中絕無動靜，遣人往視，始知賊已宵遁。與此次所奏官兵奮勇登城，賊由西南逃竄情形不符。與外國人共事，全在乎以誠信，若稍有粉飾，即爲所笑，嗣後務須據實詳報，不得一字虛假。』反革命首魁曾胡左李部是這樣的一個騙子，止是這一次不幸被外國反革命揭穿而已。

同治二年正月，上諭『據李鴻章等奏，英國擬派白齊文、法思爾德會帶「常勝軍」法思爾德現任寧波防剿等語。花旗國副將法爾師德是否即法思爾德。』

正月，『署總兵勒伯勒東傷故後，洋將買忒勒繼之。臣飭蔣益澧一軍會同洋將進規紹興，密囑蔣益澧與洋將共事，惟守禮示信，勿計功攘利，致啓爭競之端』（奏報連復六縣情形摺）

二月，『上年勒伯勒東傷故後，法國參將買忒勒權受中國副將職任，來寧接帶該營兵勇。英國總兵唆樂德克親運大礮到營，會勤紹郡賊匪。正月初一日，唆樂德克、買忒勒帶領洋兵花綠頭各勇，車輪大礮徑攻西郭門，突有黑洋人五六十名助賊施放洋鎗，彈入買忒勒腦左，登時殞命』（查明法國參戰陣亡請卹摺）

五月，富陽久圍不下，增募外國兵助攻（湘軍志浙江篇）

八月，『迭次助剿最爲出力之英國領事夏福禮、總兵唆樂德克，法國參將德克碑、稅務司日

意格、教主田雷思等九員，臣細加考核、克復各城，外國官兵，實屬出力』（外國官兵助勦出力請酌賞物件片。）

八月，『楊政謨率水勇，德克碑率礮勇。此次中外官兵會攻富陽，其苦戰克城，以法國總兵德克碑爲最』（奏報克復富陽縣城摺。）據李秀成自述，鬼子兵攻破寧波得賞銀之後，又領賞銀來打紹興。錢塘江上游太平軍恐後路斷絕，陸續放棄金華龍遊嚴郡（今建德縣）温台等地，退屯富陽。左軍才得順流而下，請鬼兵由水路攻城，配合鬼兵礮隊，連戰數十仗，鬼敗，又調鬼兵多來，攻破富陽城。秀成自述與湘兵志符合。

十二月，『洋將德克碑帶花勇前來助勦，並令淺水輪船點放開花大炮』（攻勦杭州餘杭情形摺。）

同治三年二月，『德克碑開放大礮，轟坍城垛數丈』（附陳杭州餘杭攻勦情形片。）

三月，『法國參將德克碑此次助攻杭城，每次攻勦，極肯出力，杭城克復，實著勞績，臣籌給紋銀二萬兩，分散所部「常捷軍」出力弁兵』（洋將助克杭城出力擬請奬賞片。）

以上都是左宗棠勾結外國反革命軍（左與李鴻章不和，請法國人組織『常捷軍』與李對立）屠殺中國人民的一些自供，浙江人民就在這樣可恥的『中外官軍』共同的屠殺之下又被奴役了。

李鴻章攻陷江蘇省

華爾死後，美國人白齊文繼任。同治二年，英國人戈登代白齊文統率『常勝軍』用英國大炮五十二門會同淮軍陷常熟、崑山等城。九月，進攻蘇州，『江浙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回頭，銀不交足，過期不回者，依國法而行』（李秀成自述）秀成一蘇州堅守十二月，見內部有變，出城逃回南京。蘇州失陷。『常勝軍』乘勝攻陷約五十城，所謂淮軍的戰功就在跟着『常勝軍』大殺大搶。湘軍志說：『復蘇州時，主將所斥賣廢錫器至二十萬斤，他率以萬萬數。』容閎西學東漸記說李鴻章『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自然大部份是後來貪汚所得，不過在攻掠江蘇時，獲得大量財物，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曾國藩曾國荃攻陷南京

江浙一帶太平軍一部份堅守湖州城，大部份轉入江西境、秀成帶來守城軍人數不多，因爲南京食糧不能供給太大的軍隊。在危城中，秀全疑忌秀成更甚，城內居民饑餓，『賊盜蜂起，逢夜間城內炮聲不絕，搶刧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物。』南京無法支持了。同治三年四月，洪秀全服毒殉國。六月，南京陷落。轟轟烈烈的人民大革命同南京失陷而暫時失敗了！

李秀成奉幼主洪福衝出城牆缺口，不幸散失，洪福逃往湖州，秀成藏匿民間，奸人向清營告密，被曾國荃捕獲。曾國藩從安慶趕來，親自審問。秀成並無多言，止說『速將紙筆來，吾當書之吾

史館實錄，爲爾曹焚掠盡，吾不述，奚以傳後。』他在囚籠中寫天國始末、本人戰績數萬字。並不隱諱天國亡國的原因，也不隱諱本人對天王的不滿。這當然不是對敵人誹謗自己，而是想借最後一個機會流傳天國信史（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情事眞確』）給未來的革命人民留一悲慘教訓，用心是極苦的。萬惡的漢奸曾國藩既把洪秀全掘出遺體『戮屍焚化』，又把『萬古忠義』（天王寫四字封秀成）的民族英雄李秀成『凌遲處死，傳首髮逆所到各省，以快人（獸）心』（曾國藩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這已經是殘忍兇暴之能事，但曾國藩還要對死者行最後的侮辱。他不僅删去秀成自述至少一半，塗改字句不知若干，而且卑污到代造乞憐語句和什麽『招降十要』『天王十誤』。曾國藩明明說他『文理不甚通順』，而這些僞品恰恰文從字順，與眞品顯出兩手，又明明說『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逭，在途或不食而死。』秀成如果眞有乞降的意思，正可『誘以甘言，許以不死』，爲什麽怕他『在途不食而死？』曾國藩所代表的這類人，自己穢濁黑暗，却畏忌別人的清白光明，定要讓死人也蒙些不潔才覺快意，眞是狗彘不食其餘的可恥懦夫。

第六節　太平革命失敗的原因

太平革命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經濟、民族、男女四大平等

的革命運動。自從太平革命揭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陳勝、吳廣以下數千百次的舊式農民起義，面目爲之大變。太平革命是中國歷史劃時代的大事件，與五四運動同爲一百年來歷史上兩大轉變時代的標幟，它的光榮成就永不會廢滅，它的偉大精神也永遠在繼續和發展。

太平革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主觀方面，主要由於領導方面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歸納起來，有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安樂思想三種。

宗派思想

永安突圍以前，太平軍領導集團包括革命各階級各團體，從工人、農民到富農、流氓無產者、兵士、失意士人，某些政治上被壓迫的地主、豪紳、商賈；從新式的上帝會到舊式的天地會，團結在反滿旗幟下，展開廣泛的革命運動。永安到南京，勢如破竹，就是這個統一戰線的效果。洪大全死後，上帝天地兩團體開始分裂，失去一部份助力。定都南京以後，宗派思想繼續發展，第一，老兄弟之間的分岐。洪秀全爲首的廣東派與楊秀清爲首的廣西派發生裂痕，廣西派壓迫廣東派。例如智勇兼備的羅大綱，『嘗謂人曰，吾與秦日綱、胡以晃同起兵，功亦不相下，二人以廣西老兄弟故，皆封王，我以粵籍乃不得一侯，天下之事未有不平如此者，天王也自忘其爲花縣籍乎？秀清聞之，疑其有怨志，由是不敢以重軍付之』（太平天國野史。）又如多謀善戰的捻軍首領賴文光（秀全妻弟，）楊秀清忌之，不使聞軍事，授文職』

（野史。）文光自述也說：『六年秋，值國家多故之際，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咸豐六年秋，廣東派聯合廣西別派韋昌輝派殘殺楊派，韋派又壓迫廣東派，廣東派聯合殘餘的楊派屠殺韋派，造成極大的內訌，結果石達開出走，天國元氣大傷。第二，老兄弟與新兄弟的分歧。兩廣起義人稱老兄弟或老軍，享特殊權利，『天王倚為羽翼，雖無職，每加功勳。平湖（、胡）諸銜，有過亦不盡法懲治，而老兄弟恃功驕恣，任使多不稱其職，太平大局之壞，此一原因也』（野史。）『太平軍初入南京時，廣東、廣西人十分不過二三，湖南十有五六，湖北人十有二三』（祁嶲藻：賊情訪聞記，）後來湖北三江人數量大增，地位却在兩廣人下，自然引起不平之感。到太平末期，湘淮軍悍將多是太平軍叛徒，屠殺革命軍民比滿清將領更殘忍，這些人大抵出身新兄弟或楊韋餘黨，因怨恨不平投降反革命。第三，軍人與文士的分歧。賊情彙纂說：『賊擄我官吏紳衿，讀書有心計人，或挫折以死，或分為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又說『擄來書寫人，統稱先生，准穿長衫，着鞋襪。小館紮黑綢包巾，大館紮黃包巾，無腰牌號掛。』讀書人受俘虜待遇，地位比士兵低，多數乘機逃走或充滿清的間諜。至於著名文士如浙江人錢江，在永安城中已封『三法大司馬，』江蘇人王韜勸李秀成與洋人講和，專力攻擊上游曾國藩軍，廣東人容閎向洪仁玕建議七策（辦海陸軍營校，改進軍隊，建設善良政府；立各種實業學校及銀行等，）後都失意離開太平軍，轉到

反革命方面富謀士。第四，英忠兩王的分歧。英忠兩王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天國支柱，可是英王在上游苦戰，不向忠王告急，忠王也不出力援助，自向下游用兵，兩王間意見不一致，多少流露在秀成自述裏。第五，天王與英、忠兩王的分歧。楊韋內訌後，政權歸洪氏集團爲首的廣東派，對英、忠兩王取猜忌態度，大封列王九十餘人（實際不止九十餘人）使不相統屬，意在牽制兩王，指揮賞罰不能如意。英王在安徽戰敗，洪氏集團藉口防滑兵，封江阻他歸南京。玉成致馬融和等諭裏說：「今兄（玉成自稱）因偶爾見朝中辦事不公平，兄在廬郡具本啓奏，現下不以本章爲然，小事釀成大端。」又致扶王陳得才等四王書說：「去歲耘元燕之案，曾經兄直奏回朝，致觸聖怒，復命敬王，畏王恭捧聖詔三道，聖旗一道責兄前退太湖後退安省……罪皆在兄。現已荷蒙聖恩，出以賞罰革黜。思處此之時，亦是萬幸。」洪氏集團無理欺壓，使玉成處境愈感困難，然毫不見愛護扶助的意思。玉成殉國，李秀成獨力支持，洪氏集團猜忌更甚。「去年（同治二年）天王改政，要合內外大小軍營將相……稱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天兵、御林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我等稱爲我隊我兵者，責曰，爾有奸心。恐人之佔其國，此實言也，何人敢稱自兵者，五馬分屍」（李秀成自述）秀成守南京，「洪姓用廣東之人巡各門要隘，」「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滅亡在眼前，還事廣東、廣西的私見，宗派思想使人昏迷猜忌，至死不悟，這是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

保守

太平軍佔領南京，領導集團在思想上進取心減退，保守心轉居統治地位。在

思想

軍事上，北征，西征兩軍都派二等將領率領（北征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西征羅大綱、賴漢英、石祥貞、韋俊，）又不指定主帥，軍情全由楊秀清遙制，缺少全力進攻的精神。作制度上，採取許多封建舊習慣，例如太平禮制規定各種稱謂鄙陋可笑。禁人稱大哥，禁人用紅黃兩色，因大哥是耶穌專稱（秀全稱二兄，）紅黃是『天朝貴重之物』犯者處斬刑。官員都坐轎，天王轎夫六十四人，東王轎夫四十人，最下至兩司馬還有轎夫四人、東王儀仗隊多至千數百人，有開路龍燈等無聊器物，很像民間迎神賽會。又有野蠻禁律，如：

『一、凡東王駕出，如各官兵士迴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留。』

『一、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

這雖是軍律，並非強迫人民也跪道旁，但列王及大官對小官兵士的威嚴已經超過滿清的制度。咸豐一一年，頒佈欽定士階條例，居然恢復閥閱制度世襲制度，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在洪氏集團掌政時期，事實上是否還有若干存在，是很可懷疑的。

安樂思想

洪楊到南京，就大興土木，建築王宮。『楊逆起造僞天王府，周圍築牆，厚若城垣，高又過之，可以俯瞰城外。臣等於紫金山遙見甚明』（向榮奏報太平軍情）天王居深宮中，從不出門，也不朝見羣臣，生活腐化，中外各書所記大體相同，可信確是事實。楊秀清才能極高，腐化程度却不亞於秀全。韋昌輝『雖貴爲列王，常販運貨物以營利』

（太平天國野史）劉瑲林戒昌輝說：『共患難易，共富貴難，知此二語，乃免於難，』後來楊韋殘殺，原因就在『此二語。』洪氏集團統治時期，腐化發展到朽爛。仁發『貪冒聚斂，無所不爲；』仁達『嗜洋烟，』與仁發『貪貨黷法，狠狽爲奸；』仁政『時攜狡童，被艷服，往來於市；』仁玕『好使酒，矜意氣，忌賢殊甚。』這樣一個酒、色、財、氣的無賴羣，把持政權，李秀成對洪姓痛心疾首，陳玉成認朝政不公平，完全是有理由的。不過太平軍將士生活，與一般領導者相反，始終保持良好的紀律。楊秀清『令嚴軍民畏』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却能以身作則，阻止軍隊腐化，所以若干領導者的墮落，並不減低太平軍的聲譽，不然就無法解釋人民擁護太平軍的原因了。

宗派、保守、安樂三種思想，總根源在農民階級消極方面的狹隘性、保守性、私有性。太平軍領導集團的腐化分裂，正是這些特性的反映，也就決定了太平天國的必然崩潰。

除去上述主觀方面必敗的原因，客觀方面也不允許它取得勝利。如果說，太平軍也曾有過可能勝利的機會，那就是佔領南京以後兩三年內，全力進攻北京，迅速摧毀滿清政府，當時英法美與滿清勾結還沒有成功；事實上不得不承認天國政權，不管天國此後如何變化，萬惡的滿清總是可以消滅了。失去北征這個時機，太平天國不可能獲得最後勝利，原因是：第一，滿清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逐漸結合，反革命勢力壯大起來，力量超過革命勢力。第二，那時候中國不曾有進步階級的存在，農民階級不得進步階級的領導就無法負担民主革命的任務。太平天國在主

觀客觀兩方面都缺少勝利的條件，北伐是唯一的機會，又因戰略指導錯誤而失敗。所以，歷史決定這個革命止能起着民主革命先驅者的作用。

第七節　太平革命的餘波

南京陷落了，洪秀全、李秀成殉國了，太平天國滅亡了，但這並不等於革命消滅。相反的，中國人民還是堅持巨大的革命鬥爭。

天國滅亡後，還有下列革命力量：

太平軍殘部（一八六四年至六五年）

捻黨起義軍（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至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

苗族起義軍（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

雲南回族起義軍（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西北回族起義軍（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太平軍殘部

李秀成最後一次入南京，浙江方面止保有湖州（守將黃文金）等數城，大部份軍隊如李世賢、汪海洋等十餘部都轉入江西境。秀成殉國，各將領無人指揮，大體分成湖州軍與江西軍兩大部。

同治三年六月，淮軍、老湘軍、『常捷軍』會攻湖洲，『英國將（官）發礮以攻屯，不能克，』『英國將遇寇戰輒敗退』（湘軍志）。七月初，黃文金遣弟黃文英護送幼主洪福到安徽廣德縣，準備守城大戰。七月底，叛將蔡元隆勾結南門守將投降清軍，文金棄城奔廣德，奉洪福轉戰皖浙邊境，文金戰死，殘部入江西，洪福被江西清軍捕獲，湖州軍敗散。洪福在南昌被殺，太平軍更失中心，九月，李世賢、汪海洋等攻入福建，擊斃湘軍大將張運蘭、福建提督林文察，民衆羣起響應。李世賢駐漳州，汪海洋駐汀州，衆號廿餘萬。滿清急調左李曾（鮑超部）三軍配合外國海軍攻福建，清軍屢敗，左宗棠請廈門英法領事嚴密封鎖海岸，斷太平軍運入軍火。同治四年二月，汪海洋率軍攻入廣東鎮平縣（蕉嶺縣）。清軍全力圍漳州。世賢向海洋求援，海洋不應。四月，世賢棄城走永定縣，與清軍戰大敗，逃匿山中、軍中訛傳世賢戰死，餘衆推李元茂率領歸汪海洋。海洋陰謀併吞李部，殺元茂示威，軍心不服。七月，世賢自山中晝伏夜行到鎮平，海洋大驚，夜中刺殺世賢。太平軍與清軍相持，十二月，清軍圍嘉應州（梅縣）海洋突圍戰死。餘衆推譚體元守城，繼續突圍，清軍四面進擊，體元戰死。清軍登山大呼『棄械者免死，』太平軍失主將大潰亂，被清軍斬殺兵士五六萬人，將官七百三十四人。湘軍志說：『自寇起至破滅，未嘗見斬刈如此之易，』原因很顯然，汪海洋殘殺李世賢，將士離心，鬥志消沉了。太平軍經過這次大殲滅，嫡系軍隊，喪亡已盡，南中國全部被滿清征服。

石達開對曾國藩、胡林翼，因楊韋內訌而失利，李秀成陳玉成對曾胡及李鴻章，因洪氏集團猜忌而失敗，李世賢對左宗棠，因汪海洋吞併而殲滅，宗派思想的危害，斷送了太平革命，眞是可怕極了。

捻黨起義軍

捻黨是山東、河南、安徽等省農民一種祕密結社的名稱，太平軍攻下南京，捻軍大起，各部數千人數百人不等。太平北征軍戰敗，殘兵散入捻黨，捻勢漸強。首領張洛行據雉河集（安徽渦陽縣）衆增至數十萬，最稱大部。李秀成招洛行助戰，捻軍蓄長髮接受太平軍紀律，大得民衆擁護，成爲太平軍的北方友軍。後來陳玉成在皖北大戰，得捻軍助力極大，洪秀全封洛行爲沃王。玉成敗後，部將賴文光、陳得才率孤軍渡淮，『過王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一年冬（同治元年）由鄖陽而進兵漢中，一路滔滔，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於甲子十四年春（同治三年）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師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離散』（賴文光自述）。當時張洛行戰死（同治元年被叛徒謀害）捻軍失統帥，『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期報效』（賴文光自述。）這說明什麼呢？第一，安慶失守以後，湘軍全力下注，北方兵力空虛，文光、得才帶領一枝小軍隊，經過安徽、河南、湖北、陝西四省，變成數十萬人的大軍，足見北方雄厚的革命力量太平軍未能充分利用；第二，北方革命羣衆需要太平軍領導，南京方面如果及早派遣大將數人發動捻軍，攻湘軍

後路南京城圍可能減輕。等到文光被推爲首領，捻軍已是孤軍，文光自述也看到『恐獨立難持，孤立難久』了。

文光統率捻軍，聲威大振，清軍不敢接仗。同治四年，在山東大破清軍，殺清帥僧格林沁。滿清大驚，調曾國藩督湘淮軍抵禦，曾國荃率新湘勇駐湖北。捻軍深入湖北，擊潰國荃軍，新湘勇全部殲滅。國藩督戰無功，退回兩江總督原任，滿清改調李鴻章督戰，淮軍全用洋式武器，捻軍止有刀矛，但捻軍有民衆擁護，萬騎奔騰，一日行百數十里或二百里，往來自如。曾國藩奏稱：『官兵騷擾異常，幾自賊過如篦，兵過如洗之慘，民圩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恕詞，即從賊亦無愧色。』這個民賊的供辭多少洩露一些統治者的罪惡。五年秋，文光感到孤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洛行子）懷王邱遠才前進甘陝，往連回衆以爲犄角之勢』（文光自述），自此捻軍分東西兩部。賴文光、任化邦率東捻軍攻山東，張宗禹等率西捻軍攻河南轉入陝西。滿清又調左宗棠老湘軍抵禦西捻軍。六年，任化邦戰死。七年春，賴文光被捕殉國，東捻軍潰散。西捻軍自陝西入山西，轉攻直隸，清廷大駭，派恭親王奕訢（咸豐帝同母弟）督旗兵迎敵，湘、淮軍、安徽、山東各省軍追蹤北上，直隸民衆沿路襲殺清兵，千數人小隊不敢行鄉間。左宗棠給他的兒子信裏說：『直隸之大（名）順（德）廣（宗）一帶，與山東河南接壤，各處民團兇悍異常，專以兵勇爲仇，見則必殺，殺則必毒，似此光景，成何世界。淮軍驕逸習氣，實冠諸軍，皖軍戰不足恃，東軍弱不勝戰，僅我

軍士馬一萬九千，尚未至大壞耳。』照左宗棠自供，大軍所謂『官軍』的賊匪燒殺淫掠，試問成何世界？人民見賊匪必殺，試問是否是合理的自衛？左宗棠一類民賊所造成的世界，無疑是人民的地獄，這不是明顯的事實麽？西捻軍寡不敵衆，七年秋轉入山東，徒駭河水漲不能渡，西捻軍被殲滅。捻軍起義凡十六年，戰爭地區經江蘇、安徽、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山西、直隸凡八省。

苗族起義軍

貴州東南部（榕江、台拱爲中心）是苗族居住地，雍正、乾隆時侵略苗疆，設官吏治苗民，稱爲『改土歸流。』苗民所受的痛苦，可在羅應旒的奏摺裏稍見一二：

『苗疆定後，尚有土司（苗族中貴族）通事（苗奸）其人助官爲虐，挾其詐力，朘剝無已。一切食米、煙火、喪葬、娶嫁、夫馬供應之費，無不取之於苗民。此外，又復千百其術，稍事勒索，不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機絕矣。

苗民納稅本輕，或不出稅，而官吏則以民願報効，不敢領價，勒索民物，均由土司通事辦理，官收其一，而土司通事則增數倍。

苗民例須供役，平日攤班，及至委員過境，或官吏下鄉，則合境應役。其不至或無役者，折錢二三百文，否則拘罰至數倍。苗民貧困，乃於役前數日裹糧守役，男病女役，官吏待之一如牛馬。其尤令苗民恐慌者，則客民入境，奪其田地，而相仇恨也。』

苗民在滿淸官吏、漢族地主、苗族土司、通事等的聯合壓迫下，生活還不如牛馬，他們屢起正

義的反抗，決不是所謂「野性難馴，」相反，他們是有公正合理的民族精神的。湘軍志載「羣苗」的信條說：

「吾誰不知何者爲友，以兵來則戰，以好來則撫（和，）飢則掠，怒則殺耳。吾不擾官，官乃擾吾，唯有強者勝耳。」

滿清置貴州防兵一萬七千人，就是不採取「以好來則和」而決心「擾」苗的表示。湖南巡撫李瀚章說：「究其始禍，無不由漢民之欺凌官吏之貪暴」。但始禍之始禍，歸根還由於滿清挑撥民族仇恨的卑劣政策。

咸豐四年，苗民受太平革命的影響，推張秀眉爲首領，起義反抗滿清，攻取城池。五年，出境攻湖南邊境。官吏派兵屠殺，「因亂株連良懦，皆悔其不反，」起義軍勢力更盛，滿清調湘軍、川軍、桂軍以助貴州軍，苗民也聯合漢民協力對抗。漢民有貴州、廣西的會黨，有思南的天主教民（教民分三部，思南爲白號，銅仁爲紅號，思州爲黃號，）苗、教聚衆至數十萬人。九年八月，石達開軍入貴州，苗、教紛起響應，合力攻擊清軍，省城貴陽危急，清官困守孤城，政令不及數十里外。苗、教軍出入廣西、湖南、雲南三省，以湘軍爲主力的清軍守壘不敢出。「苗以此幷輕湘軍，當入寇，輒叩壘門呼曰：吾當往攻汝湖南矣，既掠歸，復謝曰，多擾汝」（湘軍志。）當時清廷深怕石達開率苗、教軍攻入湖南，邊境屯防兵，無力進攻，達開志在入川，苗、教「無遠略，」戰事中心不離貴州境。

同治四年，滿清合四川湖南兩省財力，進圖貴州。六年，調湘軍席寶田專任軍事，席寶田是湘軍著名悍將之一，有惡毒的戰爭經驗，又用洋槍炮便於攻山寨，張秀眉『語羣苗曰，苗疆危矣，往日官軍敗則走，今深入尋戰，此癡軍也。汝曹謹備之』（湘軍志）。寶田合各軍攻荊竹園險要，七年，被攻破，『白號、黃號教及石達開餘黨俘斬略盡，言黔事者皆驚喜以為奇功』（湘軍志）苗教軍從此失勢，專依山險取守勢。寶田又採『雕勦』法，選精兵入深山奇襲，燒燬苗民糧草，一面誘降苗寨，分化苗、教軍，雙方惡戰到同治十一年，張秀眉戰死，苗民起義才被鎮壓下去。

滿清屠殺苗民，幾乎盡滅苗民的種類。湘軍志：『苗砦存者十之二，皆良苗，其能劫掠精壯者殆盡。』席寶田傳（先正事略）：『拓地千餘里，破寨千數，殲苗及百萬，自有三苗以來，兵威所及，未有至此者也。』貴州巡撫黎培敬：籌辦善後摺『黔省兵燹垂二十年，百姓存者不及前之十一』。

雲南回族起義軍

回族與漢族雜居，滿清挑撥民族惡感，尤着重在漢回兩族。法律規定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實際是『回傷漢民，一以十抵；漢傷回民，十以一抵。』官吏審斷辭訟，總是『護漢抑回』，故意造成兩族間不平等，滿清得從中操縱取利。

雲南回族，相傳元初隨蒙古軍遷來，到滿清時代，人口不及漢人十之二三，但團結力極強，不斷與漢人衝突。咸豐五年，回漢爭奪礦產，總督恆春、巡撫舒興阿乘漢回互殺，密令大殺回人，省城回人被殺數千，永昌被殺八千，其他州縣同樣殘殺。回民首領杜文秀等起兵反抗，攻佔大理府。清

政府派吳振棫帶四川兵入滇查辦，奏稱紳士黃琮倡議『滅回，』激起事變，把黃琮革職，這當然欺騙不了回民，戰爭繼續擴大到全省。清政府誘降回民首領馬德新、馬如龍，借回殺回；又派廣西土司岑毓英帶苗傜兵攻回，殺戮極慘。同治一二年，文秀戰敗。岑毓英宣稱投降免死，回兵動搖，文秀自殺家屬，吞鴉片到清營求免殺回兵。毓英立斬文秀頭，縱兵大燒大掠，大理及各縣城鄉回人全被屠洗。總督勞崇光奏稱『沿途察看地方，殘破不堪，田畝拋荒。』清政府賞岑毓英『輕車都尉』的爵位，報酬他殺回的功勞。

西北回族起義軍

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回民與新疆東部回民同屬東干族，宗教上有黑山（舊教戴黑帽）白山（新教戴白帽）兩派。滿清故意護漢抑回，又助舊教抑新教。咸豐一一年，太平軍陳得才攻入漢中，陝西回民乘機響應。回漢兩族不懂得自己同被滿清愚弄，一開始就互殺起來。西安、大荔一帶二三十縣回漢死亡（多數是漢人）不下數十萬人，清帥多隆阿藉口『護漢』屠殺史家河回民，六十里內全成白地，反滿力量因分散削弱了。同治五年，西捻軍入陝，聯絡回軍，捻回勢力才擴大到陝北，甘肅回民起兵接應，左宗棠的對策是『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駐重兵陝西耀州，『防捻回合勢。』當時捻軍自南而北，回軍自西（甘）而東（陝）縱橫各千餘里，陝北成兩軍交匯點，往返游擊，左宗棠軍疲於奔命。六年，西捻軍自宜川渡河入山西，左宗棠率軍追捻軍。八年，左宗棠回陝，

西，全力進攻陝甘回軍，當然，回軍是力不能敵的。

左宗棠對回民的認識是『其人柔則狡詐，剛則桀驁，知畏威不知懷德，性與人殊』（與吳小濤書。）這就是說，回人非人。因此定出『回性犬羊，先撫後剿』的辦法（十月，遵查劉松山各情覆陳摺。）所謂先撫，就是誘降回民，所謂後剿，就是屠殺降回，與『我能剿，彼乃甘心就撫』的思想一致，用兵目的在殲滅看作『犬羊』的回民。

左宗棠先驅回民到陝北，大屠殺後，進攻新教中心地金積堡。教主馬化龍哀求投降，宗棠堅決不許。連清政府也認為不分良莠『濫殺激變』（清政府不是愛惜回人而是感到每年八百萬兩軍費太巨，）嚴諭責問，宗棠仍主張『痛剿以服其心』要求西太后允許『痛剿』。九年，陝甘回軍反攻大勝，殺左宗棠『右臂』劉松山，一路南下到蒲城、富平、大荔一帶，全局大震。西太后大怒斥責，宗棠死力攻金積堡及其他回寨，回軍也英勇抵抗，『堡寨將破時，先刃其家屬，或投諸水火，乃解衣格鬥，死而後已』（十月，合圍金積老巢首逆被創摺）宗棠窮極無法，止好允許馬化龍投降，令化龍招各地回軍來金積堡繳馬匹軍械就撫。十年，回軍到齊，宗棠突然縱兵大殺，不留一人。他給兒子信裏說：『不宜少留根荄，重為異日之憂』給王孝鳳信裏說：『金積事了，其乾淨斛貼，較之東南諸役，尚似信心。』這就是所謂『先撫後剿』，平生殺人最快意的一次。

他得了這次可恥的大『勝利，』大軍一路向甘肅、青海殺去，到同治一二年九月又用『先

撫後剿』去攻破肅州城，縱兵大殺掠。與友人書說：『肅城克復，首要各逆，實無一漏網，土客、各回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婦女概免誅，數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爲最妥善。』所謂老弱婦女免死是騙人的，他在奏摺裏明明說『環視屍體枕藉，卽老弱婦女亦頗不免』也還是騙人的，總之，殺人到無可再多，他才認爲『最妥善』，而且認爲『漢唐以來未有之奇』，想見他當時的得意。經這次最後一城的屠洗，西北回軍連同回民大體被他殺光了。左宗棠利用漢人仇回心理、互相慘殺，據他的自供有下列結果：

『陝回竊據以來，遠近城邑堡寨，慘遭殺掠，民靡孑遺。平（涼）慶（陽）涇（川）固（原）之間，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爲天下所無』（八年四月，追剿逆回大勝摺。）

『甘肅漢回雜處，昔本漢多於回，今則回多於漢。寧靈一帶周數百里，漢民幾無遺類，其產業婦女均歸金積僕。老弱死亡，壯丁爲其傭工佃雇，漢民之痛心疾首，抑何怪其然』（十月，遵查劉松山各情覆陳摺。）

『以陝回人數計之，從前無事時，散處各州縣丁，奚啻數十萬，現計除西安城中土著兩三萬外，餘則盡族西行陝西別無花門遺種。卽令金積河狄西寧涼州等處現剩陝回計之，人口亦不過數萬。其死於兵戈疾疫饑餓者蓋十之九，實回族千數百年未有之浩劫』（九年七月，收撫回民安插耕墾摺。）

『肅州城中漢民三萬餘人，被回民先後殘殺，城破時，男女存者僅千一百餘口』（左宗棠年譜。）『肅州土客逆回，業已辦結，現在肅州實無一回羼雜。其甘州，涼州各回死亡殆盡，亦無遺種，從此關內（陝甘）

外（新疆）花門勾結當無可慮』（十二年十月，安插肅州老弱回民片。）

回漢互殘，滿清獲利，各民族人民應當牢記住這個血腥的教訓。

捻軍、苗軍、回軍都是反滿的力量，太平軍領導不能及時聯合協力作戰，終於被滿清各個消滅，民族革命必須依靠廣泛的統一戰線，這個教訓也是永遠不可忘記的。

第八節　反革命破壞下的中國社會

太平軍，捻軍都有良好的紀律，就是反革命渠魁曾國藩、胡林翼也偶爾洩露出這個事實。苗軍，回軍仇殺漢人，行動殘暴，但主要責任仍在滿清的民族政策，苗回止負被動的責任。太平軍，捻軍戰鬥的地區，被反革命破壞到什麼景象呢？照那些渠魁們說：

江南情況

『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編葦結茅，棚高三尺。老幼相攜，草根掘盡，則食其所親之肉。徽池寧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曾國藩。）

江北情況

『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同上。）

『舒廬六壽鳳定等處，但有黃蒿白骨，並無民居市鎮，或師行竟日，不見一人』（同上。）

江蘇情況

『查蘇省人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雞犬相聞。今則一望平蕪，荆棘塞途，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李鴻章。）

『常州之江陰、無錫、金匱各縣城鄉村市，一片焦土，徧地黃蒿，行終日而不見人，偶遇二三難民，露處殭餓，日夕待死，慘苦不堪』（同上。）

浙江情況

浙江此次之變，人物凋耗，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殘黎喘息僅屬者，晝則擷野菜爲食，夜則就土牆以眠。有骨肉死亡在側，相視而漠然不動其心者（左宗棠。）

江西情況

『余走彭澤，東流沿江數百里，人烟寥落，不聞雞犬聲，惟見飢民殭斃道相屬。』（周馥）

豫東情況

『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皆無人煙，賊過之區，糧食農具聚而焚燬，輪奸婦女，卽老婦亦不能免』（豫軍紀略。）

陝西情況

『西同鳳三府地最沃饒，今土地之開墾者十不二三，而人民之死亡者十居六七，或行數十里不見一椽一屋一瓦之覆，炊煙盡絕，豺貛夜嗥，氣象殆非人境。』（劉蓉。）

這種悲慘的情況，是誰造成的呢？反革命自然全部推給太平軍、捻軍。但是曾國藩在同治

二年二月不是對滿州主子這樣說麽？『粵匪新興，粗有條理，傍江人民安之若素。今則民間賊至，男婦逃避，顆粒無收……』這裏所謂今，當然指同治二年前後，咸豐一一年太平軍失去安慶以後，兵力不達『傍江兩岸』顆粒無收的大破壞，明明是湘軍燒殺搶掠的結果，與太平軍無涉。下游方面李秀成軍紀律，外國反動者也認爲『奇嚴』他連宰耕牛都嚴厲禁止，爲什麽要破壞生產？江浙兩省白骨如山，田園荒蕪，不出於屠夫李鴻章、左宗棠，而出於禁宰耕牛的李秀成，誰能相信道種鬼話？曾國荃有『田一百頃』『湘軍將士爭求從軍，每破寇所虜獲金幣珍貨不可勝計，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資殆百數』（湘軍志籌餉篇）還說部下猶未大掠，這些巨大財物，難道是人民樂捐的？捻軍如果是『輪奸婦女，老婦不能免』爲什麽『山東民團相聚拒殺官軍』『湖北民大失望』『直隸民患之，相約格殺，日有狠鬥，戎服乘馬者十餘人猶不敢經行，枉殺者不可勝計』（湘軍志平捻篇。）難道北方人民喜歡捻軍『輪奸婦女』，反對保護他們的『官軍』麽？

曾國藩與友人書說：『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衆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於此乎！』這些話必需改爲『受害於兵者十之七八，受害於革命者亦有二三』那就近乎事實了。

從一八五〇年太平軍起義到一八七三年回軍消滅前後凡廿四年中國本部十八省全化為戰場，革命和反革命鬥爭的規模是空前巨大的。反革命在戰鬥中獲得勝利的結果，社會生產力大破壞，中國進一步變為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雖然遭受挫折，却給後人留下寶貴的革命教訓。

第四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至一八六一年（咸豐一一年））

第一節　緒言

第二次鴉片戰爭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擴展和深入。發動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外國侵略者結合中國封建勢力共同撲滅中國人民革命的火焰。這個火焰要燒燬滿清統治也要延燒侵略者在南京條約上搶得的特權。狡猾的侵略者採取戰爭手段來促迫愚昧頑固的滿清政府覺悟到進一步結合的必要。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中外反革命結合過程的具體表現。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對着英法美俄四個外國侵略者。滿清政府却把南京條約叫做『萬年和約』，自信是『一勞永逸之計』（道光帝批准南京條約的上諭）。滿清政府在經濟上雖然開始依賴外國（關稅及鴉片非法收入），但在政治上隔離還很遠，因爲除了通商口岸，內地仍保持閉關政策，利用條約阻止外國勢力的伸入；鎮壓小規模的人民起義也無須外國勢力的援助。這種形勢，到太平革命軍佔領南京才發生了變化。

四個侵略國各抱野心，待機進攻。其中英國據南方，從海岸向內陸；沙俄據北方，從大陸向海

岸；扮演侵略的主角。法美從海上來，勢力遠不敵英國，扮演侵略的配角，四國對華情況大體如下；

英國——南京條約訂立後，英國商人對中國市場發生異常興奮的情緒。一個有名的商行向華輸出大批刀和叉（食具），並聲明它決計把這種商品供給全中國。另一個極著名的商行向華輸出了大批鋼琴。它們出賣商品所得的金錢，幾乎連運費都不能抵償。毛棉織品也同樣遭受厄運，在開放五口的時候，曼徹斯特盲目地作了一番極大的努力，可是這番努力落空了。這個世界紡織中心的城市，陷入蕭條狀態中，只好希望偶然碰到機會來挽救自己。一八四七年下院會選出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中英貿易的狀況，調查的結果認爲：「貿易上的困難之所以發生，由於用銀子來支付鴉片，使華人底一般貿易遭受巨大的損失，而絲和茶事實上則應抵償其餘商品底價值。」一八五〇年亨氏商人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文說：「究竟那種貿易應被取消——鴉片貿易呢，還是英美商品的出口貿易呢？」顯然，華人不能同時購買毒藥又購買商品，「鴉片買賣之增加和西歐工廠製造品底銷路成反比例，」英國政府完全懂得這個原理，但決不願放棄飛躍發展的鴉片買賣，它在第一次戰爭中獲得了充足的經驗，相信戰勝滿清軍隊、強迫交出大宗權利是輕而易舉的事。這種自信，鼓勵它進行同樣的新試驗。

英政府一面盡量擴大鴉片貿易，一面竭力尋覓暢銷工業的方法。它相信一種空想的公式，以爲「商業的發展與開作商埠的港口數量成正比例，」因此要在南北海疆及長江沿岸開闢

更多的商埠。它又相信一種實際的經驗，就是英國使用政治權力和經濟勢力，破壞了印度的舊生產方法（印度和中國都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的生產方法）收得廉價商品消滅手工紡織的效果。因此它害相思病似的要進廣州城見總督進北京城見皇帝，企圖在廣州、北京伸張自己的政治影響。最後它還相信一種慣用的辦法，就是以海盜行爲來輔助營業精神，向中國勒索軍事賠款來彌補自己商業的入超。恰巧太平革命軍到達南京，引起西方列強的震動。英國爲首的外國軍艦準備在上海、南京以及運河口等處安定「秩序」，藉以扶助搖搖欲墜的滿清政府，扶助的報酬自然是政治上，經濟上各種特權。

法國——法國對華貿易，每年貨船不過一、二隻，說不到經濟侵略。道光二四年迫滿清訂約承認傳教權，在海口設立天主堂，教士私入內地傳教，專力進行精神侵略。它要取得內地傳教的合法地位，又沒有商業上的顧忌，因之侵略行動特別露骨，天主教士迅速與鴉片煙同成侵略中國的兩大先鋒。

美國——美國需要大量茶葉和相當數量的絲，中美訂約後，每年平均輸入二百萬英鎊的中國商品。一八五五年，輸入華貨增至五百三十九萬英鎊，輸出二十七萬英鎊，差額極巨。支付方法是美國輸送棉花至英國，英國輸送布匹至印度，印度輸送鴉片至中國。它的商業地位決定它對滿清盡量保持僞善的溫和態度，一面追隨英國之後，援例要求，均沾侵略的利益。在扶助滿清

反對中國人民革命的時候；它的態度甚至比英國更積極些。因爲英國反對中國人民革命，但也反對滿清政府頑固，美國總在別國成功以後援例獲得同等的利益，這樣的政府它自然是滿意而予以援助的。

沙俄——沙俄在地理上鄰接滿洲、蒙古，陸路通商有二百年歷史，在外交上沙俄使臣不否認朝貢名義（從康熙年間起），與理藩院辦理交涉，比英法美佔極大便利。它援助滿清，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獲得航行黑龍江並在邊疆區域自由經商的權利。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它奪取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及東三省黑龍江南岸的大部份土地，還裝做公正保護者，充當北京條約的中間人，勒索滿清的酬謝。英國發明對待滿清的方法是『華人難與說理，惟臨之以威，可以惟我所欲爲』（咸豐四年江蘇巡撫許乃釗奏報上海英新聞紙論文。）沙俄利用英國採取這個海盜式的襲擊方法，自己表示中立態度，使滿清政府不能不向沙俄實行那些它本來不願意實行的讓步。英俄是侵略中國的兩大主角，外交上沙俄却常佔優勢。

當時歐洲列強間相互衝突，達到那樣緊張的程度，就是要動用武器和使用最後手段。歐洲各首都每日都有消息，今天說世界戰爭快要爆發，明天又說和平有了保證，過了一星期又說起戰爭來了。總之，歐洲局面是很不安的（一八五三年馬克思：論中國的和歐洲的革命。）太平革命的發展，不僅引起鴉片、絲、茶、毛棉織物市場的縮小，而且這種縮小將引起歐洲工商業的危機，

轉成革命和戰爭。英法美在華艦隊援助滿清政府鎮壓太平革命，同時索取各滿其意的報酬，收復並擴大中國市場。它們的願望如此，但滿清統治集團分成兩派，對外國的願望意見不同。一派是頑固派，在北京以咸豐帝、恭親王奕訢爲代表，在廣東以葉名琛爲代表。一派是洋務派，以曾國藩爲代表，比他稍前，還有不少上海、江蘇買辦化的官紳，兩派都是封建勢力，區別只在買辦成份的多寡。大抵頑固派疑忌心超過依賴心，洋務派依賴心超過疑忌心。開始頑固派掌握大權，拒絕外國援助，經第二次鴉片戰爭三次失敗的教訓，頑固派分化，一部份轉化爲洋務派，積極要求外國武力的直接援助。恭親王奕訢就是這一部份的代表人。

第二節　頑固派第一次失敗——廣州失守（咸豐六年九月至七年十一月）

道光二九年香港總督文翰要求進廣州城，被昇平社學十餘萬人威力制止，文翰恐懼，訂約永遠不進廣州城。總督徐廣縉，巡撫葉名琛冒功封爵，大得清政府信任。咸豐二年，葉名琛升任兩廣總督，自以爲尊貴無比，侮辱外國人，每接交涉文書，略寫數字答復，或竟不答，自稱「雪大恥，尊國體。」英人受辱後謀乘機報復。

平英團、昇平社學的反抗外國侵略，道光帝、耆英早就合謀，企圖用會黨土匪等罪名殘殺反英人民。太平軍起義，以一百三鄉爲中心（首領李文茂）廣州附近各府州縣民衆發展反滿武

裝鬥爭。反滿軍有司馬、先鋒（太平軍作衝鋒、）總統、都督等軍官，當是天地會採取某些太平軍制度的組織（統治階級稱爲紅巾賊或紅頭賊。）它聲勢浩大，但不能統一行動。葉名琛利用一部份地主豪紳領導的團練實行血腥鎮壓，下令各府州縣：『凡通匪者，不論過去現在，一律格殺勿論。』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的西學東漸記裏有一段記載，寫廣州刑場的慘狀，節錄如下：

『一八五五年，粵中適有一暴動，彼兩廣總督葉名琛者，於此暴動發生之始，出極殘暴之手段以鎮壓之，意在摧殘方茁之花，使無萌芽之患也。統計是夏所殺，凡七萬五千餘人（前後共殺十餘萬人，）以予所知，其中強半皆無辜冤死。被殺者有與暴動毫無關係，徒以一般虎狼胥役，敲詐不遂，遂任意誣陷，置之死地。葉之戮人，不訊口供，捕得卽殺，有如牛羊之入屠肆。刑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屍，縱橫徧地，任其暴露於烈日之下。刑場四圍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地上之土，吸血旣飽，皆作赭色，餘血盈科而進，匯爲汚池，後聞於城西遠僻處覓得一極大溝渠，投屍其中，任其自然堆疊，以滿爲度，無需人力更施覆蓋，以屍中血色之蛆，已足代赤土而有餘，不令羣屍露少隙也。此種情形，非獨當時覩者酸鼻，至今言之，猶令人欲作三日嘔。』

這都是容閎親身見聞的事實。這個近百年改良主義路線的創始人也不禁『自刑場歸寓後，神志懊喪，胸中煩悶萬狀，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憤懣之極，乃深惡滿人之無狀，而許太平天國之舉動爲正當。』葉名琛惡魔野獸般的殘忍性和廣東人民遭受毒手的慘苦情形，得容閎這一記

載流傳下來，而統治階級的著述却把葉名琛寫成『生平宅心忠厚，』『三元里紅頭賊起，勢猖甚，公晝夜督剿，收復二十二屬，疆臣負才名赫赫有建樹者，公其尤也。』

葉名琛屠殺廣州人民十餘萬人，省外各屬被殺至少也不下一二十萬人，平英團及其他革命勢力大受摧殘，李文茂等率餘部攻入廣西，江西，響應天平軍，一部份民衆逃入海島，英國海軍圍海島脅降，載回香港，日夜訓練，準備進攻廣州。當起義軍勢盛時，曾圍困廣州城。廣東洋務派勾結香港總督鮑林，建議借『洋人力禦寇，』葉名琛特有地主豪紳領導的團練，拒絕洋務派建議。鮑林眼見人民反英武力已不存在，決計發動軍事行動來完成進入廣州城的志願。這種行動有英國內閣的秘密訓令作根據，因之毫無顧忌，積極求達到目的。

咸豐六年九月，廣東水師在亞羅號船上逮捕水手十三人，亞羅號曾購得香港英商通航證，現在期滿，已無權懸掛英國旗，純粹是中國船隻，駐廣州領事巴夏禮認爲示威的良機到來，宣稱水師違法捕人並侮辱大英國旗及領事體面，強硬要求放回十三人，並對英國謝罪，限二十四小時滿意答復。葉名琛置之不理，鮑林命海軍進攻省城，沿岸炮台守兵不戰潰散，葉名琛號召四鄉團練入城守衛。英軍本爲恐嚇性質，並非有意開戰，目的在藉口面議，英官乘機進城。不料葉名琛不允英官入城交涉，又不允自己出城相見，鮑林反覺進退兩難。十一月英軍一千攻近城炮台，守城兵勇團練數萬人出城燒十三洋行，毀滅英美法商館。英兵燒城郊民房五千棟，退出虎門，勸法

美共同出兵，壓迫滿清政府修改條約。

亞羅號事件傳到倫敦，英政府乘機鼓動戰爭，宣稱：『我們的國家遭受了很大的侮辱，我國國民在遼遠的地方遭受了種種的侮辱、強迫和虐待，對於這樣舉動是不能置若罔聞的。我國根據條約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已被人破壞，而責在保護我國在該地（中國）的利益的人員，不僅有權利來對付這些暴力行動，而且務須採用一切辦法，毅然決然來對付這些行動』（英首相在市長、爵士宴會上演說。）英首相把形勢說得如此嚴重，但政府反對派在國會揭穿他的陰謀說：『鮑林爵士自已承認通航證沒有效力，亞羅船也沒有權掛英國旗。可是請注意他（鮑林）說的話：「船當時不在我們保護之下，不過中國人不知道這一點，千萬不要把這一點告訴他們。」』英國政府為什麼定要擴大事態呢？泰晤士報正確地答復了，它說：『英國營業精神的伸張，已與閉關自守的中國社會底結構相衝突。這種行為是否合法，那種行為是否適宜，這些瑣細地方都用不着提起，如英國這樣的民族，要用暴力手段向軟弱的不善於謀進步的民族發生來往關係。』這就是說，英國要在遠東伸張勢力，什麼口頭上動人的理由都是揑造的。

滿清政府被迫訂約，承認外國人在商埠傳教，內心異常憤恨。它希望上天保佑，神力毀滅外國的宗教和武力。道光三十年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摺，可以代表統治階級頑固派及落後民衆的心理：『五月十四日未時，疾雨迅雷，將上海洋涇濱天主堂所供十字架及耶穌木偶，全行擊毀，

並其所存火藥，全行漂失。臣等查該夷欲誘我愚民，援入彼教，其居心大不可問。今大威震怒，誅其所尊，洵足褫奸夷之魄而破愚民之惑，此皆我皇上敬天勤民有以感召，臣等不勝欣幸。』雷擊天主堂，當作大事奏報，咸豐帝也不勝欣幸，硃批『敬感之餘，更深慚愧』，自以為眞得上天保佑了。洪秀全創上帝教起義，滿淸君臣認『上帝會乃天主教之別名』，對外來宗教更是深惡痛絕。咸豐三年，法國馬神甫潛往廣西西林縣傳教。六年，西林縣官捕馬神甫及其信徒二十五人，毒刑拷打，分裂屍體，梟首示衆。消息傳到巴黎，法王拿破侖第三，借保護教會為名，同意英政府提議，共同向中國用兵。七年，英國派額爾金、法國派葛羅為全權大臣，率海陸軍出發，七月，英法聯軍到達香港。

額爾金投遞照會，要求入城、賠償損失、重立約章。德美領事要求酌給賠償，並願居間排解。英法美主要目的在壓迫滿淸修改條約，合力攻擊太平革命，軍事仍帶威嚇性質，並非眞求決戰。葉名琛似乎懂得一些對方用意，密告將軍、巡撫等高級官吏說：『彼但作戰勢來嚇我耳，張同雲（漢奸）在敵中，動作我先知之，我不與和，彼窮蹙甚矣。』因此不作戰守準備，將三國照會一一駁斥。他在奏報中自信必勝，他說：『若再不乘此罪惡貫盈之際，適遇計窮力竭之餘，將要求各款，一律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則得隴望蜀，伊於胡底。』咸豐帝也深信『該督熟悉夷情，操縱得宜』，諭令將進城、賠款及更換條約各節『斬斷葛藤，一勞永逸。』兩個頑固派首領做着同

樣的幻夢」等候『該夷自知理屈，悔罪求和。』不料聯軍五千人佔據河南，在城外排列大炮，提出哀的美敦書宣稱二十四小時後開戰。城中官吏紳商恐慌，葉名琛大言『彼技已窮必無事，』『敢赴敵船謀和者按軍法。』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英國侵略者一貫執行『只與官爭，不與民敵，恐嚇賄買督臣，使彈壓百姓，俯首聽從，遂能爲所欲爲』（御史韓錦雲奏）的政策。琦善、耆英、伊里布都是替英國彈壓百姓的督臣，但當時昇平社學未曾分化，那些督臣不敢公然執行英國政策。葉名琛大屠殺革命人民，社學被毀，只剩下一部份團練，這種團練對人民已是反革命武裝，但對英還保持一些反抗精神。兵練燒毀十三洋行後，頑固派、洋務派（洋行主如伍崇曜等都是洋務派）一致憎惡團練兇悍，葉名琛出示禁止，不准留在省城。團練見他行動詭祕，以爲與英人有私，是襲用琦善等『陽剿陰撫』的舊法，『紛紛解體，各謀自衛之計』（中西紀事）廣州成不設防城市。葉名琛認爲不用團練守城，就不會惹起英軍攻城，自己守定『通商而外概不商量』的方針，敵人必窮蹙自退。所謂『不戰不和不守』是他理想的外交辦法，空城是他理想的外交場所，而這却正是聯軍的進攻對象。

咸豐七年十一月，聯軍發炮攻破城牆，葉名琛逃匿。將軍穆克德訥、巡撫柏貴、豎白旗投降，聯軍入城，俘獲葉名琛，送往印度，囚禁中斃命。

廣州事變，證明了殘殺人民二三十萬，『才名赫赫』的虎狠，在外國侵略者面前，必然變成逃匿和當俘虜的犬羊。穆克德訥、柏貴投降敵國，以合作名義，在英法委員三人監省下，出告示『彈壓城內外軍民』（穆、柏等人廣州失陷奏摺），收繳民間武器，禁止人民反抗運動，這又證明了統治階級不論獨作合作，總是盡力反人民（穆、柏等自稱『安民』）決不會放棄自己的天職。同時，人民反抗運動絕不因壓力加強而低落，相反，反抗愈益普遍和深刻化。

第三節　頑固派第二次失敗——天津條約（咸豐八年三日至十日）

英法美通商傳教權利主要在上海，因此都反對太平革命勢力到達長江流域。英國商業最大，暫時採形式上的中立，觀望變化，以便雙方取利。美國商業較小，顧忌較少，助滿態度也較積極。法國企圖取得內地傳教權，竭力討好滿清，態度最露骨。兩江總督楊文定奏摺說：『上海通商各國，惟米利堅爲最恭順。此次賊匪竄擾，經吳健彰約會，卽發火輪船前來助剿，旋因擱淺轉回，至法蘭西則專以傳教爲事。英吉利又強悍詭譎，惟利是視。該夷畏賊焚掠，欲與言和，但該夷總以勝負爲從違』（咸豐三年三月奏。）這正是太平軍初到南京時三國的態度。洋務派使用各種媚外卑劣手段，請求援助，各國也或明或暗提出報酬條件。下列材料可看出當時江蘇上海洋務派的賣國活動及外國的侵略野心。

咸豐三年三月，劉麗川在上海起義。江蘇巡撫吉爾杭阿謀於各國領事。法蘭西根督辣厄爾首請助戰。又商得英美領事同意，讓出進攻道路。四年，清兵水陸並進，法兵發大炮相助；起義軍衛壘陳家木橋，洋兵與淸兵幷力防禦。五年，淸兵攻城東南，法兵攻城北，上海陷，劉麗川被殺（中西紀事：借助夷兵克復上海檔案。）

四年五月，英公使鮑林、提督賜德齡晤吉爾杭阿，『據該酋口稱，上海賊久未平，以致英國貿易滯銷。玆願將賊黨驅逐，無論送往何處，不必過問，卽將城池交還貴國』（江蘇巡撫許乃釗奏。）

閏七月，『米利堅夷酋麥蓮勒畢唵口稱，伊國情願隨同官兵從上海起，一路剿滅逆匪，開通長江。如上海等處有一匪未平，卽不敢越次而進。』又口稱，『倘蒙欽差大臣指給地方貿易（鎮江、南京、漢口。）其他如有賊匪，必當隨同驅除淨盡，並飭洋商補交舊稅，以備軍餉』（吉爾杭阿奏。）

八月，鮑林提出英國修約說帖，第九條是『彼此會同設法，肅清海濱盜匪（指太平軍。）』

七年，英吉利致兩江總督何桂淸照會『貴境沿海賊匪勢甚鴟張，有妨商務，本國甚願襄助淸剿，消除其患。』

這些『助剿』的代價是很高的，就是要消滅內地的閉關政策，開放中國全部。條件主要部

份（也是滿淸政府最怕的部份）是(一)各國公使駐紮北京；(二)開闢沿海（包括天津）及長江商埠；(三)內地自由游歷（包括傳教）(四)修改條約。吉爾杭阿爲代表的洋務派主張承認一切要求。他在當時被看作外交模範，兩江總督何桂淸致直隸布政使錢炘和信裏傳授他的外交秘訣，先批評頑固派的外交方法說：『英夷於咸豐三年，見我內地多故，卽起戎心，經吉雨山折之以理，懾之以氣，而又推誠以結之，故能轉爲我用。其推誠之法，必先破其疑團。該夷之最疑者，中華大吏不將其苦衷據實具奏。因凡有關涉夷務事件，只奉寄諭，不奉明發。而准行事件，亦作爲承辦之員意見，代爲乞恩，并由該夷求請，故不感激而轉疑中華大吏一味蒙蔽聖聰也。』何桂淸認爲頑固派那種不誠的辦法，不會換得外國的『感激』，要得外國的『感激』，必須學吉爾杭阿推誠的辦法：『吉雨山廉得其故，遇有可行之事，卽告以據實代奏。其不可行之事，則告以爾等欲我代奏，不能不奏，然一經代奏，大皇帝必將我革職治罪。我等相好，將此頂紗帽結交朋友，無甚要緊，但不知爾等安否？該夷以爲不欺，尊之曰吉大人，而中心誠服矣。』這樣搖尾乞憐的醜態，說得如此妙用，其實只是一個『准』字（一切承認）所謂『准則俯首聽命，不准則爲所欲爲，』與其爲所欲爲後還是准，不如准了免得爲所欲爲，這是洋務派自覺比頑固派高明處的所在，也正是多數頑固派人後來轉化爲洋務派的原因。試看吉爾杭阿的外交！咸豐四年，英法美提出公使駐京、開闢商埠等十八條，吉爾杭阿奏稱：『夷情狡詐暴戾，凡有所求，必得乃止，』又替三國解

釋說：『若云助逆犯順，則長江現爲賊踞，何妨藉此橫行，而乃赴粵赴滬並赴天津，必待請命而行，似又並非惡意。』結論是『夷情如此恭順，不妨曲示包荒，許其所請』以免『該夷心未愜服，終恐別滋事端』。照吉爾杭阿等洋務派的主張，咸豐三、四年滿清就和侵略國結合，共同進攻太平軍，來絞殺革命了。可是當時掌握決定權力的頑固派，別有一種主張。

頑固派首領咸豐帝與他的胞弟恭親王奕訢都是生長皇宮、極度自高自大的紈袴子。他們首先要保守『天朝』的尊嚴；第二要維持內地的閉關政策，第三是舊怨不能忘懷；第四是疑忌外國與太平軍勾結，不信他們肯實心助戰。頑固派這種思想產生一切『不准』的外交方針，在屈服於侵略者爲所欲爲以前，它做着很多擴大災禍的事，表示充分的愚蠢無知。

滿清以小民族統治中國，用絕對嚴格的『禮』作爲統治漢人的重要工具，外國人不跪拜中國官吏，尤其是不跪拜中國皇帝，在滿清政府看來，實在是莫大的危機。廣州、北京拒絕外國人進城，主要爲了總督衙門與宮殿裏有了地位平等不必跪拜的『夷人』，無異宣示『天朝』尊嚴的喪失。咸豐帝訓示葉名琛要他『接見夷酋等（英美公使）儀文，仍當恪守舊章（外國貢使免冠拜伏，屏息待命），無得以該夷等有相待稍優之請，稍涉遷就，以致弛其畏懼之心』（咸豐四年）葉名琛傲慢招禍，這個訓示也是一種原因。咸豐九年上諭規定英法美公使入京換約，『照外國（朝貢國）進京之例，不得坐轎擺隊』，後來美公使要坐轎入京，伴使力勸騎馬，最後

改為乘車，到京後宣稱美國『入覲，』企圖誘行三跪九叩首禮，美公使謝絕進宮，國書交伴使轉遞，匆匆出京。滿清自以為外交上勝利。十年，何桂清奏稱接見『英酋普魯斯。』咸豐帝痛斥說：『清朝臣子有如是者耶！雖將汝抵法，朕實赧顏，何以對天下臣民。』聯軍進攻北京，咸豐帝諭怡親王載垣說『巴夏禮欲來求見，恐該夷以賓禮自居，長其驕傲，着該王大臣勿庸接見，以崇天朝體制。』他逃往熱河，還諭示奕訢說『現在撫局難成，人所共曉，派汝出名與該夷照會，不過暫緩一步，將來往返面商，自有恆祺等，汝不值與該酋見面。』北京條約訂立，羣臣奏請回京，他諭稱：『各國尚有首領（公使）駐京者，且親遞國書一節，既未與彼等言明，難保不因朕回鑾再來饒舌。』他這樣拒絕與外國人見面，外交上起許多風波，所爭只是拜跪禮。他原想用拜跪使外國人畏懼『天朝，』結果反因不拜跪使『天朝』畏懼外國人，『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赫德局外旁觀論）就是頑固派保守『天朝尊嚴』的一點可憐的技倆。

閉關政策是滿清統治的精髓。它不願外國人游歷內地，尤其是傳播宗教，破壞政治的文化的閉關，嚴重地威脅封建秩序。清初楊光先著不得已書在文化閉關的觀點上攻擊天主教說：『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南京訂約以後，教士入內地傳教，尤引起頑固派仇視，說教徒毀祖先神主是吞食狂藥，教徒同堂禮拜是男女淫亂，三綱五常的舊禮教與外來宗教不斷發生衝突。在政治閉關的觀點上楊光先也預言道：『天主教著

督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子孫。異日者設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既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南京訂約以後，民教相仇，洋教士保護教徒，自成一個政治勢力『猶之一國之中有無數敵國而自專自主者』（總理衙門與各國大臣商辦傳教條款）太平軍起義，頑固派更證實外國宗教的危險，因之絕對拒絕開放內地的要求。

美國侵略最露骨，頑固派對它仇恨也最大。咸豐帝定出待遇四國的態度：『俄夷與中國和好多年，自宜先行接見，待以賓禮。美曾並未助惡，亦可假以詞色。法國於咸豐四年，在上海助我剿匪出力，若能改悔，當念其從前恭順，曲從寬恕。英夷首惡，斷難寬容，將來廣東一口，必不准其貿易。』滿清與英國關係惡劣，待遇條件懸殊，障礙着雙方的接近。

英國對太平軍暫守中立，引起滿清的疑忌。又出版遐邇貫珍一書，『雜識時事，語含譏刺，而於楊逆所作所為，反稱其頗有法度，尤為狂悖』（咸豐四年許乃釗奏）這更加強了滿清的疑忌。英美要求開放長江，滿清看作命運的關鍵，決不肯通融。咸豐四年上海英法美公使率兵船開往天津，咸豐帝得報，不防備天津海口，却『恐鬼蜮技倆，聲東擊西，夷船闖入江口，致與賊匪勾結』，令江蘇文武官『密為防範。』八年，欽差大臣桂良奏報：英船入江，決不至於滋事；他批斥道：『不滋事必至勾通，設若不回，何以處之。』奕訢也以為『逆夷要求各款，尤關利害者，莫如江岸通商

一節，』主張調兵決戰來阻止要求，以免『後日追悔而無及。』頑固派不信英國肯助戰，英國要先得報酬後助戰，疑忌阻止了反革命的迅速結合。

除上述四條以外，還有一條外交障礙，就是滿清政府諱言條約，從皇帝到大小官吏，不願看或看不到條約原文。正如何桂清所說：『查道光年間在江寧所定者謂之萬年和約，係一成不變之件，在廣東所定者謂之通商章程，載明十二年後酌量更改。歷來辦理夷務諸臣，但知有萬年和約之名而未見其文，以至誤將章程作爲萬年和約，徒以口舌爭辯。』外國說十二年期滿，應修改條約；滿清說萬年和約，一成不可變。外國以爲癡人說夢；滿清以爲無理要挾；兩方永不能合拍。這五條的存在，侵略國無法循外交途徑達到改訂條約、增加權利的目的，唯一方法，只有『臨之以威，爲所欲爲，』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英法佔領廣州後，想乘勢迫清政府改訂約章，俄美也趁火打劫，於是四國公使會商，聯名致書清政府。大學士裕誠分別照會四國公使，以英法美三國交涉委之兩廣總督，俄國交涉委之黑龍江辦事大臣。時英法公使集合在上海，得裕誠復書，不能滿意，遂決定率聯軍北上。

咸豐八年英法聯軍到達大沽口，美俄兩國借『從中調處』名義同來，向直隸總督譚廷襄投遞照會。咸豐帝還看作『伸訴冤抑，前來乞恩，』令英法『交還廣東省城，送還葉名琛，眞心悔過，方能逐款定議，』否則，『除舉兵攻城（廣州）外，仍令五口絕英法兩國通商。』他是完全在

夢境中，以爲可以嚇退英法。四月聯軍炮轟大沽口，海岸守兵戰敗，聯軍佔領天津城，咸豐帝才大驚，先後派桂良、花沙納、耆英往天津議和。他的辦法是『着桂良、花沙納先行拒絕，於該夷續請各事，概勿輕允』，然後讓投降派老手『耆英出爲轉圜，則該夷自當深信耆英，不致推託。』不料耆英被英人斥逐，狼狽逃回北京。咸豐帝計劃失敗，把耆英殺死洩忿。旁的辦法他是沒有的，英法宣稱要帶兵進京，他趕快承認全部條款，僅附帶一個要求：『公使駐京，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制度，不得攜帶眷屬。』這種無聊的要求，桂良自然不敢向英法提議，英國提出五十六條，法國提出四十二條，迫令桂良花沙納用印畫押。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成立。美俄也得訂立了滿意的條約。南京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的開始，天津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的加強。中國人民就是這樣被滿洲統治者出賣了。

天津條約的主要條款：(一)公使駐北京，用平等禮節；(二)開放牛莊、登州、台灣、淡水、潮州、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鎭江爲通商口岸，海關僱用外人；(三)耶穌教天主教得入內地自由傳教；(四)外國人得往內地遊歷；(五)中外人民爭訟事件由領事官會同中國官審辦；(六)修改稅則；(七)減輕商船噸稅；(八)外國兵船得遊弋各通商口岸；(九)對英國賠款四百萬兩，對法國賠款二百萬兩；(十)享最惠國待遇。當時英法人所能寫出的條件，『一字不改』的取得了。規定次年在北京交換批准的正式條約。英法軍退回上海，與桂良花沙納訂定稅則：(一)承認鴉片爲合法貿易，

改名『洋藥』，每擔收稅銀三十兩；（二）除例外（絲茶鴉片稱例外）免稅（外國人用品免稅）兩項外，進出口貨物一律按時價值百抽五徵稅；（三）洋貨運銷內地，按市價抽百分之二·五子口稅，免繳釐金和常關稅。在這種稅則下，中國新式工業不可能發達，舊工業必然大破壞，經濟上決定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咸豐帝等待聯軍退出天津，又恢復皇帝的威風，嚴令桂良花沙納『激發天良，力圖補救，』取銷『公使駐京、內江通商、內地遊行、賠繳兵費』四條，以『全免稅課』為交換。他不惜放棄每年數百萬兩的關稅收入，不是不愛錢，而是決計強迫人民來補償。桂良等不敢向英法交涉，奏稱有十可慮，其中如『不稅於夷，必稅於商。且我雖稅於商，該夷總以為稅從貨出，必至饒舌；』『既免夷稅之後，而中國又收烟稅，恐夷人笑我因有烟稅之利，而始免其納稅，轉致得所藉口。』桂良指出夷人仍要饒舌，打破了他的幻想。但是他決不肯甘心，密謀『不動聲色，使之不疑，先將天津海口預備齊全，候其來年赴京換約，聚而殲之。』十月，洋務派兩江總督何桂清深知前途危險，勸他慎重，說：『玆事重大，非徒尙意氣及空談經濟而無實用者所能任事，恐一誤再誤，必至不可收拾而後止。』這個蠻悍的頑固派首領當然不聽，硃批：『朕思遲則有變，莫若先發以制，』積極準備來年『聚而殲之』的大陰謀。

第四節　頑固派第三次失敗——北京條約（咸豐九年五月至十年九月）

大沽和北塘是天津兩個重要海口，咸豐帝令僧格林沁率東三省蒙古騎兵設防大沽，佈置相當週密，北塘只留兵丁數十名看守炮台，等於不設防，指定換約公使由北塘登陸進京。這種行動不能用軍事理由來解釋，純屬專制主義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表現。他在被迫屈服、簽訂條約以後，想爭回一些『天朝』體面，第一步要換約公使服從走北塘的命令。第二步按照朝貢國舊例，公使進京，『所帶人數不准過十名，不得攜帶軍械，不得坐轎擺隊，換約之後，即行回帆，不許在京久住。』第三步，見皇帝行跪拜禮。何桂清奉旨向英公使商量，答復是『見大皇帝只肯跪一腿。』他定要跪兩腿，警惕了英法公使從事武力準備。

英法方面感到爭議跪拜的預兆，知道要用武力保護換約。額爾金致水師提督西摩爾電，請他『集中充分雄厚的巡江艦隊於上海，護送公使普魯斯由白河（大沽口）進京，』就是說，準備與咸豐帝的『逆我者死』作鬥爭。

咸豐九年五月，英法公使率兵艦到大沽口，直隸總督勸公使改走北塘，不聽。聯軍進攻炮台，雙方接仗，結果聯軍完全失敗，英戰艦三艘沉沒，死傷四百六十四人，法人死傷十四人，英艦隊長賀布也受了傷，聯軍逃出大沽口，退回上海。敗報傳到英國，政府黨（自由黨）報紙大肆咆哮，

『一致要求實行充分的報復。』例如每日電訊主張『大不列顛應攻打沿海各地，佔領京城，將皇帝逐出皇宮，並得到物質上的保證，擔保以後不發生襲擊。』『無論如何應該實行恐怖手段，應該教訓華人重視英人，英人高出於華人之上，英人應成為華人的主人翁。我們應永遠佔領廣州，作為我們遠東商業的中心，來抵抗俄國在東三省邊境所已得的勢力，並奠定新領地的基礎。』英政府雖然如此狂妄，侵略野心充分暴露出來，但它並沒有足夠的力量進行大規模侵略戰爭。首先是保守黨藉口反對戰爭，力謀倒閣。第二英軍佔領茶葉輸出地廣州，一八五七年英國茶葉進口減少了二千四百萬磅，因此商界害怕由戰爭引起的商業停頓普及到上海及中國其他各商埠。第三印度常起糾紛，使英國不斷地感受不安。第四準備歐洲發生戰事，不敢向遠東多派援軍。第五怕滿清投到沙俄方面，如果逼迫過甚。更重要的是滿清政府崩潰後，無法勾結中國全部封建勢力共同鎮壓太平革命。英軍在廣州宣稱興兵報仇，觀察中國方面情勢。上海商人議捐銀二百萬兩給英軍，請勿再舉。英法公使藉此轉圜，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約（天津條約）即可罷兵。』何桂清奏請息事。不料咸豐帝自以為大勝，下諭說：『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本國，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倘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英法看到天津條約的一切果實，忽被從手裏搶去，只好決心一戰。

咸豐帝令僧格林沁撤北塘防隊，專守大沽，希望英法服從命令，從北塘進京朝貢。十年六月的英軍一萬、法軍八千攻大沽，分兵登陸北塘，攻大沽後路。咸豐帝又恐慌起來，他那種迫切討饒的懦怯心情對照前些時妄自尊大的強蠻態度，活畫出頑固派的標準模形。他督促直隸總督恆福趕快『照會該夷進京換約（即『概作罷論』的天津條約）不可任令委員藉口風浪不順，畏葸不前，倘再貽誤事機，致令大局決裂，惟恆福是問。該總督當仰體朕心，曲為開導，以顧大局，是為至要。』七月初，僧格林沁軍崩潰，逃回通州，天津陷落。聯軍提出開天津為商埠，賠兵費二百萬兩，公使帶兵進京換約，長駐京城等條件，並不乘勝直追。咸豐帝令桂良、恆福等往天津交涉，承認天津開商埠以交換公使駐京一款，理由是『天津已在該夷掌握，通商一層，許與不許等；公使駐京斷斷不能應許。』賠兵費、帶兵換約二條絕對不許，說『以上二條若桂良等喪心病狂，擅自應許，不惟違旨畏夷，是直舉國家而奉之。朕即將該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飭綱紀，再與該夷決戰。』這當然是些夢話，桂良回報說：『該夷特其兵力，於所請各條招巴夏禮會議，絲毫不容更改。』英法軍向通州進軍，他派怡親王載垣到通州承認一切條件，但公使見皇帝必須跪拜。會議以逮捕巴夏禮而破裂。他諭令僧格林沁堅守通州，自己準備逃往熱河。臨逃前下了一道『朕今親統大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的上諭，表示並不『畏夷』，一面召開御前會議，暗示大臣們阻止親征。他依據衆議，又下『坐鎮京北』（熱河）的上諭，說『將以巡幸之備，作為親征之舉，』換

句話說，『我要把逃走當作親征，』多麼不像人說的言語！

聯軍進攻，滿清兵船沿路潰散，八月初聯軍到北京城外，頑固派第二首領奕訢到長辛店藏匿。聯軍入北京，派兵搶掠圓明園，又把它放火全部燒燬。滿洲統治者吸取中國人民的無限血汗，經營二百年，綜合中西建築術，聚及古今藝術品，造成全世界少有的壯麗宮殿，咸豐帝整年在園裏度着荒淫無恥的生活，經聯軍燒搶，頓成白地，文化上的損失是無可計算的。

聯軍一切都滿意了。英國提出九條條款，法國提出十條條款，只缺一個簽字人。咸豐帝任命奕訢爲欽差全權大臣，這個主戰最力的頑固派首領，不敢出面見『該夷，』從中取利的俄公使，自任保護人，奕訢才敢出來畫押蓋印。咸豐帝立即順從英法的要求，批准公佈條約全文，飭各省督撫按照辦理，並下諭說：『所有和約內所定條款，均着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中英、中法北京條約成立，中國又被滿清政府出賣一大批權利。

北京條約規定：（一）開天津爲商埠；（二）準華民赴英法屬地或外洋別地工作，滿清出賣人民當奴隸替英法服苦役，開發殖民地，英法從此合法誘拐『豬仔，』數百萬窮苦人民在海外犧牲了生命；（三）割讓九龍爲英領地；（四）交還教產於天主教堂，當翻譯的神甫私增『教堂在各省租買地產建造自便』條文，奕訢也一概承認；（五）賠償英法兵費各八百萬兩，恤金英國五十萬兩，法國二十萬兩，賠款由各海關稅收內扣繳，海關更進一步落入外人手中。十月英法聯軍退

出北京。

兩個出賣中國的頑固派首領又恢復『天朝』尊嚴了。咸豐不肯回京接受英法國書，下諭說：『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淸尙有人耶！』奕訢譏笑額爾金坐轎出京，奏稱：『沐猴而冠之狀，殊覺不堪入目，』背着外國人說些大話，遮掩自己的羞辱，也算阿Q們得了勝利。

第五節　一部份頑固派向洋務派轉化——所謂同治中興

太平軍起義以後，滿淸政府完全依靠漢奸曾國藩之流替他支持。這些漢奸在反革命內戰上表示對滿淸絕對忠實。當北京危急的時候，咸豐帝飛召南軍勤王，要曾國藩等各挑二三千名勇丁北上，上諭嚴厲地說：『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不料曾國藩拒絕派兵，直截教他『撫夷。』當然，咸豐帝是早就希望投降的，但在調兵不服從這一點上，他就感到空虛了。滿淸在北京養大批滿蒙兵丁，號稱『八旗禁旅』，從來不出仗，對漢人保持天兵無敵的假聲名。『今觀天津通州之役，一戰而蹶者十之二三，不戰而潰者十之六七，是滿蒙之衆，非但不可以龍興（淸初侵入中國）例，卽求如閩粵川楚之綠營亦相去甚遠』（中西紀事）與曾國藩等漢奸軍尤其無法相比，這又使他感到更大的空虛。用什麼力量來反抗太平革命、維持對內統治呢？只有依

靠外國侵略者的援助。

頑固派排斥外國，主要由於自大與疑忌。皇帝不接見各國公使，仍是自大排外的表示，但跪拜的爭議却因此和緩。疑忌的中心，第一是公使駐京；第二是內江通商。事實證明洋人在京並無『粵東囚擄重臣，是其前鑑，肘腋之變，可爲寒心』的那種危險；長江開埠，且有『助順勦賊』的極大利益。其他行事，很多使統治階級喜出望外。如『洋人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可滅不滅，實在是『大德』（曾國藩語）洋人管理海關，每年收稅數百萬兩，交滿清政府充軍餉，可吞不吞，實在是『公平』（桂良語）；『觀其不敢害葉名琛，知有畏懼天朝之意，觀其仍肯交還廣東，知無佔據地方之心，』實在是『並非有深謀詭計』（桂良語）；逆夷貪利逞強，然以貿易爲性命，並不利我土地人民，與內地逆匪盜兵作亂者不同，』要求各款實在是『可以信義籠絡，馴伏其性』（奕訢語）。滿清對外國雖還有疑忌，那都是次要的，從重要處說來，信賴代替了疑忌，可以安心接受外國的援助了。

頑固派轉化爲洋務派，在政府主持中外合作反太平軍的是奕訢，在地方實行的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洋務派也輸入一些外國工業（軍需工業，）與當時改良派創始者容閎的主張截然不同。洋務派製造船炮，目的在鎮壓革命，並無對外國自衛的企圖；辦同文館等目的在培養譯員買辦，只求能應對外人，並翻譯某些書報。中學（封建專制學說）爲體，西學（格致天算

學）爲用，是洋務派一貫不變的方針。至於改良派是不甘心中國永遠落後，要求講『富強之故』容閎曾向太平天國建議七條：（一）依正當的軍事制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軍官；（三）建設海軍學校；（四）建設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材爲各部行政顧問；（五）創立銀行制度及釐訂度量衡標準；（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教聖經列爲主課；（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以上七條除『聖經列爲主課』一條專爲太平天國立言，其餘各條，可看作改良派的一般政綱。改良派目的在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與洋務派走殖民地的道路截然不同。但它注定了失敗的命運，首先是不認識中國已是半殖民地，外國侵略者不允許資本主義的發展；其次是希望結識中國達官『庶幾得行予志，』而這些達官非頑固派即洋務派，有意或無意地反對資本主義。宏閎結識曾國藩、李鴻章的效果，只是做了購辦造船機器及派遣被頑固派嚴格管束的留美學生兩件事，來替洋務派服務。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改良派開始以動搖依附的姿態出現，而洋務派則成爲與頑固派平分政權的統治者。它在外國支持下反革命成功，被稱爲『同治中興』。

洋務派的設施，不外『設外交機構』、『借洋兵助戰』、『自強』三類。嚴重的結果也有三個：一個是加深殖民地化，一個是加深人民的災難，一個是加深滿漢統治階級的裂痕。

設外交機構

滿清對南方藩國的制度是北京設禮部，管朝貢事務（北方藩國屬理藩院）

貢使先到廣州，粵督撫坐大堂受免冠拜伏禮，粵督撫派人伴送到禮部，由部官引貢使帶貢表到午門行三跪九叩禮，皇帝命禮部設宴，禮畢回國，不得在京逗留。歐美通商國當然不肯受跪拜的屈辱，滿清也當然不肯受不跪拜的屈辱，因此廣州督撫拒絕會見及接受稟帖，一切由十三洋行轉達。中外糾紛以至引起戰禍的這樣一個小節，在當時却看作『國體攸關』的大事。北京條約以後，各國公使駐京，滿清不願機密性的軍機處有外人往來，又不能用禮部、理藩院名義辦理交涉，咸豐十年特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卽理藩院化名）作爲外交機關，奕訢、桂良、文祥三個滿洲貴族掌管外交權。以前只有兩廣總督一人出面辦外交，現在組織擴大，北京總理衙門，下設南北洋通商大臣。北洋大臣駐天津，管牛莊、天津、登州三口，地位最高。南洋大臣駐南京，管長江及山東以南各海口，職權極大。南北洋大臣，照例由直隸、兩江總督兼任，兩督位置，又幾乎照例歸湘淮軍閥專有。軍閥官僚買辦混合體的南北洋大臣勢力遠比貴族官僚買辦混合體的總理衙門強大，這是因爲外國侵略者贊許『精明』的南北洋大臣遠比昏憒的總理衙門能辦事，扶助他們權位的提高。漢族軍閥政權開始了對滿洲貴族政權的分裂運動。

與總理衙門設立同時，奕訢開辦同文館。學生資格限八旗十三四歲以下兒童；教習資格取廣東上海通英法美文字語言、誠實可靠的商人；學業程度定『俟八旗學習之人，於文字語言悉能通曉，卽行停止，奏請優奬。』他這樣拒絕漢人參預外交，引起漢人反感，到同治元年還請不到

教習，只得忍痛聘請英國人包爾騰教書，年薪一千兩；另有漢文教習兼暗中監視洋教習一員，年薪只九十六兩。學生總數共十名。這個小書館，實際進行的是崇拜洋人、賤視漢人、放任滿人驕惰的教育，每年經費數千兩，不曾造就翻譯的技能，却養成買辦的精神，這些學生若干年後都擔任外交要職，成爲滿洲籍的洋務派。李鴻章以「上海、廣東兩口交涉事件較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爲理由，援同文館例，在上海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廣方言館），考選江浙一帶十四歲以下文童及年輕小官吏入館，聘中西教習課中西語文。學生出路是「承辦洋務」（充當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督繙譯官），及翻譯「測算之學、格物之理、製器之法」。不久廣東也設學館。上海廣東兩館也比北京館發達，南方洋務派壓倒滿州派，滿淸獨佔外交權的計劃，又歸失敗。

借洋兵助戰

滿淸在外交上最痛心的是公使不肯跪拜，最歡迎的是洋兵助內戰。北京條約以前，外交主題在爭跪拜，表示可笑的驕傲，北京條約以後，外交主題在爭助戰，表示可恥的卑諂，轉捩點在咸豐十年九月簽訂北京條約的那一天。

在簽約宴會上，法公使葛羅宣稱：「願於海口助中國剿賊，所有該國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沙俄公使也面見奕訢說：「髮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軍於陸路統重兵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英公使因與太平天國約定一年內各不侵犯，不

表示意見，咸豐帝諭曾國藩等公同商議。曾國藩首先贊成，以爲『借助夷兵，事屬可行；』別一派軍閥袁甲三（在河南攻擊捻軍）堅決反對，以爲『有害無利，必不可行。』咸豐帝動搖不決，令奕訢探英國公使態度。英國新得巨大利益，要全力開發新商埠（主要是漢口），對天國取軍事防禦，暫不進攻。它又不願俄法積極助戰，額外取得滿清新報酬，威嚇奕訢說：『剿賊本係中國應辦事件，若借助他人，不占踞地方，於彼何利？非獨俄法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即英國得之亦不敢謂必不據爲己有。』這把咸豐帝嚇倒了，密諭上海官紳說：『若肯受雇助剿，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經理，於大局或可有利無弊。』美國流氓華爾的『常勝軍』，就根據這個密諭組織起來。

咸豐十一年，英國變更態度，一面對奕訢表示『太平軍斷無成事之理，而湘楚各軍船炮不甚堅利，恐難滅賊；』一面由英人赫德建議鴉片新稅法（納稅後販至無論何處銷售，免納釐金），每年可增加收入數十萬兩，購買英國小火輪。它這一狡計，包含籠絡滿清、販賣船炮、擴大鴉片銷路三種利益。法國要求均沾利益，代購船炮，奕訢允許英法各買一半。奕訢自以爲外交成功，向咸豐帝報功說：『臣等自籠絡英法以來，目前尚稱安靜，似可暱而就我。若乘此機會，中外同心，以滅賊爲志，不難漸次掃蕩。』又說：『失此不圖，戰勢既難逆料，即英法之籠絡，亦恐無以善其後。』那種迫切求助、奉侵略者如神聖的卑劣心理，眞使人見之作嘔。咸豐帝自然極爲歡喜，令『該督撫等（曾國藩等）悉心妥議，期於必成，不得畏難苟安。』曾國藩也『稱爲救時第一要務，』招募

水勇準備接受後來在奕訢、曾國藩、李鴻章三人間發生權利衝突，咸豐帝與奕訢的一場歡喜落了空。

法國軍隊助滿清最積極，前後戰死提督三人，引起英軍的猜忌。常勝軍將弁多美國人，英軍表面幫助一些軍火，但暗中謀奪取領導權。同治元年李鴻章到上海籌備「會剿」英領事表示「不令伊國派員會帶，即將外洋火器取回，恐此軍亦歸無用。」李鴻章很害怕，說「常勝軍初立戰功，係賴幾件炮火，何伯（即賀布，英艦隊司令）華爾等拼湊而成，其勇並非精強也」（李鴻章致曾國藩書。）華爾在慈谿戰死，美人白齊文代作管帶，英領事指使大商人楊坊不發軍餉，常勝軍譁變，白齊文免職。同治二年，英人戈登統率常勝軍，英國才積極參加反太平軍戰爭。法國在上海失勢，到浙江助左宗棠組織常捷軍。李左兩大軍閥，借英法武力攻陷江浙兩省，被稱為「中興名將，」實際是英法的兩個傀儡。曾國藩是英法美共用的傀儡，他不專靠一國，因此有資格當傀儡的首領。外國侵略者找到了湘淮軍閥，北京的奕訢被冷淡了。英公使威妥瑪批評總理衙門說：「總署向來遇事總云從容商辦，究是一件不辦。說來說去，無非空談。」

自强

奕訢請設總理衙門奏摺裏說：「臣等就今日之勢論之，髮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肢體之患也。故滅髮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這裏所謂「治俄」「治英」都是裝點門面的話，只有「滅髮

捻』才是代表滿清統治階級的實話，不過他還有一句代表滿洲貴族的話不便說，就是『治漢爲先之先。』北京條約以後，滿漢洋務派都談『自強，』奕訢所談的是治漢的『滿洲自強，』曾左李所談的是利己的『軍閥自強』『自強』目的都在壯大本集團的力量，鎭壓人民革命。他們『自強』的程度決定於所得外國侵略者援助的多少。

在北京條約簽字的宴會上，法公使葛羅說：『法國洋槍炸炮等件，均肯售賣，並肯派人教導鑄造各種火器。』俄國公使對奕訢說：『俄國願送鳥槍一萬桿，炮五十尊。』奕訢聽到這些話，喜出望外，奏請『分給八旗兵丁，即行演習。』原來俄法都是空談，奕訢受愚弄，空擬了一個『訓練旗兵』的計劃。同治元年李鴻章在上海『購買外洋槍炮，設局鑄造開花炮彈，以資攻剿，甚爲得力』（同治四年李鴻章奏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摺）同治二年奕訢看到李鴻章設局造炮彈業有成效，派旗人四十八名交給李鴻章，『專令學習外洋炸炮炸彈及各種軍火機器與製器之器』。他抱着這樣大的希望，派去學生却都是些愚惰的旗丁，訓練旗兵計劃第二次落空了。他在奏摺裏說：『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製器爲先。此項精祕之器，京營學成後，祇可推之各省駐防旗兵學製，緣旗人居有定所（難道漢人居無定所？）較易防閑，仍禁民間學習，以免別滋流弊。』奕訢不懂得外國各自扶助地方的軍閥傀儡，北京政府背後並無可靠的外援，『自強』必然失敗，治漢野心祇能加深滿漢統治階級的裂痕。

『軍閥自強』的基礎是取得船炮。李鴻章首先到上海，也首先學製火器。他說：『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祕法，期有增益。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同治元年致曾國藩書。）他要學得一二祕法，不惜重資雇洋人數名，分給各營教習；又募外國匠人，由香港購辦製炮器具；又託英法提督各代購大炮數尊，自本國寄來（同治二年致曾國藩書。）他自信『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請曾國藩提倡製造鎗炮輪船。李鴻章依靠英國侵略者，在軍閥中是洋務先進。他的『自強』論被洋務派推崇和遵行。他說：『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當專設一科取士』（同治三年致總理衙門書。）設學館培養譯書人才，江南機器製造局附設譯書局，比奕訢的辦北京同文館，目光確是比較遠些。奕訢被他提醒，在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一館，學生資格限於翰林、進士、舉人、貢生那些八股專家，自然毫無成就。滿洲洋務派處處落後，中央政權不能不逐漸落到船炮及洋務人員擁有者湘淮軍閥的手裏。

同治四年，曾李合作在英美援助下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五年，左宗棠在法國援助下設造船廠於福州。此後各省督撫都設立大小軍火局，目的是鎮壓人民，但也含着軍閥割據的意味。

下面是軍閥所謂『自強』的好例。

咸豐十一年奕訢委託赫德購買船炮，共買得小軍艦七隻，運輸船一隻，用銀一百七萬兩。奕訢主張『水手用山東人，炮手用湖南人，水兵用八旗人。』曾國藩主張全用湖南人，編入長江水師中。並要求不駛出長江口外。同治二年，輪船到上海，奕訢不願讓給湘軍，聲稱『輪船水勇已在外國雇定，毋庸添募楚勇，』艦隊分交曾李二人節制，曾國藩提出嚴重的抗議說：『水陸將士，皆將引爲大恥。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節制）。不如早爲之所，疏而遠之。』當時曾國藩怕洋兵來分戰功，又不願李鴻章分得輪船，幾乎要用兵變來示威。他直截指出疏而遠之的辦法，說：『以中國之大區區一百七萬之船價，每年九十萬之用款（每月經費七萬五千兩）視之直輕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他對滿清一向自稱爲忠臣孝子，這樣粗暴露骨地揭開了可怕的面目，確把西太后、奕訢嚇倒了，只好順從他，解散洋兵，退還船隻，英國憑空得銀一百四十餘萬兩。曾國藩反對非湘軍所有的輪船，但酷愛湘軍所有的輪船。他派容閎到美國買造船機器，同治四年在上海開辦江南機器製造局，造兵船編入長江水師，說是『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同治七年曾國藩：新造輪船摺。）

很明顯的，滿清和軍閥們所謂『自強』，實際是分裂割據。滿清與軍閥，軍閥與軍閥，在利害衝突時暴露出猙惡的眞面貌。他們講『自強』，並不是歡迎資本主義，而是害怕資本主義。李鴻

章奏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摺裏說：『洋機器於耕織印刷諸器皆能製造，原不專爲軍火而設。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無從爲之區處，不過銅錢火器之類仍照向例設禁，其善造槍炮在官人役當隨時設法羈縻耳。』他在致總理衙門書裏又說：『倘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潛師洋法，獨出新意。一旦輟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陳陳相因之兵器，孰能禦之？』他預料機器的危險，也預料科學、工程師、工人的危險，愚蠢的滿洲貴族，當然更感到非常危險。奕訢要八股專家學天文算學，李鴻章阻止私人辦新式工業，以『官督商辦』的方式監視洋機器，官營工廠任令腐敗關閉，毫不愛惜，寧願購買外國貨物（船炮以至日用品），主要原因之一，就在害怕洋機器。

第六節　中國人民的英勇反抗鬥爭

頑固派的愚蠢，洋務派的『自強』把中國推進半殖民地的深淵裏。如果說，北京條約以前，滿清是封建統一的帝國，現在却是在英法俄影響下，走上由分裂以至瓜分的道路了。同治五年赫德局外旁觀論、威妥瑪新議論略向滿清政府提出瓜分警告，大意說，滿清如果政治上不信賴外國，遵守條約，經濟上不『准洋商合華商會製輪車（火車）電機（電報）各等事，』『將來中華天下不免分屬諸邦。』在侵略者看來，像滿清那樣腐爛無能的統治，沒有外國保護，應該『數

年之內爲萬國之役。』但他們不看也不敢看中國的另一面，那就是一八五七年馬克思在論波斯與中國裏指出的：『華南人在反對外人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態度的本身，很明顯地指明中國人已覺悟到古老的中國遇着極大的危險。過了不多年以後，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臨死時的鬥爭，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這是與赫德之流極端相反的預言、而中國歷史正是遵循這個預言發展的。馬克思指出以廣東人民爲首作出如下的抗英行動：『現在至少在南方各省，民衆是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人的鬥爭的。華人完全鎮靜地和有意地在香港歐人居住區域內將毒藥滲入大宗麵包。華人暗帶武器，乘搭商船，而在中途就突出痛擊船長、水手和歐洲搭客，並奪取船隻。甚至乘輪船到外國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約定的一樣，在每個放洋的輪船上起來騷動，奪取輪船。他們寧願與船一同沉於海底或者是在船上燒死，而不願降服。甚至僑居國外的華僑，也密謀起事，突然在夜裏舉行暴動，當局只有嚴加戒備並使用武力，才能壓服他們。』自稱『文明』的侵略者斥責這種抵抗方法是懦怯的、野蠻的、殘忍的方法，馬克思却給以很高的同情和評價，說『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引起了華人對一切外人的這種憤激情緒，並使這種憤激情緒帶有完全殲滅敵人的戰爭性質。如果內地的人民也有狂熱情緒，則這個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對於英人將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也是中國人民在廣東、天津表現的反抗精神，如果有好的領導和廣泛的組織，可以阻止英國的

侵略。由於缺少這兩個必要的條件，再加滿清遏抑民氣與敵勾結，反抗運動終於被壓制下去。

廣東革命民衆遭受葉名琛大屠殺，元氣大傷，剩下一部份團練，又因葉名琛行跡可疑，紛紛解體。咸豐七年十一月，英法軍攻陷廣州城。八年正月，三元里一百三鄉人民號召南海、番禺兩縣義民在佛山鎮成立團練局，有義兵數萬人。三月，咸豐帝派侍郎羅惇衍等三人到佛山辦團練，領導權落入大紳士手中。西人月報記載當時起義情形說：『省城內外居民似易於講和，惟城外九十六村（即三元里百三鄉）之人，大不相合。聞英人破陷省城、九十六村糾衆會議，以爲必夷人賄買官長，以致城池之陷易於摧枯。今我等擬上京控告，糾集人衆以鬪剿滅。』英人得到消息，企圖誘致九十六村首事人入城，勸『共相和好，』並且威嚇說：『倘勸諭之後，仍懷宿怨，害及英人，即屠戮一村以爲九十五村之鑑。』這個反帝運動發源地的九十六村，既不受誘，也不受嚇，積極準備殺敵攻城。

佛山團練局議決各鄉『堅壁清野，禁絕漢奸，』又宣告『夷人入其界者，登時格殺勿論。』英法兵恐慌，不敢到鄉村騷擾。正二月間，團練準備攻城，英法兵更恐慌。迫駐防旗兵繳械投降，防旗兵作內應。三月，團練局發起大罷工，凡廣東人『有在香港等處爲外洋人教書、辦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內概行辭退回家。』不到一月，二萬餘人罷工回來，洋人商務停頓，連做飯也要自己動手，困苦不堪，要求領事巴夏禮設法。巴夏禮說：『要停止罷工，必需破壞佛山團練

局，但水師提督去天津時，曾切實告誡：「在粵兵丁毋得與粵人挑戰。現在只好出布告勸復工。」他派火輪船到新安縣貼布告，義兵突起襲擊，殺死洋兵漢奸數人，其他地區布告不敢再貼。英法出兵攻陷新安縣城，並不能挽回罷工的狂潮，英法兵被逼退出新安。

團練局聲勢浩大，省城大官僚都逃到佛山鎮（只有將軍和巡撫未得逃走，）各人爭奪領導權，企圖借團練得功名。官紳民意見分歧，戰鬬力大爲削弱。五月，總督黃宗漢到廣東，出示稱贊「粵省人民之忠勇。」六月，天津條約成立。額爾金要求解散團練，革退黃宗漢及羅惇衍等。黃宗漢立卽出示：「中外現議和好，爾等民人毋得復相攻戰。」以此爲理由，竭力破壞團練，得英人諒解，保存了總督地位。羅惇衍等原奉密諭相機攻剿，」現在被咸豐帝出賣，硬指爲「僞造廷寄諭旨，深爲詫異，」下一道上諭說：「中國自來撫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乃有僞造廷寄，令羅惇衍等與該二國爲難，以致英人疑慮。著黃宗漢嚴拏僞造之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中國辦事光明正大。」羅惇衍等被查辦，佛山團練解散。民衆運動受官僚紳士領導，結果就是這樣。

廣東人民反英法鬥爭，應用游擊戰術，西人月報把它描寫得很神祕，也就是感到很恐懼。節錄教條如下（原文見中西紀事）：

「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處，輒被廣人劫掠殺害，所以英人不敢在外私行。」

「廣勇驍健異常，每夜於附郭地方放流星射入城中，欲以起火；省城中埋鍋箭者有之，暗地布網者有之。目下外國人若無兵丁防守之處，不敢遊行。所有中外人等兩不交易而生意寂然。」

「廣人詭計日生，故英人在省不能十分安全。有一日法國官食時見飯中置有毒藥。又天竺黑兵被人潛擄至鄉間。又香港亦屢受其害。又放火燒英人所居之屋。」

英法在軍事佔領地區，並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日夜防守，寢食不安。」英國政府黨報紙曾妄想「把廣州保留在自己手裏，和領有加爾各答一樣。」在人民英勇打擊下，止好放棄那些妄想。

「英人於黃埔地方豎一枝大旂，黃埔之人於夜間將旂繩割斷，以致顛仆。」

「黃埔地方有英國商船在岸上修補，夜間有一隊鄉勇踰山而來。船主帶兵百名上岸查訪，至一村不見一人，疑有埋伏，往別處查看，不料鄉勇伏於隱僻處，內藏砲台，忽放炮彈，英兵傷者六名，船主亦受傷。黑暗之中，該勇於隱僻處各放一炮，潛走莫躡其踪，而其炮甚巨。」

「英武弁有廚子係天竺人，偶行路上，忽被人以刀割其首而去。時有同行之天竺兵二名，並未見及，其神速如此。」

「法人自火輪船上岸，往南門買食，忽被廣勇圍住。二人奪圍而出，一人在後，頭與手皆被割去。後法人查知其處，以兵屠之，死者四十三人。」

黃埔是水陸交通要道，人民不怕殘酷的屠殺，擾襲交通線，守城兵更感不安。英官以英法兵勇不耐廣東暑熱」爲理由，運來大批「天竺之兵，代守省城。」

「英國武弁聞白雲山有鄉勇防守，遂帶領兵丁一百七名出省往查，及至該處，見鄉勇人多，衆寡不敵，遂移文至省，當夜調兵千名。次日會剿，而鄉勇已逃逸。英人追至數里外，即欲折回，而英官大怒，迫行至日中，爲戰傷者五人而受酷暑死者六十餘人。英兵退回省城，有醫生在後，忽被鄉兵擒去斬首。自此該勇等膽氣愈大，又得天津大沽之信，愈加忿怒，肝膽愈大，有花旗法蘭西天竺兵數名都被鄉人殺去。」

鄉兵誘敵深入，選中午作戰，擊敗大隊英兵，這是人民創造的游擊戰術。三元里、白雲山都打敗千人以上的侵略軍，證明這種戰術的有效。天津條約簽字消息傳到廣東，六月十四日，廣勇七千人攻廣州，駕雲梯上城，滿洲駐防軍助英法軍戰守，廣勇敗退，死傷約三百人，流三百人的熱血來抗議英法侵略及滿清賣國，雖然戰敗，愛國精神，永垂不朽。

三元里民衆組織昇平社學，「不受地方官約束」，革命性質最強，成功也最大。佛山團練局對官紳妥協，結果被官紳愚弄並出賣。天津地方接近封建統治中心北京，人民久受欺騙，中毒較深，向官府請求抵抗，連團練也辦不成。咸豐八年，英法聯軍到大沽口外，津民謀糾集「鹽梟海盜」，焚燒敵船，跪求欽差（桂良）總督（譚廷襄）請准許團練助官兵打仗。欽差，總督「恐誤撫局，」堅決不准。津民空抱義憤，但又不敢違法「擅動。」桂良反把人民義憤作爲投降的重要理

由說『天津民情洶洶，數日不（講）和，必將內變。附近天（津）河（間）兩府土匪以及各屬鹽梟，久欲觀釁而動，一聞有警，盜賊四起，官軍應接不暇，此戰之不可者二也。』他提出五不可戰以證明接受天津條款的必要，把人民要求反抗看作第二不可戰（第一不可戰是『該夷槍炮迅利，』）津民向他們跪求，眞是愚蠢得可憐。不過這種民氣不是沒有影響的。聯軍進攻大沽炮台，直隸總督譚廷襄坐轎先逃，提督、總兵等凡三品以上軍官全數奔潰，但守台士兵繼續抵抗。『炮台三次爲英人炮彈所中，華兵三次去而復返。』『又有一弁，於英人逼近炮台時，單身從炮台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將命生擒之，忽被前隊兵丁槍斃陣亡。』最後兵力不支，『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旗自刎，』一人戰死（二人一名沙春元，一名陳毅，）炮台失陷』（中西紀事引西人月報。）高級軍官逃走，小軍官還率士兵堅守，不是受民氣影響，在滿清軍隊裏不能有這個少見的例外。

第二次鴉片戰爭恰與第一次一樣，人民走的是反抗路線；統治階級走的是投降路線。

第五章　洋務派的自強與第一次割地狂潮——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

第一節　緒言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完全確定了。在這個新形勢下，統治階級分成頑固洋務兩大派。

頑固派是純封建性的政治集團，有滿洲貴族、官僚、紳士、地主、八股士人及落後民衆作基礎，首領西太后，掌握政權，在政治上擁有極大勢力。這一派人盲目排外，幻想閉關時代的囘來。同治五年，奕訢請設天文算學館，講求製造輪船機器諸法，倭仁上奏反對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拒絕一切新文化的輸入，是這一派人思想的一面。郭嵩燾描寫另一面說『中國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烟，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民生，無一人引爲疚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徧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歡迎外國消費品來滿足自己的享樂，是這一派人思想的

又一面外國侵略者破壞中國政治的經濟的封建機構，造成頑固派的排外心理，同時又加強了侵略者的破壞行動，怨仇愈結愈深，這種矛盾在頑固派與侵略者中間是不可消除的。但在政治上（如共同壓鎮革命）經濟上（如關稅及借款）生活上（如消費外國貨物）他們保有緊密的聯繫，這又造成頑固派的媚外心理，作爲與洋務派合作的基礎，通過洋務派，頑固派服務於侵略者。

洋務派是天津條約的新產物，是外國侵略者改造封建舊軍閥，使它適合於鎮壓太平革命之用的新軍閥。因之，洋務派的基本成份，軍閥、買辦、官僚缺一不可。當時被侵略者選中的曾左李三大軍閥，各擁有龐大的封建集團。左宗棠說李氏集團：「李鴻章一門，勛伐既高，依附者衆。當時隨從立功，身致富貴者又各有其親友，展轉依附，實繁有徒。」李鴻章說曾左集團：「左宗棠、曾國荃兩政十載（兩江總督），湘楚舊部視如家鄉（南京），而隨宗棠者猶多且久。」這封建集團加入買辦成份愈多，自然與外國侵略者關係愈深，政治上地位也愈高。李鴻章繼承曾國藩成爲洋務派最大首領，原因就在李氏集團加入極大的買辦成份。

頑固派、洋務派、外國侵略者在壓迫中國人民的時候是妥協合作的。在相互關係上，頑固派據有中央政府，洋務派據有許多省區的地方政府及本系軍隊指揮權。李鴻章從同治九年起，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二十餘年，包辦外交，天津成事實上的政府，權力最大。這使兩派不得不互相

依賴，保持滿清政府的統一形式。但形式的統一並不能阻止實際的分裂。湘系軍閥（曾左兩系）佔南洋及福建造船廠地盤，淮系軍閥佔北洋及上海招商局地盤，彼此懷抱敵意。滿清政府利用湘淮不和，但對李鴻章疑忌最甚。西太后善以玩弄手段，放任頑固派議論國政，把這些議論當作『清議』『公論』來牽制李鴻章，不讓李氏集團過大的發展，李鴻章與郭嵩燾書說『都中羣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爲患，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與友人書說『清議之禍，與明季同出一轍，果孰爲之耶？』他在覆鮑華潭書裏，直截表示對西太后不滿，說『深宮端拱，樞廷照舊贊襄，遇事多下部議，操天下政權仍在書吏，非外臣所能力爭也。但冀因循敷衍十數年，以待嗣皇（光緒帝）親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變。』頑固派與李鴻章關係惡劣，幾乎到兩不相容的地步，陰毒的西太后不敢貶斥李鴻章是什麼原因呢？因爲他不僅擁有強大軍隊，更主要的是外國侵略者選擇他充當最順從的代理人。

李鴻章守定曾國藩的衣鉢，比其他軍閥更能取得略侵者的信任。曾國藩主張對外不抵抗，忠實服從屈辱條約，說『道光庚子（二十年）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強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同治九年覆陳津案各情摺）這是絕對服從的外交方針，正與頑固派盲目排外同樣禍國以至於亡國，李鴻章是這個方針堅決執行人。在侵略者不允『中外相安』的時候，例如

英俄掠奪新疆，曾國藩主張暫棄關外（玉門關），專淸關內（屠殺陝甘回民）李鴻章稱爲『老成謀國之見，』要求淸政府放棄新疆。左宗棠出兵西征，李鴻章竭力阻止，說『左倡率一班書生腐官，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卽其西路調度，不過爾爾，把握何在。』後來西征成功，湘淮兩系仇怨加深，南洋大臣劉坤一斥責李鴻章說『合肥自髮捻平後，所部分屯南北，每年糜餉幾千萬，而機器輪船槍礮不在此數，似此養精蓄銳，倘遇敵而不能一決，求爲賈平章亦不可得矣』（同治七年復李若農書。）湘系軍閥不曾承襲曾國藩的全部遺教，對侵略者還不能絕對服從因之湘系軍閥政治上地位落後於淮系。

李鴻章發揮曾國藩的洋務精神，外交上極端退讓，軍事上購買船礮洋槍，培養充足的對內武力。他辦洋務非常自負，說『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卽鹵莽，尠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中國日弱，外人日驕，此豈一人一事之咎。過此以往，能自強者儘可自立，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他把辦洋務說成中國自強自立的途徑，凡關於洋務的設施，都稱爲新政。』頑固派保存全部舊政，洋務派陸續增加新政，人民負担有增無減，中國愈貧愈弱，以之求自強自立必然得相反的結果。李鴻章抱着『聖之時』的自信力，主辦新政，支配軍事外交內政三十年，經中法戰爭破產了一部份，經中日戰爭全部破產了。

第二節　所謂『自強』的『新政』

一　新政第一期（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至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

本期新政以自強爲中心，所謂『強』就是練操，用洋軍器。同治元年，滿清政府令都司以下武弁，學習外國兵法。李鴻章派一部份兵丁隨英國兵頭學習炸礮，一部份隨德國兵頭學習洋槍。這方面曾國藩比較保守，奏稱『如果步伐槍礮一一習熟，臣當函商李鴻章派員轉教臣軍，』實際是拒學洋操。後來淮軍演變爲清末北洋新軍，洋操是個重要的原因。用洋軍器是湘淮軍一致的要求，但船礮槍主要從英國購入，自己設局製造止是補助性質，開辦不久就成官僚作弊的巢穴，結果很顯然，洋務祇求自強是求本集團自強而不是求中國自強。

同治元年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全用漢人，未雇洋匠，造成一小輪船，行駛遲鈍，不甚得法。』

同年李鴻章在上海設製礮局，『募外國匠人，由香港購辦造礮器具，鑄造開花礮彈，以資攻剿，甚爲得力。』

三年　李鴻章在蘇州設西洋礮局，『機器僅值萬餘金，不全之器甚多。』

四年　李鴻章在上海購得「洋人機器廠一座，能修活大小輪船及開花礮洋槍各件，實為洋涇濱外國廠中機器之最大者。價銀四萬兩」收買後改稱江南製造總局，先造槍礮。

同年　曾國藩購買美國機器（價銀六萬八千兩）運到上海，併入製造總局。六年，開始製造輪船。局內設汽爐廠、機器廠、熟鐵廠、洋槍樓、木工廠、鑄銅鐵廠、火箭廠（礮彈）。造船設備，僅乾船塢一座，兵商船隻仍須入耶松船塢（同治元年英人開辦）修理。附設繙譯館，聘英美人譯出汽機發軔、汽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採煤圖說等書，選聰穎子弟入館學習，造就機械工程師。

五年　左宗棠在福州設船政局，開辦費三十餘萬兩，每月經費約五六萬。機器及材料從法國買來，正副監督工程師都是法國人。局中工匠二三千人，雜工八九百人，多是湘軍弁兵，工廠等於兵營。又設前後兩學堂，前學堂學法文及造船學，後學堂學英文及駕駛術。共造大小輪船十五隻編成南洋水師。

六年　崇厚在天津設機局。

六年　李鴻章在南京設金陵機器局。

九年　李鴻章擴充天津機器局，分設四廠。

光緒三年　丁寶禎在成都設四川機器局。

四年　左宗棠在蘭州設機器織呢廠，聘德國人為技師，製造軍用品及普通衣料。

七年　吳大澂在吉林設機局。

上述各局全屬軍事性質，每年耗費巨大款項，雖然口頭上也說『禦侮』『自強，』實際是重在防內，並無對外的意圖、任事官僚營私舞弊，各飽貪囊，等於添設許多新衙門、福州、上海兩船廠較有成績，也止能購買外國材料仿造舊式船隻。這種局廠陸續出現，不是說明中國有了『自強』的基礎，而是說明洋務派勢力在不斷擴大。

李鴻章辦新政最多，從籌款困難，感到富是強的根本，在覆丁寶楨信裏說：『中國積弱由於患貧，西洋方千里數百里之國，歲入財賦動以數萬萬計，無非取資於煤鐵五金之礦，鐵路電報信局丁口等稅。酌度時勢，若不早圖變計，擇其至要者逐漸仿行，以貧交富，以弱敵強，未有不受其敝者。』他爲着求強而求富，試看其求富的結果。

同治十一年　李鴻章在上海創辦輪船招商局。

光緒四年　李鴻章在天津設開平礦務局。資本二十七萬兩，光緒八年增資本一百二十萬兩。

六年　李鴻章設電報局，奏請修築鐵路。

七年　開平礦務局造鐵路二十里，又延長六十里。

英人享條約特權，設太古、怡和等輪船公司，往來各商埠，中國長江外海的運輸事業，全被洋

人輪船、夾板占盡。股實華商，而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華人股份居其大半。李鴻章接受容閎的建議，設立招商局，招回華商股本，政府特許運漕米、空船減稅等權利。從三隻輪船開始，到光緒三年，已有輪船十二隻，又收買旗昌洋行，得船十八隻。太古等公司大跌裝貨噸銀，排擠招商局。李鴻章令各省撥借官本二百萬兩，維持營業。光緒七年，續備開拓海外航線，運華貨到外國直接貿易，派美富輪試航新加坡、小呂宋、檀香山一帶。又派和眾輪試航美國，被美海關無故扣留，大遭虧折，從此華船不敢出航遠海。外國侵略者願意中國辦造船、軍火等廠，因爲那些官僚機關，決不妨礙外國利益。帶資本主義性質的招商局，一開始就遭受外國的摧殘，因爲一個招商局成功，將會產生更多的招商局。馬關條約以前，外人還不能在中國設立合法的工廠，中國資本家有利用工價低廉的機會，如果資本主義發展起來，顯然對外國不利。再看中外貿易：

	輸入	輸出
同治三年	五一・二九三（千兩）	五四・〇〇六（千兩）
同治九年	六九・二九〇	六一・六八二
光緒二年	七九・二九三	七八・八八三

輸入額中除去每年平均七萬箱（每箱約值銀五百兩）的鴉片價，外國正當商品銷路有限，中國新工業儘有發展的餘地。招商局招股，商人踴躍投資，光緒七年，粵商擬組織輪船公司，直

接運貨到英國貿易（被李鴻章阻止。）但是資本主義終於不曾應時興起的原因，固然由於外國侵略者的壓迫，同時也由於封建勢力的摧殘，例如李鴻章就是招商局的扶助者兼摧殘者。他規定「官督商辦」的制度，說『由官總其大綱，舉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衆商。』事實完全由官紳包辦，不許各商自行經理。『關道荐人，』『每遇載運漕糧時，各省轉虧員紳』『隔省官員掛名應差支領薪水』『委任各員，任意開銷，浪費侵蝕，私囊日充，公款日虧，』等等弊端，被人告發，李鴻章一概袒護，不肯整頓。有力官紳『視爲利藪，羣思攙奪，徒成一供差場所，門前冠蓋如市，而有股份之商人，望之逡巡不敢前。』商人無權過問，還負『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的義務，當然不敢添股擴充。電報局同樣官督商辦，規定官報免費，收發電報。先官後商，結果『官報日多，商報日少，電報局賠累不堪。』官督商辦是封建勢力束縛資本主義的發展，招商局，電報局股東起初都對官府提出抗議和要求，後來却失望消極，讓官府任意侵蝕。

二　新政第二期（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

本期新政重心轉到求富，工業範圍擴大。因洋布洋紗輸入額逐年漸加，光緒八年，李鴻章奏請設立紡織局，謀堵塞漏巵。此後紡織工業逐漸增加，成中國產業界重要部門。各工業分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商辦四種，官辦佔絕對多數。光緒八年，李鴻章在上海奏設機器織布局。十六年

成立，資本四十萬兩。出品止完海關正稅一道，概免釐稅。十九年遭火災燒毀。官辦。

九　年　商人祝大椿在上海創辦源昌機器五金廠，資本五十萬元。造各種機器。商辦。

十二年　張之洞在廣州設廣東繅絲局。官辦。

十三年　張之洞在廣州設機器鑄制錢局及銀元局。官辦。

同　年　李鴻章在天津設寶津局，用機器造幣。官辦。

十四年　貴州青谿縣設貴州製鐵廠。官商合辦。

同　年　李鴻章聘英國技師造津沽鐵路，長一百七十五里，招集商股並暫借洋債及官款。官督商辦。

十五年　張之洞在廣州設廣東織布局。官辦。

同　年　張之洞在廣州設廣東製鐵廠。官辦。

十六年　李鴻章在上海設紡織新局。官商合辦。

十七年　張之洞在漢陽設漢陽鐵政局，及槍礮廠。開採大冶鐵礦及萍鄉煤礦。官辦。

同　年　上海道唐松岩在上海設機器紡紗局。官商合辦。

十九年　張之洞在武昌設織布、紡紗、製麻、繅絲四局。官辦。

二十年　大買辦盛宣懷在上海設華盛紗廠。商辦。

同　年　湖北設聚昌盛昌火柴公司。官商合辦。

光緒十三年起，機器輸入逐次增加，依據海關報告：

十三年	三九八、四〇七（海關兩）
十六年	四一〇、三四八
十七年	九〇〇、五〇〇
十九年	九三〇、六五一
二十年	一、一一九、七七七

工業顯然是在進步中。這種微小的進步，是受外國經濟侵略的刺激而產生的。光緒十二年以前，進出口貨相差不遠，平均入超總不出一千萬兩，除去大量鴉片，土貨出口仍佔優勢。十三年以後，差額大增，進口貨輒優勢。試看下表（單位千海關兩）：

	出　口	進　口
十三年	八五、八六〇	一〇二、二六三
十六年	八七、一四四	一二七、〇九三
十七年	一〇〇、九四七	一三四、〇〇三
十八年	一〇二、五八三	一三五、一〇一

十九年	一一六、六三二	一五一、三六二
二十年	一二八、一〇四	一六二、一〇二

以十八年爲例，是年主要進口貨如下（單位萬海關兩）：

鴉片	二、七四一	洋布洋紗	五、二七〇
毛織品	四七九	鋼鐵等金屬	七一三
米糧	五八二	煤、煤油	七〇〇
自來火	一四二		

一向居進口第一位的鴉片，被棉毛織物代替，然佔進口總額的半數，鴉片約佔四分之一，米糧棉布大量輸入，顯示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結合的社會結構遭受嚴重的破壞，農村及城市手工業的破壞，迫使中國統治者（洋務派及某些頑固派）不得不採取近代生產方法，但他們的封建性又決定他們新事業的失敗。

官辦工業有虧無盈，是一種消耗機關。官督商辦，官掌大權，商認虧損。官商合辦，官掌大權，各認虧損。純粹商辦，政治上無依靠，難得存立。因此，官最喜官督商辦，商希望「官爲保護，商自經理」。妥協辦法是官商合辦。上海方面商人勢力較大，所謂商，多是接近李鴻章的官僚、富紳、買辦，依政治力量，取得官商合辦或商辦的權利。有意投資的普通商人，仍多被官排斥。例如湖北紡紗

局，原議官商股本各半，張之洞派一個候補道當督辦，一個候補知府當總辦，變成官僚機關。商懇請減少官權，張之洞認爲商有『成見』，取消商股，改爲官辦。開辦以後，『局面大，耗費多』，營業虧損。張之洞奏稱『湖北織布廠一開，而江漢關進口之洋布已歲少千餘萬匹』。官辦工業成績就是這樣的紙上誇張。陝西集股創用機器織布說略，代表當時普通投資人怕官心理，它在第一條裏說『擬官紳商合力商管銀錢帳項賣買，紳管學習機器教訓學徒，官主保護而不侵利權，即有事涉衙門，有紳承當，不累商民，無可疑懼』。不侵利權的官與不勾結衙門的紳，事實上絕少存在，因之商辦工業也絕難成立。

官辦必取督辦獨裁制，得任意吞蝕；商辦必取股東民主制，不容許貪汚。洋務派樂於官辦，反對商辦的眞實原因在此。官辦工業前後三十三年，有些什麽成就呢？『凡百施爲，類皆虛僞。工料之發給，十每不得五，價値之浮銷，或竟報三』。（光緒七年劉錫鴻奏）就最著名的福建船政局爲例『所造輪船，舉不堪用。美國暨日本人談及，有責洋監督日意格（法人）之無良，有爲日意格原諒其難者，蓋方今所謂製造若此其不足恃也』（劉錫鴻奏。）這是官辦工業的通病，各省設立廠局並無例外。

『每年動用正款以數百萬計，而所成之物，若經由外洋購買，或由洋匠承包，實可減半。官廠每製成一器，價比外洋尤昂，而復草率不精，形模徒具，往往取笑洋人，旋生狎侮，如此雖百年，終無

生色』（光緒二一年鍾天緯：擴充商務十條。）官辦工業的腐敗與政治腐敗是一致的，它是人民的一種負担，也是商辦工業的一個障礙。鍾天緯主張『令民間多開私廠，或即以官廠租給商人，每年收取租息。聽其爲民製造機器輪船，及一切開礦、挖河、抽水、磨麥、紡紗、織布各機器。』這種主張，符合當時新興工業的要求，但決不能獲得官僚資本的允許。

商辦工業受壓制。自然產生微弱的民主思想。例如陳虬批評『新政』說『愚以爲泰西富強之道，在省議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其末（創設議院以通下情論）許象樞著議院利害若何論，斷言議院『有利無害。』君主立憲思想的發生，反映商辦工業對官辦工業的不滿，同時也對政治不滿，以上海知識界爲中心，在思想上開始準備着戊戌變法運動。

第三節　新政第一次破產（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戰爭以前）

一　李鴻章的外交策略——一意主降

天津、北京條約以後，英法俄準備割奪中國領土，先從邊境入手。同治五年英國威妥瑪呈遞新議略論，向滿清提出瓜分警告，說『英國早得緬甸一分，法國已在安南，俄國分在西路（新疆）朝鮮之外。或問三國誠有必占內地之心乎，此理姑無深論。要在英國已在緬甸，離雲南不遠；法國

已在安南；離廣西不遠；俄國不必再論。可慮者不在各國有無侵占之心，而在各處有易侵占之勢。』侵略者公開表示領土野心，滿清政府還看作『危詞恫嚇，傲慢之談。』

頑固派『以不談洋務爲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鄭觀應盛世危言。）對外交事件動輒主戰，寧願戰敗求和。醇親王奕譞（頑固派首領，光緒帝生父，西太后親信人）所謂『不能使彼不來，要雖來而不懼；不能遏彼欲戰，要在雖戰而不虞。然後再講和約，可免別生枝節』（同治九年論天津教案奏）這種不可理解的語言，正代表頑固派的思想。非李鴻章系的洋務派多附和頑固派先戰後和論。

李鴻章系洋務派以北洋爲地盤，辦理新政，特別注重北洋水師。購買大批外國船礮，竭力超過南洋水師。南洋屬湘軍系地盤，水師用福州、上海船廠自造船，外國船極少。北洋水師多用外國船礮，陸軍全用外國後膛槍，頑固派及湘系洋務派又羨又忌，要北洋出兵一戰。李鴻章以爲『中國兵輪開辦未久，斷難驟敵西洋，』堅持『含忍議款，徐圖自強，』就是說，兵力不敵，必需講和。他那樣辦新政，永遠不會有自強的一天，因之他永遠是投降主義者。

英法俄及後起的日本要分割中國的土地，頑固派要先戰後和，李鴻章要和而不戰，交織成瓜分的第一步。

李鴻章說，『中國兵輪開辦未久，斷難驟敵西洋。』但喪失滿國給外國，恰恰從對同樣『開

辦未久』的日本開始。琉球事件是洋務派新政破產的第一次宣言。

二　喪失琉球（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

一八六六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變法維新，開始對華侵略。同治十二年，日本政府藉口琉球船遭風到台灣，被生番刼殺數十人，向淸政府交涉。淸政府稱『二島俱屬我土，土人相殺，裁決固在我，何預貴國事？』日使無言可對，摘引答辭中有『生番化外，我政府未便窮治』這句話，曲解爲台灣番地不屬中國版圖。十三年，出兵三千人進攻台灣。日本當時還是貧弱小國，它敢於輕率動武，是事先取得英美法三國的援助。美國李仙得替日本當謀主，叅贊軍事，英美輪船替日軍運輸，英法海軍還伴同日兵船到台灣、廈門，替它壯膽。這顯然是西洋侵略者自己將要掠奪，讓日本首先侵入台灣，試探滿淸的態度。日軍攻番社，被番民據險擊敗，退守龜山，設都督府及病院，修橋築路，意圖在台灣蟠踞。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帶海陸軍到台兵力遠勝日軍。英美公使出面調停，代日本要求兵費三百萬兩。沈葆楨奏稱『倭備雖增，倭情漸怯，我但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又通知李鴻章，『不必急於行成。』李鴻章也明知『日船非中國新船之敵，』『中國兵將之衆，斷不畏彼三四千人，』但英美各抱野心，美國軍事上露骨的助日，英使威妥瑪口頭上橫蠻的恫嚇，迫使李鴻章決計屈服，令守台軍不准『開仗啓衅。』訂立條約，承

認「台灣生番將日本國屬民殺害，」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中國不指以為不是，」把五百年來忠實的藩國琉球含糊送掉又賠償日本兵費五十萬兩。琉球事件開了割地賠款的惡例，此後李鴻章忙着辦割地外交。

三　馬嘉理案（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

滿清辦理外交的傳統方法：一種是『非委曲順從，即含糊答應，畏夷如虎，視民如草』（咸豐八年奕訢論耆英辦夷務。）一種是『凡外國要辦一事，必要多方推阻，及至他國恃強舉行，亦不過問』（威妥瑪與李鴻章論總理衙門辦事。）兩種方法都從先戰後和論產生，先戰所以多方推阻，後和所以委曲順從，結果是『案出之初，小者細者未允，後則允其大者，仍不能結』（李鴻章致總署書。）李鴻章另有一種方法，是『彼雖無禮在先，我未便失禮在後，姑且忍氣耐煩，實為保全和局』（與美公使談日本侵台灣。）這是有求必應的方法，最得外國侵略者稱許。駐北京外交官熟悉情形，辦理交涉，一言不合，動輒拍案叫囂，以下旗絕交，調兵開戰作外交手段，儼然自居殖民地主人地位。例如英使威妥瑪辦馬嘉理案，對李鴻章痛斥總理衙門，說『中國所辦之事越辦越不是，就像一個小孩子活十五六歲變成一歲了。總理衙門辦事大臣非先換幾個人不可。』李鴻章被他那種『憤激不平之氣，狂妄無理之言，』嚇得『殊深駭異，』更堅信自己有求

必應是『一了百了』的好方法。

英國要開闢滇緬交通，同治十三年，軍官柏郎帶兵從緬出發，北京英使館派翻譯馬嘉理從雲南入緬迎接。光緒元年，馬嘉理回雲南，傳說英兵隨後將攻騰越城。雲南巡撫岑毓英殺馬嘉理，調兵守邊境。威妥瑪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三條，總署駁斥不准。威妥瑪與俄公使密商，英向雲南，俄由伊犁進兵，迫滿清屈服。威妥瑪出京，對李鴻章表示怒意。清政府開始恐慌，同意李鴻章保和局的建議。威妥瑪提出六條，又另提七條，要求範圍愈益擴大。總署接受條件比李鴻章少，交涉停頓。威妥瑪威嚇總署，說『中國不照辦，是自取大禍』，提出更廣泛的要求六條，又改成八條。總署根據新要求商議，威妥瑪堅稱撤回所提條件，率眷屬及一部份館員出京，表示決裂。李鴻章挽留在天津商議，威妥瑪痛斥總署，說『而今我心已灰透了』，要把雲南事交與印度總督辦理，各海口交與水師提督辦理，英商稅餉概不准完納。他不受李鴻章挽留，去上海裝作在準備開戰。這是威嚇，足夠地嚇倒清政府，總署不再想如何推阻而是想如何取得任何條件了。威妥瑪經各面勸說，要清政府派定全權大臣，才肯商談。自然，非李鴻章不可。光緒二年，李威在煙台訂煙台條約，允許（一）印度總督派人到雲南調查五年，準備『復訂滇緬邊界及通商章程』。（二）英使館派人遊歷甘肅青海一帶，又由四川等處入西藏，前往印度，探訪藏印路程。（三）英國派按察使在上海設立承審公室，中國在租界設會審公堂，擴大領事裁判權。（四）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爲商埠。（五）

規定鴉片稅及其他洋貨捐。

馬嘉理案關於撫卹金、懲兇、道歉等款在條約裏是不重要的，英國借題發揮，目的在取得極大的額外權利，首先是緬甸的主權，英國有權訂滇緬邊界，等於滿清承認英國佔有緬甸全部。

四 伊犂交涉（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

新疆回民受滿清特別殘酷的統治，比內地回民苦痛更甚。同治三年，起兵反滿，五年，浩罕會長阿古柏自中亞細亞侵入天山南路立國稱王，得英、俄、土耳其承認。天山北路，回民攻陷伊犂，殘殺漢民，秩序混亂。十年，俄兵佔據伊犂，拒絕交還中國。十一年，左宗棠攻滅關內回民反滿軍，準備進取新疆。當時湘淮兩系軍閥因琉球事件發生嚴重的爭論。李鴻章立主放棄新疆，「准其自為部落，如雲貴粵蜀之苗猺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集中財力「作海防之餉」（同治十三年李鴻章籌議海防摺）左宗棠力主規復新疆，認為「關外一撤藩籬，雖欲閉關自守，勢有未能」（左宗棠覆陳海防塞防及關外情形摺）清政府支持左宗棠主張，准其借貸外債充軍餉。左軍出關是先攻北路，轉取南路，節節勝利。英國原想利用阿古柏，乘機吞併南路歸印度，讓沙俄取北路，平分新疆。英公使勸李鴻章阻止滿清用兵，這個洋務派首領奉外國人命令，對西太后，左宗棠表示極大的怨恨。光緒四年，左宗棠收復新疆南北兩路，索還伊犂的交涉開始。

光緒四年，清政府派崇厚往俄京索還伊犂。崇厚是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當事人之一，曾到過法國謝罪，這在滿人中算是外交家了，清政府特給『全權大臣便宜行事』頭銜，希望他人去地回，折漢人尤其是李鴻章的銳氣。不料崇厚到俄京索得伊犂一個城池，却簽訂割讓大塊土地、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合銀二百八十萬兩、新疆到漢口陸路通商、松花江航權等十八條款，喪失巨大權利。消息傳來，輿論大譁，要求改約。左宗棠主張『先之以議論（交涉），決之以戰陣。』這種和戰並用法，得清政府及湘系軍閥的贊同、李鴻章發揮他的投降主義說：崇厚所定俄約，行之雖有後患，若不允許，後患更亟。』又說『此次崇厚出使，係奉旨給與全權便宜行事字樣，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鄰之道，先論曲直，曲在我而侮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論曲直，曲在我而師必不壯』（李鴻章：籌議交收伊犂事宜摺）這裏所謂曲直，止是出讓伊犂的一種藉口，企圖借俄制日。當時日本利用中俄之爭伊犂，正式滅琉球國，改爲沖繩縣。琉球使臣哀懇保護，李鴻章以爲『黑子彈丸之地孤懸海外，遠於中國而邇於日本』，決計放棄。他怕日本得美國支持，不可力敵，要求履行崇約，換取俄國的援助，防日本侵犯台灣、朝鮮，奏稱『倭人畏俄如虎，與其多讓於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倭。』他始終玩弄『借夷制夷』政策，向雙方出讓權利，誘起強國互爭，最後向更強者提供報酬，自己得保存本集團勢力。湘系軍閥看破他的用意羣起反對，兩系勢成『水火』（劉坤一：復李若農書）別一洋務派

首領張之洞斥責淮系說「李鴻章歲糜數百萬金錢以製機器而養淮軍，若並不能一戰，安用重臣。」這樣的改約空氣，迫使清政府違反李鴻章的主張，專用湘系中人對俄交涉。

光緒六年，派駐英公使曾紀澤爲出使俄國欽差大臣，交涉改約。俄海軍到中國海面示威，清廷調曾國荃守山海關，鮑超駐北京，劉坤一守長江，都是湘軍舊將。祇派淮軍担任津沽一路，以示決心一戰。俄國新與土戰，欲事休息，乃於光緒七年重訂中俄條約，中國多少收回一些土地和權利。

五　中法戰爭（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

同治元年，法國攻安南下交阯（南圻）迫訂西貢條約，割西貢、東埔寨等地。法國原想從湄公河、瀾滄江直通雲南，後來發現二水不能通船，改圖東京（北圻）想從富良江（紅河）入雲南。十二年，法兵攻陷河內，不久退出。十三年，訂法越和親條約，法國承認越南爲獨立國，實際成了法國的保護國。光緒五年，越南派貢使向清政府乞援，廣西巡撫劉長佑（湘系軍閥）示意越使招劉永福助戰。劉永福是太平軍將領，天國滅亡，率部逃入滇越邊境，開闢山林，聚衆耕牧，成一獨立大部落，號稱黑旗軍。劉長佑這一表示，對劉永福算是解除敵意，對越南算是予以援助。越南招劉永福爲三宣副提督，管宣光、興化、山西三省，扼守富良江兩岸。

法兵攻河內，謀開通航路，黑旗軍勇敢善戰，又得雲貴總督岑毓英暗助軍火，屢敗法兵，法不得逞。

光緒七年，曾紀澤向法外交部交涉，聲明安南是中國屬國，中國政府不能承認『法越前訂之約。』李鴻章向法公使聲明『越南屬中國已久，貴國如欲吞滅，中國斷不能置之不問。』法外交部答詞強硬，法公使答詞含糊。曾不認法越私立條約，李默認條約，但求保持朝貢體面，二人方針不同，引起湘淮兩系大爭鬥。

光緒八年，曾紀澤向清政府建議七條辦法。按當時中法越三方情勢，曾氏所提七條，應該說是外交上比較妥善的途徑。李鴻章逐條駁斥，又不提自己的辦法，牽強矛盾，毫無理由，純屬派系間鬧意氣。清政府昏愚無知，不採曾氏建議，信任李鴻章，進行盲目的被動的錯亂外交，遭受大失敗。安南事件中，李鴻章充分表現了賣國的罪惡。

下面簡述曾李二人意見：

（一）曾　令越南派遣大員長住北京，傳達中越雙方情況。

李　照定制，陪臣不得住京師。

（二）曾　令越南派員到中國駐法使館，作為使館隨員，傳達中法交涉情況。

李　法越新約第二條，法認越南有自主權，越可遣使駐法，未必肯作中國使館隨員。且法政府聞知

必有責言，轉增疑釁。

（三）曾　通知越南切不可再與法人輕立新約。

李　兵威脅迫，難免續立新約。

（四）曾　勸越南開放紅江，宣稱「現遵中國之命，將紅江開設通商埠頭，尤與西洋各國貿易。」各國見我與越南「情不隔閡，可省無數覬伺之心。」

李　中國不認法越之約，似未便明勸越南於紅江開埠通商。若勸之，是認此約矣。

（五）曾　法人常以紅江多盜爲言，無論盜之眞假，越南宜以除盜自任，力不足則求助於中國。

李　紅江上游若果多盜，正可阻彼通商之意。

（六）曾　法越條約西洋各國並未認之。

李　無各國不認之證。

（七）曾　勸越南嚴束士民，勿與法人以口實，殺人焚屋等事皆無益而有害。

李　越境遍地教堂，殺人焚屋等事在所難免，但在臨時辦法若何。

李鴻章完全抹煞事理，任意亂駁，是什麼用心呢？第一，曾紀澤修改俄約成功，聲望大增，他害怕湘系有人奪取他的外交上地位。第二，他把藩屬國看作可有可無，不值得爲越南開罪法國。歸根說來，除了保持北洋地盤及淮系權利，其他一切都可退讓，是李鴻章的宗旨。

法國要開通紅河，劉永福誓死不肯退讓，法兵攻陷沿海城市，但無法消滅內地黑旗軍。八年，

法公使要求清政府令中國軍隊後退，讓法國進兵驅逐黑旗軍。清政府反對『我退而彼求進，』主張中退法不進。李鴻章致書總署，替法公使竭力辯護，說『細察該使用意，並無我退而彼將求進之心，恐其譯漢忽促，文義不甚分明耳。』又說『彼實力願和好。』他把侵略者說成那樣『和好，』總署同意他和法公使在天津議定的三條原則：（一）中國撤兵，法國聲明無侵略土地及削貶王權之意。（二）安南開放保勝（黑旗軍根據地）。（三）二國分界（紅江中間之地劃界，）保護安南共禦外寇。第一條是中國放棄安南，第二條是承認進攻黑旗軍爲合法行動，第三條中國取得邊外一些土地，防黑旗軍戰敗退入邊境，所爭得的止是法國聲明安南名義上不是法國保護國，反言之，還是中國的屬國。

這一條約的訂立，遭到各方面反對。中國方面，張之洞、張佩綸爲首的所謂『輿論』一致主戰；岑毓英支持黑旗軍阻法人入滇不肯撤兵；曾紀澤主張強硬交涉。法國方面，議會堅主甲戌（同治十三年）條約既得權利，認政府交涉失敗，改組政府，撤換駐華公使，出兵壓迫越南。九年中法交涉轉入緊張階段。

法國派海軍大將孤拔率艦隊進攻越南，法新公使向李鴻章聲明『無與中國失和之意，但不能認越爲中國屬邦。』李鴻章主張退讓，以爲『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曾紀澤因法議會中反對派不贊成用兵，力主『暗助越以兵與械，吾華添兵

勢宜趁早，兼可聳其輿論」爭議焦點在黑旗軍，法要求中國勿暗助，讓法軍進攻。清政府默許岑毓英暗助黑旗軍，利用它抵抗法軍。李鴻章不能勸清政府撤退駐越軍隊，又不能私允法國要求，索性在形式上採不負責態度，等待軍事上失敗。他公然提出失敗主義的新辦法說，『我勝則法必添兵再戰，我敗則尚可退囘本境，法必不遽深入，亦尚不至牽動大局。屆時再徐議分界劃守，妥議收場。』總署要他撥後膛槍接助滇桂各軍。他說北洋所存無多，南洋存有二萬桿，請令左宗棠指撥。他明知『滇桂各營後膛快槍既少，或有槍而缺子彈，徒以肉薄拚擊取勝，』他又明知南洋各軍還『前後膛參用，』而北洋各軍一律改用毛瑟等新式，舊式後膛鎗已廢棄不用。要南洋援助滇桂，這不是湘淮暗鬥等待失敗是什麼？滿清政府內部和戰不定，意見分歧。法國在越發動戰爭，逼迫越南訂順化（越南都城）條約，確定越南爲法國保護國，脫離對中國的朝貢關係。

十年，中法交涉進入最緊張階段，李鴻章也施展出最卑劣的賣國手段。

曾紀澤向法政府不斷提抗議，李鴻章認爲『法外部與劼剛（曾紀澤）嫌釁已深，以後難商此事，』勸總署調曾紀澤爲駐英公使，派淮系洋務人員李鳳苞爲駐法公使。法國與李鴻章在天津議和，清政府提出四個條件：（一）維持朝貢關係。（二）杜絕雲南通商。（三）保全劉永福。（四）不賠兵費。李鴻章不向總署商議，私自訂定天津簡明條約：（一）中國退兵；不與聞法越條約；（二）許雲南邊境通商；（三）法保護越南，不侵佔中國邊地；（四）不索兵費。簽押後含糊奏請批准。清政

府要保全劉永福，還多少有些公道，李鴻章却評蔑「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爲仇，實爲邊境後患。」又說「劉永福黑旗一軍，前後乘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切齒，必欲報復，」建議遣散，替法人報仇。法內閣當然滿意，外長給他電報說：「中堂所見兩國公共利益並未來之事，竟與我輩相同，顯有證據，下懷曷勝欣幸。」李鴻章復電說「彼此爲難之隱衷兩地心照，切盼。」似乎出賣越南不夠爽利，表示抱歉。他這樣迎合法國，以爲可以了事，但緊張形勢反因祕密訂約更趨惡化。

李鴻章的計劃是一面欺瞞清政府，一面祕密通知淮系軍閥兩廣總督張樹聲、廣西巡撫潘鼎新自動撤兵，使雲貴總督岑毓英勢孤不得不退。預料法軍消滅黑旗軍，清政府也就承認既成事實，履行天津簡明條約，決不敢出面抗法。他給張樹聲密電「法必欲逐劉，實非與岑爲難。岑素機變，臨事當自審進止。法亦斷不過我界。乞密致琴軒」（潘鼎新。）法國根據李鴻章的口頭約定，派兵巡邊逐劉。當時潘鼎新還沒有接到張樹聲密電，說法軍行動，顯與條約相反，主張「一意與戰，較易著手。」清政府發覺李鴻章欺瞞，詰問「法使與該督所談巡邊及驅逐劉團各節，何以不早上聞，豫爲籌畫？」給他「傳旨申飭」的處分。李鴻章無話可對，暫時沉默，清政府傾向主戰論。佈置對法戰爭。

清政府調主戰論者張之洞爲兩廣總督。命岑潘駐越境「按兵不動，如彼族竟來撲犯，惟有

與之接仗』令岑毓英『照常接濟劉永福一軍，使爲我用』令李鴻章照會法國：『儻法兵來犯我營，則釁自彼開，即不能保全和局』令主戰論者張佩綸爲會辦海疆事務，助船政大臣何如璋督福建海軍戒備海面。五月，中法海陸戰爭開始。

陸路戰爭第一期（光緒十年五月至十二月）

岑毓英助劉永福作戰，態度是堅定的。潘鼎新服從李鴻章密示，要求退回國境，清政府嚴斥『該撫上次電信，亦有一意主戰，較易著手之語。目前法人有意尋釁，何以該撫又有礮械不至，米糧缺乏等語，豈欲以此爲卸責地步耶？』又通令各軍不准稍退示弱，違令者按軍法。潘鼎新被斥責，不得不戰，但戰意淡薄，不願主動出擊。法軍着重向潘軍攻擊，聲稱不管『和與不和，二月必要諒山。』潘鼎新被迫回擊，法軍戰敗退三十里，戰後向李鴻章解釋說『若非併力抵禦，則全軍皆爲所乘，非我往攻法營也。』李鴻章『敗固不佳，勝亦從此多事』的指示，使潘軍不敢『一意與戰』。法內閣密電質問『閣下（李鴻章）允西曆六月六日即中曆五月十三日諒山退兵，何故並未照行。』李鴻章被法內閣質問，急欲改變清政府的主戰態度。孤拔帶兵北上，清政府也起恐慌，同意李鴻章的主張，表示『尊意即是部意』要他出面講條件，前敵更成和戰混亂的狀態。法海陸軍進攻福州，留越南法軍兵力微弱，但潘鼎新軍並不出擊。

海上戰爭

北洋大臣李鴻章管北洋水師，南洋大臣曾國荃管南洋水師，船政大臣何如

（十年六月至十二月）

璋管福建水師，各有船十餘艘。南北洋大臣地位均等，不相統轄，福建水師半附屬於南洋，但不歸南洋指揮。南洋、福建水師成立較早，暮氣最深，兵船迎送官員，拖船載勇，從不操練。六月孤拔率兵船十三艘北上，攻毀台灣基隆礮台，法兵四百攜礮四尊登陸，巡撫劉銘傳（淮系軍閥）擊退法兵，殺傷數十人，奪礮四尊。法船開入馬尾，船政大臣何如璋恐妨礙和議，不敢阻止。華法兩國兵船同泊一處，華船被禁止移動，何如璋等仍不令海陸軍備戰。七月，法通知何如璋定期開仗，何如璋堅守秘密，對部將說：『昨得李相電，尙言和議大有進步，所云必係謠傳。』到時法船大礮齊發，華船倉猝拔錨應戰。但戰機全失，船隻相繼被擊沉。福建水師陣亡將士七百六十人，他們在投降主義者統率下，就是這樣敗死了。法船礮擊船廠後，退出馬尾，被礮台擊傷兩艘。李鴻章替法軍誇張勝利，稱法船『燬閩船不過數刻，』證明萬難與敵。他拒絕派船救台灣，要南洋單獨負責，又拒絕助南洋軍火；以爲『無須借助北洋。』南洋也同樣不肯實力援助台灣，劉銘傳要求李鴻章說『南北洋輪船如肯出戰，法船不難驅逐出境，倘求統顧全局爲盼。』清政府訓斥左宗棠：『當此時機緊迫，仍存湘淮畛域之見，不能和衷協力，妥籌援剿，致台北孤危（基隆水陸失守）貽誤大局，定惟左宗棠是問。』事實上左宗棠無力援救，李鴻章有力不援，責左不責李，止增湘系的不平。如果當時湘淮海上合力，滇桂陸路齊心，中法戰爭失敗者不一定是中國。

十二月，法海軍攻浙江鎮海縣海口，礮台守將歐陽利見（湘系）擊斃孤拔，法海軍退去。

六月初馬尾戰前，法船駛入馬尾，與華船同泊一月，不見華船備戰形跡，法內閣報告議會說『中國萬不敢戰，四千人可擾七省。』議員准許政府用兵恫嚇（李鳳苞致李鴻章電）李鳳苞建議『雇德兵五十人赴華，法人知之必疑爲畢相暗助』這種可恥的奴隸謀略，大得李鴻章讚許，令李鳳苞撥給川資送『來北洋差遣』。馬尾戰後，李鴻章忽得『德相畢士馬赴巴黎結法圖華』的消息，大起恐慌，認爲『大局將不可收拾』求和更急。越南方面潘鼎新軍受李鴻章指示，戰勝不追，戰敗則退，士氣非常低落，法軍專攻潘軍，諒山守將蘇元春棄城退回邊境。

陸路戰爭第二期（十一年正月至二月）

潘鼎新軍退走，西路岑毓英、劉永福兩軍攻勢猛烈，獨力支持越境戰局。張之洞請出七十歲的退伍老將馮子材率粵軍援桂，駐鎮南關。二月，法大軍分三路進關、馮子材率總兵王德榜死力抵抗，蘇元春往援各軍『悉力分勦，大譴勝仗，追賊出關，割取首級一百餘，傷賊一千餘人，』潘鼎新電稱『自越中用兵未有如此大捷者，』點驗各軍呈繳首級『皆係精壯洋人。』馮王蘇都是綠營兵，武器極舊，甚至還用刀矛衝鋒。潘軍不是沒有戰鬥經驗，又用新式毛瑟鎗，節節敗退，完全是接受李鴻章失敗主義的影響。滇粵兩軍『將士一心，願效死力，傷亡雖多，士氣復振，』分路攻擊法軍，每戰必勝，法公使急請和解，願退出基隆，不押海關，不索兵費（曾要求八千萬佛郎）但求批准天津簡明條約。馮子材率兵進攻，大破法軍，

克復諒山，法統帥納克列耳受重傷，收殘兵敗逃。馮軍追逐，不戰取得文淵城；馮子材王德榜約會西路滇軍，乘勝進攻北寧河內兩省，西貢內應也已約定，準備驅法軍出越南。法議會大譁，內閣辭職。李鴻章電總署說『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二月十九日，中法在巴黎簽訂議和草約，根據法方所提條款不加討論，也不讓曾紀澤與聞，簽押後一日、才通知他。這在李鴻章說來，淮系在外交上戰勝了湘系。

草約訂定，上諭各路軍三月一日停戰，十一日撤兵。張之洞希望停戰前攻下北寧，李鴻章傳旨斥責說：『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恐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著該督遵旨飭電各營，如期停戰撤兵。倘有違誤，惟該督是問。』馮子材、王德榜止得放棄收復的城池，奉令撤回，在三月初一日子刻，即停戰開始一刻給張之洞一個電報；『去歲上諭議和者誅，請上摺誅議和之人，士氣可奮，法可除，越可復，後患可免。』作爲前敵將士被迫停戰時向賣國賊提出忠憤的抗議。

六　喪失緬甸（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

英國侵略緬甸，咸豐年間已割取南部各地。中法戰後英軍乘機攻滅全緬，清政府毫無違抗地訂約承認吞併的事實。連安南緬甸間老撾（南掌）地區人民反抗激烈，英人自願退還中國

淸政府也不敢接受，老撾歸入暹羅。

七　北洋海軍的擴充（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至一八八九年——光緒二十年）

海軍是當時新政的中心，外交上每一次失敗，李鴻章總是說，水師還未練成，船艦尙須添置，不得不『含忍議款。』他搜括大量金錢，向外國購置兵船槍炮，認爲是唯一的自強之策。至於中國官僚政治所產生船廠制度的腐敗，海軍操練的鬆懈，海軍將弁任用非才，暮氣日深，購械官員的貪汚（例如李鳳苞購買鐵甲艦勾串外國流氓，貪汚至百萬兩，被人告發，奉旨革職查辦；）他都不以爲意，止知出高價買外國廢船舊礮，裝飾門面，鞏固淮系軍閥的權勢。他在光緒六年妥籌（放棄）琉球案奏摺裏說：『數年之後，船械齊集，水師練成，聲威既壯，日本囂張之氣當爲之稍平，即各國輕侮之端或亦可以漸弭。』事實證明他所謂『數年之後』是遙遠無期的，也永不會有『聲威既壯』的一天。

中法戰爭，湘淮畛域太顯著了，淸政府乘機收回海軍，企圖統一指揮權。十一年九月，設立海軍衙門，派醇親王奕譞爲總理海軍事宜，慶郡王奕劻、李鴻章爲會辦。善慶、曾紀澤爲幫辦。五人中滿洲貴族佔多數，但實際權力仍在李鴻章。北洋利用海軍衙門整頓海防的名義，新添不少外國船，別處較好船隻都撥到北洋來。從十一年到十七年，李鴻章的新政達最高點，北洋有新舊大小

船艦二十五艘，他第一次發出滿意的聲明說：『綜合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李鴻章：校閱海軍情形摺）在清政府害怕漢人擁有強大武力的猜忌下，戶部尚書翁同龢藉口籌餉，停止南北洋購買外國槍炮，船隻，機器撥款，將所有價銀解戶部充餉。海軍經費原定每年四百萬兩，奕譞希望西太后歸政給他的兒子（光緒帝），贊成西太后修頤和園，移海軍經費營造。李鴻章為了結交西太后和奕譞，以鞏固權勢，不但自己同意提款，更力勸南洋大臣曾國荃同意。光緒十四年以後，停止添船，十七年以後又停購軍火。園工所費銀約三千萬兩。這雖然應以西太后為首惡，但李鴻章實是大幫兇，他却無恥地推諉甲午戰敗責任，歸罪於移款修園，軍力不充。實際上船炮不及日本只是次要因素，他的投降戰略指導才是主要原因所在。

自同治元年開始辦『新政，』到中法戰役，已歷二十四年，新政的成績，在『自強』上是不堪一戰。在政治上是造成湘淮軍閥割據對立，在外交上是割地喪權。總之『新政』在中法戰爭中表現了開始破產。不過洋務派是不能也不願覺悟的，仍繼續其『新政』等待更大破產的到來。

從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十年，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是著名的洋務派首領，李鴻章、張之洞開辦各種工廠尤稱出色，但絲毫不見『富強』的實效，重要原因就在軍閥官僚把持機

器，規定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阻止機器與民間資本結合。洋務派愈『富強，』必然是人民愈貧，國家愈弱，把洋務派創辦新工業，看作中國富強的基礎，那是完全錯誤的。因此也就招至甲午中日戰爭時的慘敗，『新政』受到澈底的破產。

第六章　甲午戰爭及第二次割地狂潮——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

第一節　中日朝鮮交涉（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至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年）

明治的維新變法，資本主義在日本逐漸發展起來。它和封建經濟結合着，表現出特別強烈的侵略性，明治時代就奠定了大陸政策，企圖征服中國甚至世界。照田中義一奏摺所說，『明治大帝之遺策』是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日本在英法美主要是美國的援助下，開始侵略台灣，結果割取了琉球。南進政策獲得初步成功以後，仍在美英援助下，向朝鮮侵入。美國要開放朝鮮市場，英國要阻止沙俄南下，日本要奪取『渡滿洲的橋樑』，沙俄要乘機插足朝鮮，國際鬥爭集中在海東一角上，應付這個危局的是滿清政府和李鴻章，外交逐步失敗，最後發生軍事上大失敗。

朝鮮交涉經三個時期：第一期爭宗主權，第二期引俄制日，第三期恃俄拒日。

爭宗主權（一八七五年——光緒元

光緒元年，日本軍艦到朝鮮江華島測量海口。日艦無故侵入領水，礮台開礮示警。日艦乘機攻毀礮台，登陸屠殺兵民無數。日政府作爲侵略的藉口，派軍艦迫

（年至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

韓政府訂立江華條約，認『朝鮮爲自主之邦。』滿政府並不正式對日抗議，僅由李鴻章密勸韓政府『用以敵制敵之策，與泰西各國訂約，藉以牽制日本。』李鴻章對朝鮮交涉，主張聯日拒俄，以爲日本『與美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可以『與中國高麗併力拒俄。』對同一時候的伊犁交涉，則主張『姑讓與俄以取償於日本。』這似乎是矛盾，但從他的投降主義說來，却是一貫的宗旨。因爲『聯日』『讓俄』是其主張。『拒俄』『取償』是欺人的辭令。光緒三年，日本內亂，李鴻章私贈日政府後膛鎗子十萬粒，說是『救災卹鄰，以示敦睦。』中法戰爭，他拒絕給南洋任何援助，對侵略琉球台灣朝鮮的日本，他瞞着清政府接濟軍火，這樣一個排內媚外的外交主持者，朝鮮的前途可想而知了。

日本扶植朝鮮失意官僚，組織所謂開化黨，反對把持國政的事大黨。光緒七年，開化黨得勢。八年，事大黨利用兵變，燒日本公使館。中日兩國各派海陸軍到朝鮮，成對立的形勢。朝鮮國王接近開化黨，企圖脫離滿清，實行『獨立。』十年，中法開戰，開化黨乘機作亂，勾結日兵入王宮奪取政權。清軍得朝鮮人民援助，擊敗日兵，亂黨逃往日本。十一年，中日談判朝鮮問題，李鴻章要求雙方同時撤兵，又允許兩國對朝鮮有同等派兵權，事實上承認中日共同保護朝鮮。十一年，中法戰爭結束，日本軍閥主張三年內與中國一戰，奪取朝鮮，理由是『中國自戰法以後，於海陸各軍，力求整頓，若至三年後，我國（日本）勢必不敵。』這樣粗率的觀察，說明日軍閥對中國情況完全

無知資產階級代表伊藤博文反對軍閥的速勝論，說『所云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雖此時外面於水陸各軍，俱以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論。現當法事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爲，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所說，中國又睡覺矣。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三五年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中國駐日使館密探朝比奈報告。）這種觀察是深刻的，日政府採用伊藤的建議，專力向朝鮮伸張勢力。

引俄制日（光緒十一年至二十年）

開化黨政變失敗，日韓間關係惡化，中國因擊敗日兵，救護韓王，勢力一時擴大起來，當時代表滿清駐韓的官員，一個是袁世凱，一個是德國人穆麟德。袁世凱在中日撤兵前，經張謇推薦任駐韓淮軍吳長慶部前敵營務處，顯出辦事的才幹。吳軍撤回，李鴻章給他『總理』名義，留韓監督政治。他抱着個人建立功名的野心，曾企圖滅韓國，廢韓王，對韓政府態度傲慢，遇事積極干涉，惹起韓人的反感，暗中謀脫離對滿清的宗屬關係。穆麟德受李鴻章委任，替朝鮮辦外交事務。他抱有另一種野心，誘韓政府與沙俄訂割地密約，使沙俄與日英美三國對立，德國乘機助俄分享權利。袁穆二人，一個逼韓離華，一個引韓投俄，在日本看來是很不利的。它要中俄關係惡化，對俄國說『中國近有廢朝鮮爲郡縣之意，俄國何不先發制人。』對中國說『俄有侵佔朝鮮之意，中國宜先下手。』唆使兩國相爭，以冀從中取利。被爭奪的朝鮮，先受沙俄引誘，後受美國煽惑，厭惡滿清，稱『清素畏洋，我派使結洋，清必畏我，』一心

尋求新主人。十一年英佔巨文島起，各國爭奪朝鮮愈演愈烈，主要爭奪者表面是中日兩國。

十一年三月，英俄因爭阿富汗將起戰爭。俄兵船聚泊海參崴，英國派兵船佔朝鮮巨文島，防俄船南侵香港。韓政府提抗議，要求『亟去此島。』李鴻章認爲『英暫據此備俄，與朝鮮中國皆無損，』對英政府表示『敝國亦無抗拒之意，』在倫敦訂承認佔領的條約，這種擅自盜賣朝鮮領土的行爲，當然引起被害國的怨恨。沙俄利用時機，一面向總理衙門聲稱：『若中國政府承認英國佔領巨文島，則俄國認爲有佔領其他島嶼或朝鮮王國一部之必要。』一面經穆麟德手，密訂割地條約，準備派兵艦據守朝鮮，各海口以助聲威。朝鮮在俄國援助下，企圖『與華平行，』抵制清政府改郡縣、派監國的計議及袁世凱的驕橫干涉。日本看到朝鮮『引俄拒華』威脅本身既得的利益，向李鴻章要求『擇美國之有才者一人，令朝鮮政府委用以代穆麟德，』李鴻章也以爲美國人可信任，派一個所謂『宅心公正、愛惜體面聲名』的美人德尼（Dwen N. Deng）代穆麟德職務。中日美英各方面壓迫韓政府取消密約，俄國勢孤，願訂約聲明『決不侵佔朝鮮領土。』李鴻章主張引俄制日以爲『韓雖可慮，有俄在旁。日斷不遽生心。我當一意聯絡俄人，使不侵佔韓地，則日亦必縮手』（致總理衙門書）。允許日後朝鮮如有大事變，中俄公同商定辦法，實際是承認俄國參加保護權。清政府認爲『被俄牽制，』不允訂約，俄國口頭聲明對韓無領土野心。十二年，英俄阿富汗事件和緩，英船退出巨文島，英俄割地交涉暫告結束。

德尼受中國政府委任，但助美日反清唆使朝鮮『結洋獨立』。十二年，朝鮮私派全權駐美公使，清政府力阻無效，朝鮮使臣有全權名義，地位在清使臣上，表示外交『自主』。德尼及日政府推薦李仙得充稅司、借美債二百萬元，以海關作担保。李仙得是引日兵攻台灣的著名流氓，清政府雖設法阻止，韓政府却授李仙得二品銜，辦理外交，表示政治『自主』。十六年，美兵船調兵五十名駐韓京漢城，同時『日兵先後濟來漢城約有四五千人』。清政府向美抗議，美日兵陸續退出，韓政府親美疏俄，仇清惡日，滿清依俄國虛聲援助，日本得美國實力支持，中日鬥爭愈益緊張，韓政府親美態度也愈益顯著。

滿清在韓地位陷於孤危，不謀挽救的善策，反增加了政府內部的派別爭鬥。吳長慶軍主要幕僚張謇著朝鮮善後六策，請李鴻章改郡縣、置監國、駐重兵，實際上吞滅朝鮮。李鴻章當然不敢聽信這種不負責任的狂議，但對年少氣盛的袁世凱及一般清議派却有極大影響。光緒帝師傅翁同龢採納『清議』，有意製造擁帝黨，張謇的主張影響到政府方面。李鴻章一向憎惡清議，也一向被清議派斥責。他原來希望『嗣皇親政』，太后退休，政治上傾向擁帝黨。翁同龢接近清議派，與李鴻章對立，李鴻章失望，轉向太后黨，附和奕譞的私意，移撥海軍經費，這又正合滿洲統治者削弱漢人兵力的願望，朝鮮形勢危急，李鴻章同意停購船械，原因就在翁李不和，借朝鮮交涉進行內爭。

中俄拒日（光緒二十年三月至六月）

朝鮮外患交迫，內政腐敗，光緒二十年三月，全羅、忠淸兩道人民響應東學黨起兵，揭『逐滅夷倭盡滅權貴』旗號；與政府軍交戰，政府軍大敗。東學黨又稱東學道，是民間反政府的祕密結社，日政府陰謀出兵朝鮮，派遣浪人、軍人組織所謂天佑俠團助東學黨作戰。韓政府請求李鴻章派兵援助，日本誘李鴻章出兵干涉朝鮮，表示『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亂，我政府必無他意。』李鴻章以爲拒韓請求，有失『上國體面，』既得日政府『必無他意』的保證，五月，派葉志超率陸軍二千五百人到朝鮮代平內亂，日政府見陰謀得售，立即派兵入韓。李鴻章初意止在保持『上國體面，』絕無備戰的決心，日軍陸續增至萬二千五百人，華軍不敢增援。韓政府見華兵勢弱；改變態度，親日疏華，李鴻章進退失據，完全落入日本預設的陷阱中。

李鴻章專心盼望外國調停，並不備戰自救。他『面商英公使電英勸阻日本進兵，』又請俄公使『速電外部轉電駐日俄使切勸日與我約期同時撤兵，』以爲『英俄夾攻，或易就範。』後來發現『英人意似簸弄生事，外和內譎，殊難信。』但俄公使表示極積援助，自覺有特無恐。俄公使說『俄韓近鄰，斷不容日妄行干預，』又稱『俄皇已電諭駐日俄使轉致日廷，勸令與中國同時撤兵。如日不遵辦，恐須用壓服之法。』李鴻章獲得這些口頭援助，對日態度轉趨強硬，諭袁世凱堅持華日同時撤兵，『此外如有別項要求，任他多方恫嚇，當據理駁辨，勿怖勿餒。』日軍陸續

增援，袁世凱、葉志超請添撥重兵，李鴻章恃有俄援，令袁葉『鎭靜勿妄動，』說『俄在日議正緊，路忽謂必有區處。』日陸軍萬人，分守漢城四路各要害，海軍全部出動，戰機成熟。六月初，袁世凱電告『日決無和意，我應妥籌。』海陸軍將領多請先佔重要地區，『早立脚步，免爲他族先得。』李鴻章仍令切勿多事，說各國正在勸和，或有辦法。葉軍駐牙山，已居絕地可危，葉志超提出三策：上策增援備戰，中策自動撤兵，下策坐守死地。當時俄公使通知『俄只能以友誼力勸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強勸日人。』李鴻章大驚，但仍希望力勸有效，軍事上採取下策，等待俄英法德義等國調處，他在訓令葉志超電文裏說『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仍望靜守勿動。』又說『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卽誰理絀，切記勿忘，勿性急。』他始終幻想俄國會武力援助，英俄『必有辦法，』日本先開戰，『將來各國開釁之罪必問日。』半殖民地國家統治階級的奴隸思想，李鴻章在朝鮮交涉中，創造了最標本的實例。他的繼承者一次又一次地重演這個實例，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李鴻章思想發展達最高點，人民所受的災禍也比甲午戰爭不知大若干倍，中國人民要爭取解放，必需反對李鴻章思想繼續支配政治。

第二節　戰無不敗的海陸軍

光緒二十年六月十八日，李鴻章電令葉志超『切記萬國公例，』二十日又電總理衙門說『英國意謂將來各國議開釁之罪必問日。』他正在說這些夢話，二十一日，日軍入王宮擄朝鮮王，迫令請日兵驅逐牙山華軍，戰爭正式開始。李鴻章奏稱沙俄將派兵驅日，中國軍可隨同『會辦。』總理衙門認為『我軍會辦一節，殊未妥協，』令李鴻章『一意主戰，斷不可意存畏葸。』這個慣於投降的洋務派首領被情勢所迫，不得不勉強應戰。他不信自己可能戰勝，而堅信外國（主要希望沙俄）一定會出面干涉，始終採取『處處後退』的軍事佈置，等待外國干涉的到來。整個甲午戰爭就在這樣可恥的失敗主義指導下，海陸軍全部被殲滅。

牙山潰敗（光緒二十年六月）

葉志超軍駐牙山，孤立無援，中日戰爭開幕，李鴻章臨時派兵二千人渡海往救，他總要帶一些外國關係才敢行動，出重價僱英國商輪高陞等三船運兵，中國兵船濟遠等三艘護送。天津電報生出賣開船消息給日本，日艦集牙山口外，開砲擊沉商輪一艘，兵船兩艘，溺死千餘人。濟遠艦管帶方伯謙見敵艦開砲，躲入艙內鐵甲最厚處，向旅順飛逃，自稱擊斃日海軍總統。海軍提督丁汝昌報稱濟遠大戰獲捷，賞銀二千兩，『告諭全軍，以為鼓勵。』李鴻章明知『中西人傳為笑談，』仍用『竭力拒敵苦戰支持』等語報告清政府。高陞船沉沒，他認為『上掛英旗，日敢無故擊沉，英人必不答應，』大有干涉戰事的希望。二十六日，電請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聲明日先開戰，釁非自我開，』發送照會的用意，不是表示堅決

應戰，而是希望『後來各國調停議結，暗伏其根。』戰爭剛開始，第一希望因日政府迅速對英認賠謝罪落了空，第二希望因各國宣告中立，調停一時無望，日本方面又『有美國人幫助議事』（朝鮮稅司柏卓安致津稅司密信）他本來不曾有戰意，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畏葸延宕』再沒有其他主張。

葉志超當然不會比李鴻章勇敢一些，日軍進攻牙山，聶士成戰敗，葉志超率軍先逃，冒暑向平壤狂奔，兵士饑疫倒斃，沿途都是屍體。從牙山到平壤不過數百里，他怕走近路遭遇日軍，專走遠路，一個月（七月底）才到達平壤，李鴻章依據葉志超報告，奏稱葉軍在牙山大捷，沿途擊敗倭兵，戰功甚大。清政府特發上諭說：『直隸提督葉志超與倭人接仗，擊斃倭兵二千餘人，實屬奮勇可嘉。加恩賞給該軍將士銀二萬兩，以示鼓勵戎行之至意。』又諭：『該軍將弁冒暑苦戰，奮勇出力，深堪嘉尚，著准其擇尤奏保。該提督已抵平壤，與大軍相合，即着統率諸將，協力進剿。』逃將敗兵受重賞，葉志超並陞任平壤各軍總統，李鴻章的賞罰調度加速了平壤軍的潰敗。

平壤潰敗（二十年八月）

主戰派首領光緒帝嚴令李鴻章備戰，牙山戰前數日，李鴻章派衛汝貴、馬玉崑、左寶貴、豐陞阿四大軍自遼東分起入朝鮮，駐紮舊京平壤城。朝鮮人民夾路歡迎，爭送茶漿勞軍。這些軍閥軍隊在國內當慣了盜賊，對朝鮮人民自然更殘暴，大軍過境，毀器物，燒房屋，奪財貨，淫婦女，殺平民，捉壯丁，擾害異常。『由義州至平壤數百里間，商民

均逃避，竟有官亦匿避。定州燒屋幾及半里，沿途鍋損碗碎，不但夫、馱難覓，且途中飯舖皆無』（李鴻章：整飭軍紀電）作為主力軍的衛汝貴『恇怯無能，性情卑鄙，平日尅扣軍餉，不得軍心』（光緒上諭）在四軍中紀律尤壞。馬左衛豐四軍共二十九營同居平壤城中，將各一心，不相統屬。衛汝貴軍十三營，人數最多，『兵不服將，驚鬧數次，連夕自亂，互相踐踏』（李鴻章：責衛汝貴電）又與馬玉崑軍互相轟擊，死傷多人。七月底，葉志超率敗兵六營逃來，被任為各軍總統。將領各有意見，不服調度，比較能戰的聶士成藉口招兵，走回天津。葉志超毫無佈置，束手待敵軍來攻。八月十五日，日軍先鋒到城郊，葉志超主張棄城逃走。左寶貴不許，派親兵監視志超，自率所部六營守北城玄武門山頂。其餘各將分守東西南三面。十六日，日軍集合重兵猛攻玄武門，左寶貴誓必死，立城上指揮，殺傷敵兵無數。日軍排礮轟擊，左寶貴戰死。日軍佔玄武門，尚不敢入城。當時馬玉崑衛汝貴擊退東西兩路日軍，還可以回兵決戰。葉志超下令撤兵速退，各軍潰亂，日軍擊殺潰兵二千餘人。葉志超率將領奔逃五百餘里，二十二日渡鴨綠江退入中國邊境。

守平壤本是必敗的下策，李鴻章一向主敗不主勝，以為戰敗講和，『和款可無大損』，戰勝則『兵連禍結，大局不可收拾。』他駐兵牙山絕地，又駐兵平壤孤城，目的就在戰敗講和，葉志超一路潰逃，正是執行他的求敗方針。

平壤城內駐滿清兵三十五營約二萬人，積儲軍火糧餉極多，凡有大小礮四十尊，毛瑟槍一

萬餘桿，餉銀約十萬兩。又各將領搶得的財物，有金磚六十七塊，金錠六十一錠，金沙大小三十包，其他貴重物無數。這些都是中國和朝鮮人民的膏血，經過他們的手，全部送給日軍。葉志超照例謊報戰績，李鴻章又照例替逃將掩飾，淸政府依據紙上空文，無視輿論的指責，下諭「葉志超著加恩免議，李鴻章亦一併加恩寬免處分。」平壤大敗，就這樣不負責任地結束了。

九連城（安東縣東境）潰敗（二十年九月）

平壤戰前，李鴻章派宋慶、劉盛休、依克唐阿等軍駐紮九連城，防守邊境，九連城是中韓交通孔道，與南岸朝鮮義州隔江相望。當時集中軍隊七十餘營約四萬人，滿州將軍依克唐阿十二營自立一軍，其餘各軍歸宋慶總統。完全像平壤一樣，各軍將領不服調度，散漫無紀，同居九連城中，依舊束手待敵軍來攻。

九月二十二日，日第一軍到義州，二十六日，日兵二三十人渡河，放一排槍，依克唐阿軍潰逃，被日軍追殺百餘人。二十七日，日軍大隊渡河，各軍不戰潰散（僅聶士成軍接戰一二小時）。二十八日，日軍入九連、安東二城。

大連旅順潰敗（二十年十月）

光緒六年，李鴻章開始經營旅順軍港，陸續建築礮台。十一年，造大船隖，設海軍提督衙門，與山東威海衞同爲北洋海軍根據地。甲午戰爭時，旅順軍港設海岸礮台十三座，陸路礮台九座，有大礮七八十尊，除本國造四尊，其餘全用德克魯伯廠製品。旅順港後路大連灣設礮台六座，有克魯伯最新式大礮二十四尊。旅順駐張光前、黃仕林、

姜桂題、程允和、衛汝成、徐邦道等六軍，共三十餘營。李鴻章令「貪鄙庸劣」的龔照璵統率六軍，實際是各不相統。大連駐趙懷益軍六營、九月二十六日，日第二軍登陸花園港口（離金縣二百八十里，）運輸礮馬輜重上岸凡十二天，中國海陸軍坐視不過問。日軍到鼻子窩，旅順震動，徐邦道提議出兵迎戰，保護後路，張光前等不聽。趙懷益聞日軍登陸，派人運大連軍米到煙台出賣，準備逃走。部下將士要求出擊，懷益斥責說：「我奉中堂（李鴻章）令守礮台，不管後路戰事，汝等欲拒敵，須請令（李鴻章命令）方可。」徐邦道率本部兵士往守金縣城，與日軍大戰，死傷極重。十月初九日，向趙懷益請援，他正在碼頭親自督兵勇搬運餉銀行李什物上船往煙台，不肯援救。金縣城破，徐邦道退回旅順。初十日，日軍分三路進攻大連灣礮台，原來趙懷益早一天已逃入旅順，兵勇潰散。十一日，日海軍來攻，礮台上見站立日兵，海陸兩軍不死一人，太意外地佔領了大連灣。

李鴻章經營大連灣凡六年，防務最稱鞏固。軍械庫中儲藏大小礮一百二十餘尊，礮彈二百四十六萬顆，德國新槍六百數十桿，子彈三千三百八十一萬顆（槍礮數目也許不確。）其他如馬匹、行軍帳及各式軍用品無數。趙懷益不願毀壞，全部留給日軍，因爲這都是不便運向別處變賣成錢的器物。日軍在大連休息十天，二十一日，向旅順進兵。各守將準備敵來就逃，統帥龔照璵早已逃歸天津。徐邦道率殘兵抵禦，擊退日軍，保旅順後路。各守將不派援兵，又不輸送糧食，紛紛

從海路逃往煙台，大小官員各取庫中貴重物件僱民船逃走，兵士無人統率。搶掠官銀號，旅順大亂。二十四日，日軍大隊來攻，徐邦道戰敗退回。二十五日，椅子山砲台失陷，各台守兵相繼潰散，日軍佔領旅順。

李鴻章經營旅順軍港凡十六年，前後費銀數千萬兩，船隖、砲台、軍儲號稱『北洋精華』，與大連灣同樣全部送給日本強盜。

二十一日，日軍被徐邦道戰敗，獸性大發，入旅順後，慘殺中國軍民，引起正義人士的憤慨。英國胡蘭德博士在『中日戰爭之國際公法』裏說『當時日本將卒之行爲，實逸出常度之外。四日間殘殺非戰鬥者婦女幼童。從軍之歐洲軍人及特約通訊員目擊此殘虐之狀況，然無法制止，唯有旁觀，不勝歎惜。此時得免殺戮之華人，全市內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爲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屍而被救殘留者。』泰晤士報載『日本攻取旅順時，戕殺百姓四日，非理殺伐，甚爲慘傷。』又有『中兵數羣，被其執縛，先用洋槍擊死，然後用刀支解。』美國報紙『痛責日本軍隊之暴行，謂日本國爲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又謂『今脫文明之假面，露野蠻之本體。』日本強盜從慘殺旅順軍民起，五十年來慘殺中國人民何止數千萬，這一篇血賬必需清算，自然是每一中國人的責任。但是，國內大盜的罪惡並不比外國強盜較少，外盜一定是內盜引進來的。滿清政府、李鴻章及其繼承者，五十年來篡奪國家統治權，一脈相傳，堅持失敗主義，招引外國強盜乘

機侵入，共同享受掠奪物。中國人民不堅決消除這些篡奪政權的內盜，日本帝國滅亡了，更強大的帝國主義還會繼續侵入，人民的災難還會繼續擴大。

北洋海軍戰敗（二十二年八月）

光緒六年，李鴻章辦北洋海軍，在天津設水師學堂。教習學生多是福建人，福州船政學堂的宗派惡習，再加上淮軍的腐爛風紀，構成北洋清軍不可救藥的症候。北洋歷年添購外國船，有戰艦九艘，守口蚊船六艘，魚雷艇六艘，練船三艘，運船一艘，共大小二十五艘，器械噸數與日本海軍約略相等。將士素質遠不及日本。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說「海軍之建也，琅威理（英海軍軍官，任北洋海軍總教習）督操極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右翼總兵劉步蟾以計逐琅威理。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羣閩人之上，遂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憂之。」李鴻章所謂「目前海軍將材，尚無出其（丁汝昌）右者，」「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餘，」全是自欺欺人的空話。他辦海軍，原為擴大本集團聲勢，與陸軍同樣不會準備對外作戰，因之從來不需要整頓。

北洋海軍兩個根據地，威海衛停泊戰艦，旅順修理船隻，各設提督衙門，保衛渤海口。二十年七月初，丁汝昌執行李鴻章的「保船」計劃，堵塞威海衛兩海口，密佈水雷、木閘、鐵鍊，阻日海軍來攻。清政府主戰派令丁汝昌出海巡弋，他總報稱「未遇倭船，」其實日艦控制了渤海，經常在

威海衞口外巡弋。

八月十三日，李鴻章派招商局輪船五艘運兵十二營援平壤，自鴨綠江口大東溝登岸，丁汝昌率海軍全隊兵艦十三艘護送。十七日到達大東溝。十八日午前，見西南來黑煙一簇，測望來船懸美國旗。午刻船來漸近，凡十二艘，全改懸日本旗。丁汝昌、劉步蟾、漢納根（德人）、泰萊（英人）在旗艦定遠鐵甲船（管帶劉步蟾）上議定佈『分段縱列』陣勢，下令起錨應戰。劉步蟾違反議定的陣勢，發出信號，令艦隊橫列，主力艦（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中。他是卑污的懦夫，企圖居中躲避砲火。泰萊見陣勢錯誤，但時機迫切，不便更改，對劉步蟾說『總兵已發錯誤之信號，然若更改，紛亂益甚。』兩翼弱艦自覺位置危險，故意緩進，艦隊成半月形，兩主力艦自然突出在前方，日艦似將攻最弱的右翼，泰萊建議全隊向右移四度，或可使主力艦先與敵艦接觸。丁汝昌立即採納，令漢納根到船後傳令發信號，各艦遵令移動，劉步蟾停留不動，逃避接觸。泰萊大怒，自瞭望塔跳下，奔上飛橋見丁汝昌，因言語不通，等待漢納根回來。劉步蟾在橋下突發一砲，飛橋年久失修，被震破裂。丁汝昌泰萊從空中跌落，都受重傷。丁汝昌仍坐甲板上督戰，漢納根出身陸軍，海戰不能得力，却成爲主要指揮者。

日艦專攻左右翼小船，陣脚致遠、經遠兩艘被劃出陣外。致遠受傷，管帶廣東人鄧世昌恨福建幫將領作戰不力，對大副陳金揆說『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此艦，足以奪其氣而成事。』致遠開

快車攔吉野，中魚雷炸裂，全船二百五十人同時溺死。經遠艦受傷，管帶林永升也鼓輪攔日艦，中魚雷沉沒，死二百七十人。眞正死戰的將領止有陸軍左寶貴海軍鄧世昌、林永升等數人，其餘將帥多是兒戲，但得李鴻章信任的却是那些兒戲將帥。

雙方接戰，中方沉沒四艘，逃走兩艘，剩下七艘。日方沉沒一艘，重傷數艦，日大艦五艘合攻定遠鎭遠兩主力艦，日旗艦松島受重傷，定遠也受傷。戰爭經歷五六小時，日艦向南退去，中國艦隊退囘旅順。

黃海大戰，中國失船較多，但止是小敗，也可以說不分勝敗，李鴻章故意自認大敗，造作唯武器論，說是『凡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礮，陸戰惟恃槍礮，稍有優絀，利鈍懸殊。』由此得出結論：『海軍快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平壤挫敗『固由衆寡之不敵，亦由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一切腐敗潰逃的責任，全部推脫得乾淨，事實恰恰證明軍閥軍隊根本不願抵抗外國侵略，所謂武器不良，無非作爲藉口，實行一貫的失敗主義。

黃海戰後，翰林院聯名奏參李鴻章，列擧罪狀，其中有『倭米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諜被獲，非明縱則私放。有海光寺傍居民王姓，經天津縣獲究，而李鴻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某（李經方）爲之說情。倭奸石川氏及軍械所劉姓被獲，供詞牽涉李鴻章及軍械局員，而某觀察逢李鴻章之意，勸令天津縣李振鵬改供，爲李振鵬駁斥而止。台灣拿獲倭船，又爲之請旨釋放。

軍械所歷年所儲槍砲，多被監守盜賣。及東事已起，猶檢出不合用之前膛槍子，賣與日本，得銀十四萬兩，局員朋分，而李鴻章爲之補給領字。外間並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這種事實決非憑空揑造，雖然不能斷定他已經賣身給日本，但處處留議和餘地，不敢堅決抗敵，始終缺乏戰意，那是無疑的。軍閥買辦性決定李鴻章在被迫作戰時，採取這個一面消極應戰一面力謀投降的卑汚方式。

威海衛潰敗（二十一年正月）

中國船艦入旅順船塢，照漢納根說『加工修理，三十五日方可再戰。』因爲『船上無用弁兵甚多，極爲難處，』他要求做海軍副提督，賞穿黃馬褂，有權甄別海軍人材，以能戰爲要，否則『不肯再上船。』這說明海軍損失不大，主要病根在弁兵腐敗無用。李鴻章拒絕他的提議，令劉步蟾暫代海軍提督。九月二十日，各艦修整竣工，出旅順口，回威海衛。十月，旅順危急，丁汝昌請率海軍全力援旅順，決一死戰。李鴻章大駡，說『汝善在威海守汝數隻船勿失，餘非汝事。』十月，清政府從李鴻章議，嚴令丁汝昌『守鎭定兩鐵艦毋損傷。』從此北洋艦隊困守港內，坐待殲滅。

李鴻章看海陸軍是個人私物，黃海一戰，大發牢騷，說『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決計藏匿不出。他不想十餘年來耗費銀數千萬兩，專養北洋一隅，當然應負抵抗侵略的責任。李鴻章要錢時看到全國出力時止見北洋，軍閥所說的國防軍隊，本質永遠是私人軍隊，這就

是絲毫不容詭辯的例證。

李鴻章外交上主張屈服求和，軍事上主張避戰自保，一個投降主義者應該有這樣的思想。他起初自信『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光緒十七年檢閱海軍奏）黃海戰後，他自信能守威海衞，奏稱『北洋海軍尚有定遠鎮遠兩鐵艦，輔以快船蚊雷各艇，與陸路砲台聲勢尚相倚。各口守台弁勇，均係訓練有素。』試看他怎樣守威海。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海陸大隊到成山頭，陷榮城縣。日船二十五艘，多是木質小船，能戰船隻不到十艘。威海港內泊戰艦十五艘，出口決戰，勝敗還未可知，丁汝昌受李鴻章命令保船，堅匿不出，日陸軍得進攻威海陸路礮台。威海衞砲台分南北兩幫。南幫砲台三座，設大砲十三尊。北幫砲台七座，設大砲十四尊。各砲全是德國克魯伯廠製。守台兵號稱綏鞏軍，凡八營。統領戴宗騫自率綏軍駐北幫砲台，分統劉超佩率鞏軍駐南幫砲台。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日軍攻破南幫砲台，鞏軍陣亡二千餘人，死傷極慘。劉超佩逃走，北幫綏軍望見，同時潰散。初七日，戴宗騫逃往劉公島。東方兵事紀略敍述綏鞏軍情況說『蓋自甲午九月，綏鞏兩軍勇丁即索壓餉銀兩大嘩，欲潰者屢矣。壓餉者，勇丁初入營，須扣餉三月，存統領糧台，以為軍米購價底銀，俟勇丁離營日始補給令去。於是將領利勇丁逃亡，其壓餉三月可不給，而續補之勇仍可扣壓餉也，恆以苦工責勇丁，勇怨刺骨。及軍事阽危，南幫鞏軍給壓餉兩月，綏軍亦譟，宗騫終不給。至是相率譁潰不返顧。』李鴻章所謂『訓練有素』的精兵，就是這樣不堪一

擊的腐敗軍隊。

日陸軍佔領南北幫砲台，日海軍堵塞威海東西兩口，海陸發砲攻北洋艦隊。十二日，擊沉來遠威遠等船。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啓正在妓院住宿，沒有遭難。十三日，各將領勾結洋員（英人浩威爲首），煽動兵勇水手叛變，聲稱『向丁提督乞生路。』洋員乘機勸丁汝昌『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說：『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視此事。』洋員及各將領密謀迫脅汝昌投降。十六日，令弁兵圍汝昌鼓噪，德員瑞乃爾密告汝昌說：『兵心已變，勢不可爲，不若沉船燬台（劉公島砲台）徒手降敵，較爲得計。』汝昌深思許久，下令各船管帶同時沉船，這羣懦夫反抗命令，怕空手投降，日本人要發怒。十七日，汝昌召集各將領，令港中餘船十艘猛撲突圍，或能逃出數艘。各將領又反抗命令，自動散會，指使弁兵持刀威嚇汝昌。汝昌勸退暴徒，服毒藥自殺。丁汝昌統帶海軍，任令腐敗，當然應負重要責任，但黃海大戰，受傷不退，威海被圍，寧死不降，在當時將帥中還算是難能可貴的人物。

十八日，懦夫們會議投降，瑞乃爾提議遵丁提督前令，沉船燬台，再議降事，懦夫們不許。浩威起草降書，請求『不傷中西水陸官弁兵勇民人之命，託丁汝昌名義繳出殘餘艦隊十一艘，劉公島砲台及軍資器械，投降日海軍。

李鴻章經營十六年的北洋海軍，可恥地殲滅了。他自稱創辦海軍是第一等『自強之道，』

原來就是這樣的一種『自強』

牛莊營口田莊台潰敗（二十一年二月）

平壤九連城戰敗，淮軍名聲掃地。清政府起用湘軍舊將，令魏光燾、陳湜、李光久等募湘勇援遼。十二月，任命湘軍首領兩江總督劉坤一爲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湖南巡撫吳大澂、淮軍總統宋慶爲副帥。山海關內外駐湘軍、楚軍、皖軍、淮軍、豫軍、滿軍共百餘營六萬餘人。其中劉坤一所部號稱八十餘營，開戰以來這是最大的一次出兵，也是清政府主戰派的最後一試，久受淮軍欺壓的湘軍又被重視了。

日軍踞海城縣，目的在進佔牛莊、營口。宋慶所部五十餘營三萬人守營口，吳大澂所部魏光燾李光久等軍守牛莊，大部湘軍進取海城。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海城日軍出戰，滿軍依克唐阿敗逃，湘軍退回牛莊。初八日，日軍分三路襲牛莊，將士請李光久出隊迎戰，光久正吸鴉片烟，不發命令，日軍已衝入市內，魏光燾、李光久棄軍竄走。湘軍十一營被圍，據民房苦鬥，死傷三千餘人，半夜後殘兵突圍出市。軍庫存毛瑟槍一千五百餘支，槍彈一百五十一萬顆，大小礮十九尊，火藥一千六百箱，馬匹衣糧無數，全被日軍擄去。吳大澂駐田莊台，當夜出奔。田莊台是營口後路，東征軍糧台所在地，宋慶棄營口，當夜率全軍回守田莊台。十一日，日軍入營口，獲得大砲四十五尊，兵船一艘，小火輪兩艘。十三日，日軍踏冰渡遼河，守河兵大潰。田莊台守兵不料敵軍迅速到來，一時不及逃避，被殺燒二千餘人。百餘營大軍，六天內連失牛莊、營口、田莊台，這一潰敗的結果，剝奪

了主戰派倖勝的希望，同時也增強了主和派求降的理由。

第三節　和戰兩派的爭權及主和派的得勢

中日戰爭與清政府帝后黨爭有密切關係。帝黨主戰，要在戰爭中削弱后黨，后黨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實力。兩黨借和戰爭奪權利，隨着軍事的慘敗，后黨在政爭上反取得勝利。

主戰派——帝黨（光緒帝、翁同龢、張謇）

西太后立光緒帝，原用作政治傀儡。光緒十二年，光緒帝年十六歲，習慣上稱爲「成人」了，西太后不便繼續「聽政」（太后獨裁）宣稱明年正月「歸政於帝。」奕譞爲首的王公大臣懇請「訓政」，所謂「訓政」是「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實際仍是「聽政。」西太后算是俯順「天下公論」允許「訓政。」十五年，光緒帝年十九歲，西太后覺得「訓政」也不便了，宣告「撤簾歸政，」命光緒帝「親政，」實際仍握干涉政令任免大臣之權。「親政」與「訓政」不同處，止在皇帝光看奏摺，看後再請太后懿旨。

光緒帝是滿洲皇族中較有頭腦的青年皇帝，學習漢文洋文，頗想有所作爲。他最親信的漢文師傅翁同龢是「尊王攘夷」論的舊式學者，任戶部尙書，參與軍機及各國事務，在政府有相當地位。李鴻章實力最大，自成北洋系統，政治上接近西太后，爲翁同龢所深惡。光緒十六年，戶部

停止南北洋購買外國軍火，翁李不和開始表面化。此後朝鮮交涉，翁主張硬，李主張讓，翁主自力拒日，李主依賴外力，雙方成見愈深。甲午年，張謇得翁同龢賞識，考中狀元。張謇著有朝鮮善後六策，恨李鴻章不用他的計策，斥爲『主和誤國』。張謇的主戰論，影響翁同龢，同龢又影響光緒帝。

主戰派本身缺乏實力，利用皇帝上諭和士大夫清議，督促李鴻章出戰。又令維新派徐建寅代丁汝昌（被李鴻章拒絕）令湘系軍閥劉坤一爲欽差大臣，嚴責李鴻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這都是主戰派排斥政敵收回兵權的計劃。至於如何戰勝日本，他們並無辦法（如翁同龢）其他所謂辦法也止有一個『聯英伐倭』（如志銳、張之洞）並不比李鴻章『聯俄拒日』好一些。李鴻章感到地位危險，對日本求和愈急，對西太后關係也愈密切。

主和派—后黨（西太后李鴻章）

西太后把持政權，當然引起光緒帝及帝黨的不平。甲午年正值她六十歲（十月十日生辰）從正月起，提海軍經費大修頤和園，準備舉行萬壽盛典，廣收貢獻，朝鮮事支持李鴻章的主張，但求從速和解了結，免得躭誤做壽。七月，中日戰事緊急，戶部請『停工作』，暗指修建頤和園事。西太后發怒，翁同龢奏稱『查停工一條，指以後尋常工作，其業經興辦之工，毋庸停止。』主戰派屈服了。光緒帝示意親近的朝臣，多上主戰條陳，企圖借清議壓迫西太后。於是南書房，上書房（宮內書塾）兩處人員每日輪流上奏摺，主戰論盛極一時。奏摺多請停辦點景移作軍費。所謂點景，是城內大路及西郊到頤和園，沿路紮彩亭彩

棚，種花、奏樂、演劇，每五步一座。這種駭人的浪費，主戰派要求停辦，完全合理，她更大怒了，對朝臣們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這就是說，決心對光緒帝報復。

李鴻章主和是要保全北洋地盤。所謂練海陸軍自強，他對伊藤說了眞話：『中國素未準備與外國交爭，』原來海陸軍止是看守地盤的私人工具。從地盤利益出發。他的外交方針，被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看得很清楚，在所著蹇蹇錄裏說：『淸政府自始卽採取求歐洲列強干涉，速行終止中日戰爭之政策。彼（李鴻章）屢懇求外國代表者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汚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又說『李鴻章心中已決定，不論以如何代價，皆不能不購和平。』日本深怕李鴻章『努力誘導外國干涉』的實現，加速軍事行動，『在外國干涉未煩難以前，不論佔領何地，皆爲必要。』日本要迅速戰勝，以免干涉，李鴻章要戰爭失敗，引起干涉，這在軍事上必然得出日軍猛進華軍速潰的結果。李鴻章知道列強不允許日本滅亡中國，敗到危急的時候，列強一定出面干涉，事實證明他這可恥的『遠見。』威海衛失陷後，『歐洲強國皆不欲日本乘勝使中國陷於土崩瓦解，』『德國希望日本不使現在時局進至極點，竟致愛新覺羅氏之社稷覆滅，』日本爲避免列強干涉，不得不放棄『旭日軍旗入北京城』的野心。李鴻章的外交公式，到今天還有人奉爲秘寶，自誇『遠見，』其實這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奴隸的依賴思想，奴隸的『遠見』恰恰說明

奴隸的無恥。

李鴻章是甲午戰爭中滿清方面的主角，不論西太后光緒帝對他支持或反對，都止能起着次要的作用。這個主角的中心工作，不是佈置如何作戰而是佈置如何誘致外國干涉。

第一期（依英俄為主的求和活動（牙山戰前）

日本用武力積極侵入朝鮮，李鴻章以同等的積極程度到處請求外國代壓日本，主要依靠沙俄，其次是英國，對德法美也設法試探，自己却拱手觀望，不準備作戰，活現出『乞哀求憐』的醜相。下面摘錄李鴻章致總理衙門電文若干條，『大外交家』的外交就是這樣的一套。

求英——五月十七日，『英公使過津，鴻面商電英勸阻日本進兵。』二十八日，『請英公使轉電外部，速令水師提督帶十餘鐵甲快艦，徑赴橫濱，與駐使同赴倭外署，責其重兵壓韓無禮，擾亂東方商務，與英大有關係，勒令撤兵，再議善後，諒倭必遵。此好機會勿任俄著先鞭。』他想利用『英俄相忌』，誘英國首先干涉，替英國計劃用兵的方法和理由那樣具體，眞是癡人做夢。他自信此計大妙，一面『屬人密告赫德慫恿』，一面請總署『商權歐（英公使歐格納）赫』。二十九日，總署復電說『英派兵艦赴倭之說，歐似不以為可，未電本國。』李鴻章做了一天好夢，被這個電文驚破。

求俄——六月二十日『喀使（俄公使喀希尼）遣巴參贊面言接韋貝（俄駐韓公使）

電：倭兵在漢城，使館不安，已電請國家（俄政府）派兵驅逐。喀擬亦電本國酌辦。鴻詢俄水師提督現有船幾隻？巴云，有大兵船十隻，調往仁川甚便。鴻謂貴國如派船，我海軍提督亦可派往會辦。巴云，甚好。』李鴻章得到這個口頭援救，認爲『似俄眞動公憤，未必收漁人之利，』請總署共同努力，促成交涉。淸政府主戰派主張聯英。二十一日覆電『謂非欲收漁利，其誰信之……不可倚以爲助，致事後別生枝節。』這是翁李意見的衝突，背後隱伏英俄兩個侵略國。

合求英俄——英俄都不肯放棄對淸政府的領導權，商定『同出調處。』英國又約德法義三國同辦，『合五國加力責之（日本）俾從公論。』六月二十四日，李鴻章遵照俄喀使通知電總署『歐在京，請署議，喀在津，與約議，』議題是中日各退兵五百里。這一天正是英輪高陞號擊沉的後一天，又是日軍進攻淸兵在牙山潰敗的一天，英俄借退兵爲名，在北京、天津參加帝后黨爭，加強自己的地位。

李鴻章在求俄求英外還向其他侵略者求救。

求法——六月初三日，法外部表示『法頗願調停，但中國應確有備戰之勢。』李鴻章得信，急電告法國『如何調停法願聞其詳。』法答稱『出於睦誼。法若出公議，當隨英俄後。』

求德——李鴻章電駐德公使向德外部說『德在東方商務有關，似未便坐視，望力勸倭撤兵。否則將開釁，恐擾大局。』

求美——李鴻章明知『美暗結日本，』但仍希望萬一。六月初十日，電駐美公使請美外部『會各國使力勸共保和局，否則勢將決裂。』美外部答稱『當電駐倭使力勸共保和局，但美不願會同英俄各國，恐各國別懷意見，於事無益。』

李鴻章全力貫注在求外國干涉，葉志超、袁世凱連電求援，他總說『已付各國公論，』『英法現已出場，』嚴令葉志超『堅貞勿怯，』『靜守勿動，』實行不抵抗主義，希望博得『公論』的同情。

第二期——依美國爲主的求和活動（威海衛失陷以前）

沙俄對朝鮮抱大野心，牙山戰後，喀希尼與李鴻章祕密商定中俄共同保護朝鮮。八月，平壤，大東溝海陸軍戰敗，西太后決定聯俄，借俄力講和，派翁同龢到天津密議。翁同龢是主戰派首領，奏稱『臣不敢以和局爲舉世唾罵。』西太后定要主戰派參加聯俄，仍令前往天津。李鴻章對同龢保證『俄必不占東三省。』同龢回京覆命，聲明『喀事恐不足恃，以後由北洋奏辦，臣不與聞。』帝后兩黨意見依然對立。同時英使歐格納也活動和議，主張『由各國共同保護朝鮮，中國賠日本以兵費。』翁同龢反對賠款，李鴻章着重聯俄，西太后但求了事，當時主戰派尚佔優勢，和議停頓。

日本方面連戰連捷，企圖攻陷北京，一舉實現大陸政策。一向扶植日本的美國，『鑑於歐洲強國之形勢，甚爲危險』（蹇蹇錄）就是說日本甚爲危險。十月初九日，美政府通知日政府說

『戰鬥彌久，若無限制日本軍海陸進攻之法，則與東方局面有利害關係之歐洲強國，難免對日本將來之安固幸福，爲不利之要求，以促戰爭之終局。』美國提醒日本前途的危險，又替日本指出獲利的方法，說『美國大總統從來對日本懷深篤之好意，若爲東方和平，當於不損中日兩國名譽之範圍內，盡力仲裁。』日政府當然『深爲感謝，』照陸奥宗光自述，『予私語美公使譚恩云：日本政府現在公然煩美國政府爲中日兩國間之仲裁者，或不免其他第三國干涉，故不能不避脫此事，異日若由中國開媾和之端緒時，美國從中交換彼我之意見，則我政府當深依賴美政府厚誼。譚恩十分了解予（陸奥）意，並約將此意報告本國政府。』美國與日本暗中結成諒解，表面裝成『公正人』向清政府提出『友誼』的調停。

主戰派反對聯俄，主和派反對聯英，恰恰給『決不干涉他國利害之美國』一個最好的機會。日本又表示『欲中國自與商辦，而不願西人干涉，』拒絕英俄插手。美國採取『不干預』態度，僅備替中日傳達意見，勸兩國派員直接會議。主和派在九連城敗後，求和更急，不得不信賴這個唯一的『公正人。』

十月二十五日，駐北京美使田貝電譚恩說：『中國將直接開媾和談判之事，委託本使，媾和條件爲承認朝鮮之獨立及賠償軍費二件，乞將此旨遞達日本外務大臣。』清政府認美國是『公正人，』很信賴地投入日美的圈套。

半殖民地政府，像小兒不敢離開保姆一樣，有所行動，必須依靠外國人，李鴻章說日本『志得氣盈，所欲甚奢』，中國官員一定『爲彼輕視』，請外國人前往，是最好的辦法。十月下旬，淸政府派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到日本，探問講和條件。日政府說德璀琳是『西人』，非中國大員，拒絕接見。當中間公正人的田貝『聞此次德璀琳突然奉使命前往日本，頗感不快，特勸告總理衙門速召彼還』（蹇蹇錄）。德璀琳止好囘來，因爲他是英國西人不是美國西人。

淸政府被逼派中國大員張蔭桓充全權大臣，聘美國前任國務卿科士達助訂和約。科士達先到日本，二十一年正月，張蔭桓續到。日政府藉口中國使臣『全權不足』，陸奥宗光面對張蔭桓朗讀『斷絕談判』的宣言。張蔭桓在日本受各種意外侮辱，最後被日本驅逐出境，退囘中國。日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公開指定李鴻章充全權大臣，理由是『彼此談判之結果，免爲紙上空文，必須有力實行。』日政府侮辱張蔭桓目的在逼迫李鴻章出面，如饑如渴地要求投降的淸政府，立即派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往日本商訂和約。

當時威海衛陷落了，主戰派最後一試的吳大澂湘軍在山海關外潰敗了，在『都城之危即在指顧』的情勢下，淸政府盼望日本開示條件。日政府通過美使田貝開示賠償兵費、朝鮮自主，割讓土地三條，淸政府以『宗社爲重，邊徼爲輕』作理由，授權李鴻章全權辦理。二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帶同科士達到馬關，與伊藤博文、陸奥宗光開始談判。

主戰派多數是空談『尊王攘夷』的書生，少數所謂有辦法的，如志銳（光緒帝親信）奏請『連英伐倭，以二三千萬兩餌之，』張之洞主張『借英款一千五百萬，購鐵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襲日本之後，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容閎西學東漸記）。完全是夢中囈語。主和派準備接受一切賣國條件，換取萬惡的『宗社』苟延殘命，比主戰派惡劣更甚。兩派主張不同，其同爲禍國殃民則一，中國人民被這一羣國賊統治着，當然免不了馬關條約的嚴重災禍。

第四節　——馬關條約的締結（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

日本戰勝腐爛的滿清，氣焰高張，軍閥，財閥，政客各提自己所希望的條件，蹇蹇錄有如下的記述：

海軍部——割取台灣全島。

陸軍部——遼東半島撫朝鮮之背，扼北京之咽喉，國家將來大計上，決不可不歸我領有。

財政部——索賠款十萬萬兩。

各政黨中有所謂『對外硬派，』主張割盛京省及台灣，賠款至少須二萬萬元以上，有所謂『改進』及『革新』兩派，主張『日本不可不有瓜分四百餘州（中國）之覺悟。此時須以山

東、江蘇、福建、廣東四省為日本領土。』又有所謂自由黨，主張『割讓吉林、盛京、黑龍江三省及台灣。中日兩國之通商條約，須訂凌駕歐洲各國之條件。』

日政府綜合這些貪慾，製成以『朝鮮獨立、割讓土地、賠償軍費及將來帝國臣民在中國通商航海之便宜等件為主眼』（伊藤奏文）的十條媾和條約，專等李鴻章來簽字。李鴻章雖然竭力辯論，甚至作無恥的哀求，都是枉費口舌，毫無效果。談判舉行五次，日本始終恃強逼勒，不准不簽字。

伊藤　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

李　難道不准分辯？

伊藤　只管辯論，但不能減少。

這就是五次談判的總精神。三月二十三日（公曆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終於簽訂馬關條約。主要內容如下：（一）朝鮮完全自主；（二）割讓奉天省南邊地方（遼東半島）；（三）割讓台灣全島；（四）割讓澎湖列島；（五）賠償軍費銀二萬萬兩；（六）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定進口稅；（七）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漢奸），不得擅為逮捕。

這是南京條約以來劃一新時代的賣國條約，中國殖民地化的程度從此更深入一大步。過

去割讓香港、九龍及藩屬國，還說是『偏遠地區』（李鴻章稱謂『甌脫』）現在割及大塊設省地區了。過去外國不得在中國設立工廠，現在可以在中國製造，免納海關進口稅了。各國與滿清締約，都享有『利益均霑』的特權，馬關條約開了端，接着就是割地狂潮和投資競爭，中國瓜分的危機更加迫切了。

李鴻章也感到馬關條約的嚴重，回到天津，稱病不出，派科士達到總理衙門，敘述『李相之忠，』勸從速批准和約。和約當然批准，李鴻章給科士達酬勞金十五萬元。

第五節　台灣的兩種抵抗——官紳的虛聲抗抵與人民的英勇抵抗（二一年五月至九月）

中法戰爭後，台灣改設行省。全省分台北、台中、台南三部。巡撫駐紮地台北府（淡水，）爲全台精華所在，經營鐵路（基隆至淡水，）商輪、屯墾、開礦，每年收入三百數十萬兩。台中窮苦，台南不會開發，窮苦更甚。台灣居民番族佔十分之六，住內地，與漢族爲仇。漢族多閩粵兩省人，住沿海城市，經常發生械鬥（主要由於官紳挑撥，從中取利。）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帶來淮軍四十餘營，被後任巡撫非淮系的邵友濂裁撤半數。失業游勇流爲盜賊，與在營兵丁結成哥老會，保持淮系勢力。台灣孤懸海外，大小官吏從內地來貪贓枉法，黑暗無比。這樣，番與漢、閩與粵、官與民、兵與官都充滿着不和，造成不和的總原因是官吏的殘暴和貪污。

光緒二十年十月，邵友濂怕日軍攻台灣，運動清政府調任爲湖南巡撫，後任是『剛愎自用，自以爲是，與僚屬動輒齟齬』（清政府上諭）的唐景崧。二十一年正月，唐景崧派同鄉軍官帶銀二十萬兩，回廣東招募盜匪，作爲親信軍隊。這種廣勇毫無紀律，欺侮其他軍隊，互相鬥毆。景崧自率廣勇守台北，令紳士林朝棟守台中，總兵劉永福守台南。林朝棟所部台灣士勇十營，中法戰爭時擊敗法軍，號稱善戰。劉永福黑旗軍從廣東調來（二十年七月）所部僅兩營，到台灣後擴充成八營。林劉都是著名戰將，被唐景崧猜忌，命令他們離開富庶的台北。

三月，台北府淮軍兵變，唐景崧令叛兵首領充營官，軍心愈益離散。

馬關條約簽字前，台灣紳民探知割台勢不可免，紳士邱逢甲創議建立民主國，開議院，製藍地黃虎國旗，用台灣國名義抵抗，免得清政府爲難。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決定限期交割，上諭『唐景崧著卽開缺，來京陛見。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員，並著唐景崧飭令陸續內渡。』一個政府當它把持統治權的時候，用各種方法教人民相信官民一體，官是人民的保護者，反對貪官污吏就是亂民。等到出賣領土人民的時候，它把『大小文武各員』撤退，什麼都不顧了。人民不願做亡國奴，設法保護自己，又被看成亂民，說『台灣民如此兇橫』（李鴻章給李經方電）請『日本遣派水陸各軍，以資彈壓，保守平安』（李鴻章致伊藤電）。這不是極明顯地指出官與民是對立的兩體，如果眞是一體的話，爲什麼要官不要民，還請日本派兵彈壓呢？當時邱逢甲爲首的一羣

紳士，不是依靠民衆的實力，而是對滿清幻想『我皇上何忍棄之』，對外國幻想『各國仗義公斷』，對唐景崧幻想『誓死守禦』。五月二日，邱逢甲等百餘人以台民名義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推唐景崧爲總統，頒發『台民佈告』說『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台民惟集萬衆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這種愛國詞句，似乎代表台民的意志，但他們的行動，遠不能代表台民。他們行兩跪六叩首禮拜見總統，送上『台灣民主國總統之印』以後，一切依賴唐景崧，所謂民主國總統和議紳（議員）實際上仍是滿清的巡撫和紳士。

唐景崧就總統任，出了一個告示說『民間有假立名號，聚衆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同時給總理衙門電報說『惟臣先行，民斷不容，各官亦無一保全。只可臣暫留此，先令各官陸續內渡，臣當相機自處（逃走）』。他嚴禁民間聚衆，顯然爲保全各逃官，這種逃官，無一不是該殺的匪類，這個台灣民主國的叛徒，命令官員兵丁急速內渡，五月初四以前，台北官員幾乎全部逃走。三月間，他曾提庫銀四十萬兩匯往上海，後來又匯銀訂購大批軍火，這些銀兩都是一去不知下落，他自己的妻子行李早已送走，止待『相機自處』，何曾想到保護台灣的土地和人民。

唐景崧就任時，藩庫還存銀四十餘萬兩，火藥庫存火藥四萬餘磅，毛瑟槍彈二百八十餘萬顆，各炮台存炮彈數千個，他一手把持，不分給林朝棟、劉永福。五月十日，滿清割台特派大臣李經方帶同科士達，乘坐日艦到基隆，會見日本台灣總督，出具割讓『清單』一紙，內開『台灣全島、

澎湖全島之各海口，並各府廳縣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屬公物件，』台灣澎湖兩島人民就在這張賣身契下當亡國奴了。日軍登陸攻陷基隆，廣勇潰亂。十二日，唐景崧逃回廈門，邱逢甲、林朝棟相繼內渡。淡水城中散勇游匪按戶刼掠，藩庫存銀二十四萬兩，匪勇奪銀互殺四百餘人。日軍不知虛實，不敢前進，得外國商人通知，十五日，派兵八十名進城，台北陷落。

台北淪陷，全省富源被日本佔有。林朝棟逃走，台中空虛，潰兵土匪大亂。台南勢成孤立，很難堅守。紳民請劉永福任軍統，總兵楊泗洪任分統，統率各軍統領十八人及義民各軍。劉永福登台立誓死守，誓書中說『自問年將六十，萬死不辭。惟軍民共守，氣味最貴相投；淮楚同仇，援助豈容稍異。』他把黑旗軍放到最危急的戰場上來團結不同系派不同地區的各軍，與日本海陸軍作戰四個月，主要是靠團結的力量。

閏五月初三日，日艦兩艘窺安平口，劉永福發炮轟擊，日艦逃走。台南與日軍戰爭開始。黑旗軍會同防海各軍日夜巡防各海口，日軍每次登陸，都被守軍殲滅，戰事限在台中陸路上，這是支持較久的重要原因。中旬，日軍攻陷新竹縣。新竹是台中入口處，林朝棟走後，劉永福介楊紫雲率新楚軍會同吳湯興所率新竹義民軍把守，大小二十餘戰，互有傷亡。相持一月餘，日軍購買漢奸從僻路抄襲，楊紫雲戰死。吳彭年率黑旗軍趕援不及，退守大甲溪，六月中旬，黑旗軍聯合徐驤所率義民軍進攻新竹，斬獲頗多。日海軍接連登陸，牽制劉永福兵力，使不得專顧大甲溪。七月初，吳

彭年、徐驤大敗日軍及漢奸軍，吳徐軍乘勝追擊敗敵，殺數十百人。後路新楚軍大營忽被漢奸襲擊，統領李惟義逃遁，大營失陷。前敵各軍聞警潰退，營官袁錦清死守大甲溪，掩護各軍。錦清率黑旗健兵五十餘人衝敵砲兵陣地，全部戰死。劉永福令忠滿（滿清人）率忠靖軍四營往援，忠滿畏葸不進，大甲溪被日軍佔領。

大甲溪失守，劉永福令各軍擇彰化（台中府）境內大溪扼守。七月初五日，徐驤率義軍三百人誘日兵深入，義軍李邦華、鎮海軍營官李仕高正面接應，新楚軍營官陳尚志、義軍吳湯興、沈仲安由後路左右包抄，大破日軍。抗日軍進攻大甲溪，敵砲火猛烈，死傷甚重。初七日，又大破日軍，敗敵逃入深山，吳彭年率隊窮追，誓『掃蕩此虜，不遺醜類』。敗敵得漢奸土匪引導，竄向八卦山，八卦山在台中府城外，山失城不能保。永福急令彭年退守八卦山。彭年令吳湯興義軍為前隊，陳尚志新楚軍為後隊，李仕高鎮海軍為左隊，林鴻貴黑旗軍為右隊，彭年守山頂。初八日大戰八小時，抗日軍死千餘人。初九日，敵軍大隊放快槍快砲環攻，湯興中砲死。鴻貴率七星隊（黑旗軍中衝鋒隊）百餘人衝入敵戰，奪湯興屍體，又中砲死。軍隊潰亂。彭年立山頂，率七星隊三百餘人死守，敵大砲集中轟擊，彭年及七星隊全部殉難。漢奸開城門迎敵，李仕高、沈仲安、楊春發巷戰半日，又全部殉難，台中府陷落。

這一期戰爭，歷時兩月餘，台中失守，戰爭是失敗了。敵人海陸步馬砲全力進攻，抗日義民軍

止有抬槍十枝，正式軍隊也止有少數毛瑟槍，雙方器械相差太遠。台灣境內游勇潰兵土匪特別多，被日本收買充漢奸，他們熟悉地勢，比正面敵軍更難防禦。軍隊派系複雜，行動不能一致，能戰的部隊太少。不過這些都還不是抗日軍的致命傷。強迫抗日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李鴻章的對台封鎖。台南現銀極少，劉永福設官銀票局，發行一元至五元鈔票，因地方貧瘠，鈔額有限，不能供軍餉。發行官信票（郵票）得洋銀五千餘元，仍無補於事。他曾派人員回廈門，電求沿海各省督撫助餉，又向各地愛國人士籌款。李鴻章及清政府嚴令官民「不得絲毫接濟台南」，籌款員都空手回來。開戰兩個月以上，前敵各軍迫切請求補助餉械，軍械庫僅有毛瑟槍數十枝，其餘土槍土藥，都霉爛不中用。永福憂愁無法，搜括得銀八千兩解前敵，路上又被日登陸兵、漢奸、土匪搶去。永福再派文案羅綺章渡廈門，電求沿海督撫救台民，語極哀痛，仍毫無所得。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極度殘忍冷酷，這也是許多實例中的一個，值得作為不可忘的教訓。台南軍民處在這樣嚴格封鎖的環境裏不屈不撓地戰鬥着，雖然失陷了台中，英勇的戰績是不可磨滅的。

七月初十日，日軍連陷雲林、苗栗兩縣。十一日，進佔大莆林。十二日，向嘉義縣侵進。正當彰化失守的時候，劉永福趕上前線籌劃防務，令王德標率七星營守嘉義城，楊泗洪率鎮海軍、武毅右軍、吉林炮隊任野戰。又招得著名匪首黃榮邦（原名丑）林義成（原名苗生）、簡成功、簡精華（原名大肚）等部助戰。這些匪首先受日寇誘惑，準備降敵當漢奸，但是他們到底是中國人，在

劉永福及義民軍感化下，都改名表示抗敵決心，而且都成了抗敵英雄。李鴻章的路線，必然產生賣國求榮的各式漢奸，台灣人民的路線，可以挽救漢奸變成愛國英雄，黃榮邦等名留青史，證明人民路線的偉大。十一日，楊泗洪率所部星夜進攻大莆林，簡精華、林義成等率義軍數千助戰，日軍敗走。泗洪追擊中被敵砲炸死，營官朱乃昌奮戰不退，日軍炮彈如雨，精華從側面猛擊，日軍大潰。乃昌受重傷，裹創血戰，揮軍追殺，遙見火光燭天，聲動山谷，探知林義成、黃榮邦義軍截潰敵逃路，一時軍心大振，前後夾攻，殺敵數百人，收復大莆林。乃昌傷重死。永福令蕭三發統黑旗軍代楊泗洪指揮前敵各軍，令簡成功總統義民軍。日寇陸路戰敗，急派兵艦十餘艘攻台南各海口，炮擊日夜不停，漢奸土匪蠢動響應。永福回台南佈置海防，又推行聯莊法，檢舉匪類，地方逐漸安靜。

十三日，王德標率七星隊及黃榮邦義軍二千五百人林義成義軍三千人簡精華義軍數千人進攻雲林縣，日軍戰敗棄城逃走。德標收復縣城，會同義軍追殺，簡精華軍從小路抄襲，截日軍成兩部，一部亂竄入山，被林義成軍包圍，全數殲滅。十四日，進攻苗栗縣，殺敵兵二百餘人，克復林栗兩縣。十五日蕭三發督各軍前進，日軍大敗，逃入彰化城。十六日，各軍圍攻彰化，敵憑藉砲火防禦，不敢出戰。當時聯莊法推行到台中台北，鄉民秘密組織聯莊，等大軍到來起兵作內應。台灣全局大有希望，但危機也同時加增，無法克服。

台南餉械早已竭蹶，劉永福再三派人回內地籌餉，這些籌餉員到處受官紳侮辱。回台後不

免怨恣，官告『接濟絕望。』因此人心動搖，議紳營弁紛紛逃匿，不可阻止。二十四日，蕭三發請求補充餉械，永福括得銀二千兩解前敵應急。外國洋行指使大小商人到官銀票局兌現銀，市面大擾；永福不得已派文案吳桐林內渡求接濟，依然毫無所得。日海軍爲解救彰化被圍寇兵，砲擊台南，企圖登陸，永福籌餉籌防，困苦萬狀。二十五日，義軍連戰連捷，殺敵大小軍官十三人。二十九日，三發奪敵大砲一尊，生擒敵兵四人，斬首數十級。八月初二日，前敵請發餉械，語極悲痛。永福括得銀一千五百兩，給前敵暫充軍食。初三日，商人持銀票索現銀更急，臥局中不走，市上拒用銀票，交易停止，抗日軍在李鴻章、外國銀行、奸商壓迫下不能支持了。

這一期將近一個月，軍事上是勝利的，但李鴻章的封鎖和外國洋行大小奸商的破壞，逼迫抗日軍必須失敗。

前敵圍城軍數千人連日饑餓，蕭三發與簡精華等商議『相持非久計，不如併力前進，奪回彰化，或可駐足。』這種悲慘的決議，他們知道走上必死的道路了，作戰非常勇敢。徐驤率精壯番民七百餘人充先鋒。八月初五日，全軍進攻，敵大放槍砲，不能攻克。初六日，黃榮邦猛攻砲台，中砲死。初七日，林義成攻砲台，又受重傷。十三日。敵軍反攻，三發率各軍力戰，三發受重傷，徐驤、簡精華奮死擊退敵軍。各軍死傷慘重，糧食匱竭，哀求永福設法救濟。永福無策搜括，長嘆道『內地諸公誤我我誤台民』到底籌不出一文錢，止好在餓死前繼續戰鬥。十九日，敵軍又反攻，簡精華、林義

成應戰，破圍重重，夜間還不能突圍，徐驤率敢死隊衝入，三更才破圍歸營，精華、義成、徐驤都受了重傷，戰士死傷無數。二十日，又大戰，各軍戰敗，死二千餘人。二十六日，徐驤率隊衝鋒，各軍繼進奮戰，敵軍退却，不幸徐驤中砲死。敵兵反擊，各軍潰敗，雲林、苗栗兩縣又陷。

陸路正在台中苦戰，敵海軍攻台南，劉永福駐安平砲台抵禦。十七日夜間，敵艦分五路砲擊，永福巡視各砲台督戰。二十三日，陸路敵砲隊攻嘉義縣，王德標假敗，棄營退入縣城。敵踞營房，夜半，地雷爆發，殺敵七百餘人。德標出擊，敗敵被沿路伏兵殺死無數。二十四日，敵軍大舉攻破縣城，七星營、義民軍巷戰，將士死傷極重。王德標、簡精華率殘軍逃入大山。嘉義縣陷落，台南危急不可守。

二十五日，敵艦攻旗後砲台，永福子成良登台拒守，漢奸引敵兵從僻遠小路登岸，突破大營，又進擊砲台。守台兵困守兩日，饑餓不能起立，砲台失陷，成良衝出得不死。二十六日，敵陸軍攻鳳山縣，義民軍戰敗，敵屠鳳山城，又進犯台南府城。永福駐安平砲台，策應守城軍。各軍餓極不能戰，二十九日，敵攻砲台，永福親自發砲，殺敵數十人。九月初一日，城中絕食，守軍潰散。初二日，敵軍攻砲台，永福登德國商船退回內地。

這是台灣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史。唐景崧放棄台北，李鴻章封鎖台南，失敗早已決定了，劉永福爲首的抗日軍，在絕望中戰鬥到最後一寸土地，這種堅強的精神，又決定了勝利終究會回

來。現在台灣歸還祖國了，李鴻章、唐景崧的繼承者儼然又統治着台灣無疑的台灣義民軍的子孫們決不會忘記五十年前被出賣當亡國奴的悲慘教訓。

第六節　三國干涉下滿清贖還遼東半島及大借外債（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

英俄兩大侵略勢力，爭奪對滿清政府的領導權，是相持不下的。李鴻章請求列強干涉中日戰爭，因『英俄相忌，』在戰爭停止前不能實現。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下旬，清政府決定割讓土地，令李鴻章渡日講和。俄國決不願日本佔朝鮮、遼東，英國也不願日本在大陸上獲得領土，在這一點上英俄利害暫時一致，因此，英採取局外中立態度，俄得進行對日干涉政策。

俄法同盟，德法世仇，法對日助俄行動是自然的，德企圖離間俄法間親密關係，又謀在遠東攫得一個軍港，因而也參加行動，俄法德三國結成了團體，但並不堅固。

俄政府對德法，積極組織共同行動，對日本，竭力隱蔽自己的眞意圖，日政府極不安心，屢電駐俄公使密探情況，毫無所得，反預料『俄國大概當不以兵力干涉。』美國國務卿祕密通知駐美日公使，急電日政府說『俄國希望占領中國北部及滿洲，當反對日本佔領該地方及爲朝鮮之保護者，三萬俄兵，已屯駐中國之北部，有漸次增加之形勢』（蹇蹇錄。）三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字前七天）李鴻章密電總理衙門，還在探問『未知俄廷意見如何，』日本却在三月二

十八日（李鴻章到馬關後六天）知道俄國的佈置，美國自居公正人地位，又保薦科士達當訂約顧問，消息通知一方面，未免太『公正』了。同月，李鴻章被兇手狙擊受傷，日政府異常狼狽，紛紛表示慰問，這當然由於李鴻章有力量賣國，是日本的理想人物，死去對日本大不利，更主要的原因是『若某強國（指俄國）欲乘此機會干涉，彼固以李之受傷為最好之口實』（蹇蹇錄），日政府怕干涉行動突然出現，一面聲明『暫時休戰』（蹇蹇錄說『李鴻章半面包有繃帶，以繃帶外之一眼表示十分歡喜之意，感謝我皇上仁慈聖旨』）一面請李鴻章在病牀上開始談判，用恐嚇手段逼勒李鴻章簽字。三國干涉快要發作，日本從英國方面獲得消息，向李鴻章連提兩次哀的美敦書，限三天內承認全部條件，否則運兵數萬進攻北京。清政府李鴻章『欲保京城，不得不爾』。科士達也從旁催促，日本在美英暗助下，遂到預期的目的。

日本爭得先著，三國落後了。沙俄大受衝動，馬關條約簽字後六天（公曆四月二十三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俄德法駐日公使，同時向日外部『勸告日本政府，應放棄領有遼東半島。』日政府異常恐慌，軍事方面『國內海陸軍備，殆已空虛，而去年來繼續長期間戰鬥之我（日本）軍隊人員軍需，固已皆告疲勞缺乏。即單與俄國艦隊抗戰，亦甚無把握』（蹇蹇錄）。外交方面，向英國求援，英國表示嚴守中立，向美國求援，美國答稱『願與日本協力，而媾和條約的批准之件，已電訓駐北京美國公使勸告中國從速實行，』援助並不強有力。日本被迫不得不對三

國屈服內閣決定『對於俄德法三國雖全然讓步，對於中國一步不讓』的方針，四月十六日，日皇宣告『容納友邦（三國）之忠言』表示全然讓步又說『關於交還半島讓地之一切措置，朕特命政府與清政府商訂，』表示一步不讓。

日本原想變相的佔有遼東，方法是口頭上『放棄永遠占有遼東半島，惟作償金之担保，一時占領該半島，而大增加金額，使中國永久不能還清。』向俄政府提出這個要求，被俄政府完全拒絕。日政府又向三國提出『交還遼東半島之賠款數目定爲五千萬兩，』三國減爲三千萬兩，償款後三個月內實行撤兵，並不許再有其他要求。九月初二日，日本正式承認三國宣言。還遼問題算是解決了，問題轉化爲國際間借債的競爭。

中日戰爭中，清政府借外債約四千萬兩。戰後驟增賠款二萬萬兩，贖遼款三千萬兩。第一次（每六個月一次）就要交出八千萬兩，第二次五千萬兩，餘款三年內付清。清政府每年收入止八千萬兩，決無償付能力，除了大借外債再不能有任何辦法。過去借外債，多由總稅務司英人赫德主持，以海關稅收作担保，期限短，利息重（至少八厘）是英國在華銀行一宗好買賣。這次清政府急需巨款，赫德建議大借外債，俄國要奪取英國的經濟利益，同時排斥法德兩國，祕密通知願單獨借銀一萬萬兩。法德當然力爭，清政府不敢開罪法德，謀分別商借，俄國不許。最後俄法合借一萬萬兩，年息四釐，三十六年還清，以海關爲担保。英國喪失大利，又怕俄法干涉海關，德國被

俄法擯棄，極爲憤恨，英德兩國合作，向清政府抗議。美國也想分潤利益，法國還想繼續出借，俄國主張列強共同借款，鬧得總理衙門像個大拍賣場，翁同龢日記敍述英法公使忿爭的情形說英公使『咆哮恣肆，爲借款也，此等惡趣，我何以堪。』說法公使『無恥無賴，而日在犬羊虎豹叢中。』到底英德成功，合借銀一萬萬兩，年息五釐，三十六年還清，以海關爲担保。三十六年期內，不得改變海關行政。這就是說，英國把持海關行政，不許別國插足。

清政府借到銀二萬萬兩，除兩次付賠款一萬三千萬兩，償清賠款餘數，還短銀六七千萬兩。經手人的回扣、佣費，官吏的貪污多至三四千萬兩，何等殘酷的剝削！光緒二十三年，清政府準備再借一萬萬兩，引起各國第二次大爭鬧。

李鴻章親俄主借俄款，張蔭桓（代表翁同龢等親英派大臣）主借英款，說『合肥聲名掃地，必無成。』俄國提出借款條件（一）俄國借款建築並管理滿洲及中國北部之鐵路；（二）現任英人海關總稅務司去職，改用俄人；（三）借款以海關稅收爲担保，不足之數，以地稅、釐金爲抵押。光緒二十四年，英國提出類似的借款條件，特加揚子江流域不割讓於他國及開放大連灣爲商港兩條，後一條專對俄國示攻勢。俄公使警告李鴻章『大連若開口岸，俄與中國絕交。』清政府親英派藉口『英款利息低而期限長，』與英國商訂草約。俄公使堅決反對，親到總理衙門提警告。翁同龢日記述俄公使語：『若中國不借俄而借英，伊國必問罪，致大爲難之事。』俄使走後，英

使又到，日記說『竇（英使竇納樂）語亦橫，大略謂中國自主，何以不敢以一語詰俄。英何害於俄。而俄必阻止耶。』翁同龢埋怨李鴻章說：『蓋合肥專以俄毀英之語激動之，故致此咆哮也。噫，殆矣。』英俄兩國爭殖民地，帝后兩黨依靠英俄爭政權，結果英國和帝黨取得勝利。原因是甲午戰後，李鴻章喪失北洋地盤，實力大損，西太后名義上『歸政』，不便過渡干涉光緒帝；三國自稱還遼有功，勒索報酬，惹起某些士大夫的反感。李鴻章提議英俄各借一半，仍不能通過，后黨失敗了。借款由英國匯豐、德國德華兩銀行出借，銀數一萬萬兩，八三折扣（駭人的盤剝）年息四釐半，四十五年還淸。主要條件是揚子江流域不得割讓於他國，借款以海關收入及一部份釐金、鹽稅爲担保，四十五年內不得改變海關行政。

甲午戰爭的結果，在政治上，瓜分危險逼在眼前，割地狂潮造成瓜分的初步形勢。在財政上，滿淸政府的基礎發生大動搖，不依賴外債就不能生存。總之，中國殖民地化比戰前更深入一層。

滿淸政府借外債開始於同治四年，到光緒二十年（光緒十三年以後不借外債）凡三十年，共借債六次，總數約四千萬兩，連利息不過五千七百萬兩，海關抵補有餘。政府每年收支相符，財政基礎相當穩定，曾左李及後起的張之洞辦洋務，談『自強』，主要由於還有錢可供浪費。

從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凡五年，借債七次，共銀三萬七千萬兩，除付日賠款本息二萬五千萬兩，其餘一萬二千萬兩，都消耗到折扣、佣金、利息、貪汚軍費、政費上去。海關稅本是政府歲

入的大宗，戰後抵押無餘，政費必須另尋財源，正如李鴻章所說：『國家屈志求和，百姓已引爲深恥，如復橫征暴斂，貧民豈能相安』（李鴻章致日政府說帖。）滿清統治的危機非常顯著，因之尋求外國依靠更感到迫切。

第七節　大買辦李鴻章游歷歐美的賣國活動（光緒二十二年正月至八月）

三國干涉，日本退還遼東，西太后、李鴻章親俄派自以爲有『遠見，』一般反李的洋務派如劉坤一、張之洞也改變態度，主張對俄締結密約，結強援保護中國。劉坤一希望『稍予以便宜，中俄邦交永固，』使『倭與各國有所顧忌』（二十一年閏五月奏。）張之洞希望更大，奏稱『中國海軍練成不易，如有俄人之助，將來無論何國尋釁，數旬之後，可以立發兵艦數十艘游行東方海面，則我得以專備陸路戰守之計，而敵人亦不能爲深入內犯之謀（六月奏。）照他那樣想法，中國海面有俄人代守，滿清眞可以高臥無憂了。劉張是有力的總督，這些謬論，對親俄派起了支持的作用。

沙俄替滿清索還遼東，當然要換取極大酬報。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俄皇尼古拉斯二世舉行加冕典禮，各國都派專使往賀。光緒帝派非淮系的外交官王之春爲致賀專使，被俄政府拒絕，說是王之春『位望太輕，難於接待，』這就是說非李鴻章親到不可。光緒帝改派李鴻章爲正使，非

淮系的外交官邵友濂爲副使，李鴻章藉口傷病時發，步履輭弱』不肯奉命。結果光緒帝讓步，授李鴻章爲『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國賀加冕，又往英法德美四國遞國書，取消邵友濂王之春專使副使名義，讓李鴻章單獨辦事，李鴻章步履不輭弱了。

李鴻章帶着大批中外隨員，二月中旬，從上海出發。臨行前曾對黃遵憲說：『連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英德等國爭奪這個大買辦，各派大員勸請他先游歐洲，後往俄國。俄皇決不放鬆，特派親王一人坐專船到蘇彝士運河迎接，把大買辦先搶到手，經最短路程送上彼得堡。三月下旬，開始外交談判，四月中旬，簽訂中俄密約，主要條款是(一)日本如侵佔中國或朝鮮土地，兩國派水陸各軍互相援助；(二)戰時俄國兵艦得駛入中國所有口岸；(三)中國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達海參崴（中東鐵路），鐵路由華俄道勝銀行承辦經理。李鴻章非常滿意。五月初離俄，游歷德荷比法英美等國，各國政府竭力招待，但並無所得，李鴻章接觸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機構，也毫無所得。他以爲中俄密約解決了一切問題，不必再留意外國富強的原因。八月，回到中國，對黃遵憲說『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

第八節　——割地狂潮（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甲午戰爭前後，歐洲資本主義正在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對中國要求投資，設工廠、造鐵路、

各國公使迭次商談，都被清政府拒絕，政治借款因缺乏機會，不能強迫清政府無故舉債。以馬關條約三國還遼爲契機，帝國主義要求一齊發作起來。投資必需劃分勢力圈，更必需先奪取根據地，以便進一步實行瓜分，與還遼同時，列強奪取根據地的競爭開始了。

法國

光緒二十一年，法國自稱還遼有功，提出割讓雲南省猛馬、烏得兩地，安南鐵路造至龍州（廣西省）昆明（雲南省城）雲南兩廣開礦先向法國商辦等要求。法公使施阿蘭態度兇悍，逼總理衙門承認。二十二年，法國要求全部成功。二十三年，迫清政府聲明不割讓海南島及對岸陸地於他國。二十四年，藉口俄租旅順、大連，強租廣州灣爲軍港，期限九十九年。法公使每次提出要求，先替清政府擬就承認文件，不准改動一字，翁同龢稱爲『犬』『鬼』表示深惡痛絕。照施阿蘭說，李鴻章親俄，認法是俄同盟，出力相助，因此交涉順利。

英國

法國企圖割雲南、兩廣爲勢力圈，英國當然不甘。二十一年，提出割讓野人山全境，開放西江等要求。英公使態度也異常橫蠻，翁同龢說他『貪如狼，狠如羊，其狡滑不下於施賊』。二十三年，訂立條約，割讓野人山一部份，西江開放梧州等三口。雲南兩廣地區存在着英法勢力的對立。二十四年，強租威海衛爲軍港，與旅順、大連對抗，限期二十五年。又強租九龍半島（擴大租地）香港附近各島嶼、大鵬、深州二灣，與廣州灣對抗，限期九十九年。

德國

二十一年，德國要求設立天津、漢口兩處租界，作為還遼的報酬。二十三年，藉口曹州教案，派軍艦強佔膠州灣。二十四年，清政府被迫訂立條約，承認（一）德國租膠州灣為軍港，限期九十九年；（二）德國在山東建築鐵路兩條（膠濟路及津浦路濟南以北一段）；（三）鐵路附近三十里內開礦權。

俄國

二十三年，俄國藉口德佔膠州灣，派軍艦佔領旅順、大連灣。俄公使向李鴻章張蔭桓送重賂，李五十萬盧布，張二十五萬盧布。二十四年，俄國換得極滿意的條約。清政府承認旅順為俄軍港，大連為商港，租期二十五年，東省鐵路造支路一條，通旅順、大連。俄財政部大臣說『此為余對中國人辦交涉第一次行使賄賂手段。』

列強根據地確定了，『各海口盡被外人所佔，此即割裂也。』（英公使警告總署語。）從各根據地出發，列強互認勢力範圍，長城以北屬俄，揚子江流域（十省）屬英，山東屬德，雲南兩廣屬法，一部份屬英，福建屬日。又各爭奪鐵路建築權，英得二千八百哩，俄得一千五百三十哩，德得七百二十哩，比得六百五十哩，法得四百二十哩，美得三百哩。『逐漸瓜分大清帝國』（德皇威廉二世語）的形勢雖已經造成，但帝國主義者決不滿足於已有的勢力範圍，利害衝突愈益加劇，中國人民也決不允許瓜分的實現，普遍地大量地發生着自發的反帝鬥爭，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就是瓜分運動的反應。

第七章　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戊戌變法一八九五年（光緒二一年）至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六年）

第一節　緒言

李鴻章自稱『聖之時』的『洋務，』經過甲午戰爭破產了，洋務派辦工業失敗，給萌芽狀態中的資本主義有機會反對官辦、官督商辦要求自己的發展，在政治上產生改良主義的民權運動。

甲午戰爭，中國海陸軍遭受徹底的慘敗，外國侵略者不僅在言論上公開主張而且在行動上積極進行『瓜分大清帝國』這刺激了一部份滿漢統治階級及染有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要求聯合起來抵禦外侮，在政治上產生改良主義的保種運動。

當時改良運動倡導者，如光緒帝、翁同龢、張謇、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人，雖然思想上各有不同，一般說，都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人物。他們希望中國也走一次『明治維新』的道路，但客觀條件絕對不能允許。因爲帝國主義通過洋務派與頑固派結合，確立了強大的統治機構，任何改良如果妨礙了它們，必然予以嚴厲的打擊。戊戌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此，戊戌以後各種

改良運動無不失敗的原因也在此。

第二節　甲午戰前改良思想的醞釀

洋務派舉辦新政，自稱求富強，實際是阻遏了民間資本主義的生長。中法戰爭前後，以上海、香港為中心，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已在倡導改良主義的「變法」。例如馮桂芬（林則徐的門生）著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所謂富強之術是「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四端，首先要廢除八股，開學校，肄習西學，設船砲局製造洋器。實行的方法他看得極容易，說「惟皇上振刷紀綱，一轉移間耳。」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度裏的資本家主要是從官僚，富商，豪紳，地主蛻變過來，它本身缺乏獨立的實力，却和封建勢力尤其皇帝有不可分的關係，把希望寄託在上層當權者，這是改良主義的共同信仰，也是它失敗的共同原因。比馮桂芬更著名的王韜（太平天國狀元）曾遊歷英國，精通西洋科學，回國後充香港循環日報主筆，鼓吹變法。他贊美日本「國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中國急需改變「取士、練兵、學校、律例」四種舊制，更為「今日時務之急」的是「首在乎收拾人心，因民之利而導之，順民之志而通之。」他認為那些洋務派的新政，止「能為民禍而不能為民福，能為民害而不能為民利」（上當路論時務書）王韜著書多種，對變法運動有很大影響。甲午以前，鄭觀應、何

啓、胡禮垣、陳虬等提倡變法，態度愈益顯明。鄭觀應著盛世危言，何啓著中國亟宜改革政法論，新政始基、新政變通、新政安行等書（各書多是何啓胡禮垣合著，總稱新政眞詮）陳虬著治平通議、報國錄（總稱蟄廬叢書）都主張開議院，行君主立憲制度。鄭觀應說：「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慮之密，無逾於此。此制既立，實合億萬人爲一心矣。」這種君主立憲主義的「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盛世危言：西學篇）論，是改良主義的基本精神，與洋務派專制主義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論性質有別。

變法運動的別一推動力是耶穌教士和在華歐美商人，他們希望滿清政治有某些改良，以便大擴商業推廣教務。滿清禁止中國人辦報，當時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漢口、香港、廣州等處，西商開設報館，延華人主筆，這些人多是維新名士，在西商庇護下，獨佔輿論界，變法思想的傳播，得力於報館不小。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歐美耶穌教士在上海成立廣學會（印度也有廣學會）會員林樂知（美）丁韙良（美）李佳白（美）慕維廉（英）艾約瑟（英）李提摩太（英）化之安（德）等能用中文著書，介紹西學，改變了一部份士大夫輕視異教的成見。會中出書範圍廣泛，外國歷史及辦學校新法影響尤大。如泰西新史攬要（李提摩太譯）列國變通興盛記（李提摩太著，記俄國大彼得日本明治事特詳，）七國新學備要（李提摩太著，又名速興新學條例。）文學興國策（林樂知譯，）自西徂東（化之安著）等書給中國維新派有根

據議論變法。光緒十五年，廣學會發行萬國公報（月報，）林樂知主筆，多載時事論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變法成爲一個運動，萬國公報是有力的推動者。

第三節　甲午戰後變法運動高漲

甲午戰爭中，親俄派西太后李鴻章壓迫親英派光緒帝、翁同龢，親英派失敗了。廣學會看出親英派不甘屈服，要在政治上尋出路，正是勸告變法的機會。光緒二十一年，派李提摩太駐北京，謁見政府中當權大臣翁同龢、孫家鼐（光緒帝師傅）文廷式（光緒帝親信）等接受勸告，開始閱讀時務書，傾向變法。

光緒十四年，廣東舉人康有爲入京會試，寫了一篇上皇帝書。請求變法維新，書中大意分『變成法、通下情、愼左右』三層，對洋務派的變法表示異議，他說：『今天下非不稍變舊法也，洋差、商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數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強，中國行之而奸蠹，何哉？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故也……至於奸蠹叢生，則雖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變之爲愈矣。』這正是中法戰後，李鴻章積極擴大洋務的時候，康有爲看作『奸蠹』『巨害』，主張從政治上變起。代表官僚買辦利益的洋務派與代表資本主義的改良派分歧就在對專制政治的變或不變這一點上。他這篇駭人的議論，得極少數帝黨官僚贊成，但無人敢代

遞。后黨大學士徐桐說：『如此狂生，不可中，』抽去他已被錄取的考卷。康有爲考試受挫，却大得聲名，有利於運動的倡導。二十一年三月李鴻章簽字馬關條約，康有爲在京會試，號召各省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萬言書，要求『拒和、遷都、變法，』着重尤在變法，說『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這是有名的『公車上書，』也是無先例的士人聯合大請願，康有爲的變法主張成爲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在滿清嚴厲禁止士人干政的制度下，這一運動是有重大意義的。雖然萬言書仍被拒絕呈遞，但頑固派閱卷官不敢再擯斥他的考卷。康有爲取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在未到工部前，又上變法萬言書，這一次他成功了，光緒帝閱後『極嘉許，』他接着又上皇帝萬言書，被工部頑固派大臣阻止。七月帝黨文廷式出面組織強學書局（又稱強學會）康有爲、梁啓超加入活動，成會中主要分子。會員有江標、袁世凱、黃遵憲等及英美人士共數十人，每十日集會一次，每次有人演說。又創行公報，康梁等撰稿，每日印一二千份分送朝官貴人。兩江總督張之洞見學會勢盛，捐銀五千兩充公費。八九月間康有爲往南京，請張之洞設立上海強學分會，臨行前一天，訪李提摩太商議合作。李氏稱許他的萬言書，『余甚驚異，凡余從前所有之建議，幾盡歸納晶結，若驚奇之小指南焉，吾人之目的相同，宜其親來訪談。』康有爲出京後，梁啓超任李提摩太私人書記，強學會的支持者是翁同龢、孫家鼐，提導者是廣學會代表李提摩太，借『書局，』『學會』名義，實際組成以英美爲背景的擁帝政黨。

后黨當然不許帝黨擴大勢力，徐桐公然宣稱『寧可亡國。不可變法，』就是說，決不許帝黨得勢。上海強學分會成立一月餘，會務發達，會員張謇，陳三立、岑春煊等多是維新派名士。善看風色的張之洞預見后黨定要進攻，藉口不同意『孔子改制』學說，停發會費。李鴻章的親家御史楊崇伊奏請查封，說是私立會黨，將開處士橫議之風，』西太后據奏強迫光緒帝下令封閉強學會。翁同龢深爲失望。帝黨御史胡孚辰奏請解禁，翁同龢藉此力主恢復，結果改設官書局，每月經費一千兩，任務是譯書，請李提摩太在官書局任職，他知道后黨勢大，變法時機不會到來，出京回上海廣學會。

極端頑固惡劣的后黨，讓強學會獲得四個月的活動，唯一原因是馬關條約太激起全國士民的忿怒了，這一羣賣國賊不得不暫時退縮。八月，日本宣言交還遼東，后黨依仗沙俄氣燄漸張，解散強學會，正是它回復權力的初步，也是維新運動第一高潮的結束。公車上書後，維新派影響散佈全國，頑固勢力並不能阻遏這個潮流，維新運動在上海、廣東、湖南三個中心地區繼續發展起來。

上海

黃遵憲就上海強學分會基礎上籌辦報館，光緒廿二年七月，時務報（旬刊）發刊，梁啓超任主筆。他是天才的宣傳家。任廣學會書記員又任李提摩太的私人書記，半年內不僅讀完了各地譯出的西書，還接受李氏的口頭指點，雖然還止二

十四歲，他的中西學問，在當時已是第一流。時務報出世，『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爲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梁啓超清議報第一百册祝辭）二十三年十月，他到湖南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務報繼續出版，上海及附近地區出版報章雜誌，不下三十種，輿論界頓呈發皇氣象，滿清嚴禁士人干政的隄防又被維新潮流衝破了。

湖南

在湘軍產生地的湖南，頑固勢力特別強大，新舊鬬爭也特別激烈，中日戰爭爆發，湖南維新志士譚嗣同、唐才常提倡變法救亡，譚唐活動僅在瀏陽縣，與康有爲領導的變法運動並無聯繫。光緒二十三年，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督學江標（後任徐仁鑄）都是維新派，與譚唐等合作，創辦時務學堂，聘梁啓超爲總教習，唐才常等爲分教，譚嗣同等積極支持。一時籌辦新式水陸交通、開礦、設武備學堂、練民團、又設南學會，出版湘學新報（自三月始，每月出三册，至四十五册止）湘報（散爲日報，合爲月報，自二十四年二月始，至八月止）。湖南成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南學會是湖南新政的最重要部份，『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策，而先從湖南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演說稿在湘學報發表）此學會之意也』（飲冰室文集：譚嗣同傳）南學會會員千數百人，省城設總會，各縣設分會。譚嗣同說：『卽不能與民權，亦當畀紳耆議事之權。夫苟有紳

權，即不必有議院之名已有議院之實矣』在變法初期這種省縣紳耆議院是推行新政的有效機關，因爲土豪劣紳反抗南學會還不曾鑽進來。時務學堂學生四十人，多是有志青年，教習批答學生課本，發揮民族，民權主義，如『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眦裂。』『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王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這是排滿革命思想已超出改良主義範圍。又如『春秋大同之學無不言民權，』『能與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洲不及也，將來大一統者，必由美國以成之。』這是贊美民主政治已超出君主立憲範圍。梁啓超、譚嗣同、唐才常、樊錐（邵陽縣南學分會首領）皮錫瑞（今文經學大師）等借學堂、學會倡導新說，當時正是各國強奪沿海要口，瓜分之說盛行，滿清政府賣國罪惡暴露無遺，人心恐慌的時候。南學會準備『屹然自立於天下，』即果遇英人葛洪（瓜分論者）之狂喙，尙能有所資藉（創辦新政，）不淪於猺獞之族』（唐才常上歐陽中鵠書。）思想上確有革命傾向。大劣紳王先謙、葉德輝率領頑固派徒黨，自稱『保衞聖道，』用各種卑污手段，大舉向維新派攻擊。說時務學堂培養『無父無君之亂黨。』南學會提倡『一切平等禽獸之行。』『倡平等』是『墮綱常，』『伸民權』是『無君上，』要求清政府殺康有爲、梁啓超。說樊錐『欲以我朝列聖乾綱獨攬之天下，變爲泰西民主之國，眞漢奸之尤，』應『臠割寸磔，處以極刑。』結果劣紳們『齊集大成殿，禱告至聖先師孔子，立將亂民樊錐驅逐出境。』皮錫瑞在南學

會講學，力主變法，他的兒子著醒世歌，說『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劣紳們斥皮氏父子『被邪說煽惑，』也用暴力把他們驅逐出境。湖南新舊兩派長期猛鬥，直到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後，頑固派屠殺維新派一百餘人，才暫時取得了可恥的勝利。

廣東

上海強學分會解散，康有爲繼續宣傳變法。二十三年，與岑春煊等在廣西開聖學會，又回廣州開萬木草堂，聚徒講學，廣州成爲變法運動的發源地。他奔走兩廣江浙，結交紳士大夫，勸辦學會報館，據梁啓超戊戌政變記說：三年內全國設立學會，學堂，報館凡五十一所，其中學會二十四，學堂十九，報館八。就地區說。湖南十六，江蘇十一，廣東八，北京三，廣西二，陝西、湖北、浙江、福建各一，實際數目或更多，康有爲倡導的功績是巨大的。

全國維新運動的高漲，引起頑固派的驚駭，洋務派首領張之洞著勸學篇，代表頑固勢力反抗新潮流。洋務派是改頭換面的頑固派，它也口稱必須變法，但絕對反對民權，不許絲毫觸動專制制度。勸學篇自序『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具，但取西人製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其（西人）禮教政俗已不免於夷狄之陋，學術義理之微，則非彼所能夢見者矣。』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就是洋務派的變法宗旨。書中有薄賦、寬民、救災、惠工等十五篇，竭力宣揚滿淸的『深仁厚澤，』全是無恥謊話；根據這些謊話，武斷的證明君主專制是盡善盡

美的制度。他的基本主張在『明綱』說『三綱相傳數千年，更無異議，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明綱篇）他的攻擊目標在民權，說『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若人皆自主，不盡滅人類不止』（正權篇）一八九八年（戊戌）勸學篇出版，『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偏於海內』對維新運動阻力極大。梁啓超評勸學篇說：『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戊戌以來將近五十年，因爲中國還不曾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張之洞和勸學篇儘有活動餘地。不過，人民政治覺悟逐步提高了，即使『挾朝廷之力』九個月『印刷至二百餘版』無非增加一些惹人掩鼻的灰塵，總不能阻止社會進步的大潮流。

甲午至戊戌，維新運動的成就：第一，衝破了滿淸禁例，爭得某程度出版結社的民主權利。第二，民間資本主義工業獲得法律上承認。甲午以後，新工業從洋務派『官辦』『官督商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中國開始傾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洋務派把持新工業的時代暫時沒落了。

光緒二十一年，維新派首領之一胡燏棻上變法自強條陳疏，要求『開民廠以製造機器』揭出官廠的弊病說：『中國各省設立製造、船廠、槍炮子藥等局，不下十餘處；向外洋購買機器物件不下千百萬金，而於製造本原，並未領略。推厥病源，厥有三故：各廠之設，類以洋人成事，其病一。

廠係官辦，一切工料資本，每歲均有定額，事事依核銷處，一成不變，其病二。各局總辦提調人員，或且九九之數未諳，但求不至偷工減料，已屬難得；器械利鈍，悉聽工匠指揮，茫無分曉，其病三。』結論是『中國欲將官廠製造器械，雖百年亦終無起色。』這個結論完全正確。他主張『必須准各省廣開民廠令民間自爲講求，如國家欲購砲槍船械機器，均托民廠包辦。則人人有爭利之心，斷本致懈，自然專心致志，實力講求，以期駕乎西製之上。』康有爲上皇帝書也說『機器廠可興作業，今各省皆爲厲禁，於吾藝技不能日新，製作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敗；而禁吾民製造，是自蹙其國也。官中作廠，率多減偷，敷衍欺飾，難望致精。宜縱民爲之，並加保護，凡作機器廠者，出費領牌，聽其創造。』胡康二人的意見，代表社會進步勢力，清政府不得不放棄奕訢、李鴻章所設禁止民間使用機器的慣例，諭令各省『招商多設織布紡綢等局，廣爲製造。』按照二十三年張之洞奏摺所說『數年以來，江浙湖北等省，陸續添設紡紗、繅絲、烘繭各廠約三十家。此外機造之貨，蘇滬江寧等處，有購機器製造洋酒、洋蠟、火柴、碾米、自來火者。江西亦有用西法養蠶繅絲之請。陝西亦集股開設機器紡織局。四川已購機創設煤油並議立洋燭公司。山西亦集股興辦煤鐵，開設商務公司。至於廣東，十年以前卽有土絲、洋紙等機器製造之貨。湖北湖南兩省已均有購械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北現已學得機器造塞門德土之法，勸諭華商興辦。湖南諸紳現已設立寶善公司，籌議各種機器製造土貨之法。自此各省氣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廣。』這確是甲午

戰後發生的新氣象，滿清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認民間資本主義生產的合法，可以說是維新運動的重要收穫。二十四年，清政府設農工商局，獎勵機器製造，又特定章程，凡『有能獨力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辦槍炮各廠，有裨於興國殖民之計者，並照軍功之例給予特賞』。槍炮廠也允許民間經營，說明光緒帝全部接受維新派建議，有高度的變法決心。

第四節　參加維新運動的派別

維新派與頑固派人數比較，『不過千與一之比，其數極小』（嚴復：論中國分黨）。頑固派反對變法，決心『寧可亡國』。這些人結合在西太后、李鴻章、張之洞三首領腳下，構成強大的反動勢力。維新人數既少，共同擁戴的光緒帝，又並無實權。頑固派有沙俄實力支持，維新派止有英美日限於友誼的同情。維新運動是資產階級要求民權的運動，而當時資產階級，還不曾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因之內部派別紛歧，力量脆弱，顯然不能戰勝頑固派。

維新派內翁同龢系、嚴復系、假維新系、康有為門下的麥孟華系都屬右派；康梁系、容閎系屬中派；譚嗣同系屬左派。這些派別代表的利益不同，對維新運動各採不同的態度。

翁同龢系

這一系是擁帝的官僚集團，翁同龢為首，孫家鼐、長麟、志銳、文廷式等為中堅。『太后既已歸政於皇上，則一切政權不宜干預，免掣皇上之肘』（御史安維俊

甲午年奏疏。）這是翁系的宗旨他們也贊成變法，謀富國強兵，但對康有爲民權平等說，表示憎惡。孫家鼐奏稱『孔子改制考將蠱惑民心，導亂天下。』請旨將改制考毀版。翁同龢日記稱『近見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此人居心叵測。』翁系的變法主張是在皇帝『獨斷』下，改革某些弊政；引進康有爲，目的在加強帝黨，反抗后黨；對民權平等說，不得不暫時容忍。翁同龢最得光緒帝的親信，西太后陸續斥逐安維俊、文廷式、汪鳴鑾、長麟、志銳，削弱帝黨。戊戌四月，光緒帝召見康有爲，決定變法，西太后迫令光緒帝革翁同龢職，即日驅逐回籍，翁系在政府中失勢，維新運動遭受嚴重的打擊。

假維新系

這一系是投機官僚，本質仍屬頑固派。嚴復說有三類假維新人：『其一、以談新法爲一極時髦之粧，隨聲附和，不出於心。其一、見西人之船堅炮利，欲從而效之。其一、則極守舊之人，及見西法，不欲有一事爲彼所不知不能，於毛舉糠粃附會經訓，天下之人，翕然宗之。維新之稱將爲所絕。此三者，有維新之貌，無維新之心者也』（論中國分黨。）例如李盛鐸原是保國會發起人之一，後來頑固派羣起反對，他也連奏三本攻擊保國會，託報館登載全部會員名單，抽出自己的名字不登，求得頑固派的信任。又如孫家鼐原是帝黨中堅，翁同龢被逐，他暗中轉向頑固派，排擠康有爲。維新派中層份子中，這一系人佔大多數，一遇風色不順，就散走或反噬。

嚴復系

嚴復是福建學堂第一期學生，光緒二年，遊學英國海軍大學。六年，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前後二十年，擁有多量的學生。二十三年，在天津出版國聞報（旬刊），譯載外國重要政事及名著，赫胥黎天演論的譯文，就在報上按期發表。甲午戰後，緊接着各國強奪海口，對中國人的刺激是太深了，天演論闡發『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保種保羣自強進化之公理，』給失望悲觀的人士指示新希望。天演論風行全國，被稱爲『中譯之善本無有過於此書者。』在維新運動中起了極大的作用。當時上海時務報，天津國聞報分掌南北輿論界領導地位，嚴復思想的影響不下於梁啓超。嚴復代表不願亡國但缺乏勇氣的保守派士人。他譯書多種，文字古奧，自稱『吾譯非以餉學僮，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羞效『報館之文章』（與梁啓超論所譯原富書），這正是保守思想的表現。因爲不願亡國，主張『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原強篇），因爲缺乏勇氣，他一面痛恨專制政治，一面又崇拜專制皇帝。闢韓（韓愈）篇說：『秦以來之爲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眞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爲，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這樣完全正確的論據，却得出『君與民共治』的結論，對大盜妥協。在上皇帝萬言書裏，不敢提示民權，止請『結百姓之心。』方法是皇帝

『親至沿海各省，巡守省方縱民聚觀嵩呼，瞻識其主。』說百姓見皇帝一面，就『懽忭感泣人人有戴主死敵，奮不自顧之心。』把大盜描寫成神聖，百姓是大盜崇拜者。他所說的維新實際是開明專制，康梁失敗後，嚴復並不被頑固派追究，這不是偶然的。

麥孟華系

麥孟華是康有爲大門徒之一，與梁啓超有同等地位。他代表康門中最頑固的一派，主張『尊君權，抑民權，』說『中國非民權不立之爲患，而君權不立之爲患。』他把中國社會一切腐敗落後現象，都看作民太自由，君太無權。他所謂變法，要變出一個有絕對權力的皇帝。

以上右派各系，都不是民權主義者，變法的目的在變無權的光緒帝爲有權的光緒帝。

康梁系

康梁系代表開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轉化爲資本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必需的保障，就是說要取得有限度的民主權利。西報稱『甲午以後，中國有三黨：守舊黨（后黨）主聯俄，意在保現存之局面；中立黨（維新派）主聯日，意在保國以變法；維新黨（興中會）主聯英，以作亂爲自振之機』（嚴復論中國分黨）中立黨是介在頑固派與革命派中間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政治團體。康梁系應該被認爲中立黨的主幹。

康有爲、廣東南海縣人，出身豪紳家庭，幼年受嚴格的程朱學教育，開口便稱『聖人聖人』青年時期，博通今文經學、中國史學及佛學，棄程朱學轉崇陸王學，以爲『直捷明誠，活潑有用。』

今文經學派自龔自珍魏源以來，借公羊傳所謂『微言大義』議論時政，有維新變法的傾向。它的反對派古文經學派與程朱道學派，桐城古文派勾結（鴉片戰後，以曾國藩爲有力代表，所謂合義理考據詞章爲一，）成學術界的頑固派。康有爲尊信今文經學、陸王學，說明他在舊學範圍內闖於求新方面。中年到北京應考，路過香港上海，『見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光緒十七年，在廣州萬木草堂開始聚徒講學。他的講學宗旨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康先生傳）原來今文學學風長於附會，雖然西書不多，也儘夠他附會了。

康有爲講學凡四年，培植維新派的基礎，陳千秋、梁啓超稱大弟子，助師著大同學、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完成了維新運動的理論根據。新學僞經考在學術意義上推翻古文經學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義上打擊頑固派的『恪守祖訓』。孔子改制考尊孔子爲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大意在『通三統』『張三世』。三統是說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三世是說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愈改愈進步。這兩部著作影響很大，改制考尤使守舊者驚駭，孫家鼐，陳寶箴奏請毀版，張之洞著勸學篇來對抗，說明他的學說獲得不小的成功。

康有爲『祕不以示人』的重要著作是大同書，混合公羊家三世說、禮運篇小康大同說、佛

教慈悲平等說盧騷天賦人權說耶教博愛平等自由說，還耳食一些歐洲社會主義學說，幻想出一個『大同之世。』全書分十部，共數十萬言。大意說封建社會是據亂世，資本主義社會是升平（小康）世，公產主義社會是太平（大同）世。他描述『大同之世天下爲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極樂世界，』表現出豐富的想像力。他說『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產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皆歸之公。舉天下之田地皆爲公有，人無得私有而私買賣之（公農論）凡百工大小之製造廠鐵道輪船，不許有獨人之私業（公工篇）大同世之商業，不得有私產之商，舉全地之商業，皆歸公政府統之』（公商篇。）至於如何去私產，說是從『去人之家始。』自稱『此事甚易，』實際是毫無辦法。康有爲著大同書當然不是好奇炫博，而是給中國資產階級指示出路。那時候歐洲資本主義正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在工業上他看到『近年工人聯黨之事，挾制業主，騰躍於歐美，今不過萌蘗耳。又工黨之結聯，後此必愈甚，恐或釀鐵血之禍，其爭不在強弱之國，而在『貧富之羣矣』（工不行大同則工黨業主爭將別成國亂篇。）在農業上他也看到『故以今之治法，雖使機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治更有精密，而不行大同之法，終無致生民之食安樂，農人之得均養也。或亦能創共產之法，而有家有國，自私方甚，而欲行共產之說，猶往南而北其轍也』（農不行大同則不能均產而有饑民篇。）歐洲的工農鬬爭，使中國剛開始的資產階級感到自己可怕的前途，大同書企圖解決這個難題，妄構中國特殊說，肯定『全中國絕無階級，

以視印度歐洲辨族分級之苦，其平等自由之樂，有若天堂之視地獄焉』（階級之苦篇。）照他的說法，中國並無階級存在，自然不會有階級鬥爭，用改良方法可以消除未來的鐵血之禍。大同書被中國資產階級奉爲經典，口頭高叫『天下爲公』，實際是抹煞階級存在幻想資產階級的永久繁盛。

梁啓超發揮康有爲的理論，提出『以羣爲體，以變爲用』的『治天下之道』（說羣自序。）羣的目的在保國保種，方法提倡聯合黃種，君民同治，以孔教爲國教，反對專制獨裁、外國侵略者及買辦洋務派。變的目的在變政體，方法是廢科舉，開學校，改官制，地方自治，反對變枝節。戊戌以前，梁啓超宣傳整套的變法理論和政論，對維新運動的推進，起了重大的作用。

康梁系政策的大宗旨是『滿漢不分，君民同治』，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從『滿漢不分』出發，康梁系不談民族，而談保種，主張聯合黃種各族，反抗白種人的侵略。對外信賴日本，梁啓超述師說，說是地球有一種『運』，已到日本，『當渡黃海渤海與中國，而北有高麗，南有台灣，以爲之過脈，今運將及矣……十年以後，中國之強盛，將甲於天下』（論中國之將強。）高麗台灣正是日本侵略中的南北兩通路，康梁反認爲是與中國之『運』的過脈。用神祕的『運』來掩飾違反人民心理的聯日政策，是他們的眞意。對內企圖『滿漢合種』，說是『平滿漢之界，誠支那自強之第一階梯也，』他舉出『散籍貫、通婚姻、並官缺、廣生計』四條辦法，替滿洲的『聖

皇』保持『幸治支那之光榮』（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康梁的保種主義是反動的。從『君民同治』出發，梁啓超嚴格區別民權與民主的含義『絕異』，中國止能行民權不能行民主，他說『政府壓制民權，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也。』

對民主革命認爲『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眞理者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故革命者最險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康梁的民權主義也是反動的。不過，他和右派的嚴復有區別，嚴復以爲『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主而入民主』梁啓超相信民主政治將得最後勝利，以爲『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康梁系屬於維新運動的中派，比右派進步，因爲他們承認從民權可以轉到民主。

容閎系

容閎是中國改良主義的創始人。幼年在香港瑪禮孫學校受美國式教育，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遊學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他篤信耶教，娶美國妻，入美國籍，是美國化的中國人。大學畢業後，抱着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富強之境』的志願。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歸國，想『識中國達官，庶幾得行余志。』他曾同情太平革命，向洪仁玕提出富強策七條，未被採納。又向曾國藩、李鴻章建議辦機器製造、廠輪船招商局，派幼童赴美遊學，都得到實現。洋務派創辦新政，多與容閎有關。留美學生一百二

十八回國，「列身顯要，名重一時」；容閎在這一派人中有威信，中日開戰，激動了他的愛國心，又回中國，結識翁同龢、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籌劃維新事業，「寓所變爲維黨領袖的會議場」（容閎：西學東漸記）。庚子年，唐才常等組織自立會，推容閎爲會長，自立軍起義失敗，退回美國。

以上中派兩系代表萌芽狀態的資產階級。它的軟弱性使它採用改良主義方法，希望從滿清政府手中用和平方法取得一部份政權。當封建壓迫使它不能忍受的時候，它也會表現出些許革命的傾向；但當它獲得有利可圖的機會，又立卽堅持改良主義或墮落到反革命。康有爲就是這一派人的典型。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孫中山準備起義，同陳少白去見康有爲，想招他同辦大事，剛好萬木草堂放假，沒有見着。正月中，康有爲率梁啓超等一羣學生往北京會試，路過上海，陳少白到旅館找他，密談革命。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記載當時談話：「我說現在中國的情形，已很危急，滿清政府實在太不行了，非革命一下不可。他也說，很對的。然後他就問我長江一帶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就大概的把局面說了一下，他也點頭稱是。」興中會第一次廣州起義，康有爲派弟子「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章太炎：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戊戌政變，康有爲逃到日本也還想利用興中會聯合起兵，後來奪得興中會華僑羣衆，才堅決保皇，專圖個人私利，從此不再是進步政黨首領，而成爲反動集團的渠魁了。

譚嗣同

譚嗣同出身湖南瀏陽縣大紳士家庭，受王夫之船山遺書的影響，早年就有

同系

強烈的民族意識、甲午戰爭更刺激他發憤提倡新學。當江南製造局譯出的自然科學書，廣學會譯出的外國歷史、政治及耶穌神學書，供給他新知識，加上舊的儒學，老莊學，佛學，構成變法的理論體系，成爲維新運動時期第一流思想家。光緒二十二年，他在南京著仁學，每成一篇，與梁啓超相商榷；康梁思想給他影響當然不小，但並不能改變他獨特的面貌。在漢滿問題上，康有爲不敢表示反滿，譚嗣同嚴斥『奇渥溫（元）愛親覺羅（清）諸賤類異類，遐陵乎蠻野凶殺之性氣，以竊中國』（仁學上）。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他悲憤異常，說『滿漢之見，至今未化，故視爲儻來之物，圖自全而已，他非所恤，豈二百五十年之竭力供上，遂無一點好處耶。宜乎台灣之民，聞見棄之信，腐心切齒，以爲恩斷義絕。開闢以來無忍心如此者』（上歐陽中鵠書）。在君民關係上，康有爲主君民同治，譚嗣同主民治，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爲君。夫曰共舉之，則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爲民辦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爲辦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仁學下）。在思想根源上，康有爲從陸王心學出發，以爲變法是由於『不忍之心』。譚嗣同據王船山『無其器則無其道』說爲變法宗旨，以爲『道必依於器而後有實用，非空漠無物之中有所謂道』（上歐陽中鵠書）就是說，依社會的變化而變法。在對舊派態度上，康有爲主妥協調和，譚嗣同主鬥爭。他說：『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今日中國能鬥到新舊兩黨流血徧

地，方有復興之望。今日但觀誰勇猛耳。』唐才常也說：『若夫地球全局，則非發明重民惡戰平等平權之大義，斷斷不能挽此浩劫。受業等能殺身以成仁，不能曲學而阿世』（上歐陽中鵠書。）這些，都是譚嗣同唐才常高出康有為處，在湖南自成維新運動中偏左的一派。不過，他們並不能超出改良主義的範圍，譚嗣同同情光緒帝，怕西太后藉口傷害『始事主戰之人』（光緒帝，）希望天佑我國，使和議速就，自弓劍懸如初』（甲午年上歐陽中鵠書。）他雖然憎恨滿洲統治，反滿決心是缺乏的。唐才常聽到光緒帝變法，說是『皇帝神聖天縱，遠邁唐虞，合地球全局觀之，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逆而難，今適得其易者，誠我四萬萬人無疆之幸也』（上歐陽中鵠書。）他相信『皇上天亶聰明，既我朝德澤之厚，』變法一定成功，籌些錢去捐道員，準備做維新大官。改良主義派不論他如何激進，到底總是軟弱的。

維新派內部右派勢力最大，中左兩派較小，表現在光緒任用專辦新政的軍機四卿。楊銳（張之洞、陳寶箴保薦）劉光第（陳寶箴保薦）代表右派，林旭（康有為門徒）代表中派，譚嗣同代表左派。四卿中譚林『尤盛意氣，毅然獨斷』（光緒大事彙鑑。）實際止有譚嗣同一人努力新政。楊銳是圓滑官僚，張之洞最親信的門徒，代表假維新系。他廣收賄賂『今日一包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章太炎革命道德說。）明知『今上與太后不協，變法事大，禍亦不測，吾處樞要，死無日矣。』還是貪戀利祿，捨不得軍機處地位。劉光第是積極的

擁帝官僚，仇恨后黨，不通往來，代表翁同龢系。林旭浮薄少年（三十五歲、沈葆楨孫婿，）與后黨首要之一北洋大臣榮祿有交情，康有爲想利用他謀帝后兩黨妥協。被捕前一天，「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斬首時還「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左派譚嗣同獨能忠於自己的變法事業，拒絕日本人的勸告，不肯逃亡，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梁啓超：戊戌六君子傳）辦理新政的四卿，反映維新運動的紛歧和無力，袁世凱敢於出賣，就因爲看穿了維新勢力遠不敵頑固派。

第五節　百日維新

洋務派的變法「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竭蹶」（嚴復：上皇帝萬言書。）梁啓超攻擊尤力，說「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覩矣。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始力而竭成之者也。不見李鴻章訓練海軍之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政變原因答客難。）

維新派反對洋務派的議論，符合社會的公意。因之『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康有為上皇帝書）也是符合社會公意的正確方針。但維新派被『變之自上者順而易』的思想所迷惑，看光緒帝是『天亶聰明』的『聖上』根本不認識他不可能變法，維新運動全部落空，正是認識錯誤的應有結果。

在國內政治方面，西太后、光緒帝的關係，是滿清機構極度腐爛的表現。光緒帝作為西太后的一個傀儡，才有他存在的意義，不願當傀儡，就是不能當皇帝。雖然光緒帝確有變法決心，對西太后表示『不能為亡國之君，若不予我以人君實權，毋寧遜位。』對孫家鼐表示『朕但願救中國耳，若能有益於國民，則無權何害』（康有為戊戌奏稿）但傀儡地位並不因此改變。在外國關係方面，西太后、李鴻章訂中俄密約，出賣東三省換得武力保障后黨政權的鞏固。英美並未得同類利益，不願意積極支持帝黨。維新派變法，超出帝國主義能允許的範圍。梁啓超引李提摩太所著西鐸說：『西官之為中國謀者，實以保護本國之權利耳，余於光緒十年回英，擬謁見英法德等國學部大臣，請示振興新學之道，以儲異日傳播中華之用。某國大臣變色曰：汝教華人盡明西學，其如我國何，其如我各與國何！』又說：『西人之見華官，每以諛詞獻媚，曰貴國學問實為各國之首，以驕其自以為是之心，而堅其藐視新學之志，必使無以自強而後已。』李提摩太目的在傳

教不妨說出一些政治侵略者的祕密。這使一般維新派覺悟到：『西人之政事可以行於中國者，若練兵也，置械也，鐵路也，輪船也，開礦也。西官之在中國者，內焉聒之於吾政府，外焉聒之於吾有司，非一日也。若變科舉也，興學校也，改官制也，興工藝開械器廠也，獎農事也，招商務也，吾未見西人之爲我一言也』（結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維新派對西人態度，譚嗣同可爲代表，他在強學會封禁以後，認爲『事理失平，轉思出而獨逢其禍。擬暫將孔子擱起，略假耶穌之名，推英國駐漢領事賈禮士充會首，結爲湖南強學分會』與賈領事『訂立密約，極費推敲，既欲假耶穌之名，復欲行孔子之實，圖目前之庇護，杜日後之隱憂。不圖西人絲毫之利，亦不授西人以絲毫之權，語語蹈虛，字字從活。此約一定，學會隨意可興，誰敢正目視者』（上歐陽中鵠書）維新派標榜保種保教，戒備西人的乘機侵略。同樣侵略的日本，却看作同文同種，主張中日聯盟，共禦西人。變法期中，伊藤博文藉口遊歷到北京，光緒帝破例親自接見，請他指導『改革順序方法』。甚至有人奏請留爲中國宰相。伊藤與李提摩太同住一處，策動變法，這當然引起英美的疑忌。隨着『中日親善』的發展，英美採取監視態度，防保種主義的實現。日本極大野心被英美牽制，不敢出力支持光緒帝。無論在內政上外交上，光緒帝都沒有變法的條件，維新派異想『順而易』失敗是必不可免的。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爲入京上書，請光緒帝『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

少存國脈、』書中列舉上中下三策，上策主旨是『採德俄日以定其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又請閱讀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及自著的日本變政志，大彼得變政考等書，經頑固派多方阻撓，直到二十四年正月，光緖帝才看到他的上書，大受感動。翁同龢也密薦『有爲之才過臣百倍』（梁啓超如此說，可能誇大，密薦是事實。）光緖帝諭總署，自後康有爲如有條陳，即日呈遞，不許阻格。有爲奉旨專摺統籌全局，大旨仿日本維新要政（一）大誓羣臣以定國事；（二）設『上書所』以廣言路；（三）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四）各道設『民政局』以舉行地方自治。維新運動開始與光緖帝結合。

以膠州灣事變爲發端，外患極度緊張，瓜分大禍迫在目前，維新派人士紛紛組織學會。京外如湖南南學會，京中如閩學會、陝學會、蜀學會、粵學會；又有保浙、保滇等會，意在團結志士，亡國後保衞本省。三月，康有爲等發起保國會，議定章程三十條，標保國保種保教爲宗旨，北京、上海設兩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略具政黨的規模。康有爲在成立大會上講演亡國慘禍，說『香港隸英人，至今尙無科第，人以買辦爲榮。英人之窶貧者，皆可爲大班，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我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這樣的意見本是替統治階層設想，頑固派却羣起攻擊，組織所謂攻保國會，散佈惡謠，又連續上奏彈劾，故意造成混亂狀況，使保國會會員畏禍退出。滿人文悌誣奏康有爲開

保國會，聲明『保中國不保大清。』頑固派當作有力證據，準備查究。光緒帝說『會能保國，豈不大善』，革文悌御史職。保國會召集三次會員二百餘人減至百人左右，以後不再開會事實上被頑固派破壞了。

這是新舊兩派首次衝突，各有損失，不分勝敗。

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上諭，表示變法決心。召見康有爲，詳談變法步驟，康有爲開始參與政權。頑固派也開始籌備政變。頒布定國是上諭後四天，西太后令光緒帝下諭革翁同龢職，驅逐出京。又諭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到皇太后前謝恩。又任命榮祿爲直隸總督，統率董福祥（甘軍）、聶士成（武毅軍）、袁世凱（新建軍）三軍。

這是新舊兩派決鬥的準備，新派得起草上諭權，舊派有軍政實權，握着屠刀待機而動。

從四月二十三日（公曆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到八月初六日（九月二十一日）共一百零四天，維新派曾有『除舊布新』的初步理想，發出數十條改革命令。這些命令大都含有妥協性，替頑固派留有出路，因爲缺少推行命令的實際力量，頑固派拒絕接受這個妥協。

關於除舊的命令

（一）廢八股，改試策論。全國數百萬八股士人痛恨入骨。（二）各省書院祠廟改設學堂，書院山長多是地方上有力紳士，祠廟有落後民衆擁護，與『嚴飭地方官保護教士，教民』命令對照，激起廣大士民的憤怒。（三）裁減綠營。近百萬將弁

兵卒發生失業恐慌。(四)裁撤京內外大批衙門冗員。腐朽官僚大震動，公開反抗命令。(五)准滿人自謀生計。二百五十年來久慣寄生生活的五百萬滿人，突然喪失特權，陷入死亡的危境。維新派紙上除舊，引起各種舊勢力強烈的反抗，光緒帝愈益孤立，西太后愈益堅強。

關於布新的命令

(一)辦學堂，首先籌辦京師大學堂。(二)設中國銀行，礦務鐵路總局，農工商總局，提倡各種實業，直到允許私人辦兵工廠。(三)獎勵新著作新發明。(四)設立譯局，編譯書籍，報紙一律免稅。(五)准許自由開設報館、學會。(六)編國家預算，公佈歲出歲入，按月發表。(七)廣開言路，不論官民一律得上書言事，嚴禁官吏抑阻。(八)辦農會，商會。短期內給予人民相當充份的民權自由，是維新派運動最大的成績。這個成績繼續發展起來，可以摧毀頑固勢力，但頑固派決不允許維新派獲得時間；在湖南，聚衆鬨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毀時務學堂；在北京，八月初發動政變。

這是新舊兩派全面衝突，新勢力來不及發展，被舊勢力用暴力摧毀。

四月間，光緒帝開始變法，西太后同時佈置軍隊，令榮祿統率董聶袁三軍。董福祥是甘肅匪魁，左宗棠收買他屠殺囘民起義軍，被稱爲猛將，最得榮祿的重視。聶士成是淮系著名戰將，絕對服從李鴻章的命令，在三軍中兵力最強。袁世凱善於運用兩面手段，取得相反各派的信任。甲午戰前，他是張謇的得意門徒，主張吞併朝鮮，強硬對日，張謇屬翁同龢主戰派，反對李鴻章，但李

鴻章却認袁世凱是唯一可用的人才。他給總署信裏說『朝鮮之事，最難處置，剛柔操縱，勢在兩難。袁世凱精明剛躁，鴻章每切諭以鎮靜勿擾。』這就是說，如果袁世凱學得鎮靜一些，那便成『不易得』的『通品』能處置最難之事。甲午戰後，主戰派稱『袁世凱深悉倭情，屢騰密報，若是倭韓形勢早達朝廷，則先事圖維，必不至如後來之倉卒。開朝旨召詢袁世凱，而李鴻章屢樽禁錮，不使至京』（翰林院聯名參李鴻章摺）據翁同龢日記，袁世凱曾派密使求他設法准令入京，他並奏請『派袁世凱帶數營』似乎袁世凱是主戰派方面的人。馬關談判，伊藤『問袁世凱何在。』李鴻章答稱『現回河南鄉里。』伊藤追問『是否尚在營務處?』李被迫承認『小差使無足重輕。』袁世凱經這一追問，聲望更高。清政府選爲北方洋式軍隊創辦人，得力於翁同龢的有意扶植。帝黨開強學會，他入會贊助。翁同龢被逐回籍，路過天津，他派專人持函獻厚禮，表示同情帝黨。在維新派看來，他應該擁護光緒帝變法。但在榮祿部下，他仍是親信將領之一，領精兵七千人。翁同龢第一次接見，就判定『此人開展而欠誠，』老官僚的人事經驗有時是精確的。果然，光緒帝及維新派首領都成了『此人』的出賣品。

七月下旬，懷塔布（西太后親信）楊崇伊（李鴻章親信）等往天津，與榮祿密謀，預定九月初，帝后同到天津閱兵，舉行政變，形勢非常緊急。康有爲先曾派親信人徐仁錄探問袁世凱意見，袁表示擁帝。康有爲、譚嗣同信以爲真，向光緒帝保薦，準備給他參謀部長職務，保護新政。七月

底，形勢更急，光緒帝密諭康有爲等說：『朕位且不保，爾等可有何良策，妥速籌商。』康譚等商定召袁世凱入京。八月初一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擢升侍郎，令專辦練兵事宜。次日又召見。初三日，譚嗣同密訪袁世凱，請他閱兵時，救光緒帝出險，誅戮后黨，恢復帝權。袁世凱許諾『正色厲聲』說『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初五日，袁世凱請訓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即日入京見西太后，半夜後，西太后囚禁光緒帝，宣稱皇帝再三懇請訓政，初六日起，坐殿辦事，百日維新宣告結束。袁世凱的兩面叛賣手段，換得頑固派的信任，從此變成政治舞台上頗爲重要的人物。

政變後，維新派議定李提摩太見英使，梁啓超見日使，容閎見美使，請設法救光緒帝，都被拒絕。榮祿、楊崇伊大捕維新派，康梁得英日艦保護，康逃香港，梁逃東京。楊深秀、康有溥及軍機四卿被捕慘死，罪狀之一是『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當時維新派紛紛逃避，北京形勢混亂，各國藉口護僑調兵入京，頑固派才開始畏懼，諭稱『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用刑至意』；被捕官員革職充軍得免屠殺。頑固派在一個月內禁止全部新政，恢復全部舊制。新政中被獎勵推行的止有保甲法。西太后說『認眞辦理，自堪弭盜』實際是利用地方頑固份子，普遍查禁維新運動。因爲光緒帝廣開言路，不少鄉村士人上書談論政事，攻擊官吏，頑固派需要保甲來摧毀民權的萌芽。

第六節　康梁維新派墮落成反動集團

新民主主義論一書指出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時說：「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改良主義的康梁維新派（死心保皇以前）當然也受這個原則的支配，不過比當時的革命派——興中會革命性更少些，妥協性更多些。

變法失敗，康梁等逃到日本，維新派開始分化爲三部份。一部份是湖南維新派，如畢永年、熊力山、唐才常等傾向革命，畢熊等先後參加興中會，與康梁絕交。唐利用保皇名義起兵勤王（排滿）算是半革命。一部份是康梁等，公開號召保皇，但仍與興中會保持微弱的連繫，梁主張合作，革命傾向比較顯著。一部份是麥孟華徐勤等，堅決保皇，反對革命。己亥（光緒二十五年）以後康梁與麥徐混爲一體，成興中會的頑敵。

康梁初到日本，經宮崎寅藏，平山周居間勸告，由梁啓超代表康有爲約陳少白代表孫中山在犬養毅家裏首次商議兩派合作。第二次陳少白直接和康有爲談判，興中會要排除滿清整個統治，康有爲要保存光緒帝；說『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今上的。』就是說比反對西太后的頑固政府。康有爲的想法，以爲西太后年齡比光緒帝大三十歲，西太后死後，自己無疑是立憲政府的首

領。他等願等待時機，當滿清主子的奴僕，不願在革命團體裏當第二三位的首領。談判不得結果，保皇會公然設立起來，與中會會員被奪去大半。當時日本政府扶植中國反滿團體，命令康有爲出境，他離開日本，向美洲及南洋華僑宣傳保皇。

梁啓超留住日本，在湖南維新派及大部份康氏門徒推動下，決議發動『勤王兵』與孫中山商定孫康兩派聯合計劃，孫中山任正會長，梁啓超任副會長。徐勤，麥孟華竭力破壞，不肯訂立聯合章程，向康有爲告急，說『梁啓超漸入行者圈套，非速設法解放不可。』梁啓超原想雙方投機，總是說『我們雖然用保皇的名，實際還是革命。』楊衢雲看出『此種人非眞愛國者，與之合作實爲有害無利。』孫中山却熱望合作，因爲中國留日本學生不過七八十人，多數屬康梁派，與中會不得一人合作成功，可以因之接近學生，對與中會是有利的，但不會警惕梁啓超別有詭謀。光緒二十五年，康有爲命令梁啓超到檀香山辦保皇會，臨走時還欺騙孫中山，立誓『合作到底，至死不渝。』請介紹檀島興中會重要會員。孫中山受騙了，他利用孫中山關係，宣傳『名爲保皇，實則革命，』誘惑僑商加入保皇會，與中會發源地的檀香山，像橫濱一樣，會員又被保皇會奪去大半。

康梁墮落了，但留在日本的多數門徒們還要求與革命派合作。康有爲到加拿大宣傳保皇，進行很順利，騙得不少金錢，寫信囘來，痛責那倡言合作的學生，說他們太無志氣，不識潮流，要附

人驥尾，實屬可恥。今日有了加拿大這樣的成績，更要痛改前非，自己爭氣。這一番教訓，把那些心想活動的門徒，罵得啞口無言，止好死心塌地，跟着他一路走。海外各埠興中會會員，受他們的迷惑，許多人變節，革命運動遭受極大的打擊，幾至無法進行。興中會本身犯了錯誤，遷就康梁派「名爲保皇」的荒謬主張，使革命旗幟在羣衆中混亂不清，進行喪失原則的合作，正如楊衢雲所說「有害無利。」

第七節　自立軍起義

湖南維新派多與興中會接近。光緒二十五年，梁啓超、唐才常、林圭、熊力山、吳祿禎等決議在長江沿岸各省起兵，運動會黨與防軍，先襲取武漢爲根據地。興中會員畢永年聯絡兩湖龍頭楊鴻鈞、李雲彪等數十人歸附興中會，楊李所開山堂，勢力最大。梁啓超談合作，目的在借用興中會的會黨羣衆。唐才常約林圭等回國籌備起事，梁啓超開會歡送，興中會主要會員也有許多人到會，彼此互約合作；與中會在長江的會員及會黨都介紹給唐才常、林圭。

唐才常到上海，發起「正氣會」，唐才常訂定會章，序文有「低首羶腥，自甘奴隸，」「非我種類，其心必異」一類反滿詞句，又有「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那種擁帝論，陷入不可解的矛盾中。革命份子畢永年、章太炎嚴厲反對；畢勸唐斷絕康有爲關係，辯論一日夜，不

得要領。興中會影響下的會黨龍頭棄畢投唐，畢憤極削髮爲僧。康有爲暗中勾結英帝國主義在華僑中募集軍費六十萬元，全部私吞，不肯接濟。唐才常並非眞心擁帝，以爲兼顧革命、保皇，可得兩派的助力，不料兩派都失望離開，反而孤立起來。

唐才常受康有爲指示，改正氣會爲自立會，軍稱自立軍。庚子年六月，借反對西太后指示義和團排外，敢借挽救時局爲名，邀請上海維新人士在英租界張園開中國國會，公推容閎爲會長，嚴復爲副會長，唐才常爲總幹事，林圭等爲幹事。國會宣佈宗旨三點：（一）『保全中國自立之權，創造新自立國，』（二）『決定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三）『請光緒帝復辟。』否認滿洲政府就不該保存清國和光緒帝，保存清國和光緒帝就不能創造新自立國，章太炎再三勸告唐才常勿爲保皇黨利用，唐才常還希望海外匯款，拒絕勸告，章太炎當場自剪辮髮，表示決裂。所謂自立運動實際是戊戌維新派的勤王運動，從右派翁同龢系（文廷式爲代表）到左派譚嗣同系都參加了這個運動。

唐才常失敗的原因，由於康有爲私吞軍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國際形勢的變化。當時正是義和團極盛，北方混亂時期，英帝國主義陰謀瓜分中國，通過康有爲指使自立會擁護兩湖總督張之洞割據長江上游，（兩江總督劉坤一另有張謇等人擁護）通過何啓指使興中會擁護兩廣總督李鴻章割據兩廣。張之洞李鴻章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們觀望形勢，如果帝后同亡或帝

存后亡，可以接受擁護，組織傀儡政府：如果帝亡后存或帝后同存，他們深信沙俄勢大，滿清統治決不崩潰，則拒絕擁護並將殺擁護者。自立會與中會領導人簡單地在帝后同存或帝存后亡一方面着想，希望與洋務派首領合作。維新派在自立會固然宗旨混沌，又自立又保皇；革命派的興中會同樣也是態度曖昧，似民主又似君主立憲。七月下旬，八國聯軍入北京，西太后挾光緒帝同逃，國際形勢不允英國獨佔南中國，張之洞的計算決定了，得英領事同意，屠殺唐才常及自立軍。

康有爲與英帝國主義的秘密勾結，在向華僑募款公函中流露出來，他說『新黨已於上海設立國會，預開新政府，爲南國立國基礎。』又說『我南方勤王義勇已分布數路，不日將起……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則我可立不敗之地。』張之洞破獲漢口自立軍機關，奏報嚴辦兩湖會黨摺說：『其僞札有曰：指定東南各行省爲新造自立之國。其華洋文規條，內有曰：『不認滿洲爲國家。』』這話明所謂『自立之國』是按照英國的計劃來行動的。不過容閎、唐才常等人未必預聞這些機密，止是間接受康有爲的指使。因爲容閎起草的對外宣言八條，與興中會上香港總督書六條比較，自立會確在『自立』的意義上發言，並無依賴英國的思想表現。唐才常信任日本人，與英人少有往來，他和張之洞交涉，似乎並不預知英國對自立運動的關係。當時自立會推容閎駐上海，黎科駐漢口，辦理一般的外交事務；康有爲派門徒龍澤厚代唐才常辦外交，這也許是承受英國指示的密使。容閎、唐才常及其他自立軍首領被康有爲欺

騙是事實，但却無直接勾結英帝國主義的嫌疑、

唐才常、林圭組織自立軍爲七軍，熊力山統前軍，駐大通；田邦璿統後軍，駐安慶；陳猶龍統左軍，駐常德；沈藎統右軍，駐新堤；林圭統中軍，駐漢口。另置總會親軍及先鋒軍。唐才常任諸軍督辦，駐漢口。日人田野橘次在上海發刊同文日報替自立軍鼓吹革命，不遺餘力。唐才常托日人勸告張之洞接受自立軍的擁護，宣布兩湖獨立。張之洞觀望形勢，不表示態度，也不出面干涉。兩湖、江西、安徽等省哥老會員及水師營兵紛紛參加，有衆數十營，定期七月十五日各路同時大舉。唐才常屢電海外，催康有爲、梁啓超匯款接濟，再三展時，等待匯款。七月底，龍澤厚招文廷式來漢口，向張之洞告發，經英領事簽字，派巡捕協同地方官吏捕獲唐才常、林圭、田邦璿、黎科等二十餘人。張之洞要對西太后表示忠誠，大殺湖北維新人士百餘人，湖南劣紳王先謙、葉德輝乘機報復，向巡撫告密，又大殺湖南人士百餘人。被殺的二百餘人都是兩湖進步的知識份子，他們有高度的愛國熱忱，主觀上要求除舊布新，挽救中國，這樣的死不失爲勇敢的死。唐才常等被捕，羣呼『速殺』張之洞不敢白日行刑，二更後押到僻靜處加害，受刑人伸直頭頸叫『殺』，毫不畏懼，確保持了譚嗣同的犧牲精神。可惋惜的是他們錯走了改良主義那條死路，不能斷絕保皇會的可恥關係，希望得些軍費，結果被保皇會出賣，二百餘人的流血，止有一種作用，就是給『改良主義無前途』這一事實作證明，其他作用是沒有的。

自立軍的失敗，使改良與革命兩派發生變化。『熊力山、陳猶龍等至日本，即向梁啓超大開交涉，要求算賬，梁憤而有披髮入山之宣言。保皇會自此信用漸失，不復談起兵勤王事，未幾易名帝國憲政會』（開國前革命史）這是說康梁一羣無恥的政客向西太后的假維新投降，更澈底的墮落了。『力山以才常起兵用勤王號，名義不順，欲力振刷之，遂與啓超絕。時香山孫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遊學生疑孫公驍桀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相與語，歡甚，知其非才常輩人也。諸生聞孫公無他獷狀，亦漸與親，種族大義始震播橫舍間』（章太炎：熊力山傳。）這是說知識份子開始從康梁影響下解放出來，投到孫中山的革命方面。

第八章　對抗瓜分運動的義和團運動　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至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

第一節　緒言

如果鴉片戰後，國際貿易中心從廣州轉移到上海，南中國經濟秩序的驟然變化，成爲促起太平革命的一個主因；那末甲午戰後，北中國經濟也起了驟然的變化，如開海港，造鐵路，辦郵電，廢漕運等等，這也成爲促起義和團運動的一個主因。但它們却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太平革命反對的是滿族的封建壓迫；義和團運動則是中國人民自發的反帝國主義的侵略。

義和團在形式上是以落後的宗教迷信表現出來，實際上却代表着廣大中國人民反帝的運動。當時人民在滿清愚民政策與宗教麻醉的欺騙影響下，只能由這種落後形式表現他們的義憤，不應該做過高的要求。運動的範圍在北中國特別廣泛，人民狂熱的參加了反侵略活動。比之平英團，昇平社學，天津教案是有更大規模的發展。中國人民中蘊藏着不可限量的反抗力，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證明它有觸必發。觸發義和團運動的原因，無疑是甲午戰後的外國侵略和滿清暴政，侵略和暴政使農民更容易感觸到的是外國教士的內地傳教。

關於外國侵略對北方人民的迫害：

領土掠奪

光緒二十一年，山東大刀會開始有排外活動，顯然是甲午戰後的反應。二十二年，德國向總理衙門指明索借膠州灣，二十三年，大刀會殺鉅野縣德教士二人，德國乘機派兵強佔膠州灣。清政府說『德國闖佔海口，蓄謀已久，此時特藉鉅野教案而起，』倒確是實情。繼德國強盜之後，俄佔領旅順，大連，英強佔威海衛，九龍；法強佔廣州灣。『四十日之間，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保國會演說辭）要挽救這樣嚴重的瓜分局面，維新派知識份子提倡保種、保國、保教的變法方案。感受威脅最大的山東人民，實行樸素的武力反抗方案。二十四年三月初，大名府考試童生時在城內發現多數布告：『各省愛國志士，視西人無法無天之行爲，已決於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燬其居。其不與我同心一致者，男盜女娼。聞此告示，而不爲傳播者亦如之，完了。』散發布告的是大刀會，證明它在努力宣傳武力反抗的方案，這個方案，迅速獲得北方廣大民衆的贊同。

經濟掠奪

光緒廿四年，中德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允許德國造膠濟鐵路，並開掘鐵路兩旁三十里內各礦。山東人民曾受侵略者無數次暴戾的欺壓行爲：例如膠濟路局員隨意釘路樁與高密縣農民口角互毆，德軍藉口保路，槍殺農民二十餘人，還勒令巡撫毓賢賠償樁價兵費三千四百餘兩。又如鐵路阻礙水路，不肯造橋放水，引起農民『暴

動。」袁世凱明知『其（德人）恃強逞兇，動因細故稱兵壓脅，久已成爲慣技，而惹民仇外益甚；』但仍派兵替德人鎭壓山東人民激動義憤，責任全在侵略者方面。膠濟鐵路以外，淸政府借英款，用英工程師築成津榆鐵路（二十一年完工）京津鐵路（二十二年完工）京奉鐵路榆錦段（二十五年完工，）又借俄款（比國出面）築盧（盧溝橋）漢鐵路，二十四年成盧保（保定）段，二十六年城保正（正定）段。凡鐵路所到地區，舊式的交通運輸被棄置，路線上田地房屋墳墓被毀壞，直隸義和團運動在京津保三角地區特別熾烈，造鐵路時對人民非法壓迫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天津間中外輪船暢通，運河逐年失去作用。光緒二十六年起，各省漕米不論海運河運，一律改徵折色，運河竟成廢物，沿河城市衰落；元明以來南北主要水旱大交通線從此荒棄，對兩岸居民的生計是嚴重的打擊。

洋貨進口在光緒十三年（中法戰後）開始超過一萬萬兩，二十二年（甲午戰後）開始超過二萬萬兩，（二十八年（庚子戰後）開始超過三萬萬兩，三十一年（辦假維新）開始超過四萬萬兩。土貨出口至光緒十七年才超過一萬萬兩。（二十八年才超過二萬萬兩，宣統三年才超過三萬萬兩。）大抵中國戰敗一次，輸入發展一次，輸出遠追不上輸入。從甲午到庚子凡七年，平均每年入超約五千萬兩，而且輸入各貨洋藥（鴉片）逐年減少（因土藥大量生產，售

價較低，）洋布棉紗及其他洋貨逐年增加，加速中國手工業生產的瓦解，北方修築鐵路，更有利於洋貨的深入內地。

光緒二十二年，創辦郵政局。二十五年，改電報局爲官辦，增添資本二百二十萬元（以前官督商辦，資本八十萬元。）對驛站和民營信局，這種新事業，威脅着舊式通信人員的生計。

漢口到北京旱路及沿運河水旱兩路是中國南北交通的兩大路線，甲午以後都起大變化；再加洋貨流行，鐵路、郵電通達等原因，農民、手工業者、商人、交通運輸工人、驛站夫、鏢客、下至響馬娼妓，失業破產者至少數百萬人。政府和地方官吏止顧搜括，誰也不曾顧及大批人的生活。

關於滿清暴政對北方人民的迫害：

無情的搜括

甲午戰敗，滿清政府濫借巨額外債，除付交日本二萬萬五千萬兩（連利息在內）餘款一萬二千萬兩用途不明，全被囘扣，浪費，私吞消蝕盡淨。政府負債既多，財政愈益困難，止好盡量增加捐稅，因之甲午以後的剝削繁重，官吏貪污比以前更大進一步。光緒二十一年，戶部竭力籌款，有扣廉俸，增釐金，折漕米，土藥、茶葉、糖、鹽、煙、酒加稅，田房稅契設法整頓，典當各商強令捐輸等各種苛雜辦法。以山西爲例，二十二年七月開辦煙酒稅，每酒一斤征錢三文，每菸一斤征錢五文，縣菸十文，至二十三年六月，共征銀五萬餘兩。二十六年，增稅爲酒五文、菸八文、縣菸十六文。按照一般收稅通例，官吏舞弊中飽比報解數加三倍。山西

人民單就菸酒一項，光緒二十六年前每年負擔二十餘萬兩，再加其他捐稅，負擔的嚴重可想。山西如此，別省自然也毫無例外。二十五年，戶部奏稱：『近年大費有三，曰軍餉、曰洋務、曰息債。息債歲約需兩千餘萬，洋務亦約需兩千餘萬，軍餉約三千餘萬，此三項已七千餘萬矣。此外，國用常經京餉、旗兵餉需及內務府經費；又各直省地方經費，亦幾二千萬。收入約八千萬，短少一千數百萬兩。』全國人民飢寒交迫，政府還要加索一千數百萬兩，捐稅名目繁多到無法再添設。西太后召集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大會議，結果議得『裁革陋規，剔除中飽，認真整頓，化私為公』十六字。這是什麼意義呢？就是政府奪取各衙門已有的陋規，讓官吏另立名目收規費。這在道光二十三年，耆英已經說出了『化私為公』的祕密。他說：『此粵（海關）例外浮費，原不難徹底查明，全行禁革；但射利之徒（官吏），營私玩法，一經查出疑目，必將視為例所應得之款，其勢必至費上加費而後已；從來清釐積弊，另定新章，大抵如此。不獨關稅一事如然。』西太后採納大臣的建議，以『嚴提中飽，力杜虛糜』名義，令各省督撫『凡取諸商民者，一併和盤托出。』北方省份，例如直隸總督裕祿即交出三十七萬兩。這當然不能滿足清政府的貪慾，竟以『雖非陋規中飽，而利不在國亦不在商』為理由，提取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清河金礦局『餘利歸公。』當然，這還是不夠的，以『江南地大物博』為理由，特派剛毅『前往將關稅、釐金、鹽課等項實力整頓，』括得二百餘萬兩。照樣又說『廣東地大物博，』派剛毅『馳往妥籌餉款，』又括得『常年

軍餉銀一百六十萬兩。』劉毅在南方共括得一千萬兩。北方各省比較貧瘠，雖然捐稅額不及江南，廣東那樣多，人民痛苦却並不比較少。滿淸政府劫掠大量金錢，各地物價立卽騰漲，就廣東物價作例，洋銀一圓不夠糴三斗米，銀四錢止夠買百斤柴。但滿淸政府還說是『並無絲毫加取於民，』更繼續向人民勒索。

廣泛的水旱災

由於吏治的敗壞，官吏肆無忌憚的吞蝕款項。咸豐五年，黃河自河南銅瓦廂改道流入山東；從此經常泛濫成災，治河經費大部被官吏侵吞，堤工草率，潰決後以搶險堵塞等名義，領得額外經費飽入私囊，水災成治河官吏的利源。光緒二十二年山東巡撫李秉衡奏稱：『近來幾於無歲不決，無歲不數決；除額撥經費不計外，其另案之款，十年通算不下八百萬兩，而河工敗壞日甚一日。』河旁居民連年受害，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治河官吏製造的人禍。二十四五年，黃河大潰決，直隸的東南部，山東沿運河的西部都被決毀，災區極廣，淹死人口十六七萬，損失田地房屋不可數計。同時北方各省連年大旱，農民吃樹皮草根，甚至吃觀音土以代糧食。例如災情較輕的江蘇北部，窮人出賣子女，女孩按容貌年齡，高價至多一千文，低價僅五十文。這種不忍想像的災難，身當其境的農民該是多麼慘痛！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春間，某些外國報紙已經說到『今年順直一帶雨水極少，麥田盡槁，民氣頗爲不靖。而山西自去年冬初迄今更涓滴無之。撫心時事，曷勝杞憂』（拳匪紀事引西報。）但滿淸政府及

地方官吏不肯承認有災，依然加緊搜括。

咸豐十年卽英法聯軍占據北京後二年，英法與滿清政府增訂條約數條。法約第六條原議『仍准教士傳教』當時充翻譯的法教士私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句。滿清政府昏憒糊塗，簽字承認。英美耶穌教士也就同享利益，到內地置產。這種卑鄙可恥的手段，是自稱『待人如己，勸人行善』的教士幹出來的。中國人民完全有理由驅逐這一羣騙子出境。

農民最怨恨的人——享特權的教士和教民

法國對華商業極微，著重傳佈天主教作侵略工具。各國在華天主教士，爲要享受特權，都服從法國公使，因此法公使獲得天主教保護權。光緒十三年，德相俾斯麥感到『布教事業，於領得殖民地有大功，』扶持德教士在山東傳教；法國專有的保護權被破壞一部份。二十三年，大刀會殺德天主教士二人，德政府不再經由法駐北京公使交涉，直接出面強佔膠澳，滿足了十年來奪取殖民地的野心。中國人民完全有理由憎恨這種僞善地用傳佈基督教之名以掩護掠奪政策的教士。

宗教侵略，在北方主要是天主教，在南方主要是耶穌教。大抵天主教的面貌暴露得更顯明，耶穌教比較溫和些。歷來教案多數由天主教發動。當然，耶穌教也不放鬆每一便於侵略的機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所謂『待人如己，勸人行善』的工作如下：

教士設立教堂，必需召集多數信徒。但中國人受儒、佛、道三教影響，雜拜鬼神，要他毀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專拜一個外國上帝，却是極困難的事。因此教士招徒的方法：第一，是張揚外國勢力，吸引那種不堪官吏壓榨或被別村別族侵侮的人『投教』這一類投教者，往往全村全族投靠教堂，依外力自衞或報仇，思想上似乎自認爲外國順民，與中國脫離關係。第二，是出錢收買窮極無聊的人『吃教』買價不一，有的說『白銀四兩』（中西紀事引吳德芝說）有的說『給銀一百三十兩』（魏源海國圖志）有的說『教士們袋子裏藏着大批的金錢，收買中國人民中間的無賴份子，來者不拒，總是臨時的或經常的發給金錢』（羅得克夫義和團記）這一類吃教者，把『教民』當做一種頭銜（義和團起義後，山東主教允許『以後教民搆訟不准寫教民字樣，是非曲直一聽地方官秉公詢辦；）依外力訛詐善良，包攬辭訟，力量比舊紳士更大。第三，是宣傳教義，得某些人的信仰；這一類人是眞正『信教者』在教民中佔極少數。事實上教堂是外國教士和投教者，吃教者共同組成的侵略團體。

教民由教士包庇，教士由公使包庇，動輒向總理衙門提出交涉，不滿足要求不止。另方面，總理衙門飭各督撫『妥善辦理，』督撫飭各州縣『妥善辦理，』強迫人民吃虧了事。依據一些簡單的材料，足夠證實教士教民『無法無天』的暴行。

教士——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屈辱結束，滿淸政府擬出八條章程，向各國公使妥籌善後，以

保『中外永遠和好。』它不敢過度揭發教士罪惡，但所舉例證，教士實是外國侵略者與中國劣紳、土豪、訟棍、強盜、騙子的混合體。總署『與各國駐京公使再三商議，均以原約未有之條，不能照允。』足見教士一切暴行得各國政府的同意。章程裏說：『教士自立門戶，違抗中國法令，僭越權柄，猶之一國之中，有無數敵國而自專自主者。』外國在各地方設立教堂等於佔領土地，招收教民等於募集侵略兵，這對中國是何等的威脅。教堂既是自專自主的敵國，自然要對外侵略。下列各種行爲與強國壓迫弱國無異：(一)出頭干涉訴訟。教民犯罪，被官管押，外國教士硬請釋放。例如，『四川教民婦女騙賴平民租項，反戳傷平民。主教者居然行文說情，教民婦女竟不抵罪。』(二)霸佔財產。『洋人愛某處房宅，其人不賣，則尋一無業奸民指爲己物，賣與洋人，並串通書吏竊印文約，洋人即據爲己有，驅逐業主。』(光緒二十二年總理衙門奏。)『紳民有高華巨室，硬指爲當年教堂，勒逼民間讓還。且於縣制有關之地，以及會館、公所、菴堂爲闔境紳民所最尊重者，皆任情需索，抵作教堂。』(三)侵犯主權。以一省最高官自居；如山東傳教士自稱巡撫，命令各官服從教堂的指示。媚外汚賤的官員有獎；如貴州主教胡縛理向總理衙門『保舉前任道員多文等，請予優獎。』不順從的官員有罰；如『四川、貴州教士因教案請撤地方官。』又如『山東鄒縣西南鄉教堂教士，向商賈收稅，苛虐異常。福建主教發賣執照，每張洋二十四元，良民有此，始免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鄉里橫行。』侵略中國主權直到連媚外的總理衙門也說：『似此無理已

極，情實難容。』（四）湿兒慘殺。如『四川毆斃教士李國一案，實由教民逼人退婚肇禍。李鴻章將正兒何彩正法，劉福擬絞；而教民殺死平民及歷年姦擄焚殺首惡教民雖已議罪，終不到案。其司鐸聖輔臣糾衆殺斃團民趙永林等二百餘名；梅教士聲稱已赴外洋，不能查辦。』（五）勒索賠款。如『四川毆斃教士馮弼樂一案，業已拏獲冉老五正法。有梅教士硬指紳士主使，逼勒賠銀八萬兩。』以上多是天主教士幹的事。但號稱較為善良的耶穌教士，又有另一套傳教方法。聯軍統帥瓦德西所著拳亂筆記說：『關於英美教會事業，余實不能詳細批評，但余却深信……美國方面，常有一種巨大錯誤，即所委任之牧師，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稱，職務方面亦未經訓練。此輩常以服務教會為純粹麵包問題。凡認為賺錢的事業，無不兼營並進。余更熟知許多牧師，兼作他項營業（如買賣土地，投機事業）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不論天主教、耶穌教，他在外國侵略政策下傳入中國；即使有安分教士，總不能改變傳教的侵略性何怪『百姓始而抱怨，繼而成恨，終且為仇，各處人民不問天主耶穌有無區別，而皆指為天主教也。』（總理衙門與各國大臣商辦傳教章程八條。）

教民——『入教華民大率敗類，一經入教，魚肉鄉民。教士每依為心腹，恃作爪牙，一涉鬥毆，必相袒護。數十年來總理衙門辦理教案，從未見教士責罰教民之事』（光緒二十——二年總署遵議教案章程奏。）教民本來多是『以教中為逋逃藪的莠民、罪犯、訟棍、地痞之流，得教士

之包庇，更使胆大妄爲，作奸犯科，無所不至。或鄉愚被其訛詐，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強佔人妻，或横侵人產，或租項應交業主延不清償，或錢糧應交公廷違抗不完納，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諉，或因小忿而毆斃平民，種種妄爲，幾難盡述」（李東沅：傳教論）。地方官不敢得罪教民，勢必『扶教抑民』，獄訟勒令平民受屈，公費強迫平民添派（各項公費如差徭及公益事項，教民往往拒絕攤派。）平民忍氣吞聲，受教民壓迫。光緒二十二年，總理衙門因『年來教案迭出，每議賠償，累萬盈千，公家受累無窮』；特定新章，凡『教案賠償之款，由該督撫臬道及府廳州縣分年按成償還歸公。』這就是教案賠款要地方官負担。從此平民又增加兩重災難：第一、代官吏賠款；第二、地方官『規避賠償，諱民教鬥毆，妄稱民變』（御史潘慶瀾奏），調兵屠殺平民，使教民滿意以減輕賠償額。如碭山縣教民搶麥，激起械鬥，江蘇山東兩省，藉口『大刀會匪滋擾』派兵『會同剿辦』殺平民三十餘人，一面賠教士七千餘吊完案。『教案之變端，皆醸成於牧令之庸鄙，必由有司抑民而袒教』（徐賡陛：民心宜順稟）這止是說出了一部份的實情，因爲抑民袒教，應負主要責任的是充當外國奴隸的滿清政府。

一般平民受教堂極野蠻殘忍的壓迫，不反抗不能生活。義和團宣傳『殺了洋鬼頭，猛雨往下流。』『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止住天』在農村中成爲發動廣大羣衆的有力口號。

民教大衝突終究要爆發，這是無疑的。如果官吏與教堂完全一致，協力鎮壓民衆，爆發可能

漫延一些。但政府和官吏事實上對教堂存在着深刻的猜疑，這種猜疑跟隨教堂勢力的日益擴大而增強起來。太平天國滅亡後，不少反滿份子藏身教堂，待機起義。如浙江教民施鴻鰲、潘阿士等本侍王李世賢部下，在鄉間打做軍器，結集義軍，被劣紳告發，搜獲『妖書符印，語多悖逆』（溫處道上總署稟。）當時革命羣衆數千『情勢洶洶』，官紳駭懼，急殺施潘二人。貴州冉石保、宋玉山、唐神仙、譚元帥等『先曾從賊（石達開軍）受僞職，嗣入教中』（總署商辦傳教章程。）安徽『白蓮教混入天主教』，專剪教外人辮髮，激起教案。尤其是戊戌變法，耶教士李提摩太等居指導地位。在頑固派看來，教士包庇莠民，是可忍的忿怒；包庇『叛逆』是不可忍的仇恨。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正好是誘導頑固派與義和團合作的基礎。

第二節　從義和拳到義和團

起源

義和拳是舊式農民起義的許多祕密結社的一種，它是白蓮教的一個派別。

歷史上有兩個宗教在農民起義中常起領導作用。一個是道教，一個是摩尼教，兩教又混合成各種祕密宗教團體。

東漢末，張角創太平道教，張陵創五斗米教，道教開始是農民起義軍的宗教。後來一部份爲統治階級收買而馴伏，一部份仍在農民中祕密活動。東晉末五斗米教主孫恩曾

起長生軍顛覆了東晉的統治。舊史書上所說『左道惑衆、』『妖賊創亂，』大抵是指道教徒準備或發動起義。道教徒自稱有奇術、能預知，在迷信落後的社會裏，這常是號召羣衆的有效方法。

公曆第三世紀，波斯人摩尼創摩尼教，周隋間傳入中國。第八世紀，回紇（中唐時住新疆吐魯番一帶）奉爲國教。回紇助唐平內亂有功，摩尼教得在長安、洛陽、太原、江陵、南昌、紹興等地建立大雲光明寺傳教。摩尼教的主要教義說：有善惡二神對立，一個代表光明，一個代表黑暗，教人崇拜光明與黑暗鬥爭，因此又稱光明教。教徒白衣白冠，死後裸葬，唐武宗禁止各宗教；後來各教解禁，摩尼教獨被永遠禁止。以後民間秘密結社的魔教（教徒稱事魔吃菜人）白蓮社（又稱白蓮會、）白雲宗、明尊教，都是摩尼教的支派。北宋末，魔教主方臘起義。這時候的魔教還保持濃厚的摩尼教色彩。教徒不飲酒食葷，不宴會賓客，不拜神佛祖先，止拜日月（日月合成明。）人死裸葬，不用棺槨衣衾。同教互通財物，稱爲一家人。但另方面，却和天師道（五斗米教）結合，教徒認張角爲祖師，被官吏捕獲，備受任何毒刑，終不肯說『角』字。元末白蓮會首領劉福通奉教主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起義。林兒稱小明王，起義軍首領之一朱元璋建立明朝。白蓮會與佛教結合，專拜彌勒佛，旗色崇尚紅色（劉福通、朱元璋等軍稱紅軍，別部有白軍、青軍，）與魔教不同。明末白蓮會蔓延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四川等省，教主王森（河北薊縣人）死後，其子王好賢及教徒徐鴻儒有衆二百萬，起義反明。滿清嘉慶元年，白蓮教首領劉之協等提出『反清復明』

「官逼民反」口號，發動大起義，旗幟衣服用白色。嘉慶十七年，白蓮教的一個支派——天理會（八卦教）起義，震卦教首李文成，坎卦教首林清聯合攻襲北京皇宮，謀奪取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起義口號是「反清復明」（李文成自稱大明天順李眞主），允許成事後公衆每人得分地一頃。白蓮教、天理會都奉「眞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眞訣，雜拜佛道兩教衆神，不專拜彌勒。宋元明清都定重刑禁止摩尼教，因之支派極紛雜，傳授極祕密，南方有魔教，齋教，吃菜教，北方有白蓮、天理等教，名目更多。嘉慶時嚴捕白蓮教，兩江總督百齡捕得教首方榮升等，百齡「令從其教者，但跨十字架又呑豕肉一塊，卽可免死；而方榮升及女尼朱二姑娘但求速死，俾生西方樂土，終不肯跨食。」（夏燮中西紀事。）照夏燮所說，「白蓮教卽末尼（摩尼）之支派，傳其教者謂之七七教，以同財同色爲其教法之綱領。」教徒「持齋誦經咒，不跨十字架，不食豕肉。」魔教徒互通財物，天理教號召分田地，這就是統治階級害怕的所謂「同財」。魔教中魔公魔母並稱，白蓮教起義首領有齊王氏，李文成妻張氏，都能領兵作戰，違反婦女雌伏的舊例，這就是統治階級喧嚷的所謂「同色」。摩尼教演化爲魔教，又演化爲白蓮教，原有教義愈演愈少，道教色彩愈演愈濃。白蓮教在農村中流行，因爲他是魔、道、佛三教的混合物，雜拜各種鬼神。

天理教起義失敗，滿清政府大捕白蓮教，那彥成查出直隸灤縣石佛口王姓一族，世代到各省傳授大乘教清茶門，方榮升就是王姓門徒，（白蓮教主王森薊縣人，石佛口王姓很可能是王

森後裔。）邢彥成破獲的教門有大乘教、清茶教、金丹八卦教、義和門、如意教、好話教、一杜香離卦教、佛門教、白陽教、紅陽教。搜出的經卷有九蓮如意皇極寶卷眞經、元亨利貞鑰匙經、遮背十王經、高老祖經、不曾發覺的教門及經卷一定還不少。滿清政府殘酷鎮壓這些教門，按『叛逆』治罪。傳教人被處凌遲、斬絞、充軍等刑。經卷被稱爲『邪悖』，特派官吏『嚴密搜查務令盡絕根株。』滿清政府對『邪教』的防禁是毫不鬆懈的。義和門是白蓮教別派八卦教的一個小派，它的特點是練習拳棒。邢彥成早已『訊明義和門拳棒，係離卦教之徒黨。』『義和團有一祕密之符號，交戰時佩於身上。其符用黃紙一張，用硃砂畫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頭無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頂上有四圓光。心下書祕字一行，其意若曰，我爲冷雲之佛，火佛在予之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後。此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上面左端書請天兵天將，其右端書請瘟疫之神』（景善日記。）這個怪像很可能是魔教祕密崇拜的鬼神，所謂『冷雲』『火佛』、『圓光』與摩尼教的『大雲光明』或有淵源。滿清嚴禁『邪教』（大清律特別規定禁摩尼教。）義和團無論在邢彥成奏摺裏，在景善日記中都有『邪教』形跡，然而它終於造成偉大運動，原因之一，就在滿清害怕義和團的勇敢戰鬥，從嚴禁轉爲利用。

義和拳在戰鬥中

天主教傳入中國，它被大多數人看作『奸誘婦女，誆騙病人眼睛，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的邪教（海國圖志可爲代表。）外國兵槍炮猛烈，但也被看作

『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跌倒不能起身的直脚人（林則徐可爲代表。）這種怪說傳到農村，有奇術又有棒拳的義和拳很自信能與外國人對敵。天津義和團揭帖裏說：『男無倫，女鮮節，鬼子不是人所生。兵法易，助學拳，要擯鬼子不費難。』第二句說兵法容易，就是神仙助人學拳，足見義和拳在羣衆中取得信仰，主要由於他有『神拳』。

擴大起來

山東江北一帶，大刀會勢力極大，被稱爲『刀痞』或『會匪』與義和拳等教門被稱爲『邪教』或『教匪』顯有不同。光緒二十一年，大刀會已作仇教活動。後來義和拳在山東取得合法地位，多數大刀會員加入義和團與大刀會實際上合成一個『滅洋』團體。

義和團從『行蹤詭祕畏人知』轉到合法公開，是經過戰鬪才得到的。山東義和拳首領曹州人朱紅燈自稱明朝後裔，開始是揭『反清復明』的起義團體。官吏袒教抑民，民受教堂指使，不論是非曲直，教民必勝，平民必敗。義和拳適應羣衆的義憤，『聚衆抗官，傳單一出，千人立聚，兵刀森立，儼同敵國，動言焚殺，官吏莫敢誰何。』在拳民武力監視下，官吏止得『噤不敢問』或『出資設席，和解拳教。』（勞乃宣：義和拳教門源流考書後。）義和拳不但保護拳民，對平民也一律保護，『路遇不平，不惜軀命代爲伸理；』平民受教民欺壓，紛紛參加，抵制官吏和教堂的橫暴、公稱義合拳爲『義民會。』這種民衆自衛方法完全合理，官吏却認爲『紀綱法度，蕩然無存。』山東巡撫李秉衡、張汝梅派兵鎮壓拳民，毫無效果。例如平原縣拳民集合千人，開放大砲，抗拒清兵，

清兵大敗逃走。光緒二十五年二月，清政府撤張汝梅職，改派著名屠戶毓賢爲巡撫；毓賢前曾做曹州知府，一年中殺所謂『匪盜』二千餘人。政府認爲『聲名卓著』，升他當按察使，他見西太后自誇功績，說『匪已肅清，永無後患』。這時候任命這個屠戶做巡撫，目的顯然在大殺山東拳民。毓賢派濟南府知府帶兵『查辦』，列陣戰鬥，被拳民殺死數十人，他不敢向政府請援，因爲說過『匪已肅清』，又不敢向拳民攻擊，因爲每戰必敗。朱紅燈要吸引反教羣衆加入義和團，改提『扶清滅洋』口號，勢力愈益擴張。毓賢正在爲難，恰巧戊戌政變後，西太后提倡辦保甲團練，毓賢出告示改義和拳爲『義和團』，表示承認爲民間團練。義和團立『扶清滅洋』及『毓』字大旗，可以公開活動，各縣遍設拳廠，在平縣八百六十餘莊，拳廠多至八百餘處。運河以西地區（水災嚴重地區）尤其發達，全省農民大體被拳廠組織起來。當時義和拳運動『僅僅想強迫教士退出中國，教徒脫離教會』，所採方法普通是『恐嚇』，最嚴重的不過近乎『虐待』，並無傷害人命，毀壞教堂的行動。傳教士却認定拳衆運動是一種『叛逆』，鼓勵教民準備武裝衝突；常常無緣無故的侵犯義和拳，一面誇張形勢。首先是美國教士向駐京美使發電報告說：『搶刼縱火及暗殺之事，有增無已，若非四公使館聯合要求停止此種情事，則在龐莊臨清與濟南府之美人，其形式極爲險惡。』其實事情並不如此。龐莊傳教部週年報告明白指出：『雖時有可怖之恐懼，然絲毫無生命之傷害。』臨清傳教部報告也說：『約三分之一的基督教徒，蒙有損失，總計

亦不過四百三十餘元。個人之傷害未見發生。居臨淸之某基督徒，有一子暨一妹夫均爲拳衆所擄，兩人之耳皆爲拳衆割去。』割耳自然是強暴行爲，但證明拳衆並無殺死教民的意圖。美國教士有意擴大事態，美公使康哲根據誇張的報告，也就壓迫淸政府撤換毓賢。十一月，淸政府尊命撤換毓賢，使用更大的屠戶袁世凱做山東巡撫，要他來完成大殺義和團的血腥任務。毓賢是絕對排外的頑固派，在軍事鎭壓失敗後，可以在『扶淸滅洋』的共同點上被迫承認義和團爲合法團體。袁世凱是絕對媚外的洋務派，他擁有強大的私人軍隊，殺人是他的長技，他到山東，義和團陷入血海之中了。

袁世凱剛到山東，肥城縣偶然發生英國牧師伯魯克被殺案。在山東拳衆整個的運動中，外人爲拳衆所傷害的止有他一人。在一九〇〇年（庚子）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外人在中國爲拳衆所殺害的也止有他一人。這說明義和團行動不曾超過『恐嚇和虐待』的範圍。牧師博特在他的報告中，曾說這次的事變，實有偶然的成份。英使館派領事甘伯樂到山東觀審，在他的報告裏也說：『伯魯克的被擄與被害，是六個人（据袁世凱奏報僃五人）所做的事情。因爲他的兄弟和家中其他的人，在最近拳衆與官軍衝突時，都丟失了性命。在伯魯克被捕後，他們曾攜此俘虜遊行了幾個鐘頭，絲毫沒有想到如何作第二步的處置。最後，伯魯克斷其束縛，企圖逃脫，在追趕中他被殺害了。』這不是也承認是偶然事件麼？袁世凱卻當作媚外資本，奏稱『平陰肥城兩

縣匪徒聚衆滋事』故意把案情擴大。被捕諸人中兩人處死刑，一人終身監禁，一人監禁十年（在獄中死去），一人徒刑二年，地保四人革役，永遠不准復充。中國人民的生命就這樣不値錢地作爲伯魯克的抵償品了。他覺得還不夠，罰出事地方居民銀五百兩，豎立一座紀念碑，又給教堂賠償銀九千兩，地五百畝。可是英國公使對這種嚴重的科罰，還不滿意，他認爲憐近的兩個村保也應該受罰；其實肇事人與伯魯克並未經過這些地方，却要負『不竭力救阻』的責任；除了帝國主義者蠻橫自大，把中國人民看作奴隸，再沒有其他理由可說。

有帝國主義無限的貪暴，就有袁世凱瘋狂的屠殺來迎合外國主人。他定出嚴禁拳匪暫行章程八條，重刑督促官紳、吏役、保甲長、家長查拿拳民；又提倡告密，提被告人家產一半或全部充賞。無論軍民人等，凡有練拳或贊成拳廠者，殺無赦。他這種極端殘忍的壓迫，激起義和團普遍的武裝反抗。袁世凱當作主要力量的新建陸軍在拳衆反抗的浪潮中變成渺小不堪。

他又奏准擴充新軍馬步炮隊二十營（每年餉銀九十八萬兩）又聯合青島德國軍隊，各地教堂武裝，協力攻擊義和團。地方官捕獲拳民，『當堂用刀殺之』連僞裝的審判也用不着，說是『不忠也不孝，不義又不仁，干犯十大惡，剿滅何足論。』到底干犯了誰呢？原來反對帝國主義乃其走狗叫做『干犯十大惡』！在戰鬬中朱紅燈戰死，義和團被消滅十餘部。以東光縣爲例，方圓十里地面，沒有一株樹上不掛人頭，沒有一個人頭上不包紅布。他的軍令是『見匪格斃之，』

又一軍令是『如匪至卽放炮，必不汝咎，若匪至不痛擊，則將領以下概正法。』軍隊屠洗鄉村，燬平拳廠，都是軍令及『嚴禁拳匪章程』規定的『合法』行爲，無數拳民與非拳民寃屈喪命。青島附近卽墨、高密、膠州的義和團與德軍多次接戰，德軍虐殺鄉村居民，稱爲『嚴辦示儆。』袁世凱給青島總督電報說：『凡亂匪阻撓礦工之事，我必設法以永除之，所謂保全二國太平之局者，我二人實有同心也。』他和剛在三四年前強佔青島的德國強盜『實有同心』，自然看中國人民是仇敵。拳匪紀事有一段山東友函彙錄，其中一函說：『東撫袁慰帥不助拳匪，嚴懲士匪（大刀會）爲東民所恨，皆有欲殺之勢。民間謠云「殺了袁黿蛋，我們好吃飯。」並在撫署照牆畫紅頂花翎之大黿，伏於洋人臂後，以示痛恨。故慰帥防範甚嚴，有於臥室外密護鐵網之說。』這樣萬惡的民賊，雖然德國直接給他武力援助，還替他宣傳所謂『袁世凱神話』把極殘酷的屠殺手段描寫爲『剛勇的武官所造成的奇跡。』但並不能阻却民衆的憤怒，一部份義和團聯合大刀會繼續在山東戰鬥。庚子年初春，乾字團、坎字團從山東北部入直隸境向天津方面謀發展。

直隸東南部以大名府爲中心，義和團勢力與山東同時高漲。光緒二十五年，一個官員敍述景州拳民情形說：『阜州三月以內，卽有教案兩起，雖皆未及決裂而了，實皆權宜處之。像拳黨衆多，一呼百諾，動輒集衆千百，洶洶而來。無論欲拿不得，且實拿不勝拿。倘或冒昧從事，彼謂官長袒護教民，激成衆怒，必至不可收拾。卽使立刻請兵，亦屬緩不濟急。州縣限於權力，故不得不暫顧目

前，以無事爲福。』這是一般地方官率直的自供。在民衆威力面前，官吏不敢袒護教民，顛倒是非，所謂『權宜處之，』實際是比較公平的處置。教士當然不肯退讓，壓迫地方官『非將拳匪立拿正法，驅逐淨盡不可。』喪盡民族意識的『教民氣燄彌甚，謂教士已調洋兵卽可來此，與義和拳打仗。』另方面『拳黨聞之愈激其怒。』『景州境內拳場亦有數十處，實防不勝防。』地方官處在『境內有教堂教民之村共百餘處』與『拳場亦已有數十處』的兩個的勢力的中間，止好藉口病重要求撤任。這說明直隸義和團與山東一樣，也止是禦侮自衞，強橫逞兇的是教士教民，不是義和團。

山東義和團入直隸境，立卽與多數民衆結合起來，天津、保定、通州（運河終點，漕米倉所在地）成爲義和團的中心地區。直隸總督裕祿的態度很強硬，庚子年正月，他出了告示說：『近日無知愚民，惑於外來匪徒持符念咒，降神附體能禦槍炮之說，輒私立義和拳會，練習拳棒，蔓延各處，以仇教爲名，滋事擾害。迨兵役捕拿，猶敢恃衆抗拒，更屬目無法紀。』他提出嚴厲辦法，『對設立拳廠煽惑滋事首要匪犯，務必獲拿懲辦，絕不能倖逃法網。』對『被誘入會習拳者，倘猶不知悛改，卽由地方官會營捕拿，決不稍從寬貸。』直隸布政使廷杰也出『嚴禁邪教』告示說：『近來義和拳匪假託邪術惑衆滋事，並拒敵官軍，不服彈壓，實屬罪不容誅。各州縣已將拿獲之匪首，稟請督憲批示，就地正法。該匪首等甘心爲亂，目無法紀，死有餘辜。』足見裕祿等人認義和團是

『邪教亂民，』毫無同情的傾向。義和團對這個殘酷壓迫，一面宣傳『扶清滅洋，』號召廣大羣衆入會。到三月初，『直隸北境幾於隨處皆有，應募入會者亦實繁有徒。若輩均係一八八九年時與天主教爲難之會匪（卽著名的天津教案；）因經法國使臣逼令華官將其首領殺戮，致懷恨在心，時思報復』（上海字林西報載北京專電。）到四月下旬，『直隸各處其勢甚熾，較前更爲猖獗』（北京專電）一面武力攻擊教堂，並抵抗『官軍』的『勦辦。』三月任邱縣義和團與『官兵開仗，官兵爲其所敗，統帶官受傷甚重，知府亦受刀傷。』四月，裕祿派兵救淶水縣教堂，與拳民開戰，義和團擊殺督隊官副將楊某。涿州拳民二三萬人佔領縣城。豐台車站出賣廢票，訛詐旅客，義和團燒燬站房，連西太后的『龍車』一併燒掉。裕祿無力控制直隸省的政權，各地西人相率逃來天津，他的軍隊削弱到止能『沿途護送』不敢出發攻打義和團。天津是義和團中心之一，二月下旬『天津通城，貼有匿名揭帖，內中字樣各有不同，大致煽惑人民殺害洋人，幷定三月初一日起事，攻打外國租界。』三月『津郡城廂內外，時有幼童演練義和拳，又有幼女演練紅燈照』乞丐組織沙鍋照，寡婦組織青燈照，兵士不少參加義和團。裕祿在羣衆大運動中，控制不住天津城。例如『豐台毀路之役，當場捕獲八人，解繫津獄。又自津西楊柳青捉獲傳法首領三人，亦置之獄；陡有一人赴縣署，自稱爲義和團，奉大師兄之令，饋問獄中諸師弟，握刀擕筐，昂然詣獄，縣吏竟聽其自由來去不稍阻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同時外國不斷施行壓力，要他消

滅義和團，他止好像毓賢那樣被迫承認『扶淸滅洋』的義和團爲合法團體，藉以保持本身的安全。五月，裕祿『以敵體禮』迎『靜（海）津一帶義和團』首領張德成、曹福田入天津城。義和團在直隸取得合法地位，勢力更大進一步，津城『旬月之間，神壇林立；業冶鐵者，家家鑄刀，丁丁之聲，日夜相續。官不敢禁挾械，但禁冶鐵；示市下，匪紛集縣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從之冶爐偏衢巷矣』（拳變餘聞）一般記載都斥責裕祿『縱拳釀禍，』其實裕祿何嘗不想殺滅義和團，但形勢不許他不向羣衆屈服；毓賢、裕祿、西太后都不能反抗這個形勢。

組成義和團的羣衆

義和團運動是廣泛的羣衆反帝運動，領導這一運動的是迷信團體義和拳，因之形式上表現極濃厚的宗教色彩；參加運動的羣衆，唯一目的在『滅洋』，如果領導者不是義和拳而是其他非迷信團體，也同樣會發動起來。

農民——義和團羣衆極大多數是農民。拳匪紀事說：『入壇之人，初惟鄉村愚民。平時受人欺壓，無可伸理；一聞匪說，冀藉神道以凌人，一洩積憤，乃相率棄其農業紛紛入城，甘爲匪類。』除去那些誣衊的詞句，基本上這種觀察是合於事實的。農民受盡各種欺壓、剝削、災禍，看出自己的仇敵第一是洋人。凡是洋人所在的地方，從內地教堂到租界，義和團都決心要消滅他，對城市取進攻的姿勢，不停留在鄉村裏。一個知縣官敍述義和團向涿州集中的情狀說：『余於四月二十日（庚子年）到景州，卽聞往北州縣皆有義和團匪與奉教人爲難，並不傷害行客。二十九日到

雄縣，則沿途皆有，或三五人、或十人、八人、四五十人不等。皆腰束紅帶，首帕用紅裹，亦有束黃帶用黃裹者。旗書『義和團替天行道，扶清滅洋』字樣。領隊之旗有坎（☵）字，乾（☰）字之分，中皆用刀矛。水行，陸行皆向北進發。其中三十歲以上甚少，二十歲以下十二三歲居多。途中相遇，秋毫無犯。初二日由新城前進，見義和團紛紛往北。申刻到涿州，城上皆紅巾，黃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蟻，城廂內外幾二萬人，余見之不免心悸。』這樣有自覺紀律的出於志願的生氣蓬勃的青年農民隊伍，雖然在思想上，一方面是迷信落後；但另方面自我犧牲，純潔無私，不畏強暴，民族自尊的偉大精神，實在是值得尊敬。他們在整個運動中，始終保持着這種精神，就是反義和團的記載也不能不承認：『拳匪肇釁時，皆面多菜色，有黃團紅團之分，皆用巾帶為識別。手用長矛或徑用竹竿，年長者約念歲，最幼者只十二三齡，前被官軍聯軍擊死者皆是輩也』（拳匪紀事）『面多菜色，』說明義和團在城市中不曾腐化，『手用長矛，』說明義和團勇敢不畏死，因為農民是義和團最主要的組成部份，運動才表現出特殊的堅韌性。

城市小手工業者及水陸交通運輸工人——運河漕米的停運，津滬輪船的暢通，京津，津榆，蘆保鐵路的告成，大量洋貨布匹的輸入，破壞了舊式的工藝和交通運輸，失業工人至少在百萬人以上。他們多數是天津、通州、保定、北京城內或附近的居民，熟悉都市中情況，義和團能進入都市，並能迅速發展，壓迫裕祿、西太后一類當權人向義和團屈服，工人響應農民起了決定的作用。

兵士——破產失業的農民工人及會黨亡命者流，在社會上生路斷絕，往往投營當兵。參加軍隊後，沾染軍營惡習，多數養成破壞性。因爲他們原來是被壓迫的，所以同情義和團，尤其是董福祥軍，滿淸把它當作滅洋的主力軍，軍官士兵很多加入義和團。又因爲他們現在是專事破壞的職業兵，所以紀律毫無，燒房屋，搶財物，凡義和團運動中被人藉口指爲暴亂的事件，大抵出於軍隊（包括反義和團軍隊）所爲。雖然如此，軍隊有槍砲武器，對外作戰卽使遠不及農工那樣勇敢，到底不失爲農工的重要支援者。

婦女——義和團組織婦女團體，說明運動帶着廣泛的羣衆性。幼女團稱爲紅燈照，老婦團稱黑燈照，婦人團稱藍燈照，孀婦團稱爲青燈照。不入團的婦女也得遵照『法』令，七日不梳頭，不纏足。團裏唱着一首歌：『婦女不梳頭，砍去洋人頭，婦女不裹足，殺盡洋人笑呵呵。』用意在勸員每一婦女參加運動。紅燈照最盛行，企圖飛到外洋燒燬外國城市。天津婦女首頭有黃蓮聖母、董二姑、劉三姑；所謂董二姑劉三姑；說是董福祥，劉永福的妹子。董福祥『立誓滅洋』被稱爲董大師兄，在義和團中極有聲望；劉永福是越南抗法，台南抗日的英雄，爲南北民衆所尊敬。義和團假託董劉名義，藉以號召。當時幼女紛紛練習法術，『父母不能禁』。太平天國以來，婦女再一次表現了政治鬬爭的熱情。反動紀載，造作卑污謠言，惡意誣衊，全不可信。

以上都是構成義和團的主要羣衆，主體自然是農民。此外還有不少另一部份人加入義和

團。這種人多是別有企圖，乘機謀私人利益。

乞丐——天津城內外乞丐，組成沙鍋照，借募餉名義，沿門強索，招人厭惡、

流氓——流氓比乞丐更惡劣，紛紛設立神壇，聚集同類，自稱義和團，欺詐強奪，多屬這一類人所爲。

滿人——北京滿人，不分男女老少，大都加入或同情義和團。『宮中內侍及年老宮女等亦不時操練拳棒。』滿人積極練拳，並不作戰，爲了保護自己的寄生特權，希望義和團替他們『扶清滅洋。』

義和團有乞丐、流氓、滿人加入，在城市中聲勢更大，但不良行爲也被這些人帶來。

義和團領導者

義和團分八卦，『其蒙首圍腰之布，分紅（坎字團）黃（乾字團）黑白四色，然互相猜忌，並不聯絡。』它原是教門紛歧的祕密團體，不可能有實際的首領及統一的行動。各派對『滅洋』意見一致，對『扶清』却有不同的主張，大體可分反清，扶清，保清三類。

反清類：白蓮教——義和團白色一派是白蓮教正傳、首領不知姓名，在運動中仍保持半祕密狀態。當義和團圍攻北京公使館形勢緊張的時候，白蓮教準備推翻滿清統治。長崎報載日公使西德二郎密信說：『城之內外有白蓮教匪，居永定門附近飯店之內，近增至二千，以弒君殺官

篡位爲主義。其名籍爲官搜獲，殺其七十名。此匪聞擬九月舉事，人心更覺惶惶。該匪胆敢以紙紮成天子及顯要肖像至菜市殺之。』白色義和團人數不多，破壞後不見再起活動。

扶淸類：朱紅燈派——朱紅燈首創『扶清滅洋』口號。紅燈死後，義和團在直隸大發展，最著名首領有李來中、張德成、曹福田三人。李來中被稱爲義和團總首領，他原是陝西義和拳總首領。關於他的事跡，傳說不一，或說：『該團匪目李來中，爲直隸團匪中最著名之頭目，卽董福祥手下之武弁也』或說：『團匪頭目名李來中，係陝西人，聞未滋事前，曾由董軍門引至內廷，經召見兩次』或說：『匪首李來中自北倉失守（七月十一日）後卽已逃避，不知所往』（以上据拳匪紀事）或說：『拳匪旣雲集京師，更有董福祥義弟陝人李來中者從中指揮，由是兵匪遂合而爲一，作爲與髮匪直無二致』（西巡廻鑾始末記）義和團與董軍合攻使館，直到聯軍入京時爲止，攻擊始終不懈，李來中逃避說不可信，他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則是事實。東南各督撫劉坤一等聯名電奏說：『拳匪若眞係直隸義民，何以陝西李來中爲首。』董福祥敗退到陝西，上書斥責榮祿說：『去年拳民之事，眾奉鈞諭，囑撫李來中，中堂欲撫拳民，則祥薦李來中。』

足見李來中的總首領地位，爲衆所共認。董軍兵士全是陝甘人，又多參加義和團，李來中以義和團首領地位，影響董軍兵士，使成爲運動的支持者。董福祥是榮祿的親信走狗，榮祿後來竭力反對攻使館，董軍自動攻擊，不肯停止。榮祿不能控制董福祥，董福祥不能控制士兵，可以推想

李來中所起的作用。天津方面首領張德成，出身船夫；又一首領曹福田，出身『游勇』，曹代表城市中羣衆，自稱『署理（本任屬張德成）靜津一帶義和神團』，張代表農村中羣衆，自稱『天下第一壇』。曹態度較強硬，張態度較溫和。直隸境內沿運河一帶團衆統歸二人管理，義和團宣稱扶清，行動上也確表示出以對等獨立的地位來扶助滿清，不受政府的約束。李來中所部『西直隸及陝西來之團匪，與端王（載漪）兵士自相攻打兩次；』反抗載漪的干涉。裕祿召張德成來天津，德成怒罵：『我非官吏，何得以總督威嚴凌我。』裕祿自認錯誤，『以敵體禮相見。』曹福田私室供『聖上楊老師』木主。那桐、許景澄奉命往天津求和，阻洋兵入京，被豐台團民捕獲，二人再三哀求，團民答稱：『吾團民知有祖師之命，不必問朝廷之命。』剛毅、趙舒翹到涿州，團民勒令對祖師跪香並承諾撤革直隸提督聶士成。這都說明義和團崇奉本教祖師，不認自己是滿清的奴僕。西太后逃亡出京，殺義和團向聯軍獻媚，景廷賓提出『掃清滅洋』口號，成立反清義和團。從『扶』轉到『掃』，『掃』實際是恢復義和團的舊面目。

保清類：滿洲貴族——載漪、剛毅、徐桐（漢軍旗人）等頑固派首領，妄想利用義和團，排除公使館中外國人。清政府特令載勛，剛毅統率北京、天津一帶義和團，又屢令載勛等查明『僞義和團，照土匪之例卽行嚴辦。』力圖約束『義和團眞心向善』（六月上諭，）但並不生效。滿洲貴族，能領導的團衆，止是一羣北京旗人，他們與清政府利害一致，保清就是保自己的特權。

上述三類以外，還有不少投機者，設壇聚衆，混入義和團。例如天津土棍王某在城內三義廟設壇，自稱壇師，招集流氓地痞，勒捐富戶四千餘兩，挾銀潛逃，被外縣團拿獲，腰斬兩段。直隸候補道譚文煥自稱義和團軍師，藩司廷雍委文煥爲統領官，帶兵搶劫，得銀數十萬兩，後被聯軍捕獲，臨刑願獻五萬兩贖命。文煥的兒子譚三，立壇自充頭目，強佔婦女數十人，逃到滄州藏匿。這一類人並無政治目的，止是圖個人私利。

第三節　義和團的志願與紀律

義和團降神唸咒，盲目排斥洋人、洋教、洋貨、洋書、洋務人員；凡帶洋氣的人和物，一見「怒不可遏，必毀殺而後快」。這是愚昧甚至反動的一面。但從義和團的志願與紀律說來（材料全取拳匪紀事）它是舊式組織的反帝運動，在當時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把義和團描寫成「暴徒亂民」，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殖民地奴僕們的有意誣衊。

義和團的志願

義和團第一志願是廢除和約（不平等條約。）庚子年四月初，北京拳民傳言溫泉山煤洞中，掘出前明劉青田預言石碑一塊，內稱「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指示和約是民冤的根源。又稱那些上行下效的官吏，「羽翼洋人，趨炎附勢，肆虐同羣」，指示大小官吏幫助洋人共同虐害人民。義和團第二個志願是驅逐

外來宗教。天津各處貼着匿名揭帖，說『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為要實現兩個願望，號召九月九日起義，『挑鐵路，把線砍，旋再毀壞大輪船……一概鬼子全殺盡。』他們以為這會使『大法國，心膽寒，英吉俄羅勢蕭然。』這自然是可笑的思想，但三個主要侵略國却不曾認錯。對新起的侵略國日本，義和團要用紅燈照『滾赴東洋，索還讓地並二萬萬之款。』天津、北京大書院附近貼有義和團警告國聞報的揭帖，明白表示反對洋人的原因說：『只因四十餘年內，中國洋人到處行，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准有洋人，餘者逐回外國去，免被割據逞奇能。』事實上在五月二十一日各國海軍攻陷大沽砲台以前，與其說義和團想殺盡外國人，不如說想逐回外國去。天津義和團對教堂揭示這樣的警告：『着爾耶穌教各教堂知悉。今限爾一禮拜內，教堂內之人，悉行離開。各教堂均由本會神人居住。如敢不遵，即須用術，將爾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毀，縱火焚燒，彼時悔之晚矣。』這種恐嚇性語句，不過拆燒房屋為止，並無殺人之意圖。上海字林西報也承認這個事實，它說：『北省人心騷動，日甚一日，其華人中之下等者尤甚。一見洋人即行詈罵，然此尚無關緊要，惟於六月十七號一聞大沽砲台被洋人攻取之信，更恨洋刺骨。』帝國主義所謂『下等者』的人民，實際是高等的愛國者。義和團自此以後，才實行殺戮洋人，表示對武力侵略的報復。它雖然戰鬥慘敗，廢除和約及反抗宗教侵略的志願是光明正大的。

義和團的紀律

純正的義和團有嚴格的紀律。『立壇之始，有願投壇者須有切實的保人，且須向壇跪香立誓。有不願意者亦不強。』『向神牌稽首，誓無改悔』以後，老師口授戒條：『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滅洋人，殺贓官。行於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團員絕對不敢破壞戒條，因爲犯戒就『符咒不靈，神不附體，不能避槍砲。』上戰場的團員都是純潔的農工幼童，再加迷信的約束，戒條完全生效。某次曹福田領隊出發，沿路擲錢，隊衆以爲老師作法，急拾取收藏。離戰場一二里，福田停隊問有人拾錢麼？隊衆各出所拾，證明留心學法。福田說：『吾道最戒者貪財，今爾衆見錢卽拾，神心不附，臨陣必覆亡。』義和團始終重視紀律，就是屠殺義和團的西太后也不能否認。十二月光緒帝罪己詔裏自供：『淶涿拳匪既焚堂毀路，急派直隸軍彈壓。乃練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恃仇教之法，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百姓皆畏兵而愛匪，』究竟誰是匪，不是很清楚了麼？

義和團嚴守紀律，生活極苦，天津團民每日兩餐，『令有力者施送米麵，又向富戶勸捐銀米。』戰陣上食糧也止有麵餅，綠豆湯。北京團民生活，由壇主供給，貴族、大官、富戶捐資設壇，自充壇主；耗費一些糧米，求得團民保護，往往一街多至五六壇，十餘壇。凡義和團所在地方，首先設立神壇，組織團民和民衆。每一壇至少二十五人稱爲一團，每團推舉一人爲團首，指揮全團。各團劃定管

轄地區，住戶必須聽從號令。團民白晝巡街，夜間巡更，盤查奸細及形跡可疑的人，凡眞團民面有『菜色』，每日所得止夠不致餓死的食物。五月對各國宣戰後獎勵義和團上諭承認：『義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軀，與槍砲相薄。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髫齡童子，亦復執干戈以衛社稷。』這樣英勇刻苦的義民，出死力反抗侵略軍，但僅僅發給粳米二萬石，供義和團食用。據宣戰上諭說：『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二萬石平均分配，每人所得不過幾升米。

義和團認出第一敵人是洋人，第二敵人是官吏；戒條規定要『滅洋人，殺贓官。』天津方面，義和團入地方官衙門示威，『開獄放囚，在總督、道、府、縣大堂設壇。途遇道、府、縣，皆叱令下輿免冠，司、道、府、縣出門皆不敢冠帶，不敢擺儀仗。』凡官必贓，就是凡官皆可殺；義和團表示欲殺的姿勢，但並不眞殺以免破裂。這些贓官自裕祿以下順從『法』令，指送糧米，請求保護；義和團也派人護衛，防止意外事件。各城門各官署，都歸團民看守，嚴查出入。不得允許，任何官員不准送眷屬、物件離津。北京方面，義和團有董福祥軍支援，威力更大。宣稱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龍指光緒帝，虎指貴族，羊指京官；『謂京官可勿殺者只十八人，餘皆可殺。』西太后不在可殺之例，因爲她是頑固派首領，與義和團思想上有共同點，不過義和團並不因此服從她的命令。西太后將出逃時，光緒帝對王公大臣埋怨說：『義和團亦不是好百姓。』西太后立即阻止說：『皇帝與你們講

的話，你們不准說出去，如有走漏以致變生意外，將惟爾等是問。』她知道自己不能控制義和團。五月底，載漪等領義和團六十人入宮，大聲呼噪要『殺洋鬼子徒弟』（光緒帝。）西太后是久經歷練的反動頭子，聞聲出來大罵載漪，又殺義和團首一人，居然保全了光緒帝。不過，皇宮以外她無力操縱。六月，義和團殺副都統慶恆家屬，清政府殺義和團五人，義和團殺慶恆報復。他想教董福祥壓服所部兵士，福祥答稱『如斬甘軍一人，定然生變。』當時北京與天津一樣，各城門，各街路以及多數貴族、官僚住宅都歸義和團保護監守，西太后不敢積極反對義和團，怕義和團『生變』滅洋人轉變為大規模的殺贓官。

義和團的勇敢精神

志願和紀律產生無比的勇敢。義和團員手執刀、矛、木棍、竹竿、石塊與帝國主義軍隊正式對敵，一方面顯示迷信愚昧，同時也顯示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這種精神的來源，主要是對外國侵略者的仇恨，迷信止能起輔助作用，因為戰場上屍骸如麻，任何愚人也會逐漸體驗到神咒不靈。如果沒有極深厚的民族仇恨作基礎，義和團首領豈能一次又一次的鼓勵團員們上戰場。說義和團運動僅僅是一種無意識的迷信行為，那是不合事實的毀謗。義和團勇敢表現的實例，舉不勝舉；依據下列兩個電報可以推見一般：『拳匪遇有戰事，競衝頭陣，聯軍禦以洋槍，死者如風靡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皆中彈而倒。西人皆深憫（？）其愚』（六月初九日威海衛電。）在戰場上有進無退，有死無生，還不夠

說明義和團的勇敢，它還有源源不絕從各地方奔赴戰場的堅韌氣魄。『天津接到探報云，官兵開各國大兵前來，頗爲震動，潛逃者不少。惟團匪則日見其多，大約俱少年無知之輩也』（七月初二日德國報載烟台電）『日見其多，』正說明義和團運動是反帝人民戰爭，而不是所謂『邪教作亂。』

第四節　西太后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

如果滿清政府（后黨獨佔的政府）對帝國主義及一部份統治階級當時沒有深刻的矛盾，義和團不可能發展成一大運動。從利用矛盾這一點說來，『扶淸』是有策略意義的口號；止有『扶淸』才能進入天津、北京，對『洋人』直接作戰。

帝后對立是后黨政府對外對內各種矛盾的總根源，戊戌政變後，強烈的發展起來。戊戌變法失敗，中央政權完全被頑固派佔奪，光緒帝禁閉在宮中，止存皇帝空名，但對頑固派還是一個大威脅。因爲西太后死後，政權當然歸還光緒帝，頑固派按叛逆治罪，是無可免的。要預防這個危險，除了從速謀害或廢棄光緒帝另立帝位繼承人，再不能有其他生路；這在頑固派看來，確是生死存亡問題，必須求得解決辦法。

頑固派起初採取謀害法，宣稱『帝病重，』駐京各公使到總署警告，並派法醫生入宮驗看。

謀害法不得行，改取廢立法；宣稱『帝久病，不能君天下；』密電南省各督撫，徵取同意。善觀風色的張之洞首先贊成，劉坤一、岑春煊表示反對。劉電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二句，發生頗大的效力。他是湘系軍閥首領，幕中有維新派張謇等人代爲策劃，事實上等於帝黨聯合軍閥，對后黨提出抗議，頑固派不得不予以重視。康有爲在海外鼓動美洲、日本、南洋羣島保皇黨華僑紛紛發電『請皇帝聖安』，並要求歸政。梁啓超在日本辦清議報，揭發后黨醜惡又不遺餘力，又不斷的替光緒帝歌頌『聖德』。剛毅到廣東搜括財物，得清議報進呈西太后，頑固派感到光緒帝並非孤立。這些，都阻礙了廢立計劃的實現，但最重大的阻力還在各國公使館方面。

廢立計劃受阻，激成頑固派烈火般的仇恨。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榮祿向西太后獻密計，請『立大阿哥（帝位繼承人）徐篡大統，』這在頑固派確已認爲讓無可讓的最後辦法了。西太后立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爲大阿哥，預定明年（庚子）元旦光緒帝行讓位禮；令李鴻章運動各公使入宮慶賀，不料又遭各公使拒絕。上海紳商經元善等號稱三千餘人，維新志士蔡元培、黃炎培等及海外保皇黨華僑號稱數十萬人，紛電反對。清政府捕經元善，元善得英教士李提摩太保護逃往澳門。頑固派的極度憤怒，從下列事實可以推見。

戊戌年十月，清政府派特務劉學詢、慶寬託名『游歷外洋，考察商務；』實際是指使刺客，謀暗殺康梁。一年以後，清政府派出大特務李鴻章爲兩廣總督，專任鎭壓保皇黨。這個大特務到了

廣東，劉毀康有爲祖墓，懸賞十萬兩捕拿康梁，嚴禁保皇黨報紙，懲辦閱讀者，電駐外國公使查禁保皇黨。尤其殘忍的，凡保皇黨徒的家屬，一體治罪。一個姓梁的黨徒，有祖母年九十餘歲，也被捕入獄，受虐待身死。從滿洲奴才李鴻章的瘋狂行爲裏，可以看出他的主人如何仇視保皇黨，也可以看出如何仇視更有力的保皇者——駐京各公使。

義和拳在山東提出『扶淸滅洋』口號，正是頑固派恨極外國人計窮力竭的時候。毓賢對義和團讓步（雖然是被迫的，）淸政府上諭（二十五年十二月）承認人民有權『習技藝以自衞身家聯村衆以保閭里，』却都含有利用義和拳洩忿的意圖。

淸政府對義和團有四派：（一）反對派，（二）贊成派，（三）反覆派，（四）動搖派。

反對派——袁昶許景澄等

這一派人堅持半殖民地統治階級的穩固立場，對內嚴厲鎮壓，對外屈辱退讓，絲毫不許動搖這個傳統方針。京官以袁昶、許景澄爲首；外官以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爲首；這些都是滿洲的也是帝國主義的精幹奴才，在反義和團運動中，充分表現他們的殘忍性。袁昶是個維新派叛徒，西太后說：『袁昶在戊戌年曾以康有爲之陰謀奏予知之，此人甚好。』（景善日記。）許景澄是淮系洋務人員，幫助李鴻章祕密出賣東三省；這兩個陰險小人，聯名上了三次奏摺，肯定『拳匪』確是『叛逆，』比『咸豐年間之髮匪，捻匪，嘉慶年間之川陝教（白蓮教）匪』危險更大。他們斥責『扶淸』口號說：『若能扶之，卽能

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切實寫出統治階級猜忌人民的卑劣心理。他們要求西太后調董福祥軍出城，派榮祿組織槍手、刀斧手十餘隊，關閉城門，分路搜捕『匪徒』『凡遇頭紮紅布身繫紅帶之匪，准其格殺勿論。並懸重賞之格，傳獻匪首所謂老祖師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擒斬該匪團長賞銀五百兩，餘匪計首一級賞銀百兩。』西太后如果採用，不是北京變成血海，便是義和團推倒滿淸，她到底不敢輕試，在義和團壓力下，把袁許二人斬首。袁許是京官，雖有兇心，並無實力，想殺人却殺了自己。外官李、劉、張、袁等擁有軍隊，情勢便不同了。他們奏稱：『拳匪目無法紀，是爲亂民，卽不與各國開釁，亦應痛剿。』一面致電駐京公使，請求各國不開釁端，中國乃能專力剿匪。若一旦決裂，則長江一帶匪徒必致乘機響應，中國亦難於兼顧。』這就是說，希望洋兵不要攻擊滿淸，屠殺義和團是可以的。袁世凱正是這樣聯合德兵大殺山東的義和團。

反對派殘酷鎭壓義和團及其響應者，獲得帝國主義的褒獎。殺人最多的袁世凱被選爲李鴻章的繼承人，以至是滿淸的繼承人。

贊成派——載漪、剛毅、徐桐等

大阿哥溥儁準備庚子年登位，被駐京公使拒絕；這使載漪仇恨外人超過其他頑固派，不惜尋求任何助力來反對外人。剛毅是西太后寵信之一，榮祿獻密計立大阿哥，剛毅不曾與聞，因此竭力奉迎載漪，與榮祿爭擁戴第一功。榮祿反義和團，剛毅乘機反榮，董福祥本是榮祿部下，『平日對滿人感情甚惡，剛毅深恨之』（景善日記。）

現在爲反榮，把董福祥拉到載漪方面來，合作排外。徐桐年八十歲，號稱道學大師，每見西人用扇掩面西太后極遵敬他的道學，教他做溥儁的師傅。自然他是渴望溥儁立卽登位的。這三個政府中有力人物，一致求武力解決廢立問題，對『扶淸滅洋』的義和團認爲是可以利用的武力。義和團得進北京城並得到政府的獎勵，在義和團實力擴大以前，主要是這三人的力量。義和團入京後聲勢大張，載漪曾兩次反抗，都被義和團制止。淸政府任命載勛，剛毅統率義和團，企圖干涉團民行動，但重要事件載勛等『不能作主，仍請壇中大師兄焚表燒香，載勛等不能干預』（拳匪紀事）。載漪等志在滅洋，不得不對義和團取退讓態度。

反覆派——榮祿 奕劻等

榮祿善於陰謀，得西太后寵信；戊戌政變，他是主要策動人之一，立大阿哥又是他一人的密計。他對西太后，載漪關系極密，對光緒帝則稱『已虧臣道，永不望邀帝之恩。』這樣除了發動『滅洋』戰爭不能有自己的生路。他是武衞軍總統，主張開戰，首先殲滅公使館，在給董福祥信裏說：『各夷欺凌我國甚矣，近來尤多干預挾制，令吾辦內事（廢立）不便，尤可憤恨。義和團法術神奇，不畏刀槍，極熱心嫉惡洋人，眞天助也。』後來看出『屠滅諸夷』不是那麽容易，立卽反對團攻公使館，竭力勸西太后壓制義和團，與剛毅尖銳對立。景善日記說：『榮祿一日不贊成，則端王剛毅不能望太后以全力助義和團也。』榮剛二人交互影響西太后，使她動搖不定。董福祥原是兇惡匪魁，也受榮祿影響，令『義和團爲先鋒，董

軍為接應，』因此義和團遭受嚴重的死傷。

奕劻是另一形式的反覆派，他對贊成派表示同意『滅洋』，對反對派表示痛恨義和團。聯軍入京後，反對派得勢，奕劻被派為議和全權大臣。協助李鴻章訂辛丑條約，從此提升為首席軍機大臣。袁世凱從榮祿門下轉到奕劻門下，得奕劻庇護，發展了北洋軍閥的實力。

動搖派——西太后等

西太后是統治階級老練的首領，在她手裏，幾千萬起義人民被屠殺了。她絕對禁止人民有『聚眾滋事』的行動。義和團反抗軍隊，殺戮官吏，遠超過『滋事』的範圍，然而她終於允許義和團進北京，這不是『扶清』口號迷惑了她，而是公使館洋人逼得她無路可走，幻想真有神佛來拯救她。她每天諷誦義和團祕咒數遍，『每誦一遍，則李蓮英（最親近的太監）在旁高呼曰：『那裏又有一洋鬼子：』』（景善日記）這種窮急求救的醜態，是她容納義和團的一面。五月上諭稱：『拳匪滋擾禁城，竟敢明目張膽，沿途喊殺，持械尋仇，任意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若再不嚴行懲辦，為禍不堪設想。着各軍會同彈壓，加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正法。勒限將首要各犯迅即嚴拿，不准再事姑息。其城內設立壇棚應盡行拆毀。』這種階級仇視的本性，是她排斥義和團的另一面。載漪與榮祿兩派各在一面力爭，載漪派人數眾多，宮內有李蓮英，『時以義和團之神奇述於太后之前。』又告剛毅，『不可稱贊義和團過甚，致啓太后之疑。』這是載漪派的有利條件。載

漪派堅主迅速開戰，西太后終是『遲疑不決。』五月二十四日，裕祿奏『洋人索大沽砲台，請朝廷卽與宣戰。』西太后大怒。載漪偽造一個公使團照會，要求『皇太后歸政，』這才激發她的憤怒達最高點。她召集御前會議，宣稱『外國人無理至此，予誓必報之；』又說『拚死一戰，強於受他們的欺侮。』又拒絕榮祿的力諫，說『我不能再壓制義和團了。』二十五日正式宣布開戰。載漪、剛毅壓倒榮祿，爭得西太后偏向贊成派。二十九日，載漪率團民入宮捕拿光緒帝，她感到危險，下諭停止圍攻使館，命榮祿赴各公使館商議和局。此後忽攻忽停，忽送西瓜、酒蔬、果冰等禮物給使館，並命奕劻前往慰問。忽密諭各省：『凡洋人，無論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對義和團屢次設法壓制，對外國預定戰敗後的辦法，說『他們（外國）雖向着皇帝，不喜歡我，我有手段教他們意思轉過來』（景善日記）。這就是準備出賣大量權利來換取外國的喜歡。天津失陷後，她非常恐慌。六月二十日，榮祿揭發載漪偽造公使團照會的陰謀，她大罵載漪。除了董軍，榮祿所說各軍都在等待停攻命令。顯然，她偏向到榮祿方面來了。

五月二十四日，西太后宣稱『我始終壓制義和團，不欲開釁，直至昨日看了外交團致總理衙門的照會，竟敢要我歸政，始知此事不能和平解決』（景善日記）。二十九日，她『心怒端王及義和團之故，下諭停止圍攻使館，』再開始壓制。她誦義和團神咒僅在開戰後五天以內，義和團不受壓制，也止有在這五天內。但是壓制不曾發展為屠殺，這不是由於她不想屠殺，而是義

和團的反壓制，使她不敢屠殺。五月三十日上諭：『此次義和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其衆不下十數萬，自民兵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聲與洋教爲仇，勢不兩立。剿之則立刻禍起肘腋，生靈塗炭，只合徐圖挽救。奏稱（李鴻章劉坤一等請剿拳匪奏）信其邪術以保國，似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又諭李鴻章等：『此種團軍，京津一帶已不下十餘萬人，宮禁前後，所在多有。剿之轉恐患生不測，不若因而用之，尙可轉危爲安。此乃天時人事相迫而成。』六月初三日上諭：『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激成大禍，亦恐直東兩省同時舉事。』五月二十六日榮祿覆劉坤一等密電也說：『兩宮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骫衆。』這些都是當時實際情形。袁昶、許景澄稱『拳匪爲腹心之疾。』在滿洲奴才看來，並不是過慮，因爲義和團造成控制政府的形勢。西太后出宮門時，不能不請『拳民護衛聖駕。』榮祿自稱『過後門時拳民竟敢大聲罵予爲漢奸。』義和團的羣衆力量壓倒了滿淸的統治力量，這就是西太后不敢公開反對義和團的眞實原因。

第五節　外國的壓迫與義和團的反抗

義和團是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運動，在各種原因的促迫下，爆發了庚子年戰禍。促成

戰禍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國侵略者抱着這樣的一種信念：『以爲在華的外人——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其解決糾紛之唯一的方法，只有多用武力，並懲罰所有關連的官員。』所謂懲罰官員，實際是督促官員服從侵略者的意志，竭盡全力去鎮壓人民。這種信念與客觀事實發生矛盾時，就是說滿淸政府因廢立問題對侵略者暫時表示不全部服從，這中外聯合鎮壓，露出空隙，庚子戰禍就從這個空隙中爆發起來。下列事實完全證明外人的『多用武力』在先，義和團的破擊自衛在後，禍首是外人不是義和團。

大沽砲台失陷以前（庚子年五月二十一日以前）

帝國主義欺壓中國，激發義和團運動的事實是舉不勝舉的。這事只從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冬季美公使康哲要求撤換毓賢交涉說起。

己亥年十月，美使館接到山東美教士的報告，說德州附近發生暴動。康哲照會總理衙門，要求保護山東境內美人的生命財產。接着，又要求『凡肇事之人，應立卽拘捕，並予以科罰。』一星期後，又送照會要求『電示地方官吏，當用強有力的方法，消滅這些恐嚇的暴徒（義和團），並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接着又要求『立卽宣佈將用何種方法保護美國人民。』十一月，康哲又要求『立卽再發一電至山東省，保護外人應有的方法，應立卽施行。』總理衙門接到連珠式的要求，當然嚴飭毓賢鎮壓義和團。但事實上，美教士的生命財產從沒有發生過危險。止有一次，當義和團經過龐莊時，基督教徒竟無故開槍，並追逐捕捉。團民被迫反攻，焚毀教堂

一所。總理衙門根據毓賢的報告答覆康哲，康哲不顧事實，提出警告式的照會，要求撤換毓賢。兩天後，滿清政府果然撤回毓賢，選擇最大屠戶袁世凱繼任山東巡撫。毓賢被任爲山西巡撫，對那些造謠生事的耶穌教士格外怨恨，庚子年他在山西不分天主耶穌一概屠殺，他的野蠻性與康哲的驕橫性結合造成山西大慘案。

英公使麥唐納自伯魯克被殺案以後，表示強烈的態度，並不因清政府袁世凱殘殺兇手，賠款、贈地而滿意。十二月，各公使在英使館開會，議決要求：『中國政府頒布諭旨一道，聲明完全禁止並取消義和拳及大刀會。又聲明凡任何會團或藏匿會衆者，均係違反中國之法律。』這就是要求清政府採取袁世凱的嚴禁拳匪暫行章程，當作一般性法律通行到反教各省（主要是直隸省。）如果當時沒有慶賀大阿哥繼位交涉，清政府當然會服從公使館的要求。可是廢立問題激怒了西太后，因此頒布的上諭（己亥年十二月庚子年正月上諭）都不能完全符合公使團的指示，交涉愈趨緊張。庚子年二月，公使團提出警告說如果不能實踐全部要求，他們將各請本國政府，採取必要的手段，保護在華僑民的生命財產。三月，公使團不等總理衙門答覆，英兵艦兩艘首先開到大沽口，美艦接着開來，德、意、法、俄各艦隨後陸續到達。公使團覺得海軍聯合示威還不夠嚴厲；四月，又提出使館駐紮衛兵的要求。康哲說：『人人皆知海軍示威，能使中國易於順從。但設此舉失敗，而各國集兵至京，聲言保護使館，則中國政府亦必然承諾要求之事。蓋中國政府

對京畿之秩序與安全當努力維護，最不願受人指摘。彼等寧願作他種犧牲而不欲京師秩序不靖也。』這種經驗原來是屢試屢效的，這一次却發生了相反的結果。頑固派誤認公使團要用武力恢復光緒帝的政權，仇外心理提高到準備反對的程度。西太后下諭褒揚辦團練的官紳，這些人死了多年，忽而明諭褒揚，顯然是準備反抗的暗示。同時，西太后任命毓賢爲山西巡撫，在任命前一星期，康哲曾要求『毓賢將來的任用，不得在有傳教部的地方，』恰恰是山西，耶穌教事業超過天主教，這又顯然是拒絕要求的一種表示。不過，這不是說淸政府對公使團不再讓步了；它承認公使團的要求對義和團的鎮壓並不放鬆，迭次諭令地方長官使用兵力，『剿滅亂民。』中國人民受外國壓迫，激起反抗的義憤，特別在直隸，義和團得羣衆響應，迅速發展起來。在『扶淸』口號下，與裕祿進行多次的武裝衝突，屢獲勝利，逼迫裕祿逐漸屈服。在『滅洋』口號下，用匿名揭帖，謠傳等方法，鼓動民衆。康哲給美國務院報告（四月初十日，）也承認『現在尚未聞拳衆攻擊美國教會之事，亦無侵犯美教士所住村鎭財產之事。』四月下旬以前，義和團行動主要是對滿淸作戰，不曾武裝進攻外國教堂。

四月二十六日，公使團提出照會約有六點：（一）嚴禁拳民練團糾黨傳布揭帖。（二）團民聚會之處無論寺廟民居，將其住持屋主一併收監。（三）將拘辦拳民不力之員概行懲處。（四）將爲首焚殺之拳衆一併正法。（五）將縱拳助拳之人盡行誅戮，（六）直隸與鄰省有拳團之處，地方官

出示嚴禁。逼勒淸政府承認，否則各國將自行調兵辦理。總署接受要求，允卽『勦辦』並『嚴禁該會。』公使團的野蠻要求與淸政府的完全屈服更激起民衆的憤怒，北京城內禁止義和拳的告示，被民衆撕去，並且斥責政府媚外。二十九日起，義和團繼續進攻長辛店、豐台等車站，驅逐洋工程師，蘆保，京津鐵路被阻不能暢通，各地洋人和教民開始被殺戮。淸政府派兵攻擊，直隸提督聶士成軍尤其兇暴，在蘆溝橋附近見人便殺，見屋便燒，見器物便毀，共焚毀村莊四處，殺人四百八十名，器物損壞無數。在落垡炮燬村莊五處，殺六百餘人。聶軍瘋狂燒殺，主要是受李鴻章的指使。他給聶士成電稱：『宜卽痛剿，保全大局爲囑。』聶士成派兵沿京津鐵路，專殺義和團，京津一帶秩序愈益紊亂。公使團方面接連表示武裝干涉，五月初四日，英、法、美、意、日、俄、德派兵三百數十名進京，七國兵船十六艘泊大沽口外示威。初十日，大沽口洋兵登陸到天津租界，形勢非常緊張。載漪、剛毅等害怕公使團用兵力扶助光緒帝，急於尋求助己的力量，『扶淸滅洋』的被注視了，剛毅以『查看』名義到涿州城接洽，初五日回京，次日奏請太后『信任義和團，用爲軍隊，以敵洋人。』他深信『這一回一定把洋人趕走了，一點也不用疑慮』（景善日記。）西太后在洋兵威脅下，態度『遲疑不決』；初十日令『榮祿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等各率所部實力剿捕』義和團。各大臣密議，載漪、剛毅、奕劻等力主『不可剿辦團匪，』決議『該團實皆忠心於國之人，如與以上等軍械，好爲操演，卽可成爲有用勁旅，以之抵禦洋人，頗爲有用。』從此義和團被認爲合

法團體、北京城內漢滿人到處公開練拳，甚至溥儁也穿拳民衣服在頤和園練習拳術，北京頓成義和團世界。西太后在斥責聶士成上諭裏說『倘因此（燒殺）激成變政，惟該提督是問』說明她被羣衆運動壓倒了。十二日，英提督西摩爾率聯軍準備向北京出發。十三日，調董福祥軍入城。十五日董軍殺死日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局勢愈不可收拾，她不得已於十七日，默許京外義和團入城，但並不信任，要他（義和團）『莫亂動』。京內外拳民結合以後，搜殺教民，焚毀洋貨店，延燒市房數千間（二十一日），剝奪貴族、官吏的威權，神壇成爲政權機關。她感到『京城內外，擾亂已極』的新威脅，十九日諭：『步軍統領衙門嚴拿滋事拳匪，交刑部正法，城內壇棚盡行拆毀』。同日諭：『李鴻章迅速來京，袁世凱着酌帶所部迅速來京』，企圖用洋務派的助力來對外投降，對內鎮壓。二十一日，聯軍攻陷大沽口炮台。二十二日，任李鴻章爲直隸總督『着迅速北上，毋稍遲延』。二十四日，敗報到北京，她還是『遲疑不決』，載漪僞造公使團照會勒令『太后歸政』，這才狂怒起來，宣稱『我不能再壓制義和團了。』二十五日頒發宣戰上諭，令義和團充先鋒進攻使館。從上述經過看來，清政府與義和團結合，主要是公使團促成的。它慣用威嚇方法命令清政府鎮壓人民，這一次却因廢立問題發生誤會，不完全服從命令，給義和團號召羣衆的機會，大沽炮台失陷完成了這種結合，而這種結合又是極勉強的。

天津失陷

五月中旬，義和團入天津城。在此以前，義和團已與洋兵發生戰鬥；初六日，獨

以前（六月十八日以前）

流鎮團民與俄國著名的哥薩克馬隊格鬥，團民死二三十人；初十日，團民與俄、法、日登陸水兵在天津城外開仗，團民死二十餘人；裕祿在民衆及外兵雙重壓迫下，異常驚駭，迭次奏請能免又不得允准，止好禮請張德成、曹福田入城，求暫時安寧。十四日，西摩爾率聯軍二千餘人，攜帶大砲機關槍向北京進發。團民破壞鐵路，隨處攔擊，聯軍第一天走了三十英里，第二天止走了十英里。在廊坊地方『突有團匪等蜂擁而至，膽量甚壯，其中尤以小孩居多』。英美兵開炮夾攻，團民死六十餘人。第三天止走了三英里，第四天團民開始總攻擊，死傷極大，但聯軍已不能向前進展。鐵軌的前後兩端都被拆毀，與天津交通完全阻絕。二十二日，聯軍軍官們認爲除逃退以外，別無他法了。他們幾乎糧食斷絕，又受傷病兵的拖累與繼續不斷的激戰，且拒且退；二十六日，退至西沽，又被團民圍攻，勢極危急；直到五月三十日，得大隊援兵，才解圍回天津。聯軍兵士陣亡六十二名，受傷三百十二人。義和團用刀矛殺傷外兵數百人，可見這次戰鬥異常激烈。聯軍將鐵路旁村莊縱火焚燒，『所有華人可以埋伏及藏躲所在，均經西兵收拾一空。』團民方面死傷損失是無法計算的，但始終阻擊，死不退却。西摩爾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勇敢，說：『義和團所用設爲西式槍炮，則所率聯軍必全體覆沒。』

五月十七日，義和團前往天津火車站，俄兵開放大砲十五門，團民死三四百人，這當然激起團民的憤怒，卽時出動大隊進攻租界，天津攻租界戰鬥從此開始。二十一日，大沽砲台失陷，團民

及一般民衆愈益激昂，天津武備學堂學生向租界開炮，英德兵回擊，學堂起火，團民死傷頗多。二十四日，清政府頒發宣戰上諭，聶士成軍奉命攻擊租界。聶軍是當時唯一能戰的新式軍隊，與租界守軍惡戰十餘次，前後相持凡八日。甲午戰爭中，聶軍勇敢善戰，這一次又表現了聶軍的勇敢；『西人謂自與中國交戰以來，從未遇此勇悍之兵』；天津城得暫時保存，聶士成軍是有功績的；但是，天津城的過早失陷，聶士成也應負責任。他和義和團結成深仇，團民自動給聶軍衝先鋒，聶軍却在後面槍殺團民。團民見勢不佳，不敢出戰，聶軍強令上陣送死。例如某次夜戰，『華兵在後，義和團在前，合攻租界，洋兵開排槍禦之，天明而止，計轟斃義和團二千餘名，華兵傷者寥寥。事後探訪，知官兵因義和團妄言惑衆，恨之切齒，往村莊搜捕團匪責令充先鋒當前敵，否則殺死。團匪持刀前行，洋兵在前開槍轟擊，官兵在後用槍擊死，故是夕團匪死者如此之多，並非皆洋兵打死』（粤人某遇難日記）。此後團民避聶軍搜捕，隱蔽在村莊中，聶士成痛恨不止。某次戰罷歸營，遽下令曰『今日盡力攻團匪』，於是軍四出，所擊殺者千餘人。聶士成如此殘暴，激起義和團的報復，『乃乘其與洋兵苦戰時，以多人捕其家屬而去，老母年八十三，亦被擄去』，聶士成『聞信，急引兵追之。練軍見聶軍追匪急，欲救之，遽嘩曰，聶軍反矣！共開槍橫擊之，聶軍敗散』（聶軍門死事紀略）。聶軍兵士不少同情義和團，敗散後不再歸營，聶士成僅收集數營，六月十三日與洋兵戰敗死，多年訓練的精銳部隊，就這樣消滅了。

聶士成屠殺義和團，但也抗擊洋兵。繼任的宋慶，專殺義和團，見洋兵就逃遁，因此士成死後五天，天津城失陷。當時城外駐宋慶軍，馬玉崑軍，練軍約七八十營，城內駐兵極少。官紳們以爲『城上不用砲轟洋人，洋人必不用炮轟城內』拒絕軍隊入城防守。十五日，馬玉崑軍與聯軍大戰，將士死傷甚重，官紳們得知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奔走相告且相慶曰，津人有生機矣。』這些腐敗已極的官紳，止希望及早投降，絲毫不作戰爭準備。十七日，聯軍砲轟天津城，宋慶大殺義和團，城內外神壇多被搗毀。本來團民盤查奸細極嚴，經宋軍慘殺，無人守城巡街，夜間教民混入城中，四更登城引上教民數十人，遍插洋旗，亂放槍炮，大呼『洋兵來了。』居民夢中驚醒，倉皇向城門奔逃，城中大亂。十八日清晨洋兵大隊進城，率教民登城中心地鼓樓，向人叢連放排槍，每一排必倒斃數十人，又連放開花炮，死人更多。據天津一月記所說：『自城內鼓樓迄北門外水閣，積屍數里，高數尺，洋人入城後，淸街三日尙未淨』據遇難日記所說：『城內但見死人滿地，繁華街道均被焚燒，西門死屍山積，房屋十存一二。』城內殘存團民半爲洋人殺死，逃出城外又遭宋軍慘殺。宋慶等七八十營大軍，不圍攻天津，又不乘虛攻擊租界，却幫助洋兵殺人。宋慶大殺義和團以後，晚間保護裕祿及官員到楊村，離天津六十里；馬玉崑逃到北倉，離天津二十里。天津近郊不見一兵，全被洋兵佔領。

北京失陷

五月十七日，京外義和團開始進城，神壇到處設立，形勢確甚緊張，但並無攻

（以前（十月二十四日以前））

使館舉動。使館衞兵却超出自衞範圍，先取攻勢，『或有時上城放槍，或有時四出巡街，以致屢有放槍傷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幾欲闖入東華門，被阻始止。於是兵民交憤，異口同聲，匪徒（義和團）乘隙橫行，燒殺教民益無忌憚』（六月三日上諭）按照外人記載，也說『德意兵曾攻入附近一廟中，拳民聞風退走，』又說『德國水兵在城頭上向南城內集會拳衆開槍。』康哲承認『使館衞兵已殺戮拳衆至百人之多。』德兵襲殺董軍三人，康哲相信『外國軍隊之技術與勇敢的表示，實爲一良好之實物教訓。』這都說明二十四日以前，義和團先受外兵的攻擊，死傷至少在百人以上。

五月二十五日西太后宣戰上諭有『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等語，表示排外決心。同日諭各省督撫『招集義民成團，藉禦外侮。』二十六日發放粳米二萬石給義和團。二十七日，令各督撫『將舊槍炮刀矛斧補軍械，趕緊修理，以備民團領用。』二十九日『賞神機營虎神營義和團民銀十萬兩，甘軍，武衞軍賞銀六萬兩』（前曾賞四萬兩）在這五六天內，她是堅決主戰者，相信『洋人命運該絕，如魚在釜中……現在全國一心，必能戰勝無疑矣。』二十九日起她開始動搖，對義和團也不再接濟，此後戰鬥由義和團，董軍在載漪、剛毅主持下，半自主進行。她實際傾向媾和，形勢又不許停戰，因此把『約束』拳民看作第一事，攻使館看成第二事。

與宣戰同時，清政府懸賞購洋人頭。『殺一男夷賞銀五十兩，女夷四十兩，幼夷二十兩。』恰巧德公使克林德坐轎往總署，路上被虎神營滿洲兵丁槍殺，企圖領賞銀。這一野蠻的慘殺案，揭開了戰鬥的序幕。接着義和團，董軍，武衛中軍（榮祿直屬）及其他京營旗兵奉命攻擊使館。使館方面有衛兵四百四十名，教民二千三百人，教士及眷屬數百人，各館男女人員約五六百人。天主教『北堂』方面有衛兵四十人，洋教士七十人，教民一千人，婦孺二千二百人。兩個被攻地點戰鬥力都極有限，進攻軍民不下十萬，使館被圍攻五十六天（五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日），北教堂被圍攻六十三天（五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二日），結果止是教民不少人死亡，義和團手執刀、矛、木棒、石塊日夜在火線上衝鋒，死傷尤極慘重。造成這一大慘殺的帝國主義與滿淸頑固派，罪惡豈止上通於天而已。五月二十九日以前，西太后曾想一戰攻破公使館，二十九日以後她有意殺害義和團，心計非常險惡。

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正式開戰，武衛中軍及其他旗兵發空砲虛張聲勢，並不眞攻。實際進攻的是義和團及董軍中一部份兵士，武衛中軍及另一部份董軍於廿六日大肆燒殺，搶劫孫家鼐、徐桐等大官僚住宅。西太后原想幾天內戰勝，軍隊的暴行，使她感到戰事延長的危險。

二十九日載漪率義和團入宮謀殺光緒帝，她更感到危險，『下諭停止圍攻使館，並命榮祿赴各使館商議和局。』恰巧裕祿謊報聯軍戰敗，她又命各軍進攻。六月初四日董福祥借武衛中

軍大砲，被榮祿拒絕，董入宮請求，又被她大罵拒絕。如果要破使館不應拒絕借砲，如果不要破使館，便應下令停戰，這種戰不求勝的怪異行爲，正是故意借刀殺害義和團。同日，她『斥責載勛不能約束拳民，任令橫行，』足見她對團民的憎惡。十一日，『天津戰敗的消息到京，太后甚爲憂慮』十五日，任命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準備乞和。

十七日天津失陷，西太后極爲恐慌，十八日，正式派榮祿向使館求和。二十日，榮祿揭發載漪僞造公使團照會，開戰的原因消失了，從此更積極求和。數次送公使館西瓜酒蔬果麵等物，又派奕劻前往慰問，表示好意。奕劻，榮祿連日寫信商議和事，不能得公使團信任。六月二十七日，電催李鴻章『卽刻起程來京。』七月十三日，任命李鴻章爲議和全權大臣，總署通知使館，請求聯軍停戰。二十日，聯軍入城。義和團，董軍攻使館直到聯軍入城才停止。她一面急切求和，一面催促義和團進攻，顯然她要團民大量死亡才有利於和議的進行。

北堂守兵僅洋槍四十桿，大炮一尊。義和團用掘地道，投石塊，埋地雷，擲火藥罐，放火等方法進攻，死傷極重。二十二日，聯軍陷北京，義和團才敗散。

義和團攻使館和北堂兩處，前後死傷不可計數，至少在萬人以上。這眞是極度的愚昧行動。但愛生惡死任何愚昧人不待教而知，義和團獨違常情，這止有一種解釋，就是帝國主義與滿清政府的極度壓榨，迫使人民願死不願活。

八國聯軍的『文明』行爲

正當義和團運動高漲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大肆叫囂，宣稱『黃種仇視白種』，『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與文明。』其實，中國人何曾仇視白人，也何曾仇視歐洲文化與文明，中國人僅僅仇視外國侵略者及作爲侵略工具的『文化與文明』。試看聯軍表現的『文明』，就證明義和團仇視的那一種外國人，絲毫不曾錯誤，錯誤止在方法太陳舊陳舊也就免不了失敗。

七月初八日，六國聯軍（奧意兩軍尙未到，）約四萬人，自天津沿運河兩岸向北京進發。左岸英美日三國，右岸俄德法三國，行至北倉，被馬玉崑軍、義和團阻擊，血戰多時，馬軍無援敗退。是役聯軍死傷日四百餘人，英一百二十人，俄六百餘人，足見戰鬥非常激烈。十四日，聯軍攻佔楊村，美軍充先鋒，死七十四人，傷一百六十五人，英軍死傷三十二人，俄軍死傷二十六人。宋慶軍大敗逃退。李秉衡率勤王兵，及義和團駐河西務，一戰即潰散。李秉衡臨死時敍宋馬等敗退情形說『軍隊數萬，充塞道路，村莊巨鎭如河西務、張家灣，俱焚掠無遺，小村亦然，馬見賊即退去，晨起請議戰事，則又北去矣；宋則總未得見，頃聞已在通州；兵將如此，豈旦夕之故。』宋馬等軍沿路焚掠，等於替聯軍掃淸道路。通州本是義和團中心之一，聯軍到時已成空城。聯軍進北京後，義和團與旗兵在宮門外聯合抵抗，『華人死傷甚多，街上屍骸枕藉，』聯軍所獲得的勝利實際止是戰勝了手執刀矛的中國人民。

聯軍在京津及所到地區燒毀、慘殺、搶劫、姦淫、不僅義和團絕無類似行爲，就是滿清軍隊程度上也還相差頗遠。下面略舉實例，可以推見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奴隸所施行的『文明』

燒毀例——通州倉米搶掠一空（日軍得米二十五萬包。）城內房屋都被燒毀，較之天津遭禍更烈。

北京城內地安門及西四牌樓一帶均成焦土，前門北至珠市口及崇文門內東交民巷無不被焚。

慘殺例——洋兵至青縣，知縣沈某被殺，分割其肉，屍無完膚。

河東某甲於日昨迎娶，正行拜堂之禮，某洋兵疑女爲紅燈照，男爲『拳匪』用槍一併擊斃。

各村居民在地檢拾柴禾，被洋兵擊斃者不知凡幾。

搶劫例——津城失守之日，西人皆率車往返六七遭，前之不名一錢者，今或數十萬金。西兵出京，每人皆數大袋，大抵皆珍異之物。

自七月間有人將家財重寶藏匿棺中掩埋。被人暗通消息，洋兵大得利市、於是四郊之外及各省會館，義園，幾於無棺不破，拋屍道左。

聯軍三五成羣，向河東及城廟內外一帶舖戶及民居翻箱倒籠，盡其所欲而去。

聯軍赴保時，沿途鄉村皆已搜掠一空。

姦淫例——崇公爵綺眷屬盡爲聯軍所擄，驅逐天壇內，次第輪姦，以爲戲樂，少長老幼無得免者。

倭仁妻年已九十餘，爲某國兵所獲，挫辱備至而死。

聯軍將其所獲婦女不分良賤老少，盡驅諸表背胡同，作爲官妓，任聯軍人等入內遊玩，隨意姦宿（以上各條均見拳匪紀事。）

當時從公使、統兵、將官、兵士、普通外人（少數教士除外）以至翻譯、漢奸、一部份教民都參加了這個『文明』運動，並且影響那些無恥的上流士紳，重價購用洋貨，甚至『西人破帽隻靴，垢衣窮袴，必表出之。矮簷白板，好署洋文用以自附於洋，昂頭自喜。』梁啓超在辛丑年清議報描述當時士大夫風氣的轉變說：『吾聞數月以來，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焉。』滿奴教育的八股科第轉變爲洋奴教育的翻譯通事。這表示洋務派、買辦、一切洋奴從此大抬頭。頑固派力求洋務化，滿清統治階級全部被外國『文明』征服了。

第六節　人民的繼續反抗

聯軍佔領北京，派兵四出攻掠。西太后、光緒帝逃到太原，八月十四日宣布『勦匪』上諭，把

一切責任都推給義和團，說『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爲肇禍之由，』接着說『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勦除不可。直隸義和團蔓延尤甚，着該地方文武嚴行查辦，務絕根株。』統治階級就是這樣殘忍反覆的。當它要利用義和團攻戰時，稱爲『承義民以血肉之軀與槍炮相薄』現在却要『責成帶兵官實力勦辦以清亂源，』作爲向外人乞憐的禮物了。這道上諭頒布以後，西太后調各軍『會勦拳匪。』聯軍路遇清軍，集意槍殺繳械，或擄充奴役，例如九月十一日，『洋兵入固安縣城，搜掠一空，城內所駐攻打拳匪之武衛軍，俱被洋兵捉獲，充當苦力陸續運物回京。』又如九月二十日『聯軍由保定府歸者，途遇華軍，誤傷直隸提督，聞該提督登時斃命。』這些奴隸軍隊不怕當牛馬，却怕躭誤『會勦』。政府竟向聯軍請求『助勦團匪，』李鴻章『傳諭各軍，如與聯軍抗拒，徒增國家之害，因此不准華軍接戰。』在南至直隸中部，西至阜平及西山一帶，東至大沽、山海關，北至赤峯、長城、張家口，方圓數百里內清兵不得准許，不敢私進駐紮，這算是劃分了雙方担任的屠場；事實上，清軍、聯軍逐漸實行互助來屠殺共同的敵人——中國人民。

京津失陷後，那些混入義和團的不良份子都逃散了；各地義和團退入鄉村，不再是幾萬人的大集團而是通常結合數十，數百人的小部隊（有時集合至萬餘人。）對清軍一般採取自衛態度，對聯軍則仍採取進攻姿勢。關於清軍聯合聯軍的無恥鎮壓，略舉幾件事作例：

『日前有四川來之拳匪甚多，行至霸州與駐防該處之津水師營炮船相遇，拳匪以官兵甚少，互相拒

輔，所有炮船均被拳匪打散，兵勇受傷者不計其數。拳匪勢甚猖獗。刻聞各國聯軍已派洋兵三四百名前往該州剿辦」（拳匪紀事載天津來函。）

四川義和團走數千里來作戰，除了爲高度的民族精神所驅使，再沒有其他目的，這樣可敬的愛國行動，却被稱爲「匪勢猖獗」歡迎聯軍代爲報復，足證統治階級是毫無心肝的匪賊。

「署理天津鎮徐總戎，日前在安肅地方率隊與拳匪接仗時，適陝西勤王隊道經是處，拳匪疑係後路，乘其不備，兩下混戰，致統領嚴觀察槍傷左腿，並傷亡馬隊魏管帶一員，各營正副哨官十三名，兵丁共傷七百六十三名。

初二日，該統領帶傷親率所部赴安肅西鄉方勝橋地方與匪復戰，該處防軍亦來助戰，約三時許，匪黨不支，概向保定大道竄去。陣斬匪黨四百餘人。德國馬步軍約數千名，分水陸二路開往保定一帶剿辦拳匪」（天津來函。）

這又是清兵戰敗，聯軍助「剿」的實例。

「河間板家窩地方，拳匪猖獗異常，經聯軍前往剿辦，未能得手。昨又會同呂道生軍門統帶馬步等隊，攻打三四日，乃得將匪首拿獲，送至河間梟示，餘黨盡行誅滅。而呂道生軍門頸下受有槍傷一處，現經法軍延醫療治」（天津來函。）

這一例是清軍替聯軍當獵狗有功，得法軍的憐憫，比其他清軍確遭遇了特殊的榮幸。與呂道生同樣著名兇惡的提督梅東益，某次在滄州『爲聯軍所攻，梅軍門行李（掠得的贓物）悉爲失去，梅軍死者四十三人。』又聯軍途遇某軍統領范廷桂，『范策馬獨前，告以此次偶爾相值，並非對敵云云。英兵不解其語，當將范廷桂槍斃。』又『意大利兵一大隊，在固安縣鄰近某處遇中國步兵三隊，意兵斷之，華兵知抗禦無濟，因不開一槍交呈兵器而降。』這些例證說明清軍在聯軍面前何等卑賤怯懦，但仍竭誠助聯軍殺人。例如『涿州尙有拳匪，法兵到後，若輩卽悉行向南退去。次日，涿州有拳匪頭目首級八具發掛各處示儆。據云，此係華兵所爲。德軍見有華軍若干人，當由德兵殺其一人，餘者悉降。』法兵殺不到一人，清兵却殺了頭目八人，德兵殺清兵一人，清兵立卽投降，這是什麽軍隊呢？這就是適合半殖民地統治階級需要的軍隊。

義和團對聯軍一面自衞一面仍取攻勢，在庚子一整年中，不曾停止過戰鬥，生命財產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但也教訓了帝國主義者認識到『瓜分一事，實爲下策』（瓦德西語）

下列事實若干條，證明義和團不撓不屈的反抗精神沒有被侵略者壓倒，與清政府出賣東三省、喪權、賠款向聯軍搖尾乞憐的醜惡對照來看，不管義和團在思想上如何愚昧陳舊，它的氣魄總是值得贊歎。

抗擊例——有潰兵以黑布纏頭，自稱黑義和團。當聯軍赴保定時，互相奮勇，向半途迎擊，互

有死傷。團匪死者八九百人，聯軍至保定，官吏出城迎接無一逃者』（八月天津來信。）

『九月初二日聯軍在保定西北一帶與拳匪開仗西兵傷損四十六名之多』（北京來函。）

『十月初，聯軍歸約克伯爵管帶前往張家口。西人得津電云，德國統兵官約克伯爵在張家口陣亡（德軍說是被煤氣薰死）是役聯軍前往他處者亦不甚利』（字林西報。）

『離天津三十里之某村，有義和團與某國兵開仗，某國兵幾大敗。後幸法兵救之，始獲勝』（十月天津來信。）

襲擊例——『刻下團匪來攻者日多，前數日曾攻山海關塘沽鐵路、天津至通州陸軍所行之道，亦常爲團匪所擾』（九月北京來電。）

『十月二十五日夜間，該處團匪餘黨糾集多人，襲擊津沽間俄國護路兵隊，後由天津派隊往勦』（北京來信。）

『拳匪多人進攻楊村德人，隨經擊退，死傷頗多』（十月天津來電。）

『有騎馬拳匪多人，前來軍糧城攻擊俄國護路兵，隨經聯軍一隊由天津前往擊退』（十月德文報。）

謀攻京津例——聯軍在內地行軍並不像預期那樣便利，十月初，它宣稱『京津一帶拳匪將次肅清，因此不復遣兵前往各處。』鎮壓義和團的任務主要交付清軍，自己着重守鐵路及京

津兩城。義和團襲擊鐵路並謀攻取京津，當然，攻取京津是空想；但聯軍也頗感不安，不敢輕視這個攻勢。

『刻下拳匪華兵（潰軍）潛行入城者甚多，深恐封口後或有變端』（天津專電。）

『天津城內刻有團匪多人練習拳技，城中居民因恐爲所剩，不敢報明』（京津七月報。）

『大靑縣（譯音）拳匪五百六名，聲言不日即將復攻天津。法德兩國已遣兵往勦』（德文報。）

『保定府法國兵官報稱，鄰近某處拳匪尙多，聲言將克服京津一帶各處』（文滙報。）

『北京四面刻亦不甚安靜，常有團拳匪告示，黏貼城牆』（天津來信。）

『有華人二人，欲炸發東局火藥庫，當火藥庫炸時二人亦轟斃』（天津電。）

『天津華人某君陳請聯軍宜預備一切，以防冬閒或有變動』（天津電。）

義和團是一種落後團體，當然不能有明確的政府思想。十一月初，淸政府接受各國的條件——空前嚴重的條件，義和團被各方面詆譭攻擊，肯定爲一切災禍的主要負責者，羣衆逐漸離散，義和團運動也就逐漸停止。

直隸省以外，各省義和團或其他團體進行各種規模的反抗鬥爭，除自立會，興中會屬於新式起義，庚子一年內，所有舊式起義團體幾乎全部起來有所表現。庚子以後，新式起義團體數量

增加，舊式團體不再有號召力，這也是義和團運動給人民的一種教訓。

各省反教反滿情況簡述如下：

山東省——袁世凱聯合青島德軍竭力鎮壓義和團、大刀會，但仍到處起事，攻破高密、陽信等縣城。北京失陷後，德州地方義和團糾合潰兵共萬餘人，謀攻入山東境，被袁世凱擊敗。義和團分散潛伏，『東省各縣皆有之，直至江蘇徐州宿遷一帶尚有該匪踪跡。』袁世凱的瘋狂屠殺，事實上並不成功。

東三省——沙俄軍隊藉口保護鐵路，侵佔東三省。義和團聯合清軍，焚毀鐵路、教堂，如牛莊城等處，教堂一律被毀無存。清軍潰散後，『拳匪』『馬賊』繼續反抗，

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唐才常自立軍約集會黨起義。

浙江——有白旗黨、百姓教、齋教起事，攻破江山、常山、開化三城。

江西——『各屬會匪、齋匪、土匪起事，江西勤王兵忽接江撫急電，飭令折回赴省防。』

福建——『漳州百姓聚衆拆毀教堂，欲與各洋教士爲難，勢甚洶洶。』

四川——『四川武備學堂肄業生爲會黨牽涉者三十餘人，該省當道密派文武員弁帶兵將學堂圍住，悉行捕斬，脫漏者僅有一名。其湖北調往之領班學生數人亦在其例。』

廣東——『駐滬美總領事得九月十五日駐粵美教士來電云，廣東三合會匪五千人歸二

人統帶，一爲孫文（譯音，）一爲楊某（譯音。）其宗旨與滿人爲難，已收。官兵刻下佔據沙灣。』

雲南——『雲南府亂匪肇事後，凡該處之內地會，聖書會等教堂均被拆毀，法兵現已調至蒙自，亂匪聲言於某日抗拒法兵。滇省法國官民暨教士等均已離開矣。』

陝北——『延安府屬境，突來蒙古人之習拳會者與教爲難。』

義和團運動確把全中國震動起來，各省新舊起義團體到處發動，連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上海租界，『謠言繁興，人心惶惑，無識之徒，紛紛遷徙，自相驚擾』（上海各國總領事告示。）這是說，租界中商民不信租界當局能保護生命財產了。流亡到陝西的清政府，依然荒淫搜括，陝西人民饑餓『致有食人之事』（西安電。）十月，『甘肅省回匪四萬五千人揭竿起事，以逐滿爲宗旨』（字林西報。）『西安回匪業已作亂』（德文報。）這個極度可憎的滿清政府，一面由各省『勤王兵』保護，一面催促李鴻章急速簽訂條約，延續了卑污恥辱的殘命。

第七節　英帝國主義指使下的分裂運動

鴉片戰爭以來，英俄兩大國據南北對立，相持不下。甲午戰爭後，德日兩國勢力伸入中國，英美日爲一夥，俄法德爲一夥，英俄對立形勢愈益尖銳。政治上西太后李鴻章親俄，光緒帝親英，俄佔優勢。經濟上俄在北方雖也不弱，但在全國則居劣勢。舉一八九九年海關貿易爲例，是年海關

所收稅銀按百分比，英商佔三十，美德各佔十三，日商佔十五，華商佔八，瑞典、挪威各佔八，鴉片稅佔四，俄商只佔一分。按東三省地區說，牛莊貿易總數四千八百萬兩。各國商船進口共五百九十五艘，內日船一百九十六，英船一百八十五，華船一百十二，其餘各國八十九，俄船止十三艘。俄對華貿易總數二千二百萬兩，還不及各國對東三省貿易總數的一半，俄處絕對的劣勢。除了商業部份，下表可略見各國在華勢力的比較：

鐵路權		財權		練兵權		租借地及勢力範圍	
(一)東三省鐵路	俄	(一)全國海關稅權	英	(一)江南洋操	德	(一)威海衛	英
(二)蘆漢鐵路	俄	(二)沿江六省釐金權	英	(二)湖北洋操	德	(二)九龍	英
(三)山西鐵路	俄	(三)山東全省礦務權	英德	(三)膠州練土軍	德	(三)長江流域	英
(四)山海關至牛莊鐵路	英	(四)東三省礦務權	俄	(四)東三省洋操	俄	(四)旅順大連	俄
(五)滇緬鐵路	英	(五)華俄銀行	俄	(五)直隸洋操	俄	(五)長城以北	俄
(六)津鎮鐵路	英德	(六)德華銀行	德	(六)海陸軍訓練	英(預約)	(六)膠州灣	德
(七)山東鐵路	德	華俄道勝銀行按條約規定，有管理中國收納租課，鑄造貨幣		(七)威海練土軍	英	(七)廣州灣	法
(八)滇越鐵路	法			(八)福州船政局	法	(八)兩廣雲南	法
						(九)福建	日

（九）北海南寧鐵路　法　類似國庫的特權。德

（十）粵漢鐵路　美（未定）華銀行也有同樣企圖。

全國海關按條約永久請英人任總稅務司，沿江六省（包括浙江）釐金也歸總稅務司管理；御史鄭炳麟奏所謂『我中華財賦全視海關入款，若一失歡心，則餉源立絀』就是說立即制清政府的死命。英人掌握財政權，足夠與沙俄各種優勢相對抗。義和團事起，沙俄攻佔東三省，英國計劃先佔長江兩廣，再與各國爭華北權利。庚子以前，英國報館登載所謂『瓜分中國和平會』章程，主要條款有：（一）每國派會員兩三名，全權處理會事；（二）各國佔領之地，歸各國管轄。應照現時該國商務所銷之多少，及該國權益所關係者，按圖劃分界限；（三）所有中國土地，既為萬國管轄，任由萬國通商（門戶開放，利益均沾。）

庚子年英國進行分裂運動，大體按照這個『和平會』的預定計劃。

長江方面

五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對外宣戰，兩江（劉坤一），兩湖（張之洞）兩廣（李鴻章）互約『凡二十四日以後之上諭概不奉行，』事實上等於以上各省對清政府宣告獨立。西太后要『各督招集義民成團，』劉張說『沿江一帶會匪鹽梟，安慶（清）道友甚多，與拳會各自為黨，名號皆悖逆之語，並無拳會之黨可招。』西太后要『暫行停還洋款；』李劉說『洋款若停，京餉及北上諸軍餉項無從接濟。』西太后要李鴻章迅速來

京李鴻章觀望不行。西太后要劉坤一帶兵援助，劉坤一拒絕北上。李劉敢於違抗西太后，這些胆量的來源當然是英國。

六月初，由劉坤一出面，約請張之洞參加東南「自保」大買辦盛宣懷代表劉張與外國交涉，以「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爲主旨，與各國領事訂立東南保護約款九條，完成了英國的初步計劃。

七月，英國計劃被法國揭發，巴黎報紙表示「法人甚恐中國從此分裂，再越一二月各國必因此紛爭，自相殘害。法人謂英國之意，甚願南北分辦，似有意以南京爲東南數省之都城。如果實有其事，法國爲自保起見，亦不能不有事於滇粵。」英國原想通過康有爲使自立軍起事，宣布東南「獨立」，選擇張劉中一人爲東南「獨立」的政府首領。經法德（德國所擬議和條款，其中一條是「仍宜以北京爲都，南京過於迫海不可用」）等國反對，放棄東南「獨立」的計劃，借給張之洞英金七萬五千磅（合銀五十萬兩，）專供湖北軍費，唐才常自立軍總部失去英租界的保護，被張之洞破壞。自立軍失敗，表示長江分裂運動的中止。

廣東方面

英國計劃在兩廣設一「獨立」政府，香港議政局議員英籍華人何啓事先取得港督卜氏的同意，與香港興中會員陳少白密商，主張「革命黨與粵督李鴻章聯合救國，由李首向政府宣告兩廣自主，而總理（孫中山）率黨員佐之」（馮

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陳少白使人約請『李鴻章幕下的要人劉學詢（特務兼買辦的洋務派）從中力助他甚以爲然，答應相助』（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何啓擬定上香港總督書英文稿，由興中會全體會員署名，送給總督，當然港督『極表同情，因向李鴻章再三接洽。』李鴻章『對卜氏提議，頗表示好感。』劉學詢寫信給孫中山說：『粵督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爲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孫中山偕楊衢雲，日人宮崎等到香港，劉學詢派安瀾兵輪在港等候，專邀孫楊二首領過船開會。這是特務們的毒計，不管兩廣是否『獨立，』先捕獲革命黨首領總是一件『奇功。』孫中山得興中會員報告，拒絕往廣州。李鴻章深信沙俄定能保護西太后，在一度動搖以後，決心北上。七月初，離粵到上海，觀望形勢。路過香港時，港督竭力勸告，『使與民黨合作，據粵自主。』李鴻章『意志堅決，無法勸阻。』英國分裂計劃遭受挫折。

英對興中會似乎興趣更濃，因爲興中會提供的條件比自立會優厚。摘要比較如下：

興中會平治章程六則（何啓起草）	自立會對外宣言（容閎起草）
（一）遷都於適中之地（如南京漢口）	復起光緒帝，立二十世紀最文明之政治模範，以立憲
（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各省立一自治政府。設立議會，以駐京公使爲中央議會暫	自由之政治權與之人民。保全中國自立之權。

時顧問局員，以目前各國之總領事爲各
省議會暫時顧問局員。

（三）公權利於天下。　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財產，保護租界，勿驚動教堂。

（四）增添文武官秘俸。

（五）平其政刑。　所有滿國專制法律，建設文明政府後一概廢除。

（六）變科舉爲專門之學。

英國分裂計劃遭各國反對，傀儡政府又不易成立。它改變政策，主張『保全中國，』恢復光緒帝大權，力行新政，令西太后退位，不再預國政。沙俄主張『恢復舊政府而略加改革，』這就是支持西太后政權，取東三省作報酬。英俄在這一不同主張上對立起來。北京失陷以前，英俄都主張分割中國，北京失陷以後，英倡『保全』俄倡分割。美日助英，法德助俄，八月英德又聯合反俄，才取得妥協成立辛丑條約。

第八節　帝國主義間分贓鬥爭

甲午戰爭的經驗，列強相信只要近代軍隊一萬，就可橫行於整個中國。中國民衆在不可忍受的滿清統治下依然馴服不動，這又使列強相信儘管暢所欲爲，決不致引起抗議或仇恨的事

情出來。他們以爲瓜分一個『東方病夫』的財產，是不會引起反抗的。戊戌變法失敗以後，瓜分中國論在國際間特別盛行，强盜們止感到一點困難，卽如何分配贓物。英國某大臣在議院宣稱：『我歐洲諸國，對東方之事，常互相猜忌，如此則徒躭誤時日，坐失事機。爲今日之計，必歐洲人各泯猜嫌，各商善法，然後亞洲乃可以落吾手。』瓜分中國和平會章程的發表，顯示英政府企圖用『和平協商』的方法來瓜分中國。這自然是一種空想，因爲英國想從『和平協商』中取得中國三分之二的利權。

義和團運動爆發了，强盜們認爲機會到來，藉口『援助中國政府鎭壓叛徒，』實行軍事進攻。從準備進攻大沽口到攻陷北京，英國利用『討代叛徒』名義，組織了各國在直隸省的共同行動；同時在中國中南部利用『反滿』（南部）『反舊政府』（中部）名義，進行着分裂陰謀。別有企圖的沙俄也不得不參加西摩爾統率的聯軍。這一時期中，英國儼然是瓜分中國的領導者。北京失陷以後，軍事、外交方面各國間都表現出意見的分歧和利益的不同。那短時期的共同行動已經過去，暫時隱伏的敵對現象又復重現，每個國家都想用自己的方法達到自己的目的。法國外交部長宣言：『如欲中國兵事早息，各大國必須各無嫌猜，會同辦理；無論各國所懷之意如何，總不可向中國有所他求（割地）如是則歐洲和局可保』（八月初六日巴黎電。）分贓不均有引起各國間戰爭的危險，阻礙了瓜分計劃的實現。不過這止是次要的原因，侵略者並

不畏懼戰爭，瓜分殖民地本來是用戰爭方法解決的。阻止瓜分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人民的反抗，侵略者從來不曾預想到會有這樣的反抗。

各國不可解決的矛盾簡述於下：

英國——確實保持既得的權利並增進政治和商業的地位，不讓沙俄在中國北部擴充勢力，也不願法國進據雲南，日本佔領福建。對清政府主張扶帝斥后。它要壟斷長江流域，遭各國全體反對，『認爲勢難坐視』（瓦德西語。）

沙俄——企圖獨佔東三省。暗中允許援助西太后，高唱着『寬大政策』『溫和手段』來減輕英德對清政府的報復。它不願西方列強利用條約攫取中國的財政管理權或增加通商的範圍或改變頑固派的政治制度。它的獨佔東三省，遭各國全體反對，認爲必須『退還中國。』

德國——德國利用克林德事件，主張極端的強硬政策，就是說，要瓜分中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起程東來前兩個星期，常到柏林外交部參閱有關中國的文件，藉以瞭解中國的形勢。他在筆記中曾說：『我國對華政策，除懲儆華人外，並無預定之目標。德國誠有瓜分中國之渺茫的觀念，然其主要目的，實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一顯身手，初不計其結果如何。』因爲它的野心被事實阻止，閏八月二十三日，英德簽訂協定，相約不在中國獲得領土利益，維持中國領土不變更。英德協定成立後，奧、法、義、日、俄、美六國先後表示贊同，列強間衝突才開始和緩起來。

法國——法國雖然是沙俄的聯盟，但是對於反對英國擴充商業利益及反對改變中國政治組織兩點，贊助俄國。至於懲罰禍首及要求擔保等事，與沙俄相反，主張嚴厲的處置。

日本——日本早想乘機派遣多數軍隊，在聯軍中爭取重要地位。西摩爾聯軍被團敗退，北京使館形勢迫切，英國請日本出兵，並願『為財政上之補助。』日本出兵二萬五千人，任聯軍主力，戰鬥十分出力；它是後起的強國，有吞併中國的野心。不願德佔山東，認為『危險萬分』也不願俄佔東三省，認為必須武力排除。因此反對瓜分，對清政府表示和協態度，藉以換取清政府的好感。

美國——庚子以後，美國成為對華主要侵略國之一。原因是，美國在東亞獲得商業軍事根據地，美國與西班牙開戰中奪得西屬殖民地菲律賓羣島。它在遠東第一次獲得領土，基礎不固，參加瓜分中國運動，對本身不利，因此它反對瓜分。一八九九年，國務卿海約翰宣佈所謂『門戶開放』政策，這個政策一面要列強開放在華租借地以及所謂『勢力範圍』使美國享有均等的利益與機會。另一方面要中國內地全部開放，使外國人享有投資權利。中國是喪失治外法權的半殖民地國家，凡外人所到的地方，侵略勢力隨之到來，如果『門戶開放』政策徹底實現，中國就完全變成殖民地。英國首先贊同，德、俄、法、日、義五國先後願意接受，美國後此成為以經濟侵略作主要手段的對華侵略國。

對鎮壓義和團，美國特別積極。當時它正在瘋狂屠殺菲島『叛亂者』，引起一部份輿論界的批評。它利用故意誇大的關於義和團方面駭人的報告，在報紙上大事宣傳，藉以說明美國對於菲律賓的『叛亂』應嚴加壓制，否則菲律賓也將產生可怕的義和團。因為它對中國抱着『門戶開放』的野心，堅決反對瓜分，希望締結一種和約，能擴充商業企圖的機會及改進中國對外交涉的外交機關（即改互相推諉的總理衙門為部長負責的外交部）；關於懲辦禍首，賠款保證等問題，它贊成俄日的『寬大政策』『溫和手段』，就是說，不反對西太后的頑固政府。

奧義西荷比五國——奧地利、義大利兩國追隨德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三國追隨法國，在聯軍中不起什麼作用。

以英俄為首的兩個侵略集團，借義和團事件，各謀實現自己的野心。但各國利害關係如此複雜，不可能求得一致。從『瓜分中國』轉到『保全中國』，中間經過三個鬥爭時期：（一）英俄主張瓜分，雙方爭奪清政府；（二）英俄爭與國，英德成立協定；（三）英德日在斥后扶帝問題上對俄美法讓步。

英俄主張瓜分（庚子年三月初至八月初旬）

三月初，直隸義和團聲勢漸盛，英美聯合德法俄要求清政府『一律剿除』。

五月初，各國派兵進京保護使館，英俄各調大兵準備行動。俄調兵便利，聲稱準備保護蘆漢鐵路，又通知清政府『貴國願藉客兵以平禍亂，敝國願承斯之』這都

是反對英國的表示。日公使照會清政府『如許俄國調大隊兵士進京，則日本調兵進京之數自必照加一倍。』俄獨佔華北計劃被阻止。大沽口失陷後，英俄兩集團矛盾更顯著。俄國允許暗中阻止聯軍進京，淸政府允許增進俄國在北方的地位。聯軍攻天津，俄軍藉口英軍供給日軍糧餉，宣稱準備撤退；佔領津榆鐵路，自稱願修理軌道，五天還修不到一里。聯軍進攻北京，俄法德軍自走一路。北倉大戰，俄法兵戰後才到，說是路被水淹，不便行走。俄國計劃關內主緩進，使聯軍停頓在京津路上，關外主急進，用最殘暴的屠殺手段奪取東三省。同時英國在中部，南部製造獨立政府，對京津戰事主急進，以便成立光緒帝當權的親英政府。北京失陷後，英俄德繼續增調海陸大軍，日本配備精兵四萬五千人聲援英國，軍事上英國較佔優勢。

英俄爭與國（八月中旬至八月底）

八月初，俄法承認德將瓦德西爲聯軍統帥，俄法德聯合，擠退原來的統帥英將西摩爾。八月中旬，俄國通告美國說：『中國皇太后已願保護各國商務利益，並設法平定土匪，使地方永遠平靖。』又聲明『本國並無向中國索地之意。』美國同意俄國撤退北京駐軍及承認李鴻章爲議和大臣的提議，法國也聲稱同意撤兵，外交上俄國獲得優勢。英國反對撤兵，宣言『即使他國退兵，吾英必須留兵北京。』瓦德西率陸軍二萬二千人，戰艦九萬噸來華，原想大有所獲，當然反對撤兵；這樣，英德意見接近了。當時各國爭執的問題，形式上是先撤兵後議和（俄美主張，）與先議和後撤兵（英德主張，）實際是選擇自己合意

的傀儡——西太后或光緒帝。閏八月下旬，英德簽訂協定。俄法聲稱加派『頭等鐵甲戰艦三十艘來華防禦，』說明外交上英國獲得勝利。

英德日鬪俄美法讓步（九月初至十月底）

李鴻章自上海到天津，清政府指定乘俄國兵船，到京後，寓所由俄兵保衛。當時所謂議和，實際是議懲罰禍首西太后的問題。其他條件止要各國提出，清政府一律接受，決無異議。英德日主張『須俟中國立有合例政府方可開議。』就是說，不承認禍首西太后的政府及其所派議和大臣為合法。俄美法『認皇太后為合例。』賣國賊李鴻章祕密出賣東三省，請俄國主張『兩宮仍舊臨朝。』英日決心準備另一戰爭去解決東三省問題（英日同盟與日俄戰爭）對西太后問題讓步，藉以換取隨意開列的條件，即所謂『不能換回的條件。』十一月初一日公使團提出議和大綱十二條，西太后接到這個免罪赦書，立即『全行照允，』她的統治地位，重新得到保證，從此一意安心充當『尼適諸國之意妥辦』的奴隸總管。

第九節　辛丑條約與東三省交涉

西太后依然執政，引起全國維新派人士（包括保皇黨）大憤恨。這一派人原想英德日主張獲勝，『光緒皇上復辟，』中國再行新政。議和大綱發表以後，這一派人失望了。西太后要和緩

這種不滿情緒（也是對外國表示態度，）二月初十日，下了一道預約變法的上諭。她首先肯定變法的性質說：『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絃。』這就是專制制度萬古不變，不抵觸專制制度的舊法可以變通。其次她教奴才們議變法，『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着內外文武大官『各舉所知，各抒所見。』戊戌新政最重要的『民權』她卻說是『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其禍更甚於紅拳。』這道醜惡的上諭確也誘惑了不少維新派。二十六日又下一道所謂罪己詔，對洋務派『新政』予以斥責，說：『各省平時無不以自強爲辭，究之臨事張皇，一無可恃。近二十年來，每一次釁端，必申一番告誡。臥薪嘗膽，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以後，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洋務派『新政』久被維新人士攻擊，公認爲蠹國殃民的弊政，經罪己詔明白斥責，又誘起不少維新派的幻想，以爲這次變法，總在戊戌變法與洋務派『新政』之間，不滿情緒漸變爲善意的盼望。西太后對外賣國，對內欺騙雙方成功，順利的恢復了統治地位。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七月李鴻章代表滿清政府與德奧比西美法英義日荷俄十一國公使簽訂辛丑條約十二條。依據這個條約，中國半殖民地程度又大進一步。第一，財政經濟大破

壞。賠款按中國人口數每人罰銀一兩，計四萬萬五千萬兩，四釐起息，分三十九年本息還清，（一九四〇年）共計九萬萬八千餘萬兩。鎊虧（銀兩換外幣的虧折）平均每年約三百萬兩。當時海關稅每年約收二千數百萬兩，除海關費，駐外使館費等四百萬兩，餘款二千數百萬兩僅敷舊外債抵償。此次驟增新債，公使團指定海關稅、內地關稅、鹽稅三項充償金來源，遠不足應繳銀數。清政府強迫各省每年攤派二千數百萬兩（最貧瘠的貴州省也攤派二十萬兩）才勉強足數（不足時借外債彌補）。國內所有重要稅收（除田賦）全被外人管理，清政府不得不另立捐稅來填補已失的財源。這樣巨大的負担全部加在從事生產的農工肩上，自然人民生活愈益窮困，社會經濟愈益凋敝。第二，確定中國政府的性質與任務。條約規定：『永禁創設或加入與諸國仇敵之會，違者皆斬。諸國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文武大小各官，倘遇有傷害外人之事，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該員即行革職，永不敍用。』明白一點說，就是中國人民被認爲奴隸，永遠不得反抗侵略者，中國政府及其官吏被用作大小奴隸管理員，負完全責任替侵略者彈壓人民的反抗行爲。第三，國家主權的喪失。使館界內由使館自行防守管理，從北京到山海關，沿鐵路重要地區，外國派兵駐守，拆毁大沽砲台。北京城內由外兵駐紮監視，這還像一個國家不像呢？不是人民努力反抗，中國早被那些奴隸管理員斷送乾淨了。

七月，辛丑條約簽字，列強完全滿意。八月，聯軍自直隸境內撤退。流亡在西安的西太后也完

全滿意，又回到北京來繼續其腐敗的統治。

庚子七月，她挾着光緒帝帶領一大羣貴族、官員、太監、軍隊逃出北京，經山西逃入陝西。凡是這一羣所到的地方，人民無不遭殃，比任何盜匪都兇惡，因爲他們都是『合法』的盜匪，用各種方法向人民掠奪。

軍隊——西太后帶京旗兵，馬玉崑兵二千餘人出逃。沿路搶掠，『各舖戶均閉門逃遁，到處均無從購物』（兩宮西狩記）後來軍隊增加，作惡更大，『官軍任意剽掠，沿途搶奪婦女，拔隊時隨意留遺至數百人之多』（十一月上諭）；『兵勇佔住民房，諸多騷擾，以至商旅裹足，糧食日昂』（十月上諭）。僅據這些自供，人民受禍程度可以想見。

官員——大批官員，到西安當差，沿途勒索酒食錢財。例如河南地方，『餉差貢差以及官眷過境，類皆需索酒食車馬舍館供應之外，又折價銀，甚且毆打辦差家人』（九月上諭。）

貴族——王爵每日給津貼銀六十兩，依次遞減。這些人毫無所事，政府大修戲園，召北京名角演劇，讓貴族官員『娛樂如太平時。』

太監——『西安情形異常混亂，賞罰黜陟之權，太監李蓮英實主之』（字林西報）各省貢物仍照舊索取規費，多或三千數百兩（如浙江貢費）少或一千六百兩（如湖北貢費），否則退還貢物。商店『最怕太監買貨，不肯給錢。』凡與西太后有關的大小事件，承辦人必須送太

監『宮門費』，例如西太后每晨要吃燕菜一碗，地方官每天送宮門費三百兩才收受這碗燕菜。這一大羣盜匪的總魁首自然是西太后，她沿途看戲作樂，到西安每天看戲。令各省進貢名貴食物，每天膳費仍照支二百餘兩，還說是『可謂省用』。養乳牛六頭，每月飼養費二百餘兩。她一大羣盜匪害得陝西『人相食』，甘肅回民起義，『逐滿』，他們才感到不安，密電鄂督張之洞：『陝西奇荒，兩宮萬難駐蹕，擬暫幸湖北。』這個專標『三綱五常』教人的張之洞，居然表示拒絕。他們想到四川去，又被川督奎某拒絕。榮祿電李鴻章『兩宮目下所處之境甚苦，務須仰體上意，早安大局。』西太后盼望李鴻章賣國成功，如飢如渴。她說『我一日不見京電，便覺無措，然每見一電，喜少驚多，心實胆怯。』公使團提出議和大綱，這才使一羣盜匪大喜，專等聯軍撤退後回據老巢。

辛丑年八月，西太后帶行李車三千輛，出潼關經河南直隸回北京。到開封辦了一次『萬壽慶典，』又收得無數貢品。她經過的道路，全用發光的黃土鋪平，極其細軟，大隊人馬走着不聞脚步聲。鋪路費每一英里需一千英鎊。地方官勒令沿路人民用毛帚刷路，不許黃土中有一小石塊。大路兩邊結綵掛燈，設立香案，陳列糖果細餅，供盜匪們任意取食。她進宮第一件事就是發掘逃走前埋藏的金玉寶器，果然並未喪失，奴才們跪下碰頭對她賀喜。她的統治地位因辛丑條約得到保證，『大修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兩，歌舞無休日。』凡外人有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國

公使夫人，不時入宮獻會，與聞內政。』半殖民地政府應如何替侵略國服務，她現在完全學會了。

與聯軍侵略同時，沙俄佔領東三省。庚子八月黑龍江吉林失陷。閏八月，俄軍入瀋陽。中俄進行交陟，商談實際出賣東三省的條約。各國阻止清政府簽約，日本尤堅決反對。劉坤一，張之洞聯名勸政府聯英日拒俄。李鴻章力主簽約，說『各國私議，全係日本從中唆弄，劉張素暱英日，易爲日本所動』（辛丑正月電奏）他公然攻擊劉張是英日派，足見賣國情急，不惜揭露政敵的面目來達到親俄派的目的。二月，俄提出最後約稿，限期畫押，不准更改一字。日英德美及劉張極力阻簽，西太后電令駐俄公使楊儒『全權定計，朝廷不爲遙制。』李鴻章電令楊儒『即酌量畫押，勿誤。』『即畫押勿誤』是西太后李鴻章的眞意，『全權定計』『酌量』是日後推卸責任的詭謀。楊儒不敢負賣國重責，堅持非奉確旨不畫押。清政府在北京公使團壓力下，通知各公使『中國不敢遽允俄約畫押，請先議公約』（辛丑條約）。俄約拒簽後，李鴻章仍許俄公使『候公約定後再畫押』，決心出賣東三省。但各國是不允許的，政敵張之洞大肆攻擊，說『若仍允畫押，則是貽笑外人，前功盡棄，各國必怒，起而效尤。』盡量揭露他的罪惡。這個七十八歲的老賣國賊『憂鬱焦急，肝疾增劇，時有惱怒，或如病狂。』九月，吐血斃命。臨死時，他向西太后保薦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賣國衣缽傳授有人，老賊死了等於不死。

第十節　帝國主義者認識了中國人民

義和團運動是落後的中國社會產物，它不能提出進步口號，是很自然的。但是同樣的運動不產生於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產生於中國，表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反抗精神，使高談瓜分的帝國主義者不得不認識『中國羣衆含有無限蓬勃生氣。』『近年以來，瓜分中國之事，爲世界各國報紙最喜討論之題目』（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運動以後，各國報紙再不喜討論這個『題目』爲什麽呢？因爲『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爲下策』（瓦德西對海辣特訪員談話）義和團『滅洋』戰鬥是慘敗了，義和團運動却阻止了各侵略國的瓜分運動，這一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橫行不法的教士、教民，受了義和團運動的教訓，改變蠻橫的態度，從此教案減少，民教逐漸相安。英外相在英國傳教會演說：『外務部深不愜意於傳教之人。此次中國之事，確係傳教者所致。我勸諸君以後傳教，不必過於踴躍，總以謹慎爲主。』印度總督古爾遜也說：『按一八九〇年傳教之男女共一千三百人，而華人之從教者僅三萬七千三百人。計一教士得三十徒耳。以中國戶口總計之，僅一萬人得一人，經營五十年而所得止此數，事之無益，從可之矣。』（教士論）他勸英美教會『愼選教士，』勸教士『自愛以防後患，』說明侵略者不再利用傳教作明目張膽

的工具，教堂也不敢濫收教徒，向平民故意尋釁。

各國統治人士對中國人民有了新認識，因之改變舊的侵略方法，提出各種新法來。

英外部副大臣在議院演說：『中國此後仍須以華人治華地，凡有意開通中國之人，應須小心謹愼，團匪之事即可取以爲鑒。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國也。』

與京某報說：『近日中國北方之事，實因歐洲各國往往無理干預。惟戕害洋人身家性命，理應各國合力勦捕；所慮者今日平之，明日復起，則又將奈何。計惟有以西學教華人，與我洋人無異，然後可望太平耳。各國其愼思所以待華人之法，勿仍蹈前四十年之所爲。』

法議員在國會演說：『中國地方廣闊，民氣堅勁，殊非印度、南洋各處可比。華人久受政府壓抑，故智力莫顯，若從而撥動之，誰敢謂亞洲堂堂之大國無華盛頓其人者起。吾故謂瓜分之說，不啻夢囈也。爲吾西人計，莫善於廣索礦山及開通口岸兩端。』

以上三點，一致放棄舊的武力壓迫，改爲以華治華、文化、經濟侵略等新法。英國侵華的重要代理人赫德著中國實測論，發揮以華治華說，尤爲透澈。摘錄於下：

今次中國之問題，當以何者爲基礎而成和議乎？大率不外三策：一曰分割其國土，二曰變更其皇統，三曰扶植滿洲政府是也。然變更皇統之策，終難實行，因今日中國無一人有君臨全國之資望；若强由此策，則騷擾相續，迄無寧歲耳。策之最易行者，莫如扶植滿淸朝廷。而驟然扶植之，則亦不能絕後來之禍根。故論中國最

終之處分，則瓜分之事實無所逃避，而無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行於今日。蓋中國人數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夢將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强中國拒外人爲目的者也。雖此次初起，無人才，無器械，一敗塗地，然其始羽檄一飛，四方響應，非無故矣。自今以往，此種精神必更深入人心，瀰漫全國。他日必有義和團之子孫，藉格林之炮，毛瑟之槍，以行今日義和團未完之志者。故爲今之計，列國當以瓜分爲最後之一定目的。而現時當一面設法，順中國人之感情，使之漸忘其軍事思想，而傾服於我歐人。如是則所謂「黃禍」者，可以烟消燼滅矣。（飲冰室辛丑集）

赫德居留中國數十年，深通中國國情。他看出義和團反抗精神的危險，但又看出中國人正統思想（惰性）的弱點大可利用，因此選定「扶植滿洲政府」爲治華上策。別一深通中國國情的美教士丁韙良（北京同文館總教習），擬條陳五條，送公使團核覽：（一）使皇上復辟，歸各國協同照料；（二）廢除皇太后之政令及其所用人員；（三）皇上復辟後所有新政，須各國許可，然後可行；（四）各國可將其分界分別清楚（勢力範圍），每國應派一人管理各省政府所爲之事？（五）各國宜設一公會，凡與各國利權有礙者可剷除之。他在說明中指出「中國不可使一概自主，以上數節可使中國不亂而使利新政，且得智慧華人之助。否則惟有廢去大清政府而瓜分之耳。此事一辦，則後來戰爭之日無已時矣。如按照吾言行之，各國則得以時使其政策合用，而中國之法亦可漸變，其所得者較瓜分爲多也。再治中國須以華人，無他術也」（登載京津七日報。）

公使團採納赫德、丁韙良的意見，技巧的運用到議和條約裏，第一，保存一般人認爲正統朝代的滿洲政府；第二，扶植封建專制制度；第三，公使團允任實際的各國『公會』。英德日放棄『光緒復辟』的主張，同意俄美法的『兩宮仍舊臨朝』，因爲前者認識到西太后比光緒帝更適合於外國的使用，光緒帝多少傾向『民權』的。

最瞭解中國情況的要推赫德，他在給德皇信裏很明白的解答了瓜分問題。他說：

「所有上流階級，對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直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當然還有奴顏婢膝的媚外部份。）至於官吏人員，則爲腐敗之氣所充塞，毫無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向，則又似乎不能再行產生振作有爲之人物。」

整個統治階級腐敗不堪，侵略者看得如此眞切，瓜分論的根據就在於此。但在義和團運動中，他們又發見了另一方面，他說：

「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能忘去者，即中國領土之內，除開西北兩面之屬國不計外，共有人口四萬萬，均係屬於一個種族，並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復不能忘去者，即吾人對於中國羣衆，不能視爲已成衰弱或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尙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至於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尙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

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彼等之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大部份甚至於并火器而無之（義和團失

敗是由於愚昧落後，武器不是主要原因。）

偉大團結的民族思想，生氣蓬勃的農工群衆，勇敢堅韌的反抗精神；這些，他們以前都不曾仔細考量過，瓜分論必須停止的原因就在於此。那末，帝國主義者怎樣進行侵略呢？瓦德西建議兩種方法：

第一，着重經濟侵略。理由是『扶助中國，使其經濟發展，國力增強，而吾人商業關係，當然亦將隨之而進步。至於併吞土地一事，與其謂爲促進商業，則毋寧謂爲阻礙商業。』這裏所謂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當然是發展侵略者的經濟，增強侵略者的國力，到一定時期，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來解決中國問題。

第二，阻止中國進步。利用中國人民覺悟程度低下，遵守反動統治之法，甘受專制政府之治，永久沉溺在奴隸生活中。他引證一個中國老人的宣言說：『我們自四百年以來，皆在睡夢之中，但其間我們深覺安適無已。你們白人，必須促我們醒覺，則將來終有一日，你們對於此舉深爲扼腕。』他同意這個老人的話，斷言『助中國發達是完全錯誤之政策。』

外國侵略的深入與人民覺悟的提高是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國歷史在這個矛盾中繼續演下去。義和團運動教訓了中國人民，拋棄舊式的起義，轉向自覺的民主運動。（第一分册終）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漢奸劊子手曾國藩

滿清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滿漢平分，實際上主要權力均在滿員之手。地方政權——各省督撫滿員常佔十之六七；總之，滿員掌握軍政大權。例如鴉片戰爭時，首席軍機大臣是穆彰阿；沿海各省直隸總督琦善，山東巡撫託渾布，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閩浙總督（駐福州）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林則徐，就中除林鄧二人，全是滿員。帶兵大員奕山、經奕，議和大員耆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滿員。這些滿員都是昏瞶貪污，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愛護的心理，而如林則徐鄧廷楨這樣的漢員，又為滿員所壓迫嫉視，不但沒有決定的權力，而且還要加以誤國病民的罪名，充軍到新疆去。

但是，這種情形，到曾國藩時代起了一個變化。曾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太平軍起義，人民響應，聲勢蓬勃。以咸豐帝為首的滿族統治集團驚惶失措，束手無策。咸豐帝首先向程朱道學求救，令儒臣獻上朱熹「大學講義」，又編呈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四篇講義。他親自到孔廟行禮，召集滿漢百官聽他講中庸致中和一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尙書四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從這些講題看來，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無『德』『惠』了。但空談是無補的，他轉向奴才們求助，大罵羣臣道：『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又說：『爾等甘爲大淸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樣痛罵，還是無濟的。他再向士子們討好，斬舞弊主考柏葰（滿族大學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場積弊極深，並不能『爲士林維持風氣。』他灰心失望，索性懶管政務，專玩女色，寵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閱奏章，嬖臣肅順替他找美女，同時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熱河發痨病死了。

曾國藩就在這個時候，由於肅順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滿淸統治者壓迫屠殺人民的急先鋒。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裏最有『政治頭腦』的，他們知道了挽救滿淸的統治不能依靠滿人而要依靠漢奸。肅順公開宣稱：『滿族沒有一個人中用，國家有大事，非重用漢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曾國藩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武昌，咸豐帝得報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說：『不圖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殊勳。』漢軍機祁寯藻諂媚道：『曾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咸豐帝被他提醒，臉色變了，半天轉不過氣來。從此他堅守慣例，不敢信任曾國藩，專指望向榮（江南大營）、琦善、托明阿、德興阿（江

北大營、）和春（兼統江南北兩大營）這些滿族將領的勝利，雖然他們的所謂大營也還是專靠張國樑一人支持。曾國藩這時候還得掌握一部分兵權，這就全靠肅順的竭力保薦。一八六〇年，即咸豐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張國樑被李秀成擊潰，滿軍軍勢大衰，只得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以挽危局。咸豐帝死後，那拉氏親自執政，她馬上改變政策，給曾國藩兩江總督節制蘇皖贛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讓他充分發揮漢奸作用。

曾國藩從此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厲行所謂『安內攘外』，終於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燄淹沒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國藩的這個『事業』，使他成為百年來一切出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一個富農家的子弟，道光十八年他應科舉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到侍郎。他從滿人倭仁、湖南人唐鑑講習程朱道學，又被與乾隆時和珅並稱滿清二大奸相的另一道學老師穆彰阿認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密保，因此升官特別快。曾國藩既然一開始就是穆彰阿的私黨，又是號稱理學大師倭仁（官至首席大學士，為西太后所尊重）的講學後輩，故與滿洲貴族有親密的關係；他的前輩唐鑑在湖南聲望也很高，學徒衆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資格，這些對他後來的『飛黃騰達』都是有力的條件。曾國藩學得道學的虛偽，卻不曾受束縛於道學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經學家）當面責備他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曾國藩說『我生平以誠

自信，』專標一個誠字來用人、辦事；左宗棠與他因派別衝突，結成深仇，就專標一個僞字來揭穿他。事實上虛僞和殘忍是結合在一起的，虛僞乃是殘忍的一方面，這兩方面正是曾國藩這個反動派代表者的特點。沒有虛僞就不能表現他反對革命的眞誠。

當時的滿淸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汚，外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爲隱諱的。連曾國藩這樣一個『誠實』走狗，也不能不承認滿淸『錢糧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於盜賊；寃獄太多，民氣難伸』（咸豐元年備陳民間疾苦疏。）「外面完全，中已潰爛」（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這樣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麽？曾國藩却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與曾同時的容閎估計約二千五百萬人死在戰爭中，）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淸政府，除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漢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羣賊匪爲什麽必需這樣做的原因。

曾國藩深研程朱道學，熟悉淸朝政制，當京官時已顯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於一般官僚。帶兵以後，雖不斷受了革命方面的打擊，但反革命意志却極堅決，自稱能在受挫受辱的時候，咬牙立志，毫不氣餒；愈是軍事棘手，衆議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後來一切反動統治階級崇奉這個『曾文正公』作模範、作祖師，認他『是我國舊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動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把他的漢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協的

外交路線，當作統治人民與麻醉青年的經典，完全是有理由的。可惜他們不懂得曾國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領，只能暫時摧殘太平天國一類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拿到今天來破壞久經鍛鍊的中國人民的抗戰民主事業，就決無成功的可能了。

曾國藩的活動與滿清這一時期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從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一）辦團練；（二）與太平軍相持；（三）戰勝太平軍；（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各種分裂表面化。

第一節　辦團練（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四年）

太平軍在廣西永安時不超過一萬人（上帝會員、老兄弟）入湖南後，因湖南天地會員的加入，人數大增，首領衡山人洪大全，曾與洪秀全同稱萬歲。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死後，天地會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響本地會黨起事。他們股小而多，力量微弱，這就給當地官紳辦團練來對付他們的機會。

團練一方面保護地主官紳的財產，一方面也使他們藉以魚肉鄉民，斂財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暫時武裝，沒有出縣作戰的意圖，更說不到出省作戰。從保甲團練以至編成正式軍隊轉戰全國，這是由於當時滿洲反革命軍隊的腐敗無能，而一切反革命派——從滿清皇帝到各種大小

漢奸——却都要求有一個反革命勁旅來和太平天國作戰所促成的。曾國藩所以能夠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就正因爲湖南當時是處在革命與反革命衝突的要衝；同時他與滿人關係親密，善講滿淸統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學，有堅決反革命的決心和手腕，這幾個條件也幫助了他。咸豐二年，曾國藩喪母在家，咸豐帝叫他幫助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任務只是『搜查土匪。』次年正月，他到長沙辦事，首先區別了團與練。他所說的團就是保甲，選擇所謂『公正紳士』（事實上是最兇惡的紳士）當團紳，在本地淸查戶口，捕捉「匪人」（主要是當時的革命份子；）他所說的練則是訓練鄉兵，集中縣城，隨時出動鎮壓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辦團，不重在辦練。凡是紳士族長來請辦團，就發給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使有約束鄉族，放手辦事的權力。辦練必需地方官主持，兵數不求多（約四五十人，）更不求各縣都練。實際上却是授權反革命紳士普遍辦團，自己在省城募勇辦練，不讓地方官紳辦練斂錢，既免分他的兵權，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說他辦的是官勇不是團丁，足見他開始就有以官勇（臨時招募）代官兵（綠營兵）出省作戰的野心，不過形式上採取所謂保鄉自衛，藉以減輕、避免各方面的阻礙（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視、排斥，鄰省的求援，咸豐帝的嚴令出戰，新兵的不願離鄉土，）並藉以實現他的訓練不完成、準備不充分、決不出省境的主張。

曾國藩辦團的方針是大張紳權，在省城設『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卽殺死，禁

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他竭力提倡團紳捕人，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他那種瘋狂的屠殺，連巡撫司道等大官也看得太無人理，與他爲難（主要是反對他越職侵權；）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險境，大家叫他『曾剃頭，』形容他殺人像剃頭髮那樣多。他感覺到公論不容，給咸豐帝上了一個奏章，說『臣身雖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豐帝大加褒奬，鼓勵他『務期根株淨盡，』巡撫們也就不敢公然對立了。這樣，曾國藩成爲湖南強豪劣紳的首領，同時也得排除某些阻礙，進一步完成他的辦練計劃。

曾國藩辦練的方針是封建團結。練勇與將領全用湘鄉人（湘軍、湘勇由此得名，）練勇招募落後的農民充當以便制馭，將領選取至親、密友，以及秀才、童生，這些人多是羅澤南（與曾國藩同學也講程朱道學）的學徒，平時講究所謂『忠誠，』聲稱願爲保衛『聖道』『倫常』而死戰。事實上他們主要目的還是爲了求富貴。曾國藩也不願意羅澤南勢力獨盛，故用收門生的方式，使羅氏學徒爭着拜曾氏做老師；湘軍大將王珍（卽王鑫）不服，說「我的老師只有羅山（澤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終被排去；其舊部後來卽形成左宗棠系的湘軍。曾國藩用同鄉、同學、親友、師生四種關係團結湘軍，造成私人軍隊，誰招募服從誰的作風，同時又奉他爲唯一的獨裁領袖。在左系湘軍成立以前，整個湘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每個營只服從營官一人，各個營

獨立，彼此不相統屬，除服從曾國藩，不受其他任何人節制，近代軍閥軍隊從曾國藩湘軍開始，李鴻章淮軍、袁世凱北洋軍等等軍閥軍隊一直繼承到現在。

太平軍佔領土地在長江沿岸，非水師不能決勝負。因此曾國藩用更多的力量籌辦長江水師，大造船艦，尤其重視洋砲，要求咸豐帝向廣州購買千餘尊，裝備戰船；洋砲不到，決不出戰，他崇拜洋砲，贊美備至，認爲戰勝的決定因素。

咸豐四年二月，湘軍水陸兩軍組織完成，大舉出戰。陸軍五百人爲一大營，非湘鄉人營官所統鄉勇稱小營，附屬於湘軍各大營。陸軍凡十三營，五千餘人。水師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營，五千人。官員、練勇、工匠、夫役水陸共一萬七千人。湘軍將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學作基本的封建主義的武裝，在軍事上有相當周密的準備，在湖南後方有豪紳地主的擁護，算是當時有力的反革命軍隊。

湘軍出境，曾國藩請求咸豐帝發給他空白執照四千張，內捐虛銜執照、捐監生執照各一半，派專人在湖南（湘軍根據地）、江西（湘軍進攻的目標）、四川（湘軍餉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規模開捐，籌餉是目的之一，主要還在讓那些缺乏社會地位的反動分子取得紳士資格，在本地辦團。他的主意是『以紳輔官，以民殺賊，佐兵力之不足』（奏參江西巡撫陳啓邁摺）

曾國藩反革命事業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於爭取滿洲皇族的信任。他辦團設『發審局』

殺人如麻，負責局員二人，其一是滿人裕麟。他練鄉勇，遭綠營將領（多是滿人）猛烈反抗（甚至採用兵變方式），乃用色欽額總管營務，保舉塔齊布升任湘軍大將，二人都是滿人又都是綠營出身的軍官，使綠營反抗不成大害。後來出境作戰，總是上奏章，誇張塔齊布的忠勇和戰功，說他們『二人親如兄弟，合如膠漆。』塔齊布死後，特別尊崇多隆阿，推他做統帥，指揮湘軍大將攻安徽陳玉成軍。曾國藩力求取得滿族統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掠漢族人民，就在小事細節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第二節　與太平軍相持（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六一年）

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水陸軍準備出戰，首先頒佈一道叫做討粵匪檄的文字。這篇檄文充分表現湘軍將領的封建性漢奸性，大意如下：

（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蘇）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針對太平軍老兄弟新兄弟的區分，挑撥內部分裂。

（二）『粵匪崇天主之教，謂田皆天主之田也，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針對太平軍之崇奉耶穌與宣傳

原始共產主義，看重號召讀書人反對天主教，保衛孔孟聖道。這一號召不僅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當時還散佈在民間的守舊觀念。

（三）『粵匪焚郴州之學宮（孔廟），毀宣聖（孔子）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關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之所共憤。』針對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軍宣佈的民族大義，曾國藩却一字不敢提到，只說幾句『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卹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話。在宣傳上，太平軍在反滿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得廣大人民的擁護，湘軍在反對天主、保護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響。在軍事上，太平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到處受人民歡迎；湘軍攻城奪地，盡量燒殺搶掠，將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戰也非常兇悍。在政治上，太平軍領土內一般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比較改善；湘軍實際是曾國藩率領若干股賊匪，出省恣意殺掠，但他代表全國所有反動黑暗勢力，又以投降主義的方法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滿漢矛盾，以及中國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程度的反革命團結，基礎也還不弱。太平軍和湘軍在這些條件下進行十二年戰鬥，相持階段佔了八年，最後太平軍失敗了，這却不是因爲湘軍有什麼特別的本領，而是因爲太平軍一部分領袖的短見——他們一到南京就不圖進取，日趨驕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結果。

太平軍到達南京，即採取保守主義。不乘勝以主力北上，發動北方民衆，直搗反革命的基本巢穴——北京（在當時是完全可能的）讓敵人得以從容重新調度力量，這是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後來失敗的張本。不僅如此，太平軍在下游不取上海、江、浙，滿淸仍得享受漕米（北京滿人及官員的生命）、地丁、關稅、鴉片捐、外交權等利益；上游不發動、領導捻軍及其他起義軍，空耗兵力與滿淸爭武漢三鎭，旋得旋失，終不能守；在這些方面，戰略上也已處失敗地位。湘軍作戰計劃，先取武漢，扼上游形勢，推胡林翼（也講程朱道學，與左宗棠同學）坐鎭調度，他的反動才能至少同曾國藩一樣。有時還要高些，湘軍後方鞏固了。第二步入江西攻取九江，第三步進安徽取安慶，最後取南京。曾國藩固守這個方針，即是在危急關頭，也死不放鬆（如在江西星子縣與安徽祁門縣誓死不移營。）太平軍石達開攻江西，陳玉成攻安徽，李秀成攻江浙，總不能牽動他的主力（曾國藩部爲基幹）變換方向，甚至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也不曾動搖他的這個反革命戰略步驟。

正當湘軍出發的時候，太平軍攻入湖南，進軍長沙附近。曾國藩自率一部份水陸軍攻靖港，湘勇潰散，曾國藩三次投水尋死，都被隨從人撈起。陸軍主力塔齊布，水軍主力楊載福、彭玉麟攻湘潭大勝，挽救了他的湘軍。他描寫這次戰功說：

「水勇開放大礮，專意射火焚船。是時北風甚勁，順風縱火，遇船即着，自卯至未，燒賊船六七百隻。長髮

（老兄弟）短髮（新兄弟），逐浪飄流，紅巾黃巾（太平軍服裝），隨波上下，岸赭水溫，同歸浩劫。水戰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

他把慘殺當作痛快，後來每次戰勝，總是用痛快的表情，繪聲繪色的寫出屠場慘景，宛然一幅一幅的地獄圖，向滿洲皇帝報功請賞。他的漢奸劊子手立場的堅決，眞像頑石一般。

靖港湘潭戰後，太平軍退回岳州，曾國藩乘機重整水陸軍，裁去潰勇五千，補進羅澤南等營。羅營軍官全是羅門學徒，戰鬥力很強。陸軍有塔、羅，水軍有彭、楊，湘軍進一步堅強了。咸豐四年七月湘軍攻陷岳州，九月攻陷武昌漢陽，十二月進圍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

曾國藩出境作戰，感到三個鬥難：

第一，太平軍作戰勇敢，『愈剿愈多，愈擊愈悍，』湘軍死傷極重，銳氣挫損；曾國藩乃提倡獸性來報仇洩忿，『振作士氣，』例如興國大治戰鬥，獲俘虜一百三十四名，『一概挖目凌遲，』九江城外獲俘虜十二人，立卽『凌遲梟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遲，』武昌城外太平軍新兵戰敗，『帶回七百餘人，全數斬決。』崇陽戰鬥擒獲七十餘人，殺死祭陣亡將士，祭畢，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國藩獸性示範下，湘軍的殘忍是從古少有的；例如同治元年七月，湘軍攻破寧國府：『大呼直入，一律斬薙無遺。』過了兩個月，還是『城內外屍骸狼藉，無人收埋』（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賊匪』遜湘軍的殘暴，野獸遜湘軍的貪婪，賊匪兼野獸，才是湘軍的眞面貌。

譚嗣同描繪這個眞面貌說：『……湘軍以戮民爲義，城邑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捕匪爲名，無分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捲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仁學卷下。）事實上湘軍攻破一城，就是屠滅一城，也就是洗切一城，所謂『城破時，百物同歸於盡』（批示徽州知府劉傳祺稟。）就是全城生命財物，頓時化爲烏有。

第二，人民擁護太平軍，敵視滿清。許多記載都說『民賊合一，』『民不恨賊而恨兵，』『賊如梳（沒收富貴人財產，）兵如篦（無所不取。）』曾國藩自己也說：『自岳州至南京數千里，小民蓄髮納貢，習爲固然，雖經諭令薙髮，鄉民狐疑觀望。官軍稍有挫衄，則四面皆賊，餉道斷』（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又說：『官兵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數，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甘心從逆。官兵過境，無物可供買辦，無人可爲嚮導。』（水師小勝並陳近日剿辦摺）『派出探兵，多被鄉民擒殺』（陳明鄰省援兵協餉片、曾國華殉難三河鎮摺。）於是曾國藩的獸性發洩到人民身上，縱兵擒殺燒掠，殘留的人民，強迫薙髮，作爲投順的標記。英人令利揚子江日記稱太平軍紀律嚴明，沿途破壞大多爲清軍所爲，責英國援助清軍爲不義。容閎西學東漸記對太平軍『官軍』曾作公平的記載，他說：『人民對太平軍較有信用，商不輟業，農不輟耕，無荒涼景象。而太平軍對人民，亦未聞有虐待事，相處甚得。』又說：『運河（江南運河）兩傍之田，皆已荒蕪，

草長盈尺，滿目蒿萊，絕不見稻秧麥穗，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眞象（指清軍燒殺破壞）必且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實由於官軍之殘暴，以予等沿途所見太平軍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極嚴之軍法。』就是曾國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裏也承認太平軍『禁止姦淫，聽民耕種，民間耕穫，公私各半，傍江人民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後，太平軍還是『民心未去』（覆陳逆酋李秀成正法片）。他爲要取得勝利，乃大燒大殺，做到『男婦逃避，烟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使太平軍『行無民之境，猶魚游無水之池，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他見長髮人便殺，從前滿清入關『留髮不留頭』，殺死中國人民無數，曾國藩又大殺蓄髮人民，強令中國人民當滿洲貴族的奴役。如果他還有絲毫漢人氣味的話，二百年前薙髮慘史，總不能無動於心的啊！

第三，湘軍是賊匪組織。目的在搶掠，搶飽了就『思颺，』就是說想逃散。咸豐四年，曾國藩對咸豐帝報告攻破武漢以後的情形說：『水師搶船太多，私匿藏貨，破城以後，水陸弁勇各獲財物頗有飽則思颺之意』（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田家鎮戰鬥，『各勇奪獲賊船至五百餘號之多，彭玉麟恐船隻太多，爭奪貽誤，又恐衆勇飽則思颺，遂將奪囘之船，一并燒毀』（官軍攻田家鎮燒盡逆船摺）這還不是強盜爭贓的圖畫？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震怒以衞吾（孔、孟）道』？（討粵匪檄）曾國藩要鞏固軍隊，乃用一暗一明兩個辦法。暗的辦法是縱兵殃民。例如湘

軍駐紮石埭城，紳士們間接向他訴苦說：『兵勇拆毀房屋，以作柴薪，捉去歸民，爲伊搬運，所有店舖，被兵勇霸佔居買賣，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代竹木，而實擄取室中器物，城鄉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致歸民有官兵不如長毛之歎』（石埭紳耆致在省諸紳書）這是平時駐軍的情況。戰時殺掠算作軍功，誰敢向他訴苦呢？他在事情無可掩蔽的時候，訓斥軍官一頓，表示維持『紀律』和『聲譽』。明的辦法是虛報戰功。憑他善於做文章，把湘軍寫得戰無不勝，一方面取得滿淸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籠絡飽則思颺的軍心。湘軍保至三品以上的軍官，不下數萬人（陸軍借補小缺請飭部核議片）事實上湘軍幾乎全部是軍官。兵易變軍官，小官變大官，使這些人貪利又貪官，升官無止境，貪利也無止境，繼續留在軍營當賊匪。也有整營的官和勇，搶飽了不願打仗，曾國藩只好全營解散，另招一羣『深山窮谷，寒苦之民』來補充。湘軍始終依靠『貪殘』維持他的『戰鬥力』。

咸豐四年十二月湘軍圍九江，至八年四月陷九江，九年六月陷景德鎮，江西入湘軍手，前後凡四年半中間經無數次大戰，陸軍主將塔齊布、羅澤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時斃命）都被太平軍擊斃，水軍戰敗被分爲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部，形勢常在危急中。曾國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從浙江方面獲得閩江的餉銀、食鹽及上海的關稅、釐金，湘軍不斷潰敗，終得免於散滅。太平軍不出兵取江浙，却在江西與湘軍苦戰，是極大的失策，石達開主持江西軍事，

曾國藩最怕他，說他『狡悍爲諸賊之冠。』六年八月，洪、楊、韋內訌，石達開馳回南京，咸豐帝喜出望外，令曾國藩準備石達開來投降。曾國藩到底是老練的，他答覆咸豐帝，深怕石達開執朝政，說：『若其石逆勝而洪韋敗，則該逆挾詭詐以馭衆，假仁義以要民（結民心）方且飛揚自恣，未必遽有投誠之心』（江西近日軍情據實覆奏摺）他又知道卽使石敗也不會投降，說他曾勸太平軍九江守將林啓容歸順，僞造文件騙瑞州守將賴裕新離防地，均無成效，還是切實備戰要緊。果然，石達開出南京後，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曾國藩大恐慌，急令大將曾國荃、李元度率湘軍主力攻石軍後路，大將李續賓（羅澤南部統將）出全力攻陷九江，石達開是孤軍，不得不退出浙江。

太平天國的內訌當然是此後太平軍失敗和曾國藩成功的一個決定原因，但太平軍後期的陳玉成李秀成兩個健將，並未使曾國藩得到順利的成功。咸豐九年十月曾國藩定四路攻安徽計劃，曾國藩曾國荃任第一路攻安慶。太平軍安徽主將陳玉成驍勇善戰，聯絡捻軍，八年十月，三河鎮大戰，玉成擊斃李續賓曾國華，羅澤南舊部全軍殲滅，曾國藩畏懼陳玉成，呼爲『四眼狗』出全力對抗，才能支持。十年閏三月，李秀成陳玉成合攻江南大營，和春、張國樑敗死，大營潰散。秀成軍攻取蘇州，直入浙江境。滿清朝廷感到生命危險，發生前所未有的慌亂，第一次給曾國藩地方政權，叫他署兩江總督，帶兵親往援救『保全東南大局。』江南大營（向榮自廣西尾隨太平軍到南京，駐兵孝陵衞，號江南大營）統帥一向是滿人（從向榮到和春，）軍隊是綠營兵，駐地

在南京附近。照咸豐帝的看法，滿洲統帥與漢人曾國藩對立，綠營兵與湘勇對立，湘軍在外圍戰勝太平軍，滿洲統帥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滿洲統治者的威信。大營潰散，咸豐帝的計劃失敗了，曾國藩取得兩江總督，表示湘軍勢力大進了一步。不過曾國藩幷未應命赴援，他認爲安慶城圍一撤，全局敗壞，不可收拾，堅決不離開安徽。當時滿清的形勢確是異常危急，江浙迫於李秀成，鄂豫皖困於陳玉成、張洛行，江西又爲李世賢黃文金所攻入，這種局面迫使曾國藩也不得不壓抑一下曾系湘軍獨佔戰功的思想，保薦左宗棠幫辦軍務，當自己的助手（實際是胡林翼保薦；咸豐帝重用左，分曾軍權，）保薦沈葆楨（林則徐女婿，不滿意穆彰阿派的曾國藩）守江西，保薦李鴻章辦淮軍。他對李鴻章特別重視，說『該員勁氣內斂，才大心細，』挑選長江水師打仗得力的將弁，交李鴻章使用，從此出現了左系湘軍和李系淮軍。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使滿清的統治更見危急也使曾國藩的毫無民族立場的漢奸本質更見發展。這就是英法聯軍之佔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脅到清室與整個中國的生存。照常理說，這是滿清立國以來的空前巨變，忠於皇室忠於聖道的曾國藩應該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實却完全相反。曾國藩仍舊堅持他的軍事計劃，自己專攻安慶，江西交給左宗棠準備從江西入浙江，對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則預定投降，喪辱悉所不計。他在奏覆勝保請飛召外援摺裏說，『俟該夷就撫。』勝保的所謂外援自然是指湘軍，但這個外援這時却不是咸豐的外援，

而是英法的內應了！形式上他是說要英法就咸豐之撫，但這顯然只是要咸豐就英法之撫的阿Q式的說法罷了！當時咸豐帝調湘軍上諭說：『情形萬分危急……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曾國藩却拒絕調兵，直截提出「撫」的辦法，他知道對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喪失兵力，破壞反革命的內戰計劃，不如投降妥協較爲便宜。滿清昏瞶賣國，曾國藩精明賣國，他的才幹勝任反革命的內戰首魁，因之他也勝任賣國能手。

當英法反動派聯合的軍隊火燒圓明園，咸豐帝逃往熱河，清政府訂城下之盟北京條約的時候，曾國藩正在江西安徽埋頭作反革命的內戰，連打敗仗。中、英、法和議成功，法國俄國的反動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軍，美國反動派要求從海道運漕米到天津，曾國藩贊成『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法國剛把他的『皇上』驅逐出北京，還不曾回來，也要『奬而允之，許其來助』反對太平天國（覆陳洋人助剿及採米運津摺）他的頭腦裏，確是除了反對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沒有別的思想。北京條約後，英法與滿清的勾結進了一步。咸豐十一年五月，幫助滿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國海關）建議進口鴉片每箱課稅四十五兩，用稅款買外國小火輪及槍砲，法國也願出賣槍砲並派人傳授製造法，咸豐帝很滿意，徵詢曾國藩意見。曾國藩完全贊成，認爲『我皇上聖慮周詳，安內攘外（一）之至意。』（覆陳購買外洋船砲摺）他要求咸豐帝在訂購洋船未到前，馬上先撥給兩隻從美國租來的破舊船使用。在利用外國人力物力以屠殺

人民時，曾國藩就全然不管什麼中國文明與外國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國侵略者當做親老子，把本國人民當做唯一的仇敵；假安內攘外之名，行安外攘內之實；假尊孔復古之名，行亡國滅種之實。這正是曾國藩傳給後來統治階級的「不朽」衣鉢！

曾國藩堅決圍攻安慶，十一年八月終於被他攻破，屠殺城中太平軍二萬餘人（老弱婦女在外。）跳水圖逃的又被水師截殺，『實無一人得脫』。他自稱大快『人』（獸）心，向咸豐報功，不料這個滿洲主子七月裏因貪色過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慟絕』，說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時候博他一笑。

第三節　戰勝太平軍（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四年）

咸豐帝死去，西太后那拉氏當權。她知道要滅太平軍必須依仗曾國藩，而曾國藩的漢奸忠實性又確信可以保險，立即大胆給他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大權（十一年十月。）他獲得漢員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權力，在這一時期中，高度發揮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對外關係上，他善於把封建勢力與外國侵略勢力相配合，依賴外國來取得反革命內戰的勝利。

上海是外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李秀成軍取江浙，官僚豪紳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

爲反動份子的集中點。咸豐十年，上海反動份子組織愛國會，出資僱美國的一個在本國犯罪逃亡到上海的流氓華爾成立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曾國藩從『人民如海，貨物如山』、『關稅每年數百萬兩』一點看，上海是最大的『餉源』，從取得洋船洋炮洋兵『助剿髮逆』一點看，上海是求外國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徑。他看到上海是決定反革命與太平軍內戰勝敗的關鍵，他就主張『聯絡洋人協力守禦』上海。同治元年正月議覆借洋兵剿賊片裏說：『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後面的『不可』却是一時的裝腔作勢，隨後他也就主張派軍隊與西兵『會剿』內地了。初時，英法駐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攻，江浙紳商向清政府請願借洋兵，清政府動搖不定。同治元年三月曾國藩派李鴻章帶淮勇往上海，準備『會剿』。四月，常勝軍聯合英法反動派的軍隊攻入嘉定青浦兩城，太平軍圍城猛擊，外國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說：『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曾國藩看洋兵戰敗，對於洋兵入內地的主張，又表示冷淡。同治二年，英人反動派戈登代華爾（在浙江慈谿縣作戰被擊斃）統率常勝軍，與李鴻章親密合作，共同進行江蘇境內反太平軍作戰，屢獲勝利。曾國藩看到李鴻章左宗棠用洋兵攻陷江浙兩省，卽又變冷淡爲擁護。清軍與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財物（搶掠），清軍得土地（當然也搶掠）曾國藩主張的所謂『會剿』辦法，李左在江浙把它執行了。

曾國藩本人駐安慶，同治元年五月曾國荃率湘軍主力進至雨花台，八月，李秀成猛攻湘軍，血戰四十六日，秀成軍敗退，南京合圍。二年十二月李鴻章戈登陷蘇州。三年三月左宗棠陷杭州。清政府催曾國藩迅速攻下南京，命李鴻章帶兵來助。曾國藩拒絕李鴻章，說最好教他帶餉銀來，李鴻章也就託故不敢來。這是曾國藩最顯著的一次內部矛盾表現，像他那樣老奸虛僞，爲什麼不能掩飾這個矛盾呢？湘軍起初利用餉銀，招誘窮苦破產農民當練勇（餉比綠營兵多三倍），出境作戰以後，官兵主要收入是搶掠財物，擄獲金幣珍寶不可勝計，流行着『軍興不乏財』的諺語。曾國藩在咸豐七年謝天恩奏摺裏也說：『湘中勇夫，以投軍爲名（官爵）利（搶掠）兩全之場，以戰陣爲日用常行之務，赴江西、湖北投効者，絡繹不絕，父缺子代，此往彼歸』造成湖南省紳士流氓痞棍大發賊匪財的熱鬧場面。搶掠，鼓舞了湘軍的『戰鬥勇氣』也強固了湘軍的戰鬥目標——南京。當時『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這就是湘軍拒絕淮軍來助，各營輪流苦攻，不惜任何嚴重損傷，圍城二年以上，病死二萬人，戰死八九千人，而作戰竟始終不懈的原因。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攻破南京，『分段燒殺，秦淮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殺十餘萬人』。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太平軍的勇敢，他說：『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

寇』（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從敵人的口中，正顯出了太平天國的將領士兵，乃是中國民族偉大的英雄的戰士。他們爲了反對滿清統治者、外國侵略者和漢奸的聯合反革命勢力，爲了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社會改革，忠貞不屈，視死如歸，悲壯激昂，可歌可泣。曾國藩誹匪賊無情的殺戮這樣大量的民族精華，豈但堪稱『萬惡』而已嗎？他大報殺人功，對財物却說：『僞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賊庫，克服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爲從來罕聞之事』（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金銀如海』的南京，爲什麼忽而變爲『全無貨物』的空城呢？原來南京的一切財物，特別是江南民間的財物，已都完全被湘軍洗劫一空，曾賊只好說一句『爲從來罕聞之事』來掩飾。曾國藩看到李秀成自述，揭露出湘軍歷來虛報戰功、諱敗爲勝、燒殺搶掠等等的內幕，深以爲忌，所以決定違抗『御旨』，把李秀成留下自行處置。很顯然的，如果遵照滿清皇帝命令，送李秀成到北京『獻俘』，曾國藩和湘軍的『名利兩全』在滿洲皇帝一怒之下，可以變爲名利兩喪。他這時再也顧不得他一生標着一個『誠』字的假面具了，他至少兩次地删改了李秀成的自述，忽促地殺了他以滅口（秀成受凌遲極刑，死訊傳出，南京居民罷市哀悼這位偉大的英雄。）曾國荃搶得寶物金銀最多，湘軍老將如多隆阿、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心懷嫉妬，借不同意擅殺李秀成爲由，紛紛向曾國藩告退，曾系湘軍幾乎鬧到爭贓火併的局面。反對派左宗棠，沈葆楨又向清帝攻擊曾國藩兄弟吞沒財寶（事載湘軍志曾

軍後篇。）清政府本想從審問中查究出金銀所在，但在曾國藩提供裁撤湘軍三四萬人的交換條件下，又看到將領爭奪贓物，形勢緊張，也就追認拒絕獻俘，擅殺李秀成爲「合法」，把危機和緩下去。曾國荃給李鴻章信裏說：「李秀成擒獲後，弟徧刺以錐，流血如注，隨卽傳置檻車（囚籠）中。」曾國荃對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比的毒手，不是簡單的爲了洩忿，更不是強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李鴻章給友人信說：「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後來的地方官難於完成恢復的工作），似需百年方冀復舊也。」湘軍燒殺搶掠的慘酷，一羣匪魁自己供得夠淸楚了。曾國藩殺李秀成，大裁湘軍，令曾國荃稱病歸家（託辭回家治疥，而曾國藩長着極重的癬，不曾回家醫治過，）都是爲了掩護湘軍賊匪的暴行，但曾國荃在家鄉大建私第，聲名仍是惡劣不堪。

曾國藩的湘軍始終是如此兇惡的一幫殺人放火的匪賊，但是他們却始終口口聲聲稱太平軍爲匪賊，爲殺人放火。但是究竟誰是匪賊，誰是殺人放火，不是明明白白的嗎？……？……

曾國藩入南京，急辦三件大事：首先是蓋造貢院，當年舉行鄉試，提拔江南士人（地主紳商的子弟）；其次建築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閑散旗兵南來駐防，發給全餉；同時強力裁撤湘勇（不發欠餉或名義上發欠餉，）一部份交曾國荃押解回籍，一部份流落南京，因索欠餉及其他非法行動，又被曾國藩用懲辦游勇名義殺死無數。曾國藩不僅消滅了農民起義的太平軍，而且也消

滅了農民從逆的大部份湘勇，食戰勝之果的只是滿清統治者及一批擁護封建舊制度的士大夫、大買辦、大地主。

第四節　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的各種分裂表面化（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

曾國藩在江南鞏固他的勝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滿清的農民軍捻軍勢力又已大張，滿清兩個大帥——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蒙古人）與湖廣總督官文束手無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軍，同治三年十月令曾國藩帶兵到皖鄂交界處督『剿』。曾國藩深知滿清想在攻捻戰爭中造成滿蒙將帥的威望，對抗湘軍將帥，自己再出『立功』，將更招滿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面繼續裁撤湘軍，一面推薦後起的淮軍並湘軍一部份，歸僧格林沁、官文調遣，保證各軍服從命令。這正合滿清的願望，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原任。

僧格林沁憎惡湘淮軍，說他們都不能作戰，唆使安徽地主武裝首領苗沛霖殺湘軍，挑釁，又令部將陳國瑞與湘軍互鬥，奏劾湘軍爭功。湘淮軍方面曾系湘軍只服從曾氏兄弟（國藩、國荃）左系湘軍只服從左宗棠一人，淮軍只服從李氏兄弟（鴻章、鶴章、昭慶），曾國藩地位雖高，指揮淮軍，仍需通過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統，更不能統曾系湘軍。僧格林沁、官文統率湘淮軍，結果引起滿漢兩系間顯著的分裂。僧格林沁敗死，滿清只好又教曾國藩出來統軍，維持北方的危局。

曾系湘軍大部分經曾國藩強力裁撤，又因長官尅扣軍餉，兵勇和下級軍官非常憤恨，兵變到處發生。例如同治四年，鮑超部（川勇，在湘軍中作戰最悍，搶掠也最兇）在湖北、江西、福建兵變，李、蔣、成三軍在湖北，訓、義兩軍在皖北，金、唐、朱各軍在皖南，相繼譁變潰散，再加被捻軍擊敗（攻捻中。湘軍止殘留曾系張詩日，左系劉松山兩部，）湘軍基本上消滅了。湘軍失意官勇，深抱不滿，相率加入秘密反滿團體哥老會，影響在營官勇也秘密入會，曾國藩嚴令『查獲哥匪，立予正法』與湘軍士兵形成嚴重的對立，從此哥老會代天地會勃興，成為有力的反滿團體之一。湘軍紀律，人民早有『官兵不如長毛』的定評，淮軍同樣『與民為仇』（批淮軍提督吳長慶稟）曾國藩無法約束，指揮不靈，屢戰屢敗，只好讓位給李鴻章，使淮軍享滅捻的軍功（劉松山部戰功最大，招滿清及李鴻章的疑忌，抑功不賞）攻捻戰爭中，湘軍本身分裂，實力保存無幾，湘淮軍又分裂，於是李鴻章政治地位追上曾國藩。

捻軍敗後，滿清認湘軍為『隱患』（淮軍後起，戰功較小，兵勇很少參加哥老會，滿清扶植淮軍，使與湘軍對立，）定計消滅湘軍，令左宗棠帶劉松山部與西北回族起義軍戰鬥。同治八年，劉松山部據綏德，高連陞部在宜君兵變，起因都是查拿哥老會員。將領不敢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當，跟左宗棠到新疆的湘軍，士兵不全是湘人了。

消滅湘軍，滿清與曾國藩意見一致，起初利用落後的一部份農民，消滅革命的一部份，轉過

來又消滅被利用者，所謂兔死狗烹，統治階級是慣用這個毒計來鞏固自己的權位的。滿淸在人民起義反抗中得轉危爲安，曾國藩得享受富貴尊榮，自然獲利極大，單就湘鄉一縣說，二品以上文武官將近一千家，他們都是豪紳大地主，佔地不繳租稅，官吏強迫貧民代繳，造成普遍破產的現象。曾國藩號召爲保衞聖道、維持傳統文化而戰，結果只是少數人富貴，多數人死亡和破產。

曾國藩在內戰中獲得勝利以後，竭力媚滿媚外來保守個人的反動成果。他替滿淸製造半殖民地政府的媚外理論來鞏固國內統治，認爲『洋人之患此天所爲，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我輩分內之事』專重在反對革命人民的內戰（批候選訓導計棠稟）『借洋人之力，開誠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遵旨通籌全局摺）。但如洋人並不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如英法聯軍之役，那又該怎麽辦呢？他認爲這裏應該『從大處着眼：咸豐十年八月洋人入京，不傷毁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他把外國侵略者看作天神一般，侵略是『有德於我，』要聯絡他『共保人財。』半殖民地統治階級的媚外心理，以曾國藩爲代表而理論化了。英法聯軍的藉口之一就是廣西人民的仇教案，同治九年，天津又發生一起教案。因民間訛傳教堂迷拐人口，挖眼製藥，有人與教徒在教堂口角鬥毆，法國領事豐大業洶洶來見直隸總督崇厚，向崇厚開放手槍，又向天津知縣劉傑放槍，擊死僕從一人，人民遂激動義憤，毆死豐大業，焚燒教堂，殺傷

教民數十人。這一類仇教事件，本質上是人民原始的自發的反侵略運動，法國藉口仇教，又提出許多無理要求；滿清命曾國藩往天津查辦，在反對太平軍時口口聲聲大罵天主教的曾國藩，這時却力主『和平』辦理了，對法使預先保證殺人數目，求其滿意；以至連政府中人（包括李鴻章）也不能忍受，羣起抨擊。說：『辦案當以供證爲憑，豈能預爲懸擬，強人就案。』這個人頭販子曾國藩堅持自己的主張，終於重辦『滋事人犯』斬二十人，充軍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也辦充軍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國謝罪。經這次屈辱外交，曾國藩的漢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國朝野呼爲賣國賊，人人欲得而誅，連他的湖南同鄉也把他在湖廣會館誇耀功名的扁額，摘下來打碎燒成灰了。他自己也覺得沒趣，說是『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爲一生憾事。』同治十一年，這個漢奸劊子手在國人皆曰可殺的呼聲中死了。

被後來直到現在的一切反動派所謳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眞相就是這樣的這些本都是公開的在當時是婦孺皆知的事實，但是統治階級却不敢宣佈它們，硬要捏造另外一套『歷史』竟然把曾國藩說成『聖賢』了。這個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正是和曾國藩一模一樣的人物，他們不也在裝模作樣要羣衆承認他們是『聖賢』嗎？世界一天被虎狼所統治，誰能禁止虎狼們互稱並自稱爲『聖賢』的自由呢？

曾國藩是封建中國數千年，尤其是兩宋以下封建統治階級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體現者

又是鴉片戰爭後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在這一點上，他的確是盡了『繼往開來』的任務。他精通極端專制主義也是極端奴隸主義的哲學——程朱道學，運用在言論上，就是滿口『誠』、『禮』、『仁義』、『道德』等字樣；運用在行動上，就是極度的殘忍，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為『痛快』。他被天朝田畝制度駭倒了，要挽救封建統治者的權利，犧牲數千萬人生命，說是『衞吾道』；所謂『道，』只是少數大地主大官僚的『道，』從人民看來，恰恰是大逆不道。

曾國藩及其領導的一羣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滿洲皇族的忠實奴隸，屠殺漢人。對新來的外國侵略者，又甘心當忠實代理人，認反革命的洋人不滅滿清、直接參加反革命的內戰為『有德於我，』不必再計較『關稅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壓人民一類『小處』（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他有意識的認清了要維持國內統治，必需依賴外力，必需不惜喪權辱國的條件去交接外力。他規定這個對外公式，也就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規定半殖民地的依附關係。對國內弱小民族，左宗棠殺回民數百萬，席寶田殺苗民一百萬，這羣人把殺人當做專業，他們殺漢民數千萬，當然不會放鬆對回苗的屠殺。當時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學大師戴望，給曾國藩一類人下了定評，說是『斯盜賊夷狄角逐於天下』（汪仲伊握奇圖解序，）眞是一點不錯。

曾國藩是屠殺同胞的內戰能手，一切思想行動，都以反革命的內戰爲中心。他反對太平天國獲勝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軍自身的錯誤，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國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練長江水師，洋砲不到決不出戰，『湘潭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砲之力，』因此得出『必需洋砲陸續接濟，乃能收愈戰愈精之效』的結論（請催廣東續解洋砲片。）駐軍江西安徽，逐步進逼南京，軍餉來源多數是上海關卡的稅銀，主要是鴉片捐稅。保衛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接參戰。沒有外國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戰勝太平天國。曾國藩以後，凡是反革命的內戰能手，也定是賣國能手，曾國藩給這些能手啓示了實例。

鴉片戰爭壓迫中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軍起義揭開了救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曾國藩創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動典型。文化方面，堅守舊文化的黑暗面，拒絕外來的進步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却依賴外國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鎮壓民衆，在外國侵略勢力保護下，保存封建權利。這樣一個典型，中國一天不解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反動統治者一天不放棄這個典型的繼承。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無疑地已經極大極重地打擊了滿清的統治，動搖了它整個統治的基礎，滿清朝廷的聲威，從此一落千丈了。歸根到底，曾國藩之流究竟還是沒有救活了滿清朝廷，只讓它多延長了幾天的殘喘，而太平天國的人民革命精神也並沒有死亡，這種革命精神的種子，經過太平天國英雄的戰士們是更深地種下在人民的

心中，甚至也種在由湘勇發展的哥老會的心中了。孫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國的繼承者自許，並終於完成了太平天國推翻滿清的未竟之業，這正如他的叛徒們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許，並幻想完成曾國藩消滅中國革命的未竟之業一樣，完全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就反動方面說，曾國藩創湘軍，主觀上雖是為了挽救滿清，客觀上却也起了些削弱滿清的作用：

滿清侵入中國，軍隊主力是八旗兵，平吳三桂到鴉片戰爭，主力是綠營兵，兩種軍隊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揮權。湘軍淮軍是近代漢族軍隊，滿清政府要通過漢族軍閥才能使用。這樣，滿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軍起義前，地方軍政長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極大多數是滿洲人。咸同兩朝，湘軍轉戰全國，督、撫、提、鎮（總兵）不得不用湘淮軍中人。這樣，滿清對地方的統治也削弱了。

鴉片戰爭時，滿清獨攬外交權。咸同以來，曾、左、李與上海紳商、買辦、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吳煦劣跡昭著，被人參劾，曾國藩奏稱吳煦聯絡洋人，廣交洋商，厚結洋將華爾，吳煦的進退，關係英法各國對中國的態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換吳煦。左宗棠經買辦胡雪巖介紹，向英商借款（中國第一次借洋債）作為出兵新疆的經費。李鴻章兼官僚軍閥買辦三種性質，與反革命的洋人關係尤密，滿清不得軍閥同意，不能單獨進行外交。這樣，滿清對外關係也削弱了。

曾國藩爲首的湘軍，挽救了滿清，同時客觀上也削弱了滿清；滿漢統治者之間，勢力起着顯著的變化，從此滿清政權，逐漸向漢族軍閥轉移。但這種變化，當然是出乎曾國藩這批反革命漢奸劊子手的主觀意識之外，其結果倒不是加強反革命，而是成爲有利於新的革命火燄迸發的因素之一了。歷史發展規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於此。

（第一分册全册終）